

聊城傳統文化研究

主编 吳文立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聊城傳統文化研究

主编 吴文立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编委会

顾问委员会

主任：金维民 李 喆

副主任：贾少勇 李望尘 马亮宽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高文举 周济成 杜泽逊 杨 达 宋士功 刘全来

编辑委员会

主任：吴文立

副主任：姜国峰 薛兆立 陈清义 侯秀丽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薛兆立 路子强 黄复庚 徐 民 赵 锋 洪 祥

姜国峰 侯秀丽 祝伟康 罗 文 陈清义 张和鹏

张东方 吴文立 任家斌 朱海波 刘庆功 布双起

王庆友

本辑编委会

主 编：吴文立

副主编：姜国峰 薛兆立 陈清义 侯秀丽

执行主编：张东方

执行副主编：路子强 祝伟康 布双起 朱海波

艺术总监：徐 民



序

一

序 一

□金维民

聊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时期，东夷人就在此地活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已在这里过着定居生活。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城群和中心城。在之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地处齐鲁、燕赵文化结合部，黄河、运河文化交汇点上的聊城，多次发生文化碰撞、融合与更生，逐渐形成了独特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她既有齐文化崇尚敬农的特质，又有鲁文化尚仁重义的特点；既有燕赵文化慷慨无私的侠义，也杂糅了秦晋文化开放宽厚的气度。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聊城是一个文化个性十分鲜明的城市。如果说在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上有诸多闪光点的话，聊城正是这样的闪光点之一。研究聊城的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是探求她的精神实质，发掘其中最有价值、最值得弘扬的传统精神。

一、忠实守诺的诚信精神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也是儒家所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春秋时期，聊城与鲁国毗邻，孔子曾多次到聊城授业讲学，其弟子子路、闵子骞、冉有等曾长期在聊城活动。可以说，聊城自古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滋润，并经过千百年的薪尽火传，使人们在躬耕之余，承接着数千年递送的诚信古风。《隋书》中曾对聊城人的诚信大加褒扬，称“今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

聊城人的诚信精神在治政、德教和百姓生活中俯拾皆是。齐景公时，晏子曾为东阿（今阳谷县阿城镇）宰，面对景公的不当之赏，晏子不仅不受，反而向景公反映实情，表现了可贵的诚信精神。战国时期茌平人淳于



髡，受齐威王派遣，向楚王献鹄，途中鹄飞，他仍拿着空笼去见楚王，楚王不仅不为失鹄而怒，还羡慕“齐有信士若此”。唐代聊城诗人魏万因崇敬李白而千里相访，感动得李白以平生最长诗篇相赠，并受托编辑李白的诗集。魏万不负重托，将历尽艰辛收集到的李白诗文编成《李翰林集》，使李白游历名山大川的诸多诗词得以完整保存、流传后世。从聊城遗留下来的一些习俗看，诚信的例子也随处可见。解放初期，聊城仍流行着“对瓦”卖牛的习俗，即在买卖双方将牛的价格谈好后，先将一片瓦摔成两半作为信物，等过一段时间发现牛没有问题后，双方再凭借各持瓦块完成交割。目前，在茌平、高唐一带仍流行着先吃饭后付款的风俗，而且结算以客人报数为准。民众以互讲诚信、互不相欺，入财利之场而不污、行商贸之业而不奸为风尚。新中国成立后，聊城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态度坚决、雷厉风行，也说明聊城的文化中具有诚信的传统精神。

诚信精神无疑是聊城历史文化中最精彩的篇章。今天，作为一种思想道德基准和一种契约信用原则，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少社会交易成本、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必需。2003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诚信聊城”的要求，有着诚实守信传统的聊城，今后也一定会书写出诚信的新篇章。

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开放、充满活力的齐文化的显著特点。聊城人创新精神的渊源，发端于以善于创造先进工艺技术著称的东夷文化，但更多地还是得益于齐文化的滋养。春秋战国时期，聊城隶属于齐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处文化土壤造就一个地方人群的文化性格，在齐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聊城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创新意识。

在人类由荒蛮走向文明的漫漫征途上，聊城历代志士仁人在思想、制度、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创新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远古时期，相传伏羲曾在阳谷一带研究天文地理，推出了二十四节气，开辟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纪元；黄帝的史官仓颉在东阿潜心造字，死后葬于此，至今铜城镇存有仓颉墓。夏商之交，伊尹躬耕于莘野（今之莘县），教民种谷植桑，带来中原农业文明的大发展。战国时期，出生于阳谷的杰出军事家孙膑创立了增兵减灶等战法，所著的《孙膑兵法》为我国重要的古代军事典籍。三国时的著名文学家曹植在任东阿王期间，不仅诗作出新、千古流传，而且深爱声律，属意弦音，是佛教音乐中国化的创始者，其创制的“鱼山梵呗”“传为后式”，直到今天仍兴盛于世界。唐初高唐



人吕才撰写的《阴阳书》，极大地丰富了唯物论、辩证法，为我国哲学思想宝库增添了新财富。宋代医学家成无己，首次完成了对“医学之祖”——《伤寒论》的注释，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明代临清艺人刘茂基创造的山东快书，至今广为流传。由于聊城人聪明能干，敢于创新，历史上曾创造了众多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特产名产。东阿阿胶已有2000多年的生产历史，自西汉至明清一直为贡品，并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东阿阿胶、临清贡砖与哈达、聊城毛笔、阳谷白酒等都曾为上等贡品，在国内居于重要地位。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多年来，我市始终把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不竭动力，经济发展速度连年高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2000年，市委市政府又以创新思维提出了建设卓越秀美的中国江北水城的奋斗目标，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中国江北水城”这一独具魅力的城市品牌，已经响彻大江南北、誉满国内外。

三、拼搏进取的图强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也是聊城人图强精神的生动写照。

聊城历史文化中的图强精神，突出表现在反侵略、反压迫上。特别是在近现代，聊城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此伏彼起。光绪年间，境内人民掀起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朱红灯、王立言等率领数万拳民，“麇集蜂拥，刀戟齐举”，焚烧洋人教堂，杀死反动教士，痛击清军，重创西方列强，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壮丽的篇章。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进犯、国难当头之际，中共聊城地方党组织、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同仇敌忾，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大打人民战争，同进犯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临清人张自忠，是为国捐躯的唯一的国民党上将军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中殉职的最高级别将领；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的范筑先，在聊城保卫战中壮烈殉国。他们的事迹和英名在人民心中树起了永恒的丰碑。

聊城历史文化中的图强精神，同时表现在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聊城历史上旱灾、虫灾、震灾连年频发，特别是境内河道众多，洪水之患长期威胁着居民的生存，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为了生存、安宁、图强，聊城人同大自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据考证，大禹治水的主要区域之一就是鲁西北平原。“禹治九河，徒骇为首”。流经聊城境内的徒骇河、马颊河及古黄河，均为禹当年治理过的河流，至今聊城境内仍有禹



堤、瓠堤遗址。元代至元年间，根据寿张县令韩仲晖和太史令边源的提议而开凿的会通河，减轻了民众负担和运输不便之苦，使南来漕船无需转经陆运，便可直达京师。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聊城人民继承优良历史传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地战胜了3年严重自然灾害，渡过了生活困难时期。改革开放之初，聊城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聊城历史文化中的图强精神，还表现在尚文重教上。在与贫穷落后的搏击中，聊城人非常清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把发展教育作为改变贫穷面貌的措施之一，使尚文之风渐渐树立起来。对此，《老残游记》中称，这里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明清之际，聊城文运大开，儒学星列，书院林立，私塾遍布，一时“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仅东昌府就有中进士者290人，中状元者5人。平民教育家武训行乞办学的义举，更佐证了聊城人兴学图强的思想。对武训的行乞办学，清廷大加褒扬，授予武训“义学正”的称号。文化教育的繁荣造就了很多名人志士，唐初名相马周、哲学家吕才，明代文学家谢榛，现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国学泰斗季羨林等都是聊城人。

改革开放以来，聊城在奋发图强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农业形成了蔬菜、林果、畜牧、水产四大主导产业，工业出现了一批在全国同行业居于重要地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城乡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全市涌现出了张海迪、孔繁森、白云、徐本禹等时代楷模。可以说，图强精神已经融入聊城人的血液，成为激励聊城人奋发图强、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四、崇商尚贸的重商精神

聊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水利、气候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农业发达。如果把聊城的历史文化比作一部雄浑的交响乐，农业文化无疑是它的主旋律，但商业文化也是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乐章。聊城重商精神的形成，主要受齐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运河开通以来多种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境内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兴起。考古发现中有春秋时期的大量贝币，表明当时已有商贸活动存在。秦汉时期，大量锦绣、罗、縠不仅进贡宫廷，并且销往朝鲜、蒙古、波斯、罗马等地。至唐代，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私营商业体系，博州的平绸、阳谷与东阿的绢均有出口。宋元时期，圆铃大枣、乌枣畅销江南。临清哈达先后



销往中国西藏和印度、尼泊尔、蒙古等国。元朝末期，由于京杭运河的开通，水运交通便利，使当时的张秋、东昌、临清成为南北漕运之要冲，带动了城乡工商业的发展，客商往来频繁，商品交换活跃。明清时期，商业更加繁荣。东昌为当时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临清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素有“小天津”之称。临清钞关税收占运河漕运税收的四分之一。当时，聊城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江浙、秦晋等地客商争相涌入，运河两岸，会馆林立，金店、银号、书坊、笔庄、药铺、茶馆等十万商户鳞次栉比，遍布城区。这种繁荣景象使我们不得不想：运河流经之地多矣，聊城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迅速崛起并且繁荣昌盛达400余年呢？根本原因就是大运河的波浪催醒了聊城人固有的商业意识，强化了聊城人的重商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使这里的纺织、制造等各业兴隆，为对外贸易打下了物质基础；有了这种精神，才营造了商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有了这种精神，才铸就了聊城辉煌的商业文明。

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京九、邯济铁路和济聊馆高速公路在聊城交汇，有着现代商业发展的区位、交通条件。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建设了香江光彩大市场等一批大型批发市场，积极发展现代物流、连锁经营等新型业态，打造城市中心商业区，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

五、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

“蹈和”，为聊城山陕会馆山门匾文，这既是商人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聊城传统精神的一种体现。“蹈和”的含义，就是在保持各种因素本质的基础上，使它们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兼容相通，人与社会的发展都处于和谐的氛围中。历史上，聊城人饱受战乱之苦，同时也经受了多种文化的冲击。可贵的是，无论是血与肉的搏杀，还是精神文化的撞击，都没有在这里播下仇恨与对立的种子，各种文化不仅没有受到排斥与压制，而且能够交融相长，共同发展，达到了一种新的、更高的境界，这与聊城历史文化中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是分不开的。汉韩延寿为东郡（聊城秦汉时属东郡）太守时，称当时的聊城“政教大行，最号易治”。“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曾任范县（治所在今莘县古城镇）知县，调任潍县知县后，曾赋诗一首：“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思切，但望人安与年丰”。这都充分体现了聊城人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



在聊城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化冲突。

第一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时期。当时，聊城处在东夷与中原交界地区，伴随着部落间的征战，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在这个前沿地带相互冲击，聊城较早地接受了这两种文化的洗礼。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并进而东部其他地区经过长时期的渗透融合，形成了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就是后来闻名遐迩、光辉灿烂的齐鲁文化的雏形。

第二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中国社会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礼崩乐坏，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迁。聊城是齐国西部的重要城邑，处在齐文化、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交界地区，随着诸侯争霸，以“仁”为核心的鲁文化、“重工商利物”的齐文化以及“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在聊城不断撞击消长，最后达到融合渗透。

第三次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南北文化大交融时期。是时，聊城境内黄河岸边的碭磧城（今茌平韩集高院墙一带，后为济州治所），为南北政权争夺的战略要地，王城（今北杨集东南、丁块西南一带）为平原郡治所，北魏孝文帝所推行的改单姓、说汉话、穿汉衣、和汉人通婚、倡导儒学教育等许多民族大融合政策，使南北双方的文化得以在这里融合为一体，先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第四次是在元明清时期。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随着会通河的开凿，穿越聊城的京杭大运河成为纵贯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津、江浙、燕赵、秦晋、荆楚等各地文化纷纷传入聊城，与齐鲁文化融会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这种新型的文化包含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秦晋文化、京津文化等多种文化成分，具有兼容性文化特色，其显著特征就是在农业文化中融进了商业文化，这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以上四次大的文化冲突，带来的不是文化的消蚀与退化，而是文化的融合与更生。多种先进的文化，不论其来自何方，都在聊城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都在这里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各种文化能在聊城兼容并包，聊城人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起了内在的根本性的作用。没有蹈和精神就不会形成融合，更不可能有后来的协调发展。

仁厚宽容的蹈和精神深刻影响着聊城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并逐渐成为人们讲礼仪、重和谐的社会风尚。元末明初，聊城因战乱和水、旱、蝗、疫之患，一度人口稀少，明政府多次组织向聊城移民。明洪武三年



序

一

(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50年时间内数次从山西省洪洞、潞州、泽州和山东省登(今蓬莱)、莱(今掖县)二府大规模向鲁西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不断迁入,民俗方面也出现了西风东渐之势,许多山西民俗被带到了聊城,如今鲁西人的许多方言和礼仪习俗,仍然打着当年大移民的深深烙印。移民与原籍民众和睦相处,相互汲取文化优点,共同为聊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明清时期,山陕、江浙、京津等众多外地客商长期选择聊城为生财之地,也说明当时的聊城社会和谐,发展环境优良。在聊城,无论达官贵人,还是百姓庶民,都把仁厚、宽容、和善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来尊崇。相传,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期间,其聊城家人因盖房与邻居发生划界纠纷,写信向傅以渐求助解决。傅以渐看后,回书相劝家人:“千里送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中人遂按他的意见将墙内移三尺,邻居深为感动,也主动退让三尺,于是出现了至今犹存的“六尺巷”。后来,康熙皇帝南巡,在聊城听说了这件事,对其老师的此举甚为赞赏,并为“六尺巷”题名“仁义胡同”。

历史上,踏和精神为聊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更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相吻合。因此,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综合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先进的文化。任何先进的文化,都是在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进行充分吸收和对其他优秀文化互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先进文化的建立都有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聊城先进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注意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把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而聊城文化中自古就有的诚信精神、创新精神、图强精神、踏和精神等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到人们的思维理念中,使其真正成为聊城加快发展、再度辉煌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聊城市政协主席、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该文原题为《聊城历史文化优势解读》,载于2005年6月24日《聊城日报》一版,本文略有改动)



序 二

□杜泽逊

在《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杀青之际，我的学生路子强受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文立先生之托持书稿专程来济南，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粗略地看了一遍，发现文章的作者除了专职研究人员外，大多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之余，热心传统文化，并撰写出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为弘扬当地的优秀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很让我感动。我对聊城不是很了解，但也有些渊源。又因吴文立会长曾就读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子强又曾在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随我读硕士研究生三年，盛情难却，就谈一点感想吧。

我曾经协助我的导师王绍增先生编著《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对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有一些了解，而海源阁就在聊城。因此，我认为聊城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延续中曾起到重要作用。海源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必然跟这个地方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早知聊城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又看到《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的文章，感到的确如此：黄帝出生地可能就在阳谷县的古桃丘；仓颉曾在聊城活动并葬于东阿县；颛顼墓就在东昌府；彭祖墓在临清市；巢父遗牧之地在聊城城郊；二十四孝之一的周朝闪子之墓在莘县；孔子周游列国，带领弟子多次驻足聊城大地；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途经冠县时所讲，汉时张衡曾建晓春亭纪念；战国中期著名的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莘县；名士鲁仲连、被后人称为“辩圣”的淳于髡是茌平人，这里有他们的墓地和遗迹；三国时期曹植被封为东阿王，在东阿县鱼山创制了佛教梵呗，去世后也葬在那里；冠县的武训靠乞讨兴义学，电影《武训传》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扬；而后，聊城也是人才辈出；隋代大运河、明清大运河穿境而过，造就了这里几百



年的繁华……这一切足以说明，聊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我国传统文化，聊城是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地域。

通读书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为现实服务的责任感。地方文史研究者、爱好者，由于地缘优势，研究成果应立足于为当地现实服务。《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以书代刊，就是这样一种立足于服务当地、引导优秀文化为大众所认知的书。比如，该书首个栏目是“学术建言”：“把聊城建成道德经济名城”主张经济社会中应该掺入更多的道德因素；重修季子挂剑台和孟子“大丈夫”论古迹，就是要引导人们重信誉、有气节，不要为富不仁等。这种“学术建言”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为地方传统文化研究走出与群众隔离、自我欣赏的狭隘境地指明了一条出路。假如全国所有的地方书刊都这样实事求是地致力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则必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二是重视地方文献和文物。研究地方传统文化，首先要从文献和文物入手。文献包括地方志、人物的别集或合集以及当事人的亲历讲述；文物包括考古发掘物、石碑和历史古迹等。这些是记载当时历史最直接最详细的证明。在本书中，除了属于直接摘录性质的“文献萃览”外，几乎篇文章都是围绕文献和文物谈的，而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该书收录了一篇《聊城所见碑刻目录》，这篇文章是作者把自己多年采访所见的碑刻一一记录下来，写明碑名、地点和简要文字说明，能为有关人员提供继续研究的线索，非常有意义，这在全国来说也是少见的。能从文献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历史真实，是一种研究；把别人不能搜集到的资料汇总起来，编成目录，方便别人检索，也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情。听说该文的作者不满三十岁，我在惊喜之余，认为该目录如不拘于自己所见，将别人见到的也加以收录，最好再录下碑文，这样会更有价值。聊城是傅斯年先生的故乡，这里的人做学问踏实，这种精神从这些业余作者身上就可以体现出来。

三是有宏观视野。地方文化研究既要立足于地方，又要放眼全国、全世界，把地方特色融入到整个中华文化之中。该书就体现了这种宏观视野。比如“学术探讨”中《聊城刻书考》一文，对全国研究版本学的人有很大帮助。该文也可以放在“民俗文化”中，但编者把该文放在了“学术探讨”中，足见对其独到价值的认识。由于现在不再采用雕版印刷，研究古籍的人很难体会到一块书版到底是如何雕刻出来的。这篇文章讲到刻书也需要经纪人；一块书版有时先由技术稍差者“发刀”成版，再由技术高超者“挑刀”细化；为使文章醒目的圈、点，多少个合起来要算作一个字



来计算；大部头的书如何分工、分时间段雕刻、交工、验收；图画怎么雕刻、工钱怎么算……这些都可以在该文章中找到答案。该文用朴素的白话，甚至夹带聊城本地方言，写得活泼有趣，是一部了解版刻知识的活教材。

就全国来看，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正走进一个逐渐繁荣的阶段，并且逐步地从省延伸到市、县。我参与主持编纂的《山东文献集成》目前正在出第四辑，也是最后一辑，四辑所收稀见图书总共一千余种，时间不限朝代，内收聊城文献 30 种左右，像《山东泰安府东阿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光绪贰拾贰年分）》一卷、《山东东昌府聊城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道光拾陆年分）》一卷、《山东东昌府高唐州赋役全书（光绪叁拾贰年分）》一卷、《山东东昌府堂邑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光绪贰拾贰年分）》一卷、《山东东昌府博平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光绪贰拾贰年分）》一卷、《山东东昌府恩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光绪贰拾贰年分）》一卷、《山东临清直隶州武城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光绪贰拾贰年分）》一卷等七种书俱为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别处不易见到，相信是研究聊城历史的重要资料。目前我正主持编纂《清人著述总目》，著作无论存佚，全部收录，并在每一位作者前特别注明了籍贯，后有作者简略小传，就是为了给地方文化研究提供方便。目前该书即将交付出版社排版，出版后或许能对聊城的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一定作用。

我认为地方传统文化研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成立研究社团，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传统文化研究与其他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必须从古籍入手，而在当今，古籍不易得到是个最大的现实问题。成立研究社团，集中一批研究者、爱好者，把大家掌握的古籍资料汇总起来，并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资料，供大家免费使用，是容易出成果的捷径。群体的力量总是超过个人的，个人掌握的资料毕竟有限，再说，自己的某些资料自己可能用不着，公布出来共享，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是在 2010 年 4 月成立的，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聚集了 100 多名会员，有高校教授，也有地方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并成立了专业委员会、研究所，搜集到文献数百种，不少文献是稿本、抄本和稀见刻本，这些资料全部公布在研究会的专门网站上，社会上的所有人员均可免费下载使用，这是一种非常合乎时代发展的思路。当然，如果条件具备，建立专门的图书室，存放纸质形态的资料，供有关人员查阅、细细研读，将更有利多出研究成果。



二是研究要实事求是，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地方传统文化研究容易出现两种倾向，第一种是正式的典籍中没有记载，而仅凭传说甚至是小说、戏曲中的某些情节，就漫无边际地演绎、戏说。这是不应提倡的。从正式的文献典籍出发，证以遗迹、文物、风俗等文化遗存，才是正确的态度。本书中没有关于传说、小说中人物就是某地某县人、谁是谁的原型的问题，可见编者是很严谨的。第二种是过于相信文献记载，尤其是地方志的记载。正史编纂都是依据严谨的史料记载，尚存不少错误，地方志的材料很多是从民间采访所得，错误屡见不鲜，不可尽信。但今人往往过于看重地方志，而不加以甄别，结果可能导致错上加错，这也是需要注意的。我接触地方志较多，发现有些地方志的“艺文志”里常有“某某人著某某书一卷藏于家”之类的话，这种信息不一定全是真的，有可能是其后人为炫耀祖上功德而捏造的。要想避免上述两种情况导致的妄下结论、误下结论现象，就要在重视本地文献的同时，多研读经典文献，多了解域外文献，树立全面、客观的态度和宏观视野。

三是多做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现在社会上正涌起一股国学热，不仅学校中强调阅读经典，有些企业还专门请人给员工讲国学方面的知识，提高员工的个人修养。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也不免出现一些表面上是在宣传传统文化，而实质上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伪国学”、“伪文化”。这就要求真正的传统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担负起正面宣传的责任，切实防止于史无征的“伪文化”盛行，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四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必须耐得住“寂寞”，狠下工夫，多读书籍，尤其是经典，不能急于求成。我这里把“寂寞”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连标点都没有的古文对普通人来说是枯燥的，在他们眼中，读古书的人是寂寞的；但对广大传统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沉湎在古籍中恰恰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来源于对中华优秀文化肩负传承的责任，正是这种继往开来的责任，促使我们认真地研读经典，经典研究好了，地方文献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更加正确。

五是要加强国学基础的学习。一般来说，国学基础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以及藏书知识等七个方面。比如，中华典籍浩如烟海，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书和需要的资料，必须借助于目录学。清代纪昀编著《四库全书总目》，就为后世学子指明了学习捷径，至今研究旧学问者无不置备。地方文献数量较少，惟其少，更不能囿于小圈子跳不出来，更要放到全国的视野中去理解，寻找经典与本地文献的结



合点，而经典的学习离不开上述七个方面的知识。

以上几点，只是我的一些感想，不一定正确，诸君见谅。

再一次展阅读该书中的文章，我欣喜地发现，在《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这些作者都很实事求是。他们多是业余的，纯粹是因为爱好当地的文史，没有功利性，惟其如此，他们的研究是真正熏陶后的成果，很有价值，实践性强就是明证。把这样一些文章结集出版，不仅可作为学术性文章不可或缺的补充，很多时候还可以起到修正学术性文章的作用。

借鉴《山东文献集成》的经验，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也想推动编纂《聊城文献集成》，并在着手资料的征集工作。由于编纂时机还不成熟，《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算是作为《聊城文献集成》的准备性工作，这是值得提倡的；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山东省、聊城市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是值得祝贺的；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仅一载，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

预祝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多成果。

2011年3月28日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高级顾问。曾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文献集成》等大型文献丛书）



前 言

2010年4月23日，80多名传统文化研究者、爱好者聚集在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宣告聊城市第一个从整体上研究推广传统文化的社团——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诞生了。

这是一个有着执着理想追求的团体。我们的初衷很单纯，就是传承、研究、交流、推广传统文化，为地方发展和公益事业加油。或许我们单个人并不强大，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微弱的个人完全可以汇集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思想的团体。我们平均年龄不足46岁，年富力强，干劲十足。虽然研究传统文化，但我们并不是腐朽的冬烘先生，相反，我们充满激情，富有创新意识。我们有思想，对祖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并努力付诸实践；

这是一个汇聚起各行各业人士的团体。我们之中，有干部、教授，博士、硕士，记者、研究员、教师、作家、诗人、武术家，也有工人、农民、学生及民间艺人等；有市内的同道，也有域外的老乡。职业、身份、地域、行业的差别，为大家相互之间开展研究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的视角；

这是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团体。从获得登记机关批准筹备到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我们仅用了一周的时间，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因为，我们信奉这样的准则：“坐而论道，起而行之。”不断深入研究，推出成果是重要的；但力所能及地推动这些成果的落实，服务于现实需要，更为重要。否则，我们就会沦落成一个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失去存在的真正价值；

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团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聊



城发展，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愿用自己的双肩，承担起一份责任；愿用我们手中的笔，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我们的声音只影响到一个人，这也是一种贡献。

就是这样一个社团，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成立了运河文化、东昌古城等 22 个专家研究委员会和民间绝活、中医文化等 4 个研究所，建立了一支从事专题学术研究的骨干队伍；

——开展调查研究，搜集传统文化资料，撰写了一批具有高质量的文章，通过报刊、网站、博客、论坛等方式，处处都可听到我们的声音；

——开展了“儒家文化与聊城”征文等专题研究活动，受到了河北、浙江等地一些领导及专家学者的关注，提供了若干与聊城传统文化有关的研究成果；

——通过不同渠道主动参与上海世博会山东周展览、山东省文博会等活动，充分展示了我们的风采，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

——参与“齐鲁儒商十大孝老爱亲模范”评选、“签名支持停建曲阜教堂”等社会活动，在尽一分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自觉加入国学复兴的行列，或义务办学、免费读经，或推荐阅读国学经典，或凭独有工艺绝活搏击市场大潮，或举办讲座，阐述人生，或采编报道，广造舆论，各行各业都不乏我们的身影；

——得到了省财政的大力支持，第一批专项经费已经到位，为进一步开展传统文化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建立了我们的官网——“聊城文化部落” (<http://whbl.lcxw.cn>)，该网站已成为本地文化类权威网站，在全省、全国都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点击率相当高；

——根据地方社团没有专职党员这一实际情况，大胆探索，创造性地设立了党员联络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党的建设，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好评。

开局之年，收获甚丰。能如此，得益于本会名誉会长、名誉顾问、顾问等领导的悉心指导，得益于广大会员的积极努力，得益于市社科联、市民政局的管理监督，得益于社会各界的支持呵护，也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倾心团结、相互理解、目的纯正、想做好事、多做好事的领导班子。各位会长及秘书处为做好研究会的工作尽心竭力，我为有这样的同道而欣喜，而自豪。还要强调的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们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组成



了编辑班子。选中的各位同志既是研究会的会员，也是我的同事。他们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挤出业余时间编校书稿，虽然辛苦，但大家均对从事这一义务劳动毫无怨言。在此，我要对他们郑重地道一声感谢。

正是具备了上述种种有利条件，才有了本书的顺利面世。在本书中，我们的“企图”显露无遗：多出成果，服务现实。基于此，在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曾将本会的总体目标作了这样的概括：“以发掘、研究、弘扬聊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建设学术化、公益型、非赢利的社会团体，为打造‘江北水城·运河古都’、建设文化强市做出积极贡献。”显然，我们是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服务现实需要，提供决策参考。本书“学术建言”部分的文章就是这一想法的最直接反映。当然，服务现实，要结合实际，比如“聊城古城”就是为服务于市委、市政府关于古城区保护性开发改造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而设。同时，其他类文章也有用意，或是专题研究，或是普及知识，或推介楷模，均想有益于社会各界。

这些年来，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爱好和作为一名聊城人的责任感，我一直对聊城传统文化十分关注，每当看到各级领导重视文化时就会欣喜。特别要强调的是，市委书记宋远方同志多次指出：要充分发挥聊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聊城的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步伐，努力实现“两个转变”：把聊城潜在的文化影响力转变为现实的城市竞争力，把聊城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峰海同志多次提出明确要求，并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但是，现实中，我们离实现这“两个转变”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许多聊城人从外地旅游回来，都会对我们的旅游产生些感慨。因为，我们现在真正有知名度的旅游景点不多、线路不成熟、结构不合理，造成来客少、停留时间短、社会影响小，从而对经济的带动性很小，这个支柱总是支不起来。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文化古迹旅游还非常薄弱。因此，对深厚的地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是发展文化古迹旅游的关键所在。最近几年，在研究聊城传统文化特别是我们的东昌府志、县志、镇志、村志中发现，历史上许多非常著名的贤人在我们聊城留下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德行和遗迹。比如：

——春秋时著名贤士季札挂剑徐君墓，使其诚信高风传颂千古。而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就发生在今阳谷县张秋镇。可惜的是，清乾隆十六年（1757年），“挂剑祠”被大水冲没，仅有“五体十三碑”等文物存世；



——战国时的鲁仲连，义不帝秦，射书救聊城，以排忧解难著称于世。他高尚的人格、超人的智慧，散发出惊人的魅力和传奇色彩。聊城古城东关原有鲁仲连射书台，现其故里茌平县望鲁庄村仍有鲁仲连祠、墓，“连村烟市”曾列入古茌平十景；

——亚圣孟子在冠县“直车而立言”，晓谕景春，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千古宏论，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备受国人推崇。今天冠县的烟庄、宋村、千家店、八里庄、东西二提壶、南北两化春、止立村等村名即源于此。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曾建晓春亭纪念；清嘉庆九年，又奉上谕重修；

——唐代张公艺手书百个“忍”字回复唐高宗的故事，发生在寿张（今阳谷县寿张镇），反映了以和治家、和睦相处的治家理想。这一故事广为流传，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王氏“三槐堂”源于宋代时的莘县。王旦相真宗十一年，一生为官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创王家世代家风，苏轼曾撰《三槐堂铭》赞颂。尤为难得的是，王旦荐人无数，可从来不让人知道，其忠事忠君的高风，令人赞叹不已；

——元代堂邑县令张养浩在署建“四知堂”，以汉代杨震所说的“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自勉，要求自己居官清正廉洁，不受贿，不徇私，让人备加敬仰。他根据任堂邑县令的经验，撰写的《牧民忠告》一书，既是其正直人格的写照，也是历来从政者的重要参考，“新华网”曾作为重点推荐学习；

——阳谷城东关的博济桥，以雕刻着明万历年间阳谷县丞笪一顺的故事而闻名。他上任时自驭一牝牛而来，任期内牝牛生一犊。任满回籍，声称牛犊系吃阳谷料草生成，故坚留牛犊于阳谷，仍驾牝牛而去。后人感其清廉，将事迹刻制成《车去留犊图》雕于博济桥上，以志怀念；

——傅以渐不仅是清代第一个状元，而且还以“各让三尺又何妨”的回信留下千古佳话。在今聊城东关街傅斯年陈列馆东侧，有一条仁义胡同，灰色的墙壁、彩绘的牌坊、大大的牌匾，十分醒目。这条宽为六尺的小巷虽然是再造的，但其教育意义却十分重大；

——清末冠县人武训行乞兴学，“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其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聊城县县长的“抗日老人”范筑先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毅然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誓死不渡黄河，坚持敌后抗战，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人及全国民众的高度评价与赞扬。

《大学》曰：“富润屋，德润身。”司马迁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见贤思齐，贤行润身。通过了解学习体会这些美德故事，我们就可以拉近与这些古今圣贤的距离，会感觉好像在历史的隧道中穿行，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受到熏陶，不断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同时，从这些美德故事入手，可以更好地激发我们的自豪感，唤起我们热爱聊城、建设聊城的热情。因此，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将之物化为可观、可听的旅游景观，就一定会吸引大批的外地游客来聊城游览学习，这对于发展文化古迹旅游业、提升我们的文化竞争力至关重要。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上有待加强。聊城的一些文艺演出非常成功并获得了几个大奖，可喜可贺，但遗憾的是，题材与聊城无关。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聊城历史上选取一个观众都认可的题材，改编为剧本，这样不就可以更好地宣传推介聊城了吗？比如“季札挂剑”的故事。这个发生在阳谷县张秋镇的诚信故事，史料翔实，意义深远，千古传颂不绝，为什么不能用艺术再现的形式来教育世人呢？二是伪文化盛行。典型例子不少，但为防止对号入座，影响和谐，就不说了。这些伪文化的不足显而易见：花钱造成浪费，起不到什么效果；没有足够的教育意义，达不到教化的目的；文献上无记载，难以令人信服。

那么，我们聊城发展文化古迹旅游的出路在哪里？

市委、市政府已经做出聊城古城区保护性开发改造的战略决策，应该说，这是一个大手笔，是打造旅游产业龙头的关键之举。但是，有了龙头，龙身在哪？我认为，龙身就是各县（市、区）的旅游资源。像东汉时张衡为纪念孟子而建的冠县的晓春亭，临清八岔路乡的彭祖墓，莘县的三槐堂及古城镇的郑板桥遗迹，阳谷张秋镇的挂剑台，东阿县的仓颉墓、鱼山，在茌平县的鲁仲连墓、祠等，这些都应是龙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惜，时至今日，这些资源仍停留在“潜在”这个层面，而没有转变成现实的旅游景区。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不仅如此，随着研究的积累和深入，我们的收获不断增加。在整理



“美德故事”过程中，我发现聊城还是“孝”文化的发祥地。

例证一：

周朝闪子（又称郯子）“鹿乳奉亲”的故事发生在莘县，旧时褒封甚重，题咏甚多。莘城南关古有闪王庙；城南2里处曾有闪王墓；莘县城南旧有闪里村，传为闪子旧时居处；

例证二：

鲁义姑“舍子救侄”的故事发生在今茌平县韩屯镇一带，最早记录于刘向所著《列女传》。后人为纪念这位深明大义、退敌兵保家乡的村妇，就为她修了祠堂，塑了泥像，起名“鲁义姑祠”。祠在韩屯镇大碾李村正北的罗屯村。每到农历二月初五至初七，四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来这里举办香火大会。她教育人们：面对大义，抛弃私爱，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义。鲁义姑就是杰出的女性代表，因此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

上面两个故事列入了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二十四孝”，只是到了元代，因男女楷模分置的需要，把鲁义姑当作了“女德”中“义”的典范，于是在定型“二十四孝”时把她从中移了出来。但从起源上讲，“义”与“悌”是一致的，都是“孝”的延伸。

例证三：

孔子弟子子路因鲁乱来到今黄河岸边的莘县古城镇（原范县县治所在地），开坛讲学，后人在其讲学处建“仲子庙”（遗址在原范县县治即今莘县古城镇东南隅）。郑板桥任范县知县兼署朝城县事时，专程参拜仲子庙，并亲书“仲子庙”牌匾一块挂于庙门之上，此匾至今犹存；子路堤和子路书院遗址至今仍在。

例证四：

“天下第一孝”（乾隆赐碑）——孔子弟子闵子骞洁身自重。当年，他拒绝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召请后，一直隐居在今河南省范县（县治在今莘县古城镇）孟村，死后葬于此，闵子墓距莘县古城镇政府驻地（范县旧县治所在地）仅11公里。

子路和闵子骞分别以“百里负米奉亲”和“单衣顺母”的故事列入“二十四孝”。范县所辖部分区域属于今天的莘县，其民国前的县治即在今莘县的古城镇驻地。因此可以说，二人在范县期间，其孝行对包括莘县在内的周边地区肯定有重要影响。

由于在宋、元时的“二十四孝”中，聊城发生的事占了两个，并另有



两个“二十四孝”的重要人物在聊城生活过，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聊城是孝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支持这一结论的还有一个新发现：列“二十四孝”之首的是“虞舜孝感动天”的故事。据《史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委员张长城先生考证出：“寿丘”就是古“桃丘”，中心地带位于今阳谷县阿城镇的黄河岸边。如此论成立，那么虞舜也应在聊城生活过，其孝行肯定也对周围有重大影响。因此，称聊城为孝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就有了更多的历史依据。

其实，聊城不仅是孝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在研究中发现，远古时期的聊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些非常著名的人文先祖和圣贤大哲大都在聊城生活过，留下了一批文化遗迹。最具代表性的是：伏羲在阳谷教民种谷，神农氏发掘了古阿井（阳谷县阿城），黄帝生于古桃丘（阳谷县阿城），高士巢父隐居聊城并葬于此（聊城开发区许营）。此外，聊城著名的古墓葬还有“字圣”仓颉墓（东阿）、蚩尤墓（阳谷）、颛顼墓（聊城城区西北）、尧王坟（聊城城南）等。高唐县有少昊司寇（刑官）爽鸠氏之墟，东昌府区堂邑镇是黄帝第五子清阳氏旧所，鲧、禹父子治水的传说流传至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聊城是黄河冲击扇形地，境内有古黄河、济水、徒骇河（古漯川）等主要河流，古代聊城的先民就是在这黄河冲击扇形地上生存。这里是黄河中、下游和华北、东北最先接触交融争夺的中心区，是水患最严重的地区，是古史演进的极其重要的舞台，具有了国家形成的基本条件。五帝时的重要历史事件大多发生在这里或与这里有联系。据典籍记载，河、济之间存在着大量有关军事战争中以水为兵和治水的故事，显然，正是水患因素，才极易引发部族间的战争。直至今日，国境内还年年防汛抗旱、存在水事纠纷，可以想见远古时期“水”的因素何其重要。传说中的共工曾以水行霸，鲧、禹、四岳在此治水。为了治理水患，人们不得不疏通河道，修筑堤防、统一规划、共同实施，这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也就是说，水害虽然给聊城先人带来了苦难，但也是磨炼先人、激发先人智慧的有效途径。于是，久经磨难的聊城先人极有可能最先脱离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其标志即是出现了军队和城邑，进而在虞舜之时诞生了国家。其后大禹通过治水立德立威，从方国形成了帝国，为夏启开启“家天下”式国家奠定了基础。



上述推论，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聊城先人生活的范围主要是在济水西岸的茌平、阳谷、东阿、莘县、东昌府区、冠县、馆陶、临清等地，经济上以原始农业为主，渔猎为辅。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聊城远古先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共留遗址 44 处。根据聊城地方史料零星记载和多方研究成果，并结合重要的考古发现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发现，在“三皇五帝”时期，伏羲、神农、黄帝、蚩尤、少昊、颛顼、尧、舜、禹等部落首领和帝王曾在聊城活动或建都。知名考古学家、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研究员提出，景阳冈文化城遗址极有可能是古穷桑。古穷桑在古史中传为穷桑帝少昊登帝处、黄帝登帝处、颛顼之都、虞舜之都。古聊城境内曾是黄帝居地、少昊领地、蚩尤领地、颛顼居地、舜的有虞氏所在地，是当时东西文明的交汇地，这说明聊城曾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特殊的地域，造就了聊城领先的文明。由此推断，聊城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体说，我们处于华夏文明中心区内的东部，绝非一些专家所称的“东夷”。于是人文先祖和古代圣贤陆续在此带领聊城先民生活，并以此为基地开疆辟土，从而使得聊城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但是搞好这一课题，不仅有赖于对地方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同时又要对其他文献特别是不局限于聊城的经典文献有深入研究，并能将聊城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大背景中去思考，这样既可防止一叶障目、对本地文化的认识人为拔高，又可在地方文献资料中发现中华文化研究的新佐证和新观点。对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来说，完成这样的重任，其中一个前提就是要对聊城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为此，我们自研究会成立伊始就提出：参照《山东文献集成》的做法，推动编纂《聊城文献集成》。这一设想得到了省、市财政及市社科联的支持与肯定。当然，正式启动这一浩大的工程，需要党委、政府的重视，需要行业精英的参与，仅靠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着手编辑《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其目的有三：一是汇集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二是推动聊城传统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三是为编纂《聊城文献集成》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标志着丛书的正式启动。

上述仅是就学术研究问题而言，而这仅是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两项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即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就整个社会来看，这一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巨，也越来越迫切。民国版语文



教材的热销即是一个警钟，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今天的中学生已经开始读不懂昔日的小学教材，原因虽然很多，但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断层是一个重要因素。面对这一普遍性问题，虽然我们地处一隅，但仍可有所作为。研究会成立之时，我们就将开展公益性宣传推广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会员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这样的事情，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为更好地推进这一工作，我们正准备开设聊城文化大讲堂，请市内外的领导专家现场讲授传统文化知识及研究心得，并开设专门网站，将讲座资料公布出来供大家随时观看参考。虽然限于资金、场地等因素至今还没能如愿，但这一设想得到了聊城日报社、聊城新闻网及市文广新局、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领导的赞赏，一些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各界贤达也都表示支持。为此，我们力争今年将聊城文化大讲堂正式开办起来，有兴趣者既可到现场听讲，也可在闲暇时登陆网站到虚拟现场受教。当然，我们这样做，也是服务现实的一种方式，也是地方社团的特色，与搞好学术研究同样重要。

最后还要声明的是：除有特别注明者外，《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放弃版权，所有文章欢迎转载引用。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能将这些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而您的关注和使用就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和支持。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吴文立

辛卯年季春谷雨于乾乾斋



目 录

序一	金维民(1)
序二	杜泽逊(1)
前言	吴文立(1)

学术建言

弘扬聊城历史文脉 建设道德经济名城	乔 然(3)
仓颉墓前说仓颉	李望尘 王 一(8)
重修张秋挂剑台意义重大	吴文立(12)
重建晓春亭 学做“大丈夫”	吴文立(19)
感受张养浩 重建“四知堂”	吴文立(26)

学术探讨

黄帝故里是“桃丘”	吴文立(33)
管仲“三归”在聊城	张富祥(44)
曾经影响山东历史的沙麓山	赵明信(62)
曹植与佛教音乐之我见	刘玉新(69)
聊城刻书考	吴云涛(73)
赵维新心学思想引论	邹建锋 黄巍魏(77)
武训精神旅游价值探析	张东方 (84)



名人与聊城

临清有座彭祖墓(附:探访彭祖墓)	吴文立 洪祥等(93)
中医汤剂创始人——伊尹	谷万里(103)
鲁仲连与聊城	张东方(106)
孔门弟子与冠氏邑	戴敬仁(113)
段干木归葬冠县	戴敬仁(117)
文天祥过聊城	吴文立(122)
紫柏真可与聊城隆兴寺	吴文立(126)
元好问在鲁西的生活与创作	任金光(131)
傅光宅与戚继光	路子强(135)
杨以增与林则徐	丁延峰(137)
何思源与武训	邢培华 邢莉(141)
中华魂——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颂	王鲁(148)
武进士黑鸣凤事迹考略	井扬(164)

聊城古城

东昌历史街巷图	高文广(172)
光岳楼建造者——陈镛	刘洪山 张和鹏(174)
聊城古城门门额全接触	刘洪山 张和鹏(178)
聊城县衙门回忆记	于朝臣(180)
四大书庄之宝兴堂	于新贵(184)
安氏三廉	张和鹏等(186)
聊城古城居民生活觅踪	刘洪山等(191)
闲谈正月里的玩	吴云涛(202)

美德故事

闪子鹿乳奉亲	(209)
鲁义姑舍子救侄	(213)



冯异谦退不居功	(217)
田真兄弟和气兴家	(220)
张公艺以忍治家	(223)
王旦荐贤不图私恩	(229)
笪一顺车去留犊	(236)
武训乞讨兴学	(239)
范筑先敌后抗战	(248)

运河文化

清代京杭运河聊城段(局部)	(260)
聊城运河古闸古码头考	李望尘等(261)
隋运河永济渠寻踪	戴敬仁(265)
京杭运河穿黄及其相关问题考	陈清义(273)
悠远的运河号子	赵中田等(282)
聊城运河航回忆	刘庆功 路子强(285)
土闸悠悠五百年	路子强(288)

民俗文化

聊城民间剪纸艺术初探	金凤杰(295)
张秋木版年画的前世今生	张 颖等(298)
吕才与尺八	吴文立(301)
运河谜谣(十一首)	赵中田(305)
苦山村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治性”研究	吴 欣(308)
浅谈临清清真八大碗	刘英顺(321)
聊城八角鼓	于 敏(325)
临清武术	魏庆新(330)

古迹寻踪

运河古都聊城(电视片解说词)	祝伟康(337)
----------------------	----------



人文天下第一山——谷山	张长城(340)
济世寿人古阿井	谷万里(350)
古城古钟,牵出明朝一些事儿	张和鹏(352)
会通镇小考	戴敬仁(354)
《曹植碑》书法艺术欣赏	陈同龙 李兴来(356)
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	聊城地区文化局(359)
聊城所见碑刻目录	张文兴(363)

文献萃览

聊城现存文献概述	吕品(371)
浅谈海源阁著作八种	徐泳(374)
临河歌	周·孔子(380)
王彦章画像记	宋·欧阳修(381)
三槐堂铭	宋·苏轼(383)
王氏宗谱跋后	宋·岳飞(385)
《中州集》引	金·元好问(386)
牧民忠告	元·张养浩(387)
县令箴	元·吉之哥(401)
东昌府城重修碑记	明·于慎行(402)
冉子仲弓墓碑记	清·孙星衍(404)
窦小姑	清·须方岳(406)

图 片

季子挂剑台五体十三碑	(18)
会盟台	(39)
中堂	明·赵维新(82)
天马山石刻	明·戚继光(135)
天马行空石刻	明·傅光宅(136)
三槐堂匾	(234)
澄泥印	(300)



目
录

第一山碑	宋·米 蒂(340)
曹植碑	(357)
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	(359)
孔子回辕处碑	(380)
仲子庙匾	清·郑板桥(405)
附录一:聊城文献资料征集公告	(408)
附录二: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	(409)
后记	(4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 / 吴文立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中国风云人物丛书）

ISBN 978-7-5108-0309-3

I. ①聊… II. ①吴…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380008 号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

作 者 吴文立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第 35 号(100037)

网 址 <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28.25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309-3

定 价 46.00 元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网址：<http://whbl.lcxw.cn>

学术建言



弘扬聊城历史文脉 建设道德经济名城

□乔 然

编者按：乔然，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北京大学文化旅游产业教授，长期在国家文化部从事国际文化交流、艺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曾策划、操作了中国艺术团赴美国演出、法国中国文化周、孔子国际文化节、国际文化产业论坛等重大项目。2006年6月1日，乔然应邀在聊城东昌宾馆小礼堂做了题为“文化产业与聊城经济发展”的报告，他认为聊城城市精神的核心是诚信，应让诚信介入经济建设，打造中国道德经济名城，这很值得深思。会后，聊城日报记者张颖对乔然进行了专访。本文根据张颖发表在2006年6月2日聊城日报上的文章改写而成。

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力，不能将文化产业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而我国的文化一直是被剥离在经济范畴之外的，这是极大的错误。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百年史，有三次大规模的经济赶超。

第一次是美国对英国的赶超，主要得益于美国文化的异军突起。众所周知，美国本来是汽车王国、钢铁王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电影业、唱片业、动漫业异军突起，美国最终凭借文化产业完成了对英国的经济赶超。第二次是日本对美国的赶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意识到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开始大力发展影视器材业，并在上世纪80年代前完成了对欧美的“经济赶超”。第三次是“韩流”的兴起。韩国这样一个小国制造了汹涌的“韩流”，铺天盖地的韩剧、大量的韩国动画片……都充分说明了它强劲的文化势头。

这三次著名的“经济赶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得益于文化产业



的异军突起。而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却恰恰忽略了对文化化的操作，并最终导致了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严重滞后，以及文化产业严重缺失。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有一句话，“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是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新闻在新华社发布后，美国七大演艺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齐聚北京，来寻找投资的商机以及项目的洽谈点。

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文化产业呢？目前在产品贸易上，我们对美国有高达1000亿美元的顺差，但在文化贸易上，数据却恰恰倒了过来。此外，我们全国共有2958个剧团，这些剧团全年总收入为5.7亿元人民币，而日本一个四级剧团的全年收入就多达13亿元人民币。还有，我们自称是杂技创汇大国，但全国100多个杂技团，每年的收入总和还不到加拿大一个太阳马戏团年收入的八分之一。这与我国的文明历史、与我们拥有的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势是不相适应的，与我们“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也是不相适应的。所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在中国有极大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文化产业可以拯救一个城市

文化产业是解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经济行业。纵观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有两种，一种是经济生产力，一种是文化生产力。两种生产力形成了两个市场，一个是物质产品市场，一个是文化市场；两种市场形成了两种消费，一种是物质产品消费，一种是精神产品消费；经济越发展，人们的精神产品消费需求也就越高。一个城市只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才能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部分，文化历来与经济密不可分。可以说，市场经济的竞争其实就是创新的竞争，没有文化，就很难创新。在经济建设中，文化的缺失必定会带来这样的恶果——经济创新能力不足。没有文化含量的企业无法做大，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只有提升城市文化素质，才能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文化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器，并要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朝利润的最大化、高端进军。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日本、韩国文化产业的



飞速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

例如，因经济衰退，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城一半以上的居民搬走了，奥兰多城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有财政赤字的城市。为此，他们成立了“拯救城市经济生命委员会”，决定率先搞文化产业，建起了迪斯尼乐园，最终使这个城市起死回生。目前他们的税收收入占整个佛罗里达州的 57%。

还有美国的夏威夷，当时它有三个支柱产业：檀香木、造纸、造糖。可是当檀香木一棵也没有了的时候，其他两个产业也不行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们发现只有当地的波利尼西亚土著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于是，夏威夷打起了文化旅游这张牌。现在，其独特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每年可以吸引多达 3000 万的外国游客。不仅如此，他们还每年根据游客的需要聘请特色文化项目，像中国的武术、杂技来这里表演，夏威夷成了世界各地文化的展示舞台。这一事实证明，搞好一个文化产业项目，可以带活一方经济，甚至拯救一个城市。

财富和资金正向文化厚重的地方流动，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

丽江古城有一条著名的四方街，是什么吸引了世界上 57 个国家的人在此投资办企业？是丽江独具特色的东巴文化。东巴经文中说：“人与自然是骨肉同胞，人类称霸自然，自然不堪受辱，降灾人类。贤人惊语：礼待自然，春秋祭署（人面蛇身女神，掌管自然万物），人与自然和谐繁衍。”在这里，人们如果盖房子时需砍掉一棵树，他必然会种上两棵树。丽江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也正因如此，丽江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喜爱与敬佩，吸引着人们到丽江投资办企业。

文化产业就是用优秀的文化去赚更多的钱。当产品达到一定质量的前提下，能显示其地位的价位，将取决于文化，即产品卖的就是文化。

文化产业的作用显而易见，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提高广大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为良好的市场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说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保障。当今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出现假冒伪劣盛行、坑蒙拐骗不断等现象，文化产业发展不足是主要原因。二、提供文化食粮和精神动力，是经济创新的根本源泉和原始动力。这是因为创新能力得益于高素质的人才，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创新就无从谈起。文化产业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创新能力的增强。经济建设必须以道德人文为统领，而文化产业的缺失必然造成大众道德的低下，造成经济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



建设中华道德经济名城

在这种大的形势下，聊城应该怎么办？

发展的实质就是竞争制胜，但如何竞争才能制胜？“有所争，有所不争，方能争之；争其所不能争，为智争也！”

那么，聊城所具有的他人所不能争的是什么？要找到答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聊城文化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聊城成功打造江北水城品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应该说做得非常成功。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上善若水”，“水”的本性是“善”，“水利万物而不言”，水滋润万物而一无所求，这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江北水城的文化内涵就是“善”，以此立市，与人为善的聊城必然会受到各地人的欢迎。但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江北水城有“水”，只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自然基础，与其他地方相比，也并非独有，因此可以说，它不能代表聊城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

聊城的山陕会馆应该值得关注。山陕会馆是关帝庙与商会的合一，这在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商人聚集的场所里，大殿里供奉的是关公，而不是和别处一样的财神。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代都尊崇关公，并把他封为“帝君”，接受大众的崇拜，商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文化层面上来说，关公代表忠义、诚信，大家已经把他当作道德的杰出代表。人们祭拜关公，是因为敬仰他的这种精神，希望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以这种诚信来激励约束大家，并以此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换句话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关公“管”的就是市场秩序。

为什么这种现象在聊城表现得如此突出？关键在于这个地方文化精神的厚重，在于聊城在自然条件、地理因素、历史文化底蕴、人文素质等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山东是儒家圣地、人文之邦，聊城又是运河重镇，深厚的历史人文精神与运河带来的经济繁荣在这里融合，形成了聊城独特的城市文化，那就是以道德统领经济的发展。山陕会馆是中华道德经济的典范，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德”，即诚信美德。

确立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价值核心，还要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潮流是什么？是以德治国，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增强民族的创新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山陕会馆所代表的诚信文化即“德”是合适的，



同时，再加上江北水城所赋予的“善”，“德”与“善”的有机结合正是聊城人文精神的核心。聊城以关帝为人文楷模，聊城的商人以诚信、道德、至善来统领市场经济秩序，倡导市场竞争的公开、公平、公正、善良，所以说聊城不但是中国江北水城，更是中华道德经济名城。聊城是自然基础与人文传统有机结合的典范，而以人为本建立道德经济新秩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德”与“善”作为聊城人文精神的核心，正契合了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洪流。

今天，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经济的引领。这是因为近些年我们忽视了道德经济秩序，忽视了传统人文精神的精粹，并导致了人们文化素质的缺失，最终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以致假烟、假酒甚至假药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倡导诚信精神，以人为本，重建道德经济秩序显得尤为迫切。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聊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抓住机遇，大力弘扬城市历史文脉，重新建立起道德经济的新秩序，打造中国道德经济名城，树立城市形象尊严，提升城市品牌和竞争力。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资源不等于商品，要通过文化产业的打造、城市品牌的树立，来确立自己的地位。



仓颉墓前说仓颉

□李望尘 王一

在人类走向现代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华夏子孙很难想像没有文字的先民是怎样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的，更难知道在四千多年前没有文字的愚昧时代，人类是怎样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摸索着寻求前进的。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人类社会才进步到现代文明时代，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

上古结绳以证事，后来以书契表意。造字者是谁？追溯文字的创始人，是众人颇感兴趣的。关于文字的起源，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审分览》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曰：“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和，皆和谓之公，公和之相皆也，及仓颉固以知之矣。”秦汉时期有关仓颉造字的传说和记载更为多广。秦朝统一文字后，李斯所作教学课本的第一句话就是“仓颉作书”。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把前人这些传说和记载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这些记载都说，无文字时人们记事结绳系疙瘩、画道道，容易混乱，事物表达不清，人们的思想不易沟通传播。于是，黄帝史官仓颉开始创造文字。对于仓颉造字的事情，历史上多有记载。赵高、李斯、胡母敬撰仓颉上篇，杨雄、班固撰仓颉中篇，还有贾鲂作的仓颉下篇，都记载了仓颉创造象形文字的事迹。

大约在五千年前，地中海周边地区出现了象形文字，巴比伦的古文字刻在软泥板上，又称楔形文字。古埃及的文字写在特制的纸草上，稍后那里便有了文字记录的作品和墓志铭。在我国山东的莒县、邹平、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都出土过象形文字刻片。据有关专家考证，仓颉创造的象形文字，与古埃及的文字和巴比伦的古文字形成的时间大致是相同的。这说明，处于世界不同区域人们的思想思维发展上基本是同步的。



《皇览》曰：“有仓颉冢在利阳亭南，坟高六丈。”《春秋·元命苞》曰：“仓颉卒，葬利乡亭。”宋代罗泌《路史·前纪》载：“仓颉氏，冯翊人。”古书上对仓颉的出生地及卒葬地的记述应该是清楚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地名不断演变，以致到近现代，人们对仓颉的卒葬地说法不一，莫衷一是。清朝李贤考证后说：“阿之西北三十五里，古名利阳亭，或即利乡欤？志载有仓颉墓，墓前有祠，较诸东之寿光、西之阳曲为近是。”文中之“阿”指东阿县治所在地，即今平阴县东阿镇。“阿之西北三十五里”即东阿县王宗汤村，村南原有仓颉墓、碑、仓王寺。清道光五年（1825年）知县李贤书见寺墓已圮，于是重修“仓圣祠”。故老相传，东阿县王宗汤村古名叫利乡。明朝《兗州府志》记载：利乡是仓颉故居和卒葬地。仓颉墓、寺尚都保存完好。

据当地老人讲，仓圣祠有两层高，非常壮观，此方之民称“仓圣楼”。在日本侵华时期，仓圣祠惨遭破坏，所拆砖石被用作修筑炮楼。另外还有石碑数通，立于享堂前，五十年代，修黄河堤时将石碑拉走。六十年代，又将享堂基拆掉，修建仓颉墓西小河上的石桥，如今石桥仍存，两端拱上各有题记，曰“仓圣桥”。该河从西南流向东北，河里芦苇丛生，水流淙淙。仓颉墓四周的百米以外有古柏50余株，更给仓颉墓增添了几分古朴苍茫。

2000年，有关部门组织考古队伍对东阿仓颉墓地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出土的龙山时代的陶器有鼎、罐、瓮、盆等，商周和汉隋时期的陶器更是十分丰富，基本认定该遗址为龙山文化至汉隋时期文化遗址。从龙山文化流传至今已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东阿仓颉墓仓颉的生活年代与历史记载都是相符的。经考古专家论证，基本可以认定王宗汤村是仓颉的故居和卒葬地，这与历史传说和地方志的记载也是吻合的。同时，仓颉出生于陕西冯翊，终葬于东阿利乡，与考古和典志记载也是相吻合的。

泱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象形文字的创造和甲骨文的延续及方块字的崛起，人们才由愚昧走向文明。这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人类循历史规律前进的轨迹。在这浩茫的历史岁月里，天翻地覆，时光荏苒，人世兴衰，先民却未忘祖上造字功德，祭祖、立祠、作文、筑坟、树碑者承袭不绝。

仓颉是中国的文字始祖，在世界文字史上占有重要位置。1939年，仓颉的名字和形象就进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三座馆舍之一的约翰亚当斯大楼大门上，镶嵌着12个对世界文字有影响的传说人物，



仓颉名字就在其中。这座大楼的东侧、西侧以及中央出口处，共有三组铜制大门，其中东、西两侧大铜门上各记载了涉及世界文字历史传说的6个人物，仓颉（TS·ANGCHIE）的雕像就在东侧大铜门上，左侧门第二个。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仓颉的概括词是：“中国文字的庇护（The Chinese Patronwriting）。”显然，这种评价与我们传统上尊崇仓颉为造字圣人相比意义更为高深。仓颉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字，很多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但唯有中国的象形文字保存最好、使用时间最长。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和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直到今天的方块字，虽经历漫长岁月，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在外部形态造型、内部结构、笔画走势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特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可以说，没有古老的象形文字，也就没有今天的方块字。正如恩格斯所说：“令华夏子孙引以为自豪的是，当久已死亡的古埃及、巴比伦古文字成为今天学者稽古研究的对象时，中国汉字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没有停顿地使用，至今作为世界唯一一种有着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这正是我们华夏子孙应该感到骄傲与自豪的。

在上古时期，文字处于雏形发展时代。古今中外的一些伟人、文人、名人，都把仓颉称作造字鼻祖。在夏朝以前的原始社会，人们用口述言传的方法，一代又一代传颂着仓颉造字的功绩。到商周时期，文字发达健全了，文人就用作文、著书、立传记之。秦朝李斯曰：“仓颉造字，以教后诸。”许慎《说文解字》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为……是也。”古书上不但记载仓颉创造了中国的象形文字，还描述了仓颉是如何创造象形文字的，更重要的是教导子孙后代要赓续圣迹，使之流芳千秋万载。据历史资料记载和传说，以及勘探挖掘出土的文物来判断，四千多年前的象形文字，是仓颉创造的。早已形成历史定论，是无可非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的语言越来越丰富。后来人们为了完善汉字的应用，在仓颉创造的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又发明增补了许多汉字。这是符合自然科学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发展规律的。但对于后续众多的汉字发明增补者，决不能与造字鼻祖仓颉相提并论。把上古时期的象形文字和现在的方块字混为一谈，都归功于仓圣一人，也是不对的。

对于仓颉造字，社会上也有不同见解。有人说：“仓颉男女都不知



道，无有见证，非也。仓颉造字，是传说，更疑也。”对仓颉造字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对这些难解之谜，要去挖掘、研究、考证，历史的密码终会被揭晓。在没有文字的上古时代，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的记忆，靠的就是传和说，这就是上古时期人类唯一的记忆、传承接代方法。没有历史的传说，也就不知道昔日和将来。须知，在历史上，任何传说一般都是事出有因而不是毫无根据的，否则连这些传说也不会流传下来的。当然，既然是传说，就会有遗漏，有附加，就会走样，甚至说得古怪荒诞，但我们要透过现象求本质，找出合理的内涵，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对仓颉其人持有否定态度的人，对仓颉造字持怀疑眼光的人，请多看点古代历史，多学些古典哲学，多了解些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就能开阔自己的眼界，拓宽研究探讨思路，就能悟出仓颉造字的原理及对社会的贡献，使对仓颉造字的认识研究与考证，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

仓颉之功，在于他创造了象形文字，使人类社会从愚昧开始走向文明。后世之功，用言传身教传递始祖造字圣迹，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又一个辉煌。《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明了文字，人类的知识得到了传承，从而有了文明；但相应的，罪恶也随之诞生，这也是悲剧的开端。鬼哭神嚎，是庆幸文明的肇始，也是对不珍惜字纸者的提醒和指责。

愿更多的人关心支持东阿仓颉墓，愿更多的人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的火炬不致在我们手中熄灭。

（李望尘，系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聊城运河文化促进会副会长、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名誉顾问。王一，系聊建集团高级工程师、聊城华夏仓颉文化学会秘书长）



重修张秋挂剑台意义重大

□吴文立

季札挂剑的故事流传千古，缘于其彰显的诚信美德。

这个故事载于《史记》、刘向的《新序》、《吴越春秋》等，大概情节是：

吴国的贤人延陵季子，要到西边去访问各国，他佩带宝剑拜访了徐国国君。徐国国君观赏季子的宝剑，嘴上没有说什么，但脸色透露出想要宝剑的意思。延陵季子因为有出使上国的任务，就没有把宝剑送给徐国国君，但是他心里已经答应给他了。季子出使各国，总想念着回来，可是徐君却已经死在本国。于是，季子解下宝剑送给继位的徐国国君。继位的徐国国君说：“先君没有留下遗命，我不敢接受宝剑。”于是，季子把宝剑挂在了已故徐国国君坟墓边的树上就走了。随从人员阻止他说：“这是吴国的宝物，不是用来作赠礼的。”延陵季子说：“我不是赠给他的。前些日子我经过这里，徐国国君观赏我的宝剑，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脸色透露出想要这把宝剑的表情；我因为有出使上国的任务，就没有献给他。虽是这样，在我心里已经答应给他了。如今他死了，就不再把宝剑进献给他，这是欺骗我自己的良心。因为爱惜宝剑就使自己的良心虚伪，廉洁的人不是这样的。”因为有这样的德行，徐国人赞美延陵季子，歌唱他说：“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挂丘墓。”

季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季子是被誉为“至德第一人”的吴国开国君主太伯的第十九代孙、吴王寿梦的第四子。他的主要事迹，一是三让王位，二是出使中原各国，三是挂剑徐君墓。公元前544年（吴王余祭四年），季札出使中原各国，经



徐国，先到鲁、齐、郑、卫、晋，最后由徐返吴，而挂剑的事，则贯穿这次出使。最后，他回来时，想将原来心已许的剑相赠，于是有了挂剑墓树的事。

就因季子有“三让”和挂剑的德行，孔子非常崇敬他。季札去世后，孔子亲自题写了“於戏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字，后人刻于碑石，所以季子墓碑又称为“十字碑”，现存于丹阳季子庙，江阴申港季子庙也有摹本，这也是存世的唯一一处孔子留下的真迹。

数百年后，司马迁感慨道：

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延陵季子的仁义之心，使人无限的敬仰钦佩。尤其对事理的观察，透彻微末，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啊！何以他能有如此的远见？因为他是一个深通人情物理、有真学问的君子啊。

季子挂剑的故事一直是讲诚信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受到历代人们的赞颂。

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根据《张秋志》、《东阿县志》、《兗州府志》记载，故事就发生在张秋。

明万历二十四年黄承玄修《张秋志》（清康熙斌业斋抄本）有两处记载该事：

一、在“陵墓”部分

挂剑台即徐君墓。《史记》：“季札使齐，过徐君，徐君好礼剑，口不敢言，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剑系之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子乎？’曰：‘不然，始我心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挂丘墓。’”

二、在“古迹”部分

徐君墓即挂剑台，在城南。《括地志》载：“徐君庙在泗州徐城县，以地图度之，徐城者为是。然古迹两见者多相传已久，未必无据。而挂剑草亦奇迹也，草形似剑，可疗心疾，土人珍之，今亡。”

《东阿县志》载：

挂剑台，在县（东阿镇，明、清、民国时期东阿县城）西南六十里张秋镇。昔吴季子使上国过徐，徐君爱其所佩剑而不言，



季札察其颜色而心许之，及还则徐君已歿，季札挂其剑墓树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挂邱墓。”

《兗州府志》载：

在东阿县西南六十里漕河东岸相传即徐君墓，墓前有祠，祭祀徐君。季子台在祠下，台左右生有一种草，叫做挂剑草，能够治疗心病。

由此可见，这个古迹在张秋镇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全国有多处挂剑台，包括徐州、泗洪、封丘、平阴、睢宁等，哪个是真的？更有价值？而相比来说，比较得到认同的是泗洪。张秋的价值如何？

在《张秋志》“艺文”部分，收录了与此有关的五个重要文献：

一、东阿人李谦的诗作

李谦（1233—1311年），东阿人，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曾作《季子祠》（过徐君墓）：

瘠卤丰营茅，荒林翳荆棘。此地果何地，云有徐君域。

当年吴公子，过此聘上国。心交固已许，一剑非所惜。

岂期轺车还，君已掩窀穸。抚摩三尺铁，欲效知无及。

惟有挂剑树，此恨容可释。精诚达泉壤，千载未易息。

至今地效灵，化为异墓碧。采采不忍去，观此叹今昔。

今人交面颜，昔人示曾臆。曾臆久益坚，面颜徒外饰。

我诗志其墓，非徒吊陈迹。百世闻高风，衰俗庶可激。

李谦与徐世隆（徐琰）、孟祺、阎复齐名，号称“东平四杰”，至少有两次归故里。剔除其少年作品，最迟也应在1311年前。

二、元朝康时的《吴季札挂剑徐君墓记》(附元杨淳后记)(见图)

吳季札挂劍徐君墓記 元康時

季札挂劍事載於史，世次猶見於春秋，遂索其畧昔
上國未獻，遇徐君已死，遂解劍繫之。徐君冢樹
曰始以吾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為人無
所私，季札心交以信，可見矣。冢在景德故鎮
之南，百舉武惟地，叢草蔓延，形若削土以挂劍
名之，或云冢在泗州。今按此地古有碑刻季札挂劍
徐君墓，樹八字，昔人已嘗訪其墓而封樹之，又從而
歌詠之，故老相傳必有所據，不復置辨。嗚呼！春秋
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相軋，雖齊桓晉文革
力攘奪而成名，况其下者乎？季子之於吳，有可取之
義，還讓守節，素而。
哉！觀其墓子，蘊博思不累其志，引避楚名。
挂劍於墓，死不背其心，孰謂一劍之誠化異草而
無信過之者？式於魚牘以達斯室之幽。
舞於湯門以決沐猴之怒者，不啻天淵也。元至正十
三年仲秋，宜郎部水監丞蒲憲
讓國得仁挂劍，全信延陵季子其質矣。是年生
二十餘年之後，每經徐君墓，輒仰季子高風，徘徊而不忍去。元至正間，有為水部丞者，蓋嘗封
樹徐君之墓矣，而弗季子祠之建可嘆矣。淳承
命，亟河因其傍有三官廟，掇之以祠。季子仍
封樹徐君之墓，而併祀焉。歲在丁丑，正德十二
年春正月二十五日也。工部都水郎中前江西
道御史闡中楊淳記。



季札贊有序

明知東阿周祚山人

余嘗讀左氏得季札使列國其論列國之臣免難與否若出應響何其神也及其論樂審音上下三王列諸侯皆告子不窮鑒鑒乎可徵又何其淵深也太史公載吳世家自季伯仲葬而下獨於札之事憑焉輯位而去之謂止附于臧之高義實足掩泰伯之遺風乎吁嗟又足多矣及後載徐君事尤奇世至戰國人心靡蕩不能救止故遂之於王盟勤於會告惟之以鬼神申之以詛咒猶有不勝也何有不待言說出死生之際如札之事夫吾知之矣善信者不待徵恭言善誠者不必假於物存者非失於存亡更者無間於邂逅若季札者直得之矣阿河水之上有廟舊吳因用賀焉贊曰吁嗟先生體道宏偉排赫南邦志足經理揖遜而去下視微塵周覽天下窮極羣紀明幾察微中病起廢包羅該括剖析議投見者厭厭闇者拔席富是之時幾近展試詎世大亂卒屬高志爰止於徐旦夕之語言體神交式逾風契肺腑昭晰生死心與龍氣基本相為終始世道日下屢有定止其容便其音韻朗爽一端不啻萬里我贊匪文以助

重脩挂劍臺祠記
（總督漕運蔡士英立書）

这篇文章，记述了他出资委托吕振之重修挂剑台祠的情况：

1. 描述了旧台祠的情况：“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年）之秋”，第二次总督漕运的蔡士英终于有机会来到张秋，“维舟祠下，始入祠致敬焉。

三、明朝东阿知县周祚的《季札赞》（见图）

此文是赞颂之文，其文献价值是点明了季子祠的情况：“阿河水之上，有庙旧矣。”说明自杨淳始建的季子祠已经有些年头了，开始破旧了。

四、总督漕运尚书蔡士英的《重修挂剑台祠记》（见图）

蔡士英，号魁吾，辽宁锦州人，江西巡抚，漕运总督大司马，谥襄敏。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为凤阳巡抚，总督漕运。

興起也夫
余志也君墓石以待誦紀其事余思李子讓國之義
高擬夷齊孔子大聖若書其墓今延陵片石零落無
聞吳人亦未有起而表彰之者乃以挂劍一事因徐
君以廟食茲土是知以心許友存沒不移耿耿時千
秋長在一諾之誼豈不重于千乘哉則斯祠之有關於
興紀也又非偶余舊遊之幸也後之來者其亦知所

由此文可知：

1.徐君墓的位置：“冢在景德故镇之南百举武，惟地从草蔓延，形皆肖剑，土人以挂剑名之。”（举武，即举足、举步）

2.康时对徐君墓真伪的态度：“或云冢在泗州，今按此地古有碑刻‘季札挂剑徐君墓树’八字，昔人已尝访其墓而树之，又从而歌咏之，故老相传，必有所据，愚不复置辩。”按，此文抄录不全。据清谈迁《北游录》“纪程”条，康时《记》中言有“柏一株，大如斗”，可见墓之久远，为真墓无疑。

3.初建季子祠：康时曾于“元至正间，盖尝封树徐君之墓矣，而弗季子祠之建。”就是说，当时还没建季子祠。到了明代正德十二年（丁丑岁）正月，工部都水郎中杨淳“承命巡河，因其旁有三官庙，遂撤之以祠季子，仍封树徐君之墓而并祀”。

五、明朝东阿知县周祚的《季札赞》（见图）

此文是赞颂之文，其文献价值是点明了季子祠的情况：“阿河水之上，有庙旧矣。”说明自杨淳始建的季子祠已经有些年头了，开始破旧了。

六、总督漕运尚书蔡士英的《重修挂剑台祠记》（见图）

蔡士英，号魁吾，辽宁锦州人，江西巡抚，漕运总督大司马，谥襄敏。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为凤阳巡抚，总督漕运。

这篇文章，记述了他出资委托吕振之重修挂剑台祠的情况：“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年）之秋”，第二次总督漕运的蔡士英终于有机会来到张秋，“维舟祠下，始入祠致敬焉。



前列季子、徐君二像，后有垝垣然，云即君墓也。古柏尚存，遗碑星列，榱桷摧圮，风雨飘摇。”

2.说明了撰此文的原因：（吕君）“请纪其事。余思季子让国之义，高拟夷齐，孔子大圣为书其墓。今延陵片石零落无闻，吴人亦未有起而表彰之者。”意思是说，考虑到这位高风足与伯夷、叔齐比肩，又得到孔子为其亲书墓碑的高士，而现在竟然沦落到“片石零落无闻”，“吴人亦未有起而表彰之者”（或许是在吴地也未见季子的纪念建筑之意），于是才写了此文。

这里，蔡士英以“高拟夷齐”比喻季子，不算高明。夷、齐虽然有高风，但只是一避了之，远不如季子让位、出访、劝友、挂剑、救难等给人印象深刻，其对后世产生的教化作用非常大。因此，连孔子也禁不住发出了赞叹：“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范常喜《〈上博楚简·弟子问〉1、2号残简字补说》）

五、寿张主簿马之驥（雄县人）的《张秋挂剑台辨》（见图）：

張秋挂劍臺辨
壽張馬之驥撰人

廿三年前歲在壬午余赴光州雜揚任假道張秋曾至徐君墓觀吳季子挂劍處今余承乏為克屬河曹司壽張東阿蓮道駐張秋鎮與挂劍臺東西夾一水瓶舟載屐無間朝夕矣稿嘗讀地志謂徐君墓在泗州者近是蓋以泗州有徐城遠有徐君墓事相因緣不應張秋無端又有墓第張秋之墓元至正以前即有古石碑則其所由來者遠矣竊謂古人建國必以地著為號而古今州中國歷廢興恒多改易舊名以求後先乖舛必詳測往典庶可為後人立說之衝夏書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墓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又云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按淮水出豫州經徐揚沂水出艾山在今沂州家山在今費縣羽山在今郯城皆今兗府東境大野卽今鄆野縣東原卽今東平州一在今兗西一在北皆見屬兗是今兗府四境盡為古徐州之域周人併徐之國僕王秉周穆之竟侯攝地而朝諸侯奄有此土及八駕還轍已舉徐而滅之矣後之為徐者遷徙於北理或有之卽都邑之於丘墓相距遠邇亦無可考烏在彼之為是此之為非乎杜子美登兗州城樓詩云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畧不及兌杜公學識可謂侔矣古兗州在徐州西北今北宜之南皮河間僅雲及濟南之桀蔑皆有九河故道東昌之濮州有雷澤云

此文对张秋挂剑台进行了论证，很有价值。

1.明确提出泗州徐君墓与张秋徐君墓并存的问题。

余尝读《地志》，谓徐君墓在泗州者，近是。盖以泗州有徐城，遂有徐君墓，事相因缘，不应张秋无端又有墓。

2.张秋徐君墓挂剑台的根据。

其一，有古石碑。“第张秋之墓，元至正以前即有古石碑，则其所由来者远矣。”古石碑在元代至正年间以前就有，而且存在很长时间了。这说明，张秋徐君墓并非凭空捏造。



其二，以张秋地处古徐州、泗州地处古扬州来对比二墓真伪。

窃谓古人建国必以地著为号。而古今州国中历废兴，恒多改易，循名以求后先，乖舛必（多），详测往典，庶可为后人立说之衡。

又引《夏书》（《书经·禹贡》）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

接着，作者作了自己的解释：

按淮水豫州，经徐、扬；沂水出艾山，在沂州；蒙山在今费县；羽山在今郯城，皆今兗府东境。大野即今巨野县，东原即今东平州。一在今兗西，一在北，皆见属兗，是今兗府东四境尽是古徐州之域。周人并徐州于青州，虽无徐州之名，而徐地自在。夫以徐地而有徐国，因有徐君，因有其墓，至当也。泗州今属江南，古属可以认知，与徐何涉？即志以古徐子国，实徐偃王之国。偃王乘周穆之荒佚，扩地而朝诸侯，奄有此土。及八骏还辕，已举徐而灭之矣。后之为徐者，迁徙于北，理或有之，即都邑之，于丘墓相距远迩，亦无可考。焉在彼之为是，此之为非乎？

作者认为，泗州徐君墓即使真是徐国国君之墓，实际上是周初造反被灭国的徐偃王及其后人的墓地，或者张秋徐国国君是被灭国的徐偃王后人北迁造成的，但不管如何，张秋徐君墓才是真的季札挂剑的徐君墓。明白了这段内容，就会理解泗州挂剑台及现在徐州新建的挂剑台的真伪。但伪并非就是不好，有多处挂剑台存在，也正证明了季子的做法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颂扬，诚信之于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其三，引杜甫诗以证，说明兗州处青州、徐州之间，间接说明“以徐地而有徐国，因有徐君，因有其墓，至当也”。其他所谓的徐君墓本不在古徐州地，其所建的挂剑台真伪自然就很清楚了。

张秋挂剑台由于历史悠久，且处于运河重镇，历年来受到了崇敬。

自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在张秋工部分司负责管理河道的官员杨淳于徐君墓前修建了“挂剑祠”后，明、清年间，一些文人、官员也纷纷题咏镌碑，对“挂剑祠”予以续修。祠内，四壁立有十三通碑刻，皆为历史名人题词。这十三块碑刻，计有五种字体，书法精妙，称之为“五体十三碑”。

可惜的是，清乾隆十六年（1757年），“挂剑祠”被大水冲没，而立于祠中的十三通历代名人诗文碑刻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陈昆麟、李印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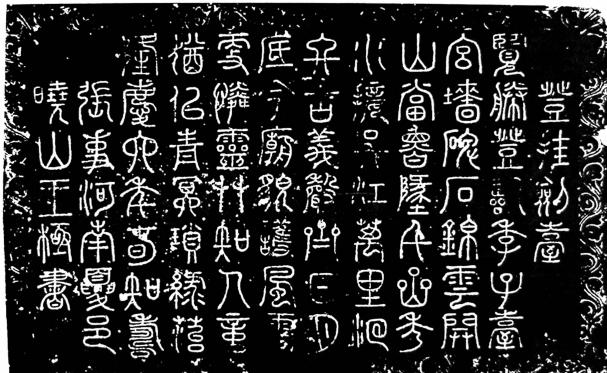
曾出版过《张秋挂剑台五体十三碑考释》一书。

季子挂剑的故事，整个讲的是信用，而这种信用，又是在非常令人敬仰的季札身上体现出来，因此，更为人所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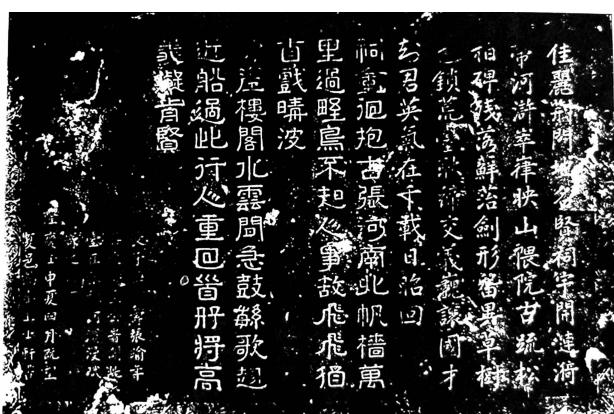
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信用、诚信，在当今是非常需要的。因此，弘扬这种美德，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徐州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已将挂剑台修建完毕，而我们的张秋挂剑台旧址仍是一片废墟。因此，早日重建张秋挂剑台非常必要。因为，到这样一个极富

精神内涵的景观处旅游参观，看到的不仅是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还能让人的心灵受到熏陶，给人以震撼。相信这对发展聊城文化旅游业、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进而构建和谐社会都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系聊城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五体十三碑”之一，《登挂剑台》 王极 诗并篆



“五体十三碑”之二，《挂剑台在张秋河滨,漫赋寄之(三首)》 王士轩 诗并书



重建晓春亭 学做“大丈夫”

□吴文立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论，是亚圣孟子所阐述的人格标准，两千多年来，国人传诵至今。

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历史的巨声发自千年古邑冠县。

据史料载，孟子由齐至魏国和晋国国都去，路过冠县。当时，魏国有位名叫景春的人，对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出名的外交政客十分崇拜，就想找孟子请教一下这个问题。碰巧，这次在孟子路过冠县时如愿以偿，于是就上前拦住了孟子的车。《孟子·滕文公下》有对话记录：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我们用白话文重新看一下两者的对话：

景春问孟子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发起脾气来诸侯都很恐惧，安静下来，天下没有战争也就太平无事了。”

孟子说：“这样的人怎么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二十岁的成年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嘱咐他；姑娘出嫁的时候，母亲嘱咐她，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必须要恭敬，必须要警惕，不要违背你的丈夫！’用顺从作为处世原则的，这是卑贱的女人之道。而男



子汉应该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住宅，即仁里；站立于天下最正确的位臵，即礼上；走在天下最宽广平坦的大路，即义上。能实现志向就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时就独自施行这一个原则。富贵不能使他的心惑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节操，武力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是大丈夫。”

孟子的话语铿锵有力，令人敬佩不已。冠县县志对孟子此行也有记载。据民国《冠县志》载：

当其（孟子）去齐适魏及晋都，烽烟告警，不约而护送者千家，提壶浆迎者八里。景春拜谒而干谕，孟子止车而立谈，教化剀切，晓谕详明，见《孟子》中篇。今有烟庄、宋村、千家店、八里庄、东西二提壶、南北两化春、止立村历历可稽。

由上可见，孟子此行不但留下了“何谓大丈夫”的名言，而且当地一些村落的名称也深深地打下了孟子的印记：

烽烟告警处，此处古有烟墩，在今村南，已废，是孟子去齐适魏及晋都时烽烟告警的地方，村因名烟庄。

不约而护送者千家，故有宋（送）村，现分化为东宋村、西宋村两村。

不约而护送者千家，又因村傍要道，设有店铺，故名千家店，后俗称为店子。

提壶浆迎者八里，后称此处为八里庄，现分化为张八里、陈八里两村。

提壶浆迎处，后称提壶村，今称提固村，已经分成东、西提固村。

孟子晓谕教化景春处，故名晓化春，演变为小化村，现分前、后小化村。

孟子止车而立谈处，后称止立村，今名直隶村。

大丈夫人格是孟子的首创。当然，孟子所谓的大丈夫有特定的含义，不能照现在世俗的意思来理解成大男子主义等等。《说文解字》“夫”字条下说：“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孟子所讲的“大丈夫”则与身体条件无关，不是指“身长八尺”之人。孟子的“大丈夫”与性别也无关，不是指男性之人，不是说大男子主义就是大丈夫精神。与权势无关、与财富无关、与能说会道的才能无关、与博学多才无关，甚至与雄才大略也无关。在孟子的眼里，大丈夫是具备高尚人格的人。



在这里，孟子首先否定了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之流为大丈夫的观点。因为张仪是魏国人，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入秦，代替公孙衍的大良造之职。以后又任秦相，迫使魏国献上郡十五县。他游说各国服从秦国。他向魏出主意说，要用秦、韩、魏三国的力量攻伐齐、楚两国，实际上是使魏国首先表示听从秦国，又使其他国家也仿效魏国，这就是连横的政策。他怕齐、楚联合，于是又到楚国去用离间计：答应若楚与齐国绝交，秦国就将商、于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楚怀王竟信以为真，派人到齐国去辱骂齐王，并与齐绝交，使齐国联合秦国来对付楚国。当楚怀王要张仪交出商、于六百里土地时，张仪说：“我只答应奉献六里地给大王，不是六百里啊！”楚王大怒，发兵攻秦，被秦、齐联军打得大败，大将军屈丐被俘，秦国夺取了楚国的汉中等地。这就是张仪的为人。纵横家顺从君主的意志而攻城掠地，置民众的生死于不顾，因此孟子对他们十分鄙视，说他们行的是“妾妇之道”。而反观中国历史，由“大丈夫”到“臣妾”，再到清代的“奴才”，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人格史。由此，我们能体会到，弘扬孟子的“大丈夫”观是何等重要。

继而，孟子提出了他的大丈夫标准：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就是说，大丈夫要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也可以说这是大丈夫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接着，又提出了大丈夫的三条检验标准，或者说三块试金石：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富贵”、“贫贱”、“威武”概括了人生的三种不同处境。对许多人来说这三种处境都是严峻的考验。能够在贫贱时坚持操守的在富贵时未必能坚持，反之亦然。至于在“威武”面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存在，许多人未必能做到“不能屈”，自古以来毒刑拷打不失为意志薄弱者变节的通行证。

战国时期虽为乱世，但仍有一部分人始终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从千秋万代着眼，这是孟子所谓的“大丈夫”，也是其自身的真实写照。孟子对于大丈夫的呼唤，体现了他对乱世中生民的眷顾，也体现了其自身人格的崇高。正因如此，孟子的话受到了后代的景仰。民国《冠县志》载：

后汉张平子筑台构亭勒石纪之，此张平村之所由名也。

现张平村已演变为前张平东、前张平中、前张平西及后张平四村。



“张平子筑台构亭”即晓春亭。

民国《冠县志》又载：

晓春亭在县治东北十二里前张平村，亚圣孟子晓谕景春处，今废，其趾遗尚可考。亭为后汉张平子所创建。至明嘉靖年间，内阁孟渊重修庭宇，邑侯夏濬设学于此。清嘉庆九年，复奉上谕，重修，冠县教谕张登三、圣裔孟毓杰为之记。

该县志中提及的清嘉庆九年奉上谕重修晓春亭时冠县教谕张登三、孟

重修晓春亭碑記	孟子六十代孫孟毓傑邑人
張平村舊有曉春亭一所係亞聖鄒國公孟子曉諭	景春處祠基荒廢者久嘉慶四年歲次己未依奉恩
詔內一欵廢墜者舉之明年歲在庚申乃聯族捐資	詔內一欵廢墜者舉之明年歲在庚申乃聯族捐資
重修不果未敢呈報七年壬戌春間蒙上憲檄飭確	重修不果未敢呈報七年壬戌春間蒙上憲檄飭確
查先賢祠基據實上報卽於四月初三日具呈本縣	查先賢祠基據實上報卽於四月初三日具呈本縣
張天業下據呈曉春亭因歷年久遠庭宇傾頽碑倒	張天業下據呈曉春亭因歷年久遠庭宇傾頽碑倒

子后裔孟毓杰分别所作的碑记，收录于“艺文”中：

晓春亭的创建者后汉张平子，即东汉的张衡（76—139年），平子是其字，南阳人。东汉安帝时为太史令，顺帝朝廷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后征拜尚书。他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其四言诗《怨篇》、五言诗《同声歌》和七言诗《四愁诗》被后人无数次引用、仿作和评论；其《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更一直被公认为汉赋中的名篇和精品，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杰出的科学家，是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发明人，还是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关于张衡是否来过冠县，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任金光先生（冠县文化局原副局长）曾专门做过分析：

张衡来到冠氏是非常可能的。张衡担任太史令一职前后14年，而观天测地是太史令的主要职责之一。要完成这些任务，跑



遍全国各地是必需的。在他的著名天文学著作《灵宪》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天体运行、日月角直径等实测观察数据，张衡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这些数据绝不会凭空想象，而是亲临各地实测而来。因此，我们虽然没有张衡来冠氏的史料，但绝不能因此否认他曾经来过。

任金光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同时还有两个因素我们不能忽视，据《张衡年谱》：

124年（安帝延光三年）——张衡47岁，居公车司马令4年。二月，从安帝东巡狩，祠孔子。衡作《东巡语》、《舞赋》、《羽猎赋》。

136年（顺帝永和元年）——张衡59岁，居侍中，末年出为河间相。

可见，不但张衡在担任太史令时有机会到各地观天测地，而且他随天子东巡或任职河间相时，也有机会实地了解或听他人转述孟子在冠县晓谕景春之事。退一步说，他是否来过冠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下令或倡议创建晓春亭，目的无非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孟子的大丈夫观，形成崇尚大丈夫、学做大丈夫的风尚。因为他知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大丈夫人格在通常的情况下也许见不出什么特别的不同，而在有关生死大义的关键时刻则顿时焕发出灿烂的光辉。正如孟子所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尽心下》）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讲诚然是珍贵的，然而还有比生命更珍贵的大义。在生命与大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作为大丈夫应该是毫不犹豫的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培养大丈夫人格不是向壁虚造，而是有人性心理结构的内在依据，这就是人性向“善”。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属于仁、义、礼、智。这是孟子人性心理结构的四根支柱，而这四根支柱就是培养大丈夫人格的根基。因为有此根基和佛性，人人皆可成尧舜、成大丈夫。

由此可以看出，孟子提倡人性善，是要解决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德问题，那就是确立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石。假如一个社会老是让我们感觉到好人没有好报，坏人活千年，这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就很难保持。这个大难题



怎么解决？西方用宗教的解决办法。在西方，假如有人问为什么做好人？答案是做好人将来可以上天堂，可以跟上帝坐在一起吃蛋糕；做坏人要下地狱。中国没有全民性的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为国家的道德体系提供保障。那么，中国解决这个道德的难题靠什么？靠的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就两个字“不朽”，就是让人成为圣贤，精神不死，而圣贤就是人性中善的全面发展。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孟子人性善的重要性了。做好人是符合你的本性的，你只有做好人才能够完善自己，才能完成自己。这是对人的正激励，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

可见，孟子用这个办法解决了道德非常深刻的问题，为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民族确立了我们自己的独特的道德基石。从人性出发，我们照样可以获得崇高与尊严，一样可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人性善可以使我们获得对自我的肯定，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对人类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信心。

既然人性是善的，如何培养大丈夫的人格呢？

孟子认为，第一是坚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不因官位、钱财而屈志，即使与权贵交往亦应持平视的态度。有个例子：孟子到齐国，齐宣王说好了到馆舍去拜会他，后来伪称有病，要孟子去朝见。孟子断然拒绝，说自己也有病，不能上朝。他认为儒者为国君筹划治国方略，乃王者之师。他说天下可尊贵者有三：地位、年龄、道德。齐王凭借地位，居然轻视长者和有德行的人，这不是国君应有的态度。孟子的这种自尊和独立人格，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

第二是须善养“浩然”之气，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升华。内心充盈自信，外在就会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他在回答学生公孙丑提问时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
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
丑上》）

显然，孟子之意，浩然之气来自于仁道之心所孕育的一种情感，一种对国家、人民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情感运行于心中，流贯于血脉，便形成一种内在的充满自信的气势，最终外化为一种人格行为和凛然的气概。

第三是要磨炼身心，勇于面对挫折。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大丈夫人格的成就，不仅“心志”要经受痛苦的磨炼，而且身体也要接受劳累、饥饿、穷乏的考验，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必然遭遇许多失败、挫折，行为总是不能如意。孟子认为，这种失败、挫折对于造就大丈夫人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经受这样的考验才能培养出“动心忍性”的坚韧意志，才能增加卓越的非同寻常的能力。

成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就一定有大的人格、大的境界、大的眼光、大的胸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公孙丑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讲这种话的人是空前绝后的。恰恰这话是孟老夫子讲出，这既是他坚定自信的表露，也是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体现，真是气魄震烁古今，令人钦佩不已！

大丈夫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提出的大丈夫人格，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优秀分子，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宁可牺牲生命而绝不屈服于敌人，彰显了中国人的骨气。

孟子的大丈夫观，今天依然可以指导我们去探索人生的价值。这一壮语发自我们鲁西，更值得我们珍惜并以此作为我们人格完善的标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重建晓春亭，现场感受一下孟老夫子的教诲，以激励我们不断进取，成为真正的大丈夫。在此，以任金光先生的话来结束此文：

挖掘、开发晓春亭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座小小亭台，联系着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见证着一段不朽的千古名言，其价值不言自明。笔者认为，应尽快重建晓春亭及附属设施，加大宣传力度，弘扬这段不平常的历史章节，为我们丰厚的历史文化再添亮点。



感受张养浩 重建“四知堂”

□吴文立

在元代的山东文坛上，济南人张养浩（1270—1329年）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位作家。他不仅兼擅诗文，而且尤以散曲创作为最高成就。张养浩为官即以勤于政务、革除时弊、为民解难闻名。他担任堂邑县尹（县令）三年，不但在县署内建“四知堂”以自勉，留下了一段为人传颂的美谈，而且还将自己担任县令的经验进行总结，撰写出《牧民忠告》一书，成为历史上县级执政者重要的参考典籍。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元代著名散曲家。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以直言敢谏著称。弃官归隐后，1329年，关中大旱，他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在救灾工作中，积劳病死，终年五十九岁，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正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养浩少时即有才名。在19岁的那年秋天，他登上了济南名胜白云楼，写下了著名的《白云楼赋》。后来，山东按察使焦遂读到了《白云楼赋》，大为赞赏，于是接见了张养浩，并推荐他做了东平学正。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张养浩在23岁时离开东平，到京城大都求仕。经人介绍，献书于平章不忽木。不忽木奇其才，力荐张养浩做了礼部令史，进入御史台。在此期间，不忽木曾因张养浩生病亲自前去探望，见到的居然是家徒四壁，于是大为感慨，赞叹道：“此真台掾也！”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张养浩做了丞相掾，稍后被选授堂邑县尹。

他在《初拜堂邑县尹》一诗中表达了出任堂邑县的抱负和愿望：

一县安危任不轻，初闻恩命喜愁并。

徒劳人尔岂吾意，何以报之惟此诚。

操刃岂容伤美锦，循墙谁敢忘高名？



前贤为尹规模在，他日须期与抗衡。

在这首诗中，张养浩很好地表达了出任堂邑县的抱负和愿望，他要把这一方土地视作一块“美锦”，非常诚恳、非常谨慎地加以治理。

堂邑是一个小县，风气不正，迎来送往，多有所闻。为此，他想出一个办法：一上任就在住室的门上挂了一块“四知堂”的匾额。

“四知堂”命名，源于后汉杨震故事。

杨震（59—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阳（今陕西省华阴）人。他通晓经典，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之称。

杨震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他始终以“清白吏”为座右铭。杨震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任荆州刺史时举“茂才”提拔起来的官员，听说杨震途经本地，特备10锭黄金，于白天谒见后，又乘更深夜静无人之机，将黄金送给杨震。王密送这样的重礼，一是对杨震过去的举荐表示感谢，二是想请这位老上司以后再多加关照。杨震不但不接受，还批评说：“我和你是故交，关系比较密切，我很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意思是：夜黑人静，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您老就收起来吧。杨震回答：“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惭愧，只好作罢。

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古今中外，影响很大，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先生”。他的后人，也因此以“四知”为堂号以示纪念。

张养浩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四知堂”，一是见贤思齐，挂上这样一个匾额，即是内心崇尚杨震高风的真实写照，二是他要廉洁从政的公开承诺，更是他反对当时就存在的官场歪风的实行行动，因为这样下来，实际上是把那些送礼人的路给堵死了！

张养浩一向把钱看得很轻，《元史·张养浩传》中说他“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他有强烈的经世济民思想，做官后，更是以“四知”精神来要求自己。到堂邑后，有了“四知堂”这个杜绝受礼的牌子，轻装上阵，工作开展得很好。他对堂邑百姓减免赋税杂役，并奖励垦荒，号召发展生产。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他上任之初，就拆毁了淫祠30余所，废除了让过去的“盗贼”每逢初一十五到县衙参拜的规定。他说：“那些所谓的‘盗贼’都是良民，只不过为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现在已经对他们进行过处罚，如果仍然把它



们视为‘盗贼’，就等于断绝了他们的自新之路。”那些“盗贼”听到这一番话都感动得哭了，并互相告诫说：“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张公的恩德呀！”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张养浩在纵容犯罪。

堂邑县有一个叫李虎的家伙，曾经杀过人，而且纠集一伙歹徒为害一方，百姓们忍受不了他们的暴戾，但是过去的县尹却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张养浩来到堂邑之后，很快依法处置了他们，民心大快。直到张养浩离开堂邑十年之后，这里的百姓还为他立碑颂德。

张养浩治理这个小县三年，使之由贫变富，民俗大改。卸任时，他作了《题四知堂》一诗：

邑壮怜才弱，官微虑患深。

韦弦千古意，冰檗一片心。

袖有归来赋，囊无暮夜金。

三年何所得，憔悴雪盈簪。

这首诗中，他谈了命名“四知堂”的本意：自己年轻官小，不正之风盛行，但面对寒苦艰辛的处境（冰檗），决心以“四知”来警戒自己（韦弦）。坚持下来后：“袖有归来赋”，你看他两袖清风，归去来兮，多么潇洒；“囊无暮夜金”，你看他心无愧怍，襟怀坦白，坦荡荡有君子之风！

《元史》中说张养浩“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直到清康熙七年，堂邑知县张茂节，还对张养浩故居进行重修。至今《堂邑县志》中载有元明善撰的《县尹张养浩去思碑》。客观地说，在当时有“达鲁花赤”（监县官，位置在县尹之上，由色目人担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存在的情况下，张养浩作为县尹能做出这样的成就，确实是少见的。

以“四知”精神鞭策自己，张养浩的收获是巨大的。

那么，四知堂在哪里呢？

康熙《堂邑县志》（光绪十八年雀城书院重刻本）记载：

四知堂，在县之旧署，宣化其听事也，四知退食之所也，并张养浩所题。明初创立今署，其地不可考矣。

据专家考证，现堂邑镇政府西边堂邑棉厂里有一片草地，就是明代“四知堂”遗址。

据《聊城县志》载，任职堂邑期间，张养浩撰写的诗文有《初拜堂邑县尹》、《雨后行县》、《堂邑远心亭归饮》、《行水灾郊外》、《堂邑宣化堂退食》、《公退书四知堂壁》及《警宵楼记》等。《堂邑县志》有《张养浩传》。



三年任满，张养浩调任博平代理县令（今属山东茌平），有诗作《自堂邑移改博平权县事》记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被召回京师为司经，未及上任复改文学，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元仁宗）的老师。

据聊城地方志记载，张养浩除在堂邑、博平两县任职外，还曾到过高唐县。高唐原有东方朔庙（东方朔为齐国平原郡人，汉时高唐属平原郡），元代曾重修，现只存碑文一块，除记载东方朔一生功绩外，还说明原庙在高唐城东北十里处。庙重修之后，诗人张养浩赋《过东方朔庙诗》（见光绪《高唐州志》）一首：

先生高识过当时，谁道偷桃旧小儿。
揖让不逢三代盛，滑稽聊免一身危。
草荒汉构云承宇，苔蚀颜书雨涩碑。
我亦从来恶苟礼，斜阳遥望醉空卮。

光绪《高唐州志》还收入了一篇张养浩为高唐好友商泽民撰写的《静斋记》（见图）。

鲜为人知的是，张养浩也是元代有名的政治家。像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一样，张养浩崇尚儒家的“入世”精神，从小发奋学习，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后做过地方官员，曾任堂邑（今山东聊城与冠县部分地区）县令；做过监察官员，曾任监察御史；做过中央官员，曾在中书省任右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以及礼部尚书等职。1329年，关中大旱，他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在救灾工作中，积劳病死。他遵循儒家学说，始终言行一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任堂邑县令时撰写了《牧民忠告》一书，内容包括从受命上任到离职休养共十个方面、七十四项做事做人的方法，是我国牧令中较为完整的述职报告。书中对地方官员从“拜命（接受任职）”那一天起、到“闲居（解甲归田）”那一天止，其言行规范提出了自己的忠告：

为官之道应该在于“省己”、“戒贪”、“勉学”、“劝农”、“均赋”等等，意思是说在任期间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如何才能做一个老

高 唐 州 志	返 初 早 開 書 新 相 居 高 能 爲 自 吾 測 室 其 耶 端 萬 倪 物 往 爲 者 吾 又 體 嘗 耶 爲 其 三 靜 全 其 之 動 養 雖 從 吾 仕 亦	不 地 能 爲 其 切 予 相 處 室 其 也 慮 退 今 請 日 見 甚 游 澤 混 漠 處 髮 爲 靜 命 久 相 民 混 焉 於 各 我 齋 酒 至 從 氏 焉 其 此 種 卒 往 道 治 又 予 送 蟄 風 也 種 記 嘗 故 改 相 識 韓 壇 休 杜 遂 之 託 舊 元 善 之 其 廓 門 述 予 公 爲 予 也 三 封 馬 距 其 已 爲 業 退 後 十 也 其 雖 忘 記 甚 居 予 年 當 雲 蒸 游 其 未 洽 鵠 仕 矣 當 散 歷 嘗 及 間 華 京 嘗 時 救 一 者 託 筆 謂 山 師 守 不 寂 坐 以 與 而 予 中 契 庠 知 分 平 告 否 別 家 君 潤 濟 天 木 昔 焉 以 今 有 自 不	張 養 浩 史 中 臺 丞 御	靜 齋 記



百姓喜欢的地方官，可以说也是他历年为官经验的总结，也正是张养浩从政的正直人格的写照。

《牧民忠告》自面世以来，受到了欢迎。近几年，有许多地方推荐这本书：

广东的《阳江日报》转载了全文并有白话译文；

中国经济网将它放在“党建在线”部分并做了注释：

在建立学习型党组织的形势下，2009年6月，新华网在“新华读书”专题，推出了“为领导干部推荐古代两篇小册子”：

值此，中央号召干部多读书之际，特从县乡工作数十年的经验出发，向在任和即将上任的市县官员和大学生“村官”推荐古代当好州牧县令的两篇小册子。

这两篇小册子之一就是《牧民忠告》。

张养浩还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职。他根据任监察御史的经历，写有《风宪忠告》一书。根据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这些中央官员的经历，写有《庙堂忠告》一书。加上原来的《牧民忠告》，三书合称《三事忠告》或《为政忠告》。三事，指牧民、风宪、庙堂的职责。牧民，即治民，指地方官员；风宪，即风纪，指监察官员；庙堂，即宗庙与明堂，转为朝廷的意思，指中央官员。《三事忠告》，就是对地方官员、监察官员、中央官员的真诚劝告。因而，《三事忠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直为从政者所推崇。

可见，张养浩在聊城三年，不但留下了“四知堂”的美名，还给我们留下了治理县域的经验总结。《牧民忠告》这本带着聊城气息的执政著作，相信读到它的聊城人会有特殊的收获。

“四知堂”是一个知识型官员廉洁奉公的真实记录和样板，尽快恢复重建，或以博物馆的形式再现在世人面前，让到场者实地感受“四知”精神，亲身翻阅《牧民忠告》，亲自朗诵那些沾满聊城印记的诗文，相信会给人以别样的收获。

愿张养浩的“四知堂”能早日重见天日，不再仅是一个美好的历史故事。

学术探讨



黄帝故里是“桃丘”

□吴文立

魏晋著名学者、医学家皇甫谧（215—282年）在《帝王世纪》中说：“黄帝生于寿丘”。史学界对黄帝出生地为今何地颇有争议，有山东曲阜说、河南新郑说、山西交城说，还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提出的甘肃天水说等等。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张长城先生经过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后发现：“寿丘就是寿张的前身，即远古时候的桃丘，古址在今阳谷县东南的陶城埠及台前县东端的徐堌堆。这里就是人文始祖黄帝的出生地寿丘，因其被历史长河淹没而又凸显在寿张的文化符号里。”

寿 (tao) 与桃通用 ——桃丘即是黄帝出生地寿丘

远古时代的先人，穿兽皮、食野果。在悠长的岁月中，人们慢慢意识到，桃是一种益寿延年的水果，“桃养人，杏伤人，李子行里抬死人”的古谚语流传至今。在古人类社会，桃负载着一个特殊的含义——长寿，一直到现在，人们祝寿的时候还用献桃来寓意增寿，称为“寿桃”。

张长城说，在有了文字之后，“寿”字起初依然读“桃”音，并且相当长一个时期寿 (tao)、桃通用，现在仍有寿字旁的“桃”音字在使用，如“涛”、“梼”、“焘”等。《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像这样的早期文献中，寿字大都是读桃音的。（2008年第28期《走向世界》载有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张华松撰写的《有虞氏的龙兴之地》一文，也提出古代“寿”字读音同“桃”，赞成寿丘即桃丘的观点）



据张长城推断，黄帝生于寿（tao）丘，就是桃丘。在远古时代，桃丘因盛产桃而得名，桃在语言交流中也是寿的意思。桃丘为黄帝族某一个时期的都城，废于黄河之患。后来黄帝部落大部分西迁到了河南新郑方向，另有小部分南徙十公里，定居于今东平县西部戴庙附近，初名桃聚，寿（tao）字出现后更名为寿（tao）聚城，这就是寿张“寿”字的起源。

随着黄帝部族迁离故土，桃丘逐步沦为废墟：这里地处黄河冲积地，位于黄河、济水、大清河主河道畔，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接壤处，春秋及历代多属“各国”、各省、县边界。频发的灾患、民族的迁徙、战争、国家分与合等诸多因素，使文化出现了断裂和传承的改变，生生地把黄帝出生之桃丘给迷失了，以至于长时间以来人们竟不知道真正的寿丘到底在哪里。

由于一段时期“寿（tao）”、桃通用，桃丘被写成了“寿（tao）丘”，后来，又变成了“寿（shou）丘”，张长城强调，寿张始于桃丘，桃丘就是寿丘，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就出生在这里。

从桃丘到寿丘的变迁 ——黄帝时代的“三国演义”

张长城认为，约在公元前三千至二千五百年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大地进入“万国时代”，万国时代后期又基本上分属炎、黄、尤三大集团：炎帝部落在黄河中游南部；尤统治区为鲁、江、浙等东部区域；黄帝部落在黄河中下游，桃丘是一时都城，黄帝出生于此。他分析了当时三大部落演变的过程：

远古时期的桃丘土地肥沃，适宜种植桑及五谷，又有众多河流可以捕鱼，先民们基本上处于种植、渔猎的生存状态。由于河流不断徙变、洪水泛滥，黄帝部落的都城桃丘虽固，也免不了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于河西。一般大水过后土地能耕种，人们返回家园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但遭遇几百年一遇的洪灾后，桃丘便成了汪洋，无奈之下，黄帝族逐步西迁，并最终选择了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史学界称“有熊国”，这就是目前所谓的新郑“黄帝故里”的由来。因新郑是炎帝的统治区，自然就发生了冲突，结果以炎帝族让步、双方言和而告终，两大部落从此和睦相处，联姻结盟。双方还把各族崇拜物统一组合，设计制定龙图腾，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龙和华夏族第一次大融合，“炎黄子孙”之说就来源于此。



再说当时东部蚩尤部落。“尤”是其族人对这位首领的尊称，意为非常伟岸、英勇、才俊的头人。尤统一东部后，不断向西傍河平原扩展，一直扩侵到黄帝的老家——桃丘，把洪水退后的平原沃地占为己有。黄帝获悉，决不忍让，因为这里是他的故乡，列祖列宗均长眠于此。于是，一场传说中历史上第一次残酷的战争拉开了序幕。首领尤英勇无畏，加之部落有金属斗械（东部人最早发明使用了金属，铁的旧体写法“鍊”就是由东夷而来。《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战斗取得了节节胜利。黄帝几经败退后调整了战略，并联合炎帝部落一起攻打尤部落，传说还有九天玄女等帮助，终于将尤擒杀于“逐鹿之野”。黄帝杀了尤之后，分尸别葬于今巨野县等处，而将其头颅作为祭祀祖宗的祭品带回桃丘，祭毕葬于寿张阙城内，并命名曰“狗城”（《地道记》“寿张”注：“有蚩尤祠，狗城”）。今台前县城关镇后三里村东南约300米处原有大冢，本地人称蚩尤坟，1933年黄河决口时淤没。

黄帝族战胜了尤族，士气更加高涨，一方面加强宣传攻势，从声望上诋毁尤，规定在尤字音前面加蚩字（“蚩”是贬词，《说文》释为“虫也”。《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意为毛虫尤，彻底将尤丑化。另一方面，对尤族追捕诛杀。由于尤部落群龙无首，兵败如山倒，大部分西侵部落向南方溃退，直到今天，贵州苗族人仍祭祀着他们的祖先——尤公，并代代相传：他们的故乡在北方，被强人所撵，过了三条大河九重大山才到了云贵今苗乡；另有一部分被俘成为奴隶，称其为“黎民”，区别于炎黄部落的“百姓”，最后这部分人逐渐融入华夏族中；还有一部分人漂洋过海，逃往朝鲜半岛、日本等地，成为当地文明的先驱。

黄帝统治“中原”后，权力中心转向西部，桃丘故地依然自然灾害频仍。当黄河北徙或南徙后，这片沃土又成为先民们定居生活的家园，傍河（济河、大清河、徙骇河等）而聚居，耕种稼穑，渔猎生息。传说黄帝之子少昊即位后又把都城定了桃丘东部的曲阜，并且这个阶段“祥和而富庶”。黄帝之孙颛顼继帝位后把都城徙迁在了今河南濮阳（旧称帝丘），离桃丘有一百公里。应该说，这两个地方离帝乡寿丘都不远。

祭祀黄帝于曲阜 ——宋真宗以“梦”定寿丘

甘肃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



北。”这样，就直接将河南新郑说、山西交城说和甘肃天水说否定了，同时，也是对寿张桃丘说的否定。对此，张长城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鲁城不等于曲阜，直接将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解释为寿丘“在曲阜东门之北”是有问题的。为此，他作了详细解释：

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虽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黄帝出生地在鲁。问题是，是在鲁国的哪个地方呢？

光绪《东平州志》载：“《乾隆府厅州县志》云：（微乡）在州西，春秋庄二十八年筑郿。《公》、《谷》作微。《水经注》：水北迳微乡东。京相璠曰，寿张西北三十里有故微乡。按，此寿张故寿张也，在州境。”清代《寿张乡土志》云：春秋鲁庄公筑“郿”城于“寿张”，郿谓之微，鲁邑也。由此可见，鲁庄公所筑“郿”城是鲁国西部重邑，属于鲁国，古址在今梁山西北尚岭（今属台前县），而桃丘就在尚岭（郿城）偏北几公里的地方，完全符合寿（tao）丘“在鲁城东门之北”的记载，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给桃丘正名，给“黄帝生于寿丘”之说驱散迷雾。

张长城接着举证：《春秋·桓公十年》：“公会卫侯于桃丘，卫地也。”杜预曰：“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即桃丘矣。”此时桃丘应该是桃、寿（tao）分离时期，此时桃字寿义淡化，寿字桃音渐失。此后，桃丘改名为桃城、桃城埠，寿（tao）聚变成了寿（shou）聚城，时间上大概在秦统一六国又统一文字后。济南档案馆的专家曾认为定陶县的陶丘与“寿（tao）丘”有关系，但张长城说，从人文发展过程分析，陶也晚于桃，陶字古时读yao音，与窑、尧同宗。因此，从字义上讲，将“寿（tao）丘”解释为桃丘显然更为准确。

很多史学家认为，远古时期，山东中东部是蚩尤的地盘，曲阜不可能是黄帝的老家，而且从未见有“生而好古”的孔子及其同时代的人谈起身边有黄帝出生地寿丘的记录。只是到了南北朝以后，才开始有人将寿丘与曲阜直接联系起来。

那么，是哪个人最终将寿丘定在了曲阜呢？张长城认为，是大权在握的宋真宗。

到了宋代，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需要祭祀黄帝，在哪里搞这个重大政治活动呢？（可能当时的各种寿丘说不能让他满意，或者当时根本就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争论，大家查一下各地寿丘说提出的时间即知）于是，宋真宗又利用了一次神道设教的手法。清乾隆《曲阜县志》记载：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闰十月，改县名曰仙源，徙治寿丘。”并附注文曰：“帝言，轩辕黄帝降于延恩殿，谕群臣曰：朕梦天尊命之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曲阜，乃改曲阜为仙源县，徙治寿丘。”

宋真宗一锤定音，并在曲阜建有景灵宫纪念黄帝。至此，寿丘在曲阜之说正式“成立”。

张长城提醒说，宋真宗将寿丘定在曲阜，可能也有不得已的考虑。因为那时的桃丘地界几成泽国，宋代梁山八百里水泊再连“大野泽”，那已荒野了的“九岭十八堌堆”中的桃丘，不在水中就在北河滨了。没办法，就在曲阜吧。况且宋朝皇帝崇尚儒学、信仰道教，道教把黄帝尊奉为玉皇大帝（俗称老天爷），主管三界，最终青睐曲阜也是情理中事。于是，大兴土木，造“黄帝故里”与圣贤府集一隅，一来祭祀方便，尊宗敬贤功德无量；二来要为大宋江山的牢固奠定宗教信仰基础。其用心，真可谓良苦。

记者发现了一则有趣的现象：明清时，曲阜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对曲阜寿丘有关的记载和文物加以改造，使宋时叠石而饰之寿丘，一下子变成少昊陵了，并在撰写少昊陵的文字记录时，销毁了与寿丘有关的诸多文物古迹，宋代的无字碑及元人《重建景灵宫碑》也被统统毁掉，代之而起的是与少昊陵有关的诸多设施，于是，宋真宗“梦”定的寿丘渐渐不为人知。这种变化不知缘于什么，但历史事实是，从明、清、民国直至现在，一直是这样。

嫁接寿丘以怀旧 ——新郑是黄帝的第二故乡

因为研究上古历史，张长城注意到，由一个当地的退休老教师赵国鼎先生发端，“黄帝生于寿丘”新郑版这几年宣传得最火，网上大量关于黄帝故里的帖子似应是新郑人或新郑说支持者所发，观点无非是黄帝出生地就在新郑，新郑就是黄帝故里。其实，明白了黄帝部落西迁的历史就会知道，那是黄帝部落迁徙过去后的怀旧情结所致。设立供后人纪念缅怀黄帝的景观无可厚非，但新郑不是黄帝的出生地，确切说，新郑是黄帝的第二故乡。

张长城反问：试想一下，宋真宗坐朝廷在开封，离新郑只有一百多里路。如果当时“黄帝故里”新郑说能得到公认的话，真宗皇帝又何必六七



百里迢迢东巡曲阜呢？

生于1961年的张长城先生现为阳谷双阳食品公司员工，多年来热衷于研究族谱文化、人文现象、地方远古史等。他发现，中国人怀旧情结浓厚，故土难离一直是中国人的共性。因此，迁徙他乡，也总是设法将故里的人文景观嫁接过去。寿丘在鲁说是对的，但鲁不是指曲阜，而是鲁庄公的佐治之所郿城。当然，也不排除鲁庄公等鲁国人把寿丘定在曲阜纪念，这也不外是怀旧情结所致。因当时桃丘属卫国，是齐、卫、鲁的交汇点，也是各诸侯国的争夺地。由于河徙之故，桃丘也有可能归属过鲁国，反反复复，丢而复失是常事。鲁国人失桃丘而定寿丘于曲阜，正符合古代儒学雅士的怀旧情结。他进一步分析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帝丘）。”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虽然未必是事实，但绝非偶然。这种“后徙曲阜”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后人为迁就“寿丘曲阜说”而发布的自圆其说。

张长城举了本地古人怀旧情结嫁接人文景观的例子。他说，古寿张治所曾迁居多处，寿张、祝口、寿张集等这些古“寿张”治所都有凤凰台，今寿张镇又有凤鸣台，据分析极有可能是古桃丘、寿聚城址一路走来的文化怀旧遗存。台前县才成立二十几年，已急匆匆地把凤鸣台南移四里至金堤河南岸，成了台前县一景。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台前”县名正源于“凤鸣台前（南）”之说。可见，各地附会的人文景观历史悠长，代代相传，至今仍盛行。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张长城分析，一是民族迁徙附带；二是治所迁移嫁接；三是僻乡文化移进城（古寿张桥北张村张公艺家族有张家庙，这也是最早的百忍堂所在地。后来唐代旧寿张城东街也建有张家庙，后与故城同废；明代又于今寿张城东街建张家庙，废于“文革”）。凡此种种，均是民族情感的怀旧情结所致。但由于移接旧址的古文人们怀着对故土的特殊情感，采用各种手段以迷乱真相，力求将移接之景粉饰“成真”，以达到要把“杭州作汴州”的目的。

张长城说，从宏观历史上看，阳谷县城内的谷山和会盟台最初的（谷山、会盟台在古阳谷地——平阴县东阿镇谷城和东平县王古店，下页照片为迁移后的会盟台），老寿张城西的张良墓及曲阜、新郑的寿丘，都属附带移接之景，唯独曲阜寿丘长时间以来少露破绽，这是“桃寿”变故及人为作用所形成的假象，现在该是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阳谷县境内的会盟台。为县治迁移后“移接”之景。

桃丘→桃城→桃城埠→陶城埠 ——寿丘究竟在哪里？

张长城认为，就像黄河淤没了古穷桑一样，人文变迁也湮没了“黄帝生于桃丘”的信息传承。到了唐宋之后，当地隐隐约约地传颂着一个神秘而古老的信息：“寿张邑有景九岭十八堌堆，最大的是玉皇岭”等等。桃丘变成了其中一个大堌堆，而在文化典籍中则变异成了寿丘，与桃丘脱离了关系，被曲阜、新郑等地“注册”而去。与此同时，聚落桃丘者，依然怀揣着对远古遗址的崇敬之情守护着桃丘碑，哪知史册中早已被古人更名为寿(tao)丘，又变成了寿丘。尽管桃丘地几经隶属寿张县，寿张人也将古邑传续了几千年，或更名或迁移，始终对寿字情有独钟，但还是有了寿字源头是桃丘的失传。析透桃、寿二字从字意的变故又到字音的演变，加之考古探索发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寿张的源头是桃丘，而桃丘就是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始祖黄帝的出生地寿丘。

那么，寿丘或者说古桃丘究竟在现在的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张长城认为，要把握好三个认识角度：一是桃丘的位置，二是桃丘名称的变迁，三是今桃丘与古桃丘的区域差别。

一、桃丘的位置

《水经注疏》（北魏郦道元撰，民国杨守敬纂疏、熊会贞疏）载：

《春秋·桓公十年》书，公会卫侯于桃丘（会贞按：下引杜说，东阿东南有桃城，在今东阿县西南），卫地也（会贞按：卫



地二字，杜《注》文）。杜预曰：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即桃丘矣（杜《注》有桃城。会贞按：《释例》作有桃丘，是桃城即桃丘，郦盖兼采之）。

《方舆纪要》载：

今东阿县西南六十里有安平镇。镇东十八里为桃城铺，旁有一丘，高可数仞，即桃丘。

可见，桃丘在今东阿县西南、今阳谷县张秋镇（安平镇）东十八里，又名桃城、桃城埠（埠多误写为铺）。

二、桃丘名称的变迁

桃丘，周以前称桃丘，又写作“寿（tao）丘”。晋以后称桃城、桃城埠，曾属东阿、阳谷、张秋、寿张县等。因金堤河穿过，现在的桃丘分为隔河相望的两个村子：

——陶氏定居于金堤河北，遂名陶城埠，今属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

——明代徐氏迁居于金堤河南，遂名徐堌堆，今属河南省台前县吴坝乡。

阳谷县地名办公室公布的资料说：“陶城埠，春秋时卫邑，名桃城，清末称桃城埠。《左传》云：鲁桓公十年秋，公会卫侯于桃邱，弗遇。汉刘邦封刘襄为桃安侯，桃安侯在此建村，易名桃城。”

台前县政府公布的资料说：古桃丘在徐堌堆，史载海市蜃楼频现，为齐桓公会卫侯之地，又名会盟台，为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 5600 平方米。

可见，现在作为地名的桃丘已经不存在了，而陶城埠和徐堌堆只是定居于古桃丘的两个村落而已。

三、今桃丘与古桃丘的区域差别

张长城说，黄帝时代的古桃丘很可能是一个较广阔的区域。换句话说，今天的桃丘与古桃丘已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远古时代，这里毕竟是一个大部落的都城，或者说至少当时是一个重要的中心都邑，而今天的桃丘最多只是当年寿丘的一个中心区而已。但总体说，古桃丘似应不出古寿张县的“九岭十八堌堆”中，且以现桃丘为重点区域。

祖籍寿张的张长城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寿张史，没成想却发现黄帝故里就藏在寿张这个文化符号里，进而论证出桃丘就是寿丘这一重大历史事实。还桃丘一个远古历史真相，这是寿张人的幸事，也是史学界的幸事，更是华夏后人的幸事。他动情地说：“寿张，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更名、迁址最多的古县邑，同样也是最古老的地名之一。感触寿张，了解寿张，才



知道我们的根有多深，我们的先人经历了多少曲折和磨难。学习历史，触摸历史，才明白祖祖辈辈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所追求的愿景即是和谐安定的生存环境。研究华夏人文史，不可小看寿张啊！”

采访后记 ——由“桃丘——穷桑”看聊城在 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帝王世纪》载：“黄帝由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帝丘）。”记者发现，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古桃丘与穷桑很可能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有可能两者就是一体，只是名称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张长城说，自己还没有深入研究，但目前感觉，这个穷桑，八成就在古寿张的“九岭十八堌堆”中，且以桃丘概率最大。他说，寿张人习惯说“邑有九岭十八堌堆、三十六庙……”，实际上说的是以“岭、堌堆、庙”命名的村庄，比较上口好记，但也隐约传续着神秘古老的讯息。因年代太久远，在断续的人文传递过程中，被逐渐罩上一层层神话传说或宗教迷信的外衣，以致于众多古遗址都不好考证其源。随着近年来考古探索发现，这些“岭、堌堆”下面均有远古先民的筑造遗址，现已有不少“龙山文化”及以前古遗址被发掘认证等。其实，这个区域的古遗址过去不断被黄河淤积，不单是某个时代文化的产物，很多“岭、堌堆”的文化层很可能比“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更遥远。

另据公布的资料，1994年阳谷县开发景阳冈（景阳冈属于古寿张“十八堌堆”中的东沙堌堆）景点时，发掘出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有35万平方米，经考古专家张学海先生考证，认为很有可能是舜帝的都城，并进一步推测：景阳冈龙山文化城极有可能是古穷桑，古穷桑是古史中传为黄帝登帝处、少昊登帝处、颛顼之都、虞舜之都。

记者认为，因舜帝曾“作什器于寿丘”（《史记》），又以古穷桑为都，如景阳冈是舜帝都城，这里距其东方的陶城埠（桃丘）只有十公里，因此可以推断，古桃丘或许也是舜帝之都，或者说，东沙堌堆景阳冈区域很可能就是古桃丘亦即寿丘的一部分，由此得出古桃丘即是古穷桑的推论，是十分自然的事。



现象一：这里曾是华夏人文始祖和远古圣贤活动的中心区域

黄帝之后的历代帝王迁都频繁，其主要因素就是水患徙变之故。虽然如此，远古时代众多中华人文始祖的建都地仍没出古桃丘文化圈子。黄帝之子少昊先在这里即位，稍后又把都城迁到了东部的曲阜；黄帝之孙颛顼在这里即位后把都城迁往一百公里外的帝丘（今河南濮阳）。在黄帝前后在这里留下遗迹的还有：

- 伏羲在古阳谷教民种谷；
- 炎帝神农氏发掘古阿井（今阳谷县阿城镇）；
- 寿张阙城有蚩尤墓；
- 东阿有“字圣”仓颉墓；
- 聊城城区西北原有颛顼墓；
- 高士巢父隐居聊城，“巢父遗牧”为聊城古八景之一；
- 聊城城南原有尧王坟；
- 高唐为少昊司寇爽鸠氏之墟；
- 东昌府区堂邑镇是黄帝第五子清阳氏旧所；
- 鲧、禹父子治水的传说流传至今；
- 长寿冠军彭祖之墓仍完好地保存于临清。

现象二：这里有数量众多且分布有序的远古文化遗存

聊城境内有大汶口文化遗址 18 处、龙山文化遗址 41 处、龙山文化城 9 座，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是全国最大的龙山文化城，有“都、邑、聚”等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古寿张、阳谷、东阿、茌平及其他地方众多文化遗迹或“堌堆式”遗址，大都分布在古济水以西，且由西南向东北呈条带状分布。记者认为，这些区域很可能也都属于寿丘（古桃丘）和古穷桑。换句话说，古桃丘和古穷桑不仅可能包括古寿张的“九岭十八堌堆”，还很可能包括东阿、茌平等地区的众多“堌堆”。

由上推定，包括聊城在内的古桃丘及周边区域很可能的东西文明的交汇地，曾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这里特殊的地形优势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成为远古人类生活最早的区域之一。同时，河流众多，黄河、济水等造成的水患在给人们带来磨难的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组织人力、共同战胜灾害的契机，由此产生了部落、国家，频繁的交流又产生了文字等。寿丘及其周边地区，是东西文明的交汇地，当然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黄帝生于寿丘”这个千古之谜的破解也启示我们，研究远古文化，



研究聊城文明起源，要跳出桃丘看桃丘，跳出寿张看寿张，当然，也要跳出聊城看聊城，跳出中国看中国。有了宏观思考，我们才可更好地认识、把握寿丘、寿张乃至聊城在中华文明起源上的地位。而有了这样的宏观思考，你就会发现，古济水西岸极有可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不仅包括桃丘，还应包括众多的“堌堆”等。如此，理解众多的聊城人文古迹遗存，就会豁然开朗。

发现黄帝生于寿丘即桃丘，这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重新认识聊城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的地位的开始。记者也衷心地希望以此为契机，大家共同努力，早日揭开穷桑乃至鲁西远古文明的众多真相。

（原文载 2010 年 6 月 22 日《聊城日报》，题目是《黄帝故里是“寿张”》，个别地方有改动）



管仲“三归”在聊城

□张富祥

古籍久传之后，理解易生歧义，有些成语、俗语尤其难于考求，所谓管仲有“三归”就是著名的一例。至迟自汉代以来，人们对“三归”的解释便层出不穷，但是迄今未有大家公认的比较妥当的说法，以致这样简单的两个字，竟成为学术上的难题。这一问题不但涉及对古籍的阅读和理解，而且涉及对管仲的评价以及对齐国社会风俗、文化流变的研究等等，因此现在仍有细加检讨弄个清楚的必要。

一、古籍中有关“三归”的资料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也为了减省读者翻检之劳，这里先将有关资料清理一下。

“三归”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这一章主要是批评管仲“不知礼”的。后人对“俭”字的理解有问题(解说详后)，所以现在就将全章抄在这里，以免断章取义。与此相联系的是《礼记》中批评管仲的两段话：

管仲镂簋、朱紱、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礼器》)

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紱，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杂记下》)

“镂簋”指的是在器物上雕刻花纹，“朱紱”指的是系在领下的帽带用红色的，“山节”指的是建筑物的斗拱叠得很高，“藻棁”指的是建筑物的梁柱装饰华丽；“旅树”即孔子所说的“塞门”，指大门内的照壁；



“反坫”指接待宾客时放置空酒杯的土台子。旧说按先秦礼制，前四样都是天子才能用的，后两样也只有诸侯才能有，所以孔子批评管仲僭礼；又说管仲虽然是贤大夫，而真叫人难以在他之上做君长(太侈逼上)。《礼记·杂记下》在上引文字之后还有一段话：“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这是说晏婴连祭祀用品都非常俭约，和管仲正好相反，然而这俭约作风又让他的下属为难。

自《论语》之后，有关“三归”的记载屡出不鲜。《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八记载说：

晏子相景公，老辞邑。……公不许，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今夫子以相寡人，欲为夫子三归，泽及子孙，岂不可哉？”……晏子出，异日朝，得间而入邑，致车一乘而后止。

晏婴不受封邑，齐景公一定要他接受，他不得已，只留了够供应“车一乘”(一车四马)的土地。《晏子春秋》内外篇另有多章记其事，都是传闻异辞，有些在本文第五节还要引到。

《韩非子》说到“三归”的文字有两处，实有三条：

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

一曰：管仲父出，朱衣青盖，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外储说左下》)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国，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难一》)

这几条所记也是传闻异辞，但后者记了霄略为管仲辩解的话。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又以“或曰”的形式反驳霄略：“今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说苑·尊贤》篇载有类似的故事，而于“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下接言“桓公赐之齐国之市租一年”。



《战国策·东周》亦有为管仲“三归”辩解之文：

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

这是说管仲故意“为三归之家”，奢侈甚至超过齐桓公，为的是平息国人对齐桓公奢侈的非议，而并不是故意去做有害于民生的事。汉刘向《说苑·善说》篇引用了这一说法，但有误解：

桓公立仲父……乃谓管仲：“政则卒归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于是匡。”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

俞樾《群经评议》已指出，刘向引用《战国策》时，把齐桓公之事与宋君筑台之事牵连到一起了，以致误认为“三归之家”即是“三归之台”。另外，刘向对“以掩桓公”的理解也不妥，他实际上是“以掩桓公非”五字连读的，以“自伤于民也”另为一句，这样“自伤于民”也就成了故意伤民，与《战国策》原意不符。

《史记》、《汉书》所见的“三归”，有以下几条：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
（《汉书·平津侯（公孙弘）传》）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史记·货殖列传》）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史记·礼书》）

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陵夷而不反。（《汉书·礼乐志》）

管仲设轻重以富国，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
（《汉书·地理志》）

另外，《风俗通义·十反》篇也说到：

夷吾朱紱以三归，平仲辞邑而濯纓。

以上这些材料，好些是辗转传抄的，总源头是《论语》和《晏子春秋》。《汉书·地理志》的“取三归”，有人引为“娶三归”，属误引，其文



本于《史记·货殖列传》，“取”仍当是“求取”或“接受”的意思。对于上述材料的具体分析，下面随文涉及。

二、前人对“三归”的解释

据我们所见，前人对“三归”的解释主要有下列一些说法——

1.“三归”指“娶三姓女”或“娶三国女”说。何晏《论语集解》引汉包咸曰：“三归，娶三姓女。妇人谓嫁曰归。摄，犹兼也。礼，国君事大，各官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备职，非为俭。”这种说法，后来颇有影响。《史记》张守节《正义》、《汉书》颜师古注都用此说。《战国策》鲍彪注亦用此说，但谓“盖三取女”，无“姓”字，且属疑辞。皇侃《论语义疏》以为“姓”字不当，改为“娶三国女”，据古礼而言“管仲是齐大夫，而一娶三国九人，故云有三归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又引其父刘履殉《秋槎杂记》，谓“天子、诸侯娶妻班次有三”，“诸侯娶夫人，二国媵之，并夫人本国为九女”，“其本国归女为一次，二国各一次，故曰三归”。俞正燮《癸巳类稿》又稍有变化，提出娶三正夫人说，以为古时天子、诸侯皆有三宫(三正妻)，卿、大夫、士一宫，管仲娶三位正妻是逾矩非礼；然所举齐桓公有三夫人等例证，古时又皆以为是非礼之事，则其说不能自圆。

2.“三归”为台名说。此说见于刘向《说苑·善说》篇，然实属误解《战国策》之文，前已指出。而朱熹《论语集注》、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仍从其说，且金氏又曲折求诂，把“三归”讲为用于建筑的“算家三归法”。后人拘守于朱熹的名声，又欲牵合“娶三姓女”说加以变通。如南宋黄震《黄氏日抄》说：“《说苑》谓管仲避得民而作三归，殆于萧何田宅自污之类。想大为之台，故曰非俭；而台以处三归之妇人，故以为名欤？”孙志祖《读书脞录》也说：“三归之为台名是也。然所以名三归者，亦以娶三姓女之故。”毛奇龄《稽求篇》曾驳斥黄震之说，钱坫《论语后录》等亦指筑台迎女说不通。

3.“三归”为府库说。清武亿《群经义证》云：“台为府库之属，古以藏泉币。……韩非子……以三归对贫言，则归台即府库别名矣。”此说是由上说蜕变来的。黄式三《论语后案》及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都赞成此说。

4.“三归”为地名说。清翟灏《四书考异》云：“以管氏本书证之，三归特一地名，读《轻重》篇自见。盖其地以‘归三不归’而名之也。”所谓“归三不归”，是指《管子·轻重》篇所记的一个寓言故事中，有三个



“终日不归”及“彼臣归其三不归”之文。按故事所讲，以为“其地以‘归三不归’而名”，有点匪夷所思。不过翟氏以为“本公司地，桓公赐以为采邑耳”(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引)，值得注意。梁玉绳《管子》从此说，但只说“为地名近之”，未提及“三归”得名来历。

5.“三归”指“三百乘之地”说。此说是日本学者太田方在所作《韩非子翼龜》中提出的，今未见原书，仅见于学者的征引。所依据的是《管子·乘马》篇所说“方六里为一乘之地”，故“三归”指三百乘之地。

6.“三归”指“家有三处”说。清俞樾《群经评议》云：“《韩非子》先秦古书，足可为据。先云‘置鼓而归’，后云‘家有三归’，是所谓归者即以管仲言，谓管仲自朝而归，其家有三处也。家有三处，则钟鼓帷帐不移，而具从可知矣，故足见其奢。……管仲家有三处，一处有一处之官，不相兼摄，是谓‘官事不摄’。”此说甚为平实，然《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一日”所记，前后两“归”字恐不能一例讲。实际原文讲的是两事，前者状管仲出行之气派，后者指管仲家财之殷富。

7.“三归”指“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说。清郭嵩焘《养知屋文集》卷一云：“此盖《管子》九府轻重之法，当就《管子》书求之。《山至数》篇曰：‘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三归之名实本于此。……《轻重乙》篇云：‘与民量其重，计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尽此而已矣。’……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汉书·地理志、食货志》并云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归，其言较然明显。《韩非子》云‘使子有三归之家’，《说苑》作赏之‘市租’；三归之为市租，汉世儒者犹能明之，此一证也。《晏子春秋》辞三归之赏，而云厚受赏以伤国民之义，其取之民无疑也，此又一证也。”此说联系经济和租税制度解释“三归”，考虑深刻，直到近时仍多有从之者，或有“最善”、“最为有力”、“确当”之评。郭氏的意思，是指管仲所得赏赐为国家所征收的商税，这些商税约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1929年，张维思曾作《三归考》(载齐鲁大学《国学丛刊》第一集)，提出“三归”为“税关”说，即征收关税，显然由郭氏之说化出。

8.“三归”指“以三牲献”说。清包慎言《论语温故录》云：“三归当为僭侈之事。古归与馈通。《公羊》注引《逸礼》云：‘天子四祭四荐，诸侯三祭三荐，大夫、士再祭再荐。’又云：‘天子、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诸侯之士，特豕。’然则三归云者，其以三牲献欤！……合观(《晏



子春秋》)内外篇所云，则三归亦出于桓公所赐。内篇言‘以共(供)宗庙之鲜’，而外篇言‘赏以三归’，则三归为以三牲献无疑。晏子以三归为管仲之一恶，亦谓其侈拟于君。”此说几乎没有附和，唯刘宝楠《论语正义》谓之“颇近理”，“亦通”。然在笔者看来，所说“归”通“馈”，实最接近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讲为“三牲献”仍然滞而不通。

9.“三归”指管仲所蓄“春谷女奴”说。这是新近杨希枚先生提出看法，见所著《先秦文化史论集·从七出谈到三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杨先生通论有关古代婚姻和经济制度的一些史料，然后落到“三归”上，认为“三归”可以解为女性的“三出”或“三嫁”，也就是“常出常嫁”，“出”是离婚，“嫁”是结婚，“三”表示多次的约数；又据《管子·小匡》“女三嫁，入于春谷”及《墨子·天志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妇人以为春首”等文，古者女三嫁，要没入宫中，充为春谷的女奴。这样也就证明了：“就管仲而言，身为齐相，除了官家可能配属他相当数目的奴属外，或更由于他获得邦君赏赐或恩准蓄养女奴，而有着更多的奴属。……而这样的一个‘家’，在著者的解释之下，也就是所谓‘三归之家’。”此说又开一新视角，然用女奴的数量指称一个贵族的“家”，恐怕是绝无仅有，仍令人不好理解。

前人关于“三归”的解说，当然不大可能搜罗无遗，以上所举只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各有见解，但在运用史料上随意性较大，尤其是着力从《管子》书中寻找带“归”字的词句作为依据，便不免断章取义。这里不拟详加评断，但诸说主导意见我们都不能认同。

三、讨论“三归”的几个前提

在谈我们自己的看法之前，拟先确定几个考察分析的前提。

其一，“三归”为齐桓公所赐，这点应该没有疑问；

其二，“三归”与传闻的管仲之奢富有关系，从现有史料的大多数来看，这点也应该没有疑问；

其三，“三归”一词始见于《论语》，那么《论语》所记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那么“三归”提法的源头在哪儿？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其四，《论语》首记“三归”的文字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传统的解释对还是不对？

其五，除了《论语》，解释“三归”的初义主要应靠哪些文献？

这里后三点都需要研究，研究过后才能作为解释“三归”的前提。

《论语》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全书的可靠性是从来没有人怀疑



的。具体到管仲有“三归”的故事，既出于孔子之口，且在弟子所记的对话中，其可靠性也不容置疑。“三归”的故事，当然出自齐国，而孔子在齐景公二十六年(前522年)就已见过景公与晏婴。据《史记》所记，是年景公偕晏婴到鲁国访问，适逢孔子自周返鲁。景公见到孔子，问起秦国何以能称霸，孔子答以尊贤之义，景公大为高兴。这时孔子30岁，在鲁国已由办私学成名。五年后，即齐景公三十一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出走齐国，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景公接见孔子，向他问政，他乘机向景公进说以礼治国及节财之道。据说景公还有意以尼溪之田封孔子，只是因为晏婴以为儒者个人性格太强，礼节太繁琐，不注重法治，又讲究厚葬，才没有同意景公的做法；又传齐国贵族有人要收拾孔子，而景公自称年老不能用他，等于下了逐客令，孔子不得不仓皇逃回鲁国。孔子返回鲁国大概在齐景公三十三年(前515年)初。此时晏婴也已年老，而距管仲去世恰好130年。联系《晏子春秋》的记载来看，景公在此时欲援旧典为晏婴增加封邑，而晏婴谈起管仲的“三归”，力辞不受封，都在情理之中。还有一件事是，孔子离开鲁国前，鲁国内乱的原因之一就是鲁昭公举行祭祀他父亲(鲁襄公)的大典，而执政的季平子却将宫廷舞队抽到自己家里跳舞。《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历来学者都认为这话是针对季平子抽调舞队事而发的。有这样一些背景，我们相信管仲有“三归”的故事一定起于齐景公欲增封晏婴事，《晏子春秋》的相关记载也都与晏婴辞邑事牵连在一起。想来孔子在齐国时必定听到过此事，甚至亲历过，所以此事应该是绝对真实的，断非后人所能伪造。现在“三归”的话头就排在《论语·八佾》篇里，而后人谈及“三归”又每与季氏“八佾舞于庭”并提，这些都不是没有来历的。

前人对孔子批评“管氏有三归”一章的讲解，我们认为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对“俭”字的理解上。此章开头就记有孔子的话：“管仲之器小哉。”什么是“小器”？听孔子说话的人不知夫子所指的是哪一端，所以接着问道：您说的是管仲“俭”吗？旧注对这个“俭”字，几乎不加解释，显然是认为作节俭、节约讲，因为好懂，所以用不着解释。这也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儒家虽重礼，却也并不主张为行礼而铺张浪费。《论语·八佾》篇就明确记录着孔子的话：“礼，与其奢也，宁俭。”《子罕》篇也记载孔子说：“俭，吾从众。”可是在论“三归”一章里，“俭”却不宜讲为一般意义上的节约。很明显的是，这个“俭”是和“小器”相对而言的，



如果讲为一般意义上的节约，又怎么能说是“小器”呢？恰当的解释，应是讲为吝啬。《诗·魏风·葛屦序》：“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孔颖达疏：“俭啬言爱物。”又《文选·西京赋》：“独俭啬以龌龊。”这类语境中的“俭啬”带有贬意，实即吝啬，所以“管仲俭乎”的“俭”讲成这个意思，方可与孔子鄙言的“小器”相应。

由此索解接下孔子的回答：“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也就不难看出，孔子在这里是谈礼的，而不是泛论政治，更不是因“俭”而论“俭”。确切地说，他谈的是祭礼，所谓“事”即指祭祀，而“官事”也就是国家祭祀，亦即公室的祭祀。“事”可专指祭祀，如《周礼·天官·宫正》“凡邦之事肆”郑玄注：“事，祭事也。”《书大传》“天子有事”注亦云：“事谓祭祀。”人所熟知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然更是把祭祀与征伐当作头等的大事。所谓“官事不摄”，包咸解“摄”为“兼”，后人群从之而无异议，实则未必确当，我们以为当讲为辅助、赞助。《诗·大雅·既醉》云：“其告维何？笾豆静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毛注：“言相摄佐者，以威仪也。”郑笺：“朋友谓群臣同志好者也。……其所以相摄佐，威仪之事。”孔疏说得更清楚：“论祭事而言攸摄，则是群臣相摄以助之。……摄者收敛之言，各自收敛以相助佐，为威仪之事，则《祭义》所谓‘济济漆漆’是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有此处后二句诗，杜预注云：“摄，佐也。”这些经注之文恰可与孔子所说“官事不摄”互相发明。孔子的回答可以这样译释：管仲有“三归”之富，却不出财为公室助祭，他有什么理由要吝啬！可见孔子虽主张节俭，而在祭祀问题上也并不赞成过分的俭约。就在《八佾》篇本章的前面，隔着四章，即今本《论语》卷四的第一章，便明确地记有一事：“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把他不主张祭祀过俭的观念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祭祀该用的物品还要用，不可俭省。这样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在批评管仲“器小”、吝啬之后，又接连举出“树塞门”、“有反坫”之事，甚至情绪化地指斥管仲“不知礼”。全章的上下文意紧相扣合，完全是一个话题的符合逻辑的问答；若按传统的解释，则全章所记不免被分成三件事。孔子之所以对“季氏八佾舞于庭”表示出极大的愤慨，自然也是他这一种情绪的流露。

孔子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三归”，他的弟子们也没有追问“三归”是何意，可知“三归”之语在当时还是人人都明白的。然而时过境迁，风俗无恒，后来人们说“三归”，反而越说越糊涂了。那么现在要搞清楚，



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想法是，摆脱现存既有的分歧说法，直求有关原初文献。这样的文献，从我们上述“三归”的来龙去脉来看，似乎只有《晏子春秋》一种。此书屡次道及“三归”之事，且言之颇详，应该正可为《论语》作注脚。也许有人会提出这部书的真伪问题，但我们以为，其中的基本史料非后人所能伪造；晏婴的主体思想也包含在里面，不是后人能够加进去的。它应该和《管子》一样，出于稷下学士的笼括，虽亦有不可靠的内容，而仍应看作是晏婴的言行录。其中有关“三归”的记录，大体有事实根据。《韩非子》和《战国策》谈“三归”，已然增加了传闻的成分，类似于纵横家的炒作。《史记》、《汉书》的记载大致本于《论语》，然《史记》以“三归”、“反坫”合称，《汉书》以“三归”与“雍彻”、“八佾舞廷”并举，可能对“三归”的具体含义都未仔细考求，只是当作奢侈和僭礼的代用语来使用了。实际“三归”指富奢，“反坫”、“雍彻”、“八佾舞廷”指僭礼，三者本义还是有所区别的。

四、本文对“三归”的看法

有了上述几个前提，便可进而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根据《晏子春秋》所提供的史料，我们认为“三归”之义只能就齐桓公赐予管仲采邑之事求解。前列翟灏、梁玉绳、太田方之说虽不确，而亦都涉及于此。实际上，“三归”只是“三归之家”的缩略语，在用语习惯上固然可以简称“三归”，而在语义的理解上却断不可将“归”、“家”二字分开。前人解释“三归”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家”字，老是围绕“归”字兜圈子，结果是百计检讨，还是觉得《管子》及相关古籍中的“归”字不够用，甚或将分散的“三”和“归”字生拉硬扯地拼合起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战国策》鲍彪注特别说明“夫家：曰家”，这其实是个大错误，有了这个前提，就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娶三姓女”之说的羁绊。反过来说，凡是把这个“家”字理解为普通意义上的“家庭”的，“归”字也一定不得正解，这就是“三归”难题的症结之一。所以这里先谈这个“家”字。

实际上，以往大家所忽略的仅是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先秦时诸侯称“国”，卿大夫称“家”。在典型的宗法分封制下，“国”和“家”的基础在领地，二者的性质是相同的，只不过领地的大小有别：“国”的领地包括诸侯控制的整个版图，“家”的领地则仅限于诸侯版图中的某些“邑”。二者可以合称“国家”，但“国家”一词在当时还只是一个相当空泛的象征性政治概念，并无多大的实质性意义。因此先秦古籍中的“家”



不仅可以代指卿大夫，而且可以代指卿大夫的采邑。如下列训释——

《尚书·皋陶谟》“夙夜浚明有家”孔传：“卿大夫称家。”

《论语·季氏》“闻有国有家者”集解引孔注：“家，卿大夫也。”

《论语·子张》“夫子之得邦家者”皇疏：“家谓作卿大夫也。”

《礼记·曲礼上》“凡家造”郑注：“大夫称家。”

《礼记·礼运》“天下国家”孔疏：“家谓卿大夫也。”

《国语·楚语》“家货足以共享”韦注：“家，大夫也。”

《周礼·大司马》“家以号名”郑注：“家谓食采地者之臣也。”

(以上代指卿大夫)

《周礼·夏官·序官》“家司马”郑注：“家，卿大夫采地。”

《周礼·官·序官》“家宗人”郑注：“家谓卿大夫所食采邑。”

《周礼·方士》“掌都家”郑注：“家，大夫之采地。”

《周礼·师》“以家邑之田任稍地”郑注：“家邑，大夫之采地。”

《周礼·朝大夫》“掌都家之国治”郑注：“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

《大戴记·文王官人》“使是治国家”注：“家，采邑。”

(以上代指卿大夫采地)

《孟子·离娄上》“天下国家”赵注：“家谓卿大夫之家。”

《公羊传》庄公四年“家亦可乎”何注：“家谓大夫家。”

《易·师卦》“开国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又干注：“承家，立都邑也。”

(以上兼指)

由诸如此类的材料可以知道，先秦无论称“家”、称“邑”、称“家邑”、称“都邑”，又无论指卿大夫之身、之地，所表达的无非是一事之两面，即贵族有地则有家、有家则有地。管仲“三归之家”的“家”字也是在这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即实指齐桓公赐予管仲采邑。“家”表身份，表地位，表宗法、政治关系，表财富分配原则，有时也直接表示私有财产的多寡。这些均需从不同的语境中随机选定。

由此反看“三归”，清人包慎言以为“归”字当读作“馈”，实在是不幸而言中，可惜又走偏于“三牲献”。古籍中以“归”字假借为“馈”的例子不胜枚举，即《论语·阳货》篇所见“归孔子豚”便是人们熟知的一例。唯是大家司空见惯，既放过了对“家”的深究，遂使“三归”的“归”字也没了着落。“归”字旧时既通“馈”，也通“餽”。“馈”的本



义是指赠赐食物，“餽”的本义是指祭鬼(祖先)，后来二者通用，均可指祭祀的荐享。引申开来，二者都可指一般意义上的进献、赠送或赐予，于是就成了同音同义的异体字。古汉语有“散文则通，对文则异”的规律，“馈”字虽可表进献，而有时又与“献”的意义有所区别。如《周礼·天官·玉府》有“凡王之献……受而藏之”之文，郑玄注指出“古者致物于人，尊之曰献，通行曰馈”；孔颖达疏则强调，正规的用法应是“上于下曰馈，下于上曰献”。具体到“三归之家”的语意，这个“归”字假作“馈”正当表示“上于下”之义，实等同于“赐”字。古时卿大夫立家则赐邑，赐邑则成家，上文已详言之，无须具体举例。这在先秦一些贵族的名字上也有反映。比如鲁国的公孙归父、齐国的析归父、楚国的仲归、郑国的公子归生(皆见《左传》)，这几个人都以“子家”为字，可见在当时贵族中间流行以立家赐邑取名字的风气。质诸古人名、字相应之例，这几个人名中的“归”字皆当读作“馈”，是又正可作为“三归之家”即是“三馈之家”的坚强证据。

弄清了“家”、“归”二字的特定含义，解释“三归之家”也就没有什么为难之处了。简单说来，“三归之家”既指赐邑而言，那么它可以理解为三次受封的卿大夫之家，也可以理解为三倍的封邑。卿大夫封邑的数量，因宗亲远近、地位高下、国家大小及土地状况等确定，当然不可能同格。《礼记·王制》载：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

这种整齐化的史料不能说全不可靠，但实际情况不可能这么整齐。先秦时期通常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千乘之君”、“百乘之家”等，诸侯的卿大夫即属于“百乘之家”这一等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赵岐注：“万乘，兵车万乘，谓天子也；千乘，诸侯也。”“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百乘之家，谓大国之卿食采邑，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



约略言之如此，实际到春秋战国时，“天子”有名无实，“万乘”成为大国的代称，“千乘”指中等国家，“百乘之家”则多指大国执政贵族。《韩非子·爱臣》篇也有相近的记载(大约由孟子之言化出)：

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

“百乘之臣”即“百乘之家”，称“臣”以君臣言，称“家”以采邑言。“百乘”通常指有百辆兵车的兵力，相应的兵赋则出自私家的采邑；若按“方六里为一乘之地”的说法计算土地面积，那么“百乘”相当于方六百里，这与大国之卿所食采邑也相去不远。“百乘”不是个小数目，恐怕只有大国之上卿才能有“百乘”的称号，一般贵族的受封则达不到这个规格。《韩非子·难三》篇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以“政在节财”，并自道其意向说：

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句中上一“三”字当是衍文，不然的话就是衍出下面的“者三”二字，两个“三”字只能存一个，意思是齐景公一天之内就分封了三个“百乘之家”。原篇下文，韩非驳斥孔子的观念，以为“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用其富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只提到“百乘之家赐”。可见这是卿大夫分封的上格。此事若属实，孔子在齐时应是能够听到的，所以《韩非子》所记出于孔子之口，而此又恰可与齐景公增封晏婴的传言相勘合。

至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三归之家”应是指管仲受封，得到了相当于“百乘之家”三倍的土地。管仲为齐国上卿，是桓公称霸的头号功臣，被尊为“仲父”，他受封的规格自然可以极高。虽然现在没有齐国贵族受封的统计表，无从知道他受封的规格究竟有多高，但由史书屡出“三归”的事实及谓之“富拟于公室”、“侈拟于君”等，总能推测当管仲在世时，管氏家族即使不是齐国第一家，也不会在高、国等大贵族之下。《说苑·臣术》篇载晏婴“家贫”，景公“令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这个“千家”实指约有千户纳赋人家，与“百乘之家”的提法不同，未可混淆了两个“家”字。从规模上说，“千家之县”也是大县，应该约略相当于一个“百乘之家”的封地。不过《说苑》此条本于《晏子春秋》，而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八谓景公“使吏致千金与市租”，不作“千家之县”。



讨论至此，问题还没有完结。现在要继续追问的是：齐桓公封管仲，为什么称“归”（馈）而不称“赐”？管仲受封是一次而得到了相当于正常赐封三倍的土地，还是赐封了三次？“三归”的土地究竟有多少？都在哪里？下面另辟一节作些讨论。

五、管仲封邑考实

“三归”一词之所以使人困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随着历史变迁和语言环境的转换，人们对先前诸侯赐邑而称“馈”（餽）的语言习惯已越来越生疏。《论语》中的这类词汇就颇不少，比如“儒”字，在此书中仅见于“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语，当时人肯定对“儒”的涵义和来历十分清楚，而后人却摸不着头脑了。“三归”也是仅见之词，流变情形类似。

赐邑而称“馈”有一层特别涵义，就是诸侯赐邑虽在实质上是为了优遇宗法贵族、有功大臣及其子孙，而在名义上却称是为了使受赐者的子孙有固定的收入而用于奉祀，以使家族的香火不致断绝。这种名义其实在后世一直保持着，并非先秦特有的现象，而其起源大概可以一直上推到宗法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详细的追溯没有必要，这里不妨看一个见于《韩非子·喻老》篇的故事：

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河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

楚庄王问鼎中原，称霸一时，归而赏令尹孙叔敖。孙叔敖鉴于楚国有“禄臣再世而收地”之法，只请赐予瘠薄的沙石之地，且地处偏远，所以其地得以为世业，“九世而祀不绝”。这故事见于多种古籍，或谓其地名“寝丘”，很像是葬地之名。古人把奉祀看得极重，卿大夫赐邑而称“归”若“餽”，显然不是没有来由的。

管仲赐邑，见于《晏子春秋》的记录，也多以宗庙祭祀为言。其《内篇·谏上》第十二载：

公曰：“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狐与谷，以共（供）宗庙之鲜。赐其忠臣，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请赐子州款。”辞曰：“管子有一美，婴不如也；有一恶，婴不忍为也。”其宗庙之养鲜也，终辞而不受。

又《外篇·重而异者》第二十四载：

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



着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子孙赏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为夫子赏邑，通(当作遗)之子孙。”晏子辞曰：“昔圣王论功而赏贤，贤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礼，无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孙奚宜与焉！若为齐国大夫者必有赏邑，则齐君何以共(供)其社稷与诸侯币帛？婴请辞。”遂不受。

这两条材料，一说“以供宗庙之鲜”，一说“以为子孙赏邑”；本文第一节所引《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八之文，也说“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这些都以保持管氏的奉祀为名，尚隐约与祭礼上的“馈食”有关系。《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九记晏婴辞退家臣高纠事，末云：“此三者婴之家俗，今子是无一焉，故婴非特食餽之长也。”这个“食餌之长”是就主仆关系而言的，餌食的是主人；如果允许比类的话，那么移之于君臣关系，君主制禄，群臣委质，君主毋宁也可称是“食餌之长”。这又是一种赐邑可称“馈”的联想。晏婴称管仲之忠为“一美”，而称管仲取邑为“恶”，这还可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八所记的一段话作参照：

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予辞之，何也？”晏子曰：“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得之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这类凌乱的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是以晏婴的辞邑和管仲的接受“三归”对照而言的，几乎没有例外。

管仲的受封缺少较详细的实录，但《左传》昭公十一年(前 531 年)载有申无宇之言：

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

谷即谷邑、谷城，旧址在今山东东阿县南东阿镇，晋杜预注《左传》，尚谓其城中有管仲井。齐国筑谷城在齐桓公二十四年(前 662 年)，那么其地为管仲封邑也在此时，时距管仲初相齐(前 685 年)已有 13 年，距其去世(前 645 年)则尚有 17 年。这是现在唯一能够确切知道地点和赐予时间的管仲封邑。申无宇为楚国大夫，与晏婴同时，他生在管仲百余年后，尚称管氏谷邑之封“至于今赖之”，可见直到晏婴相齐时，这里仍是管氏的家业。据《史记·管晏列传》：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



《索隐》引《世本》，记有庄仲山、敬仲(即管仲)、武子鸣、桓子启方、成子孺、庄子卢、悼子其夷、襄子武、景子耐涉、微，凡管氏十世，而诸人事迹现在已不可考。管微没有谥号，大约到他这一代，田氏已经篡齐，管氏遂趋衰落。

除谷邑外，上引《晏子春秋》之文明确提到的管仲封邑尚有狐邑和“书社五百”。狐邑今地不详，清人洪亮吉说“狐、骀近是”，然骀地据说在今山东临朐县境，距谷邑太远。晏子书中两次提到“狐与谷”，我们怀疑狐邑即是阿邑(又称柯邑)，在今阳谷县东北，地界与谷邑相连。“书社五百”见于《左传》哀公十五年(前480年)：

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
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

齐国与卫国联手，攻破了晋邑冠氏(今河北馆陶)，结果很快又被晋军打败了，事在齐景公二十七年(前501年)。因为卫国帮助过齐军，所以齐国虽败，还是割出“书社五百”之地给卫国，以示答谢。其地约略在今山东茌平至冠县一带，位处东阿以北，估计与狐邑、谷邑皆相毗邻。可能这里原来也是管仲的封邑，而到景公时既割让给卫国，也就不能成为管氏的世业了。齐国的割让当是迫于晋国的压力。

见于载籍的管仲封邑仅有这些材料。如果说“三归之家”就是指三次赐予的三处采邑，那么就应是谷邑、狐邑与“书社五百”了。三处采邑大约不是一时所赐，其中谷邑赐封最早没有疑问，狐邑和“书社五百”可能都是后来增赐的。尤其“书社五百”赐予最晚，齐景公说管仲“不辞而受”时就只提到“书社五百”，故又有管仲“年老，赏之以三归”之词。三处封邑究竟有多少土地？不好估计，可以推算的是“书社五百”。据传统解释，古制以二十五家为社，社内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造册，所以叫做“书社”。这样，“书社五百”就有民户12500家。这虽然只是个约数，而合狐、谷二邑，少说也有数万家。齐景公说仅狐邑和谷邑就有十七县之地，这可能有传闻的夸大，但总之应有大批的田土。看来后人说管仲“富拟于公室”，并非没有史实依据。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三归之家”，“三”可能只是表示多的意思，不一定就是确指三次，因而所封的采邑也不一定就是确定的三处。但诸处采邑合起来，面积相当于三个“百乘之家”也说得通，所以“三”也可以表示倍数。多次封赐及多处采邑的推测，可拿《晏子春秋》所记晏婴辞邑的材料作参照。书中涉及晏婴辞邑的文字多至9条，虽有传



闻重复，而其中有 5 条就涉及州款、邶殿、平阴、橐邑、都昌、台、无盐等地名。不管他接受不接受封赐，这些材料都可说明，贵族之家赐邑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随时都可能进行，这应是常规。返回去看管仲的封赐，也应该是这种情形。《韩非子》记“三归”，与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等并举，都放在管仲初相齐时，这是不可信的。如上所说，谷邑的赐封有确切时间，距管仲初相也已过了十多年。当然，诸子书不是编年纪，也没有必要要求他们引用故事都像史书记录那样谨严。

六、补述有关“三归”的历史背景

自“三归”话语流传以来，所有载籍无一例外地是把“三归”当作管仲奢富的代名词来使用的。这自然大致不错，但需要具体分析。《战国策》以及误抄《战国策》的《说苑》说是管仲接受“三归”之赐，是为了掩盖齐桓公的奢淫行为，纯属与史实不沾边的猜测，这在本文前面已经指出了。《列子·杨朱》篇说“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又把《战国策》的说法大大夸张开来。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津津乐道于“贫不可以治富”，似乎是在为管仲辩护；然而又说他“贪欲富贵”、“不知术”，对管仲作为法家先驱的学说缺少分析，对“三归”的事实问题也并未仔细追究。客观地说，晏婴是“三归”问题的始作俑者，我们相信所有批评管仲奢侈的言论都是从他开始的。不过他所批评的，都是管仲晚年的事，尤其是“三归”之语的流传，根子就在他批评管仲晚年对桓公给他增加的赐邑“不辞而受”。这实际上是晏婴本人辞邑的一种反照。齐景公不许晏婴辞邑的理由是：“自吾先君定公(丁公?)至今用世多矣，齐大夫未有老辞邑者。今夫子独辞之，是毁国之故，弃寡人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八)还屡屡搬出桓公赐管仲的掌故为口实。这在君臣之间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但从现存资料来看，景公越是这样说，晏婴就越是不买账，其操执亦难能，而有关管仲奢侈的话头从此也就越发不可收了。

这中间有着齐国社会变迁的特殊历史背景。本来，当齐桓公称霸时，国力隆盛，管仲功高望重，晚年多得一些封邑，也在情理之中，没什么大不了。况且管仲改革政治，发展经济，还曾提倡“侈靡”，主张通过增加消费以促进交换，刺激各业生产。所以尽管管仲家财极富，当时“齐人不以为侈”。“侈靡”主张有一定合理性，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中也不能说是不正当的理念。不过这一主张确也助长了齐国统治集团中的奢侈风气(事实上奢侈无度的总代表要推齐桓公)。更根本的问题是，自管仲、齐桓公相继去世后，齐国的政局就陷于长期的动荡，弑逆与变乱频仍。及齐庄公被



弑，景公继立，又有专横跋扈的崔杼、庆封二相争斗，结果是一死一出亡。这时齐国的国力已大下降，流行已久的奢侈之风也亟需反拨，于是景公起用晏婴，力求达成久乱之后的安定愿望。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晏子春秋》中有关他节俭的材料连篇累牍，他的人格和智慧都令人动容，而他的政治业绩在齐国史上也仅亚于管仲。在这样的形势下，管仲受到一些批评就是必然的了。尤其是追溯奢靡风气的源头，齐桓公是不能触动的，管仲便成为主要的靶子。另一方面，“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利羞称乎五伯”（《荀子·仲尼》），儒家对“霸道”之学一向不感兴趣。所以司马迁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待到孔子流亡齐国，作为35岁已成名的儒者，他接触齐国社会更多，又愤于鲁国(以及各国)的变乱，思人心不古，叹世风日下，对管仲、齐桓公的肯定就更加淡化了。如此一来二去，到底使孔门成了“三归”话头的最早传播之源。

从文化上说，变道的齐学既有兼收并蓄的容量，也隐藏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偏重权宜的弊端，桓、管之后齐国政局的长期变乱便是这种流弊的直接效应，晏婴恐怕是齐国历史上第一位看出这种流弊并起而挽救的政治家。他在执政中期偕景公到鲁国问礼，表明他较早地转向吸收儒学。虽然他不用孔子，而对儒学作用于齐文化的大趋势应该是看清了的，他的节俭、尚礼的措施对纠正齐国学风的流弊确也发挥了一些功用。孔子适齐也带着改造齐国风气的大愿望，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话，想来必定是他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孔子的宏愿很快就落空了，但总算使齐学与鲁学的交流开了一个试探性的头。由此看《管子》，看管学，这也是一个必须留意的角度，“三归”不过是个小话头。

话转回去说，管仲生前的生活是不是真像传言的那样挥霍铺张？现在实际上并无具体详细的确实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与此相反的是，现存《管子》书中倒是有不少提倡节俭的言论。唯是据情理言之，齐桓公既是一位极其奢侈荒淫的君主，齐国贵族中间又曾流行奢侈之风，那么管仲生前也未必就不是一位奢华的国相。这在今天已不必“为尊者讳”。倘若放开一些来看，当齐人意识到政治权力即将转向田氏，挥霍国家资财的风气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对历史责任的追究也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管仲的身上。这其实也反映了齐人对于桓、管称霸的怀念，而这种怀念又透射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七、结语

(一) 有关管仲有“三归”的话语，起于晏婴相齐时。晏婴提倡节俭力行，屡辞封邑，曾溯及齐国旧典，批评管仲晚年接受“三归”的赏赐。因孔子曾至齐国，熟知其事，后来“三归”一词遂首见于《论语》中。

(二) 《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其意指管仲富有家财，却又不出财助公室祭祀，这是“俭”(吝啬)、“小器”。所以他举“树塞门”、“有反坫”之例，指责管仲“不知礼”。

(三) “三归”或“三归之家”的本义，是指管仲曾三次接受桓公的赐邑，有三处采地；这三处采地的总量，相当于一般卿大夫正常赐地的三倍，也就是相当于三个“百乘之家”。这里的“归”通“馈”，指赐邑而言；“家”指采邑。“三”也可以理解为多次的约数。

(四) 管仲的封邑，现在可知者有谷邑、狐邑和“书社五百”，“三归”可能就是指这三处封邑。诸处封邑不是一时所赐，其中“书社五百”封赐最晚，在管仲晚年。诸地都在今山东东阿、阳谷、茌平一带。

(五) “三归”话语的流传，反映了齐国社会风气的流变，同时与儒学对齐文化的浸润有关系。其直接社会原因是春秋末年齐人对桓、管称霸以来奢侈风气的反思和反拨。

(六) 旧有的各种说法，我们虽不能同意，但也受到不少启发。本文亦一家之言，希望读者与各家说法互参。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文史》2003年第3期，题目为《管仲“三归”考》)



曾经影响山东历史的沙麓山

□赵明信

今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地是广袤的平原。河北省大名县的东半部，以及山东省莘县、冠县、河南省清丰县与之毗邻之处，都是沙质土地。在 2600 多年之前，历史上著名的沙麓山，就在这里巍峨矗立。

沙麓山的屏蔽与山东夷族

关于沙麓山，大名县解放前的诸本县志均记载有名。它的主峰起自今大名县东北部，向东南绵延伸展。根据几十年前未被全部平整的地貌分析，其几道主峰应坐落在大名县东半部的 500 平方公里之上。《穆天子传》卷六，即东晋郭璞《周穆王盛姬死事》记载：周代，周穆王和其爱女叔女坐曾两次来到山上。第一次，周穆王的兴致很高，对沙麓山铭勒题词，进行封敕。随之又在沙麓山附近猎得白鹿，得到美人盛姬。但不久盛姬患病、去世，周穆王隆重地厚葬、痛悼他的心爱之人，叔女坐参与主持了追悼仪式。第二次，叔女坐又随周穆王到沙麓山，刚来到居住下来，叔女坐就因思念盛姬而痛哭不已。由于叔女坐曾在沙麓山居住，还有传说叔女坐死后葬在沙麓山，所以建庙纪念她。此庙被当地人称为东土山奶奶庙，年年香火不断。这就是郦道元《水经注》卷五所记沙丘堰，现为石家庄村，在大名县城东 25 华里。

历史上，沙麓山所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当时，黄河西出潼关，流到今河南省濮阳市便转而向北，经今河北省大名县中部、山东省冠县和临清市西部，奔河北省衡水市、沧州市，然后注入渤海。历史上把太行山与这一段黄河之间称为“河内之地”，亦即九州之一的冀州。



对冀州至关重要的还有邯郸南边的漳河。它流出太行山后，咆哮奔腾，东向流入沙麓山西部的黄河。漳河像连接沙麓山与太行山的线条，把冀州之地划分为南北两块。冀州北部，即今河北省中南部，被黄河和太行山屏蔽为一条南北走廊（姑且称其为“河北走廊”）。沙麓山距离太行山不足100公里，成为河北走廊的南端咽喉，沙麓山乃是控制河北走廊咽喉的锁钥。

河北走廊咽喉往南，就是上古五帝活动的中心区域——中原。黄帝之后，颛顼和帝喾的首都都在今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尽管距离邯郸市区只有150公里，距今大名县城仅75公里，但沙麓山和太行山扼制了中原势力向北扩展，保障了北方民族在今河北省中南部的活动。

大禹分九州，首为冀州，把河内之地全部划在冀州之内，而且把州治定在漳河岸边的邺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希望把漳河之北的土地（北田）与南部之地共同掌握在手。但是，沙麓山却使这种希冀只能作为长期的梦想。

同样，在当时的条件下，山东与中原之间的交通受到滚滚黄河的限制。再加上黄河东边的湖泊、沼泽以及山峰，挡住了中原势力向东扩展。据山东省莘县的有关资料，“莘县南部如今是平原，古代却是土丘起伏，沟壑遍地，故古地名中多见‘丘’字”。可以推断，在更早一些时候，也会是山脉。西周之前，沙麓山之东的民族被称为东夷。直到西周分封诸侯国、成功统治山东之时，沙麓山之东主要是东夷的民族历史，这是山东历史的一大特点。

南蛮北狄、西羌东夷，是中原的说法，今濮阳市一带是确定东西南北的基点，不可能以濮阳西部的太行山标志东西，只能把沙麓山的东边称为山东。山东省的字义，不是太行山之东，而是沙麓山之东。这个山，乃是沙麓山。

沙麓山东麓的莘野连接山东腹地；西麓的黄河狭窄，乃理想渡口；而它的南北都是连片的湖泊、沼泽，都不利于渡河。所以，沙麓山既是山东的西部屏障，又是沟通中原的要道和控制枢纽。由于沙麓山乃东西往来必经之处，从很早时候起，行人就越来越多，而且有人在沙麓山上聚集居住。古代称人们聚集为邑，沙麓邑出现在沙麓山上（到春秋时期，齐桓公在沙麓邑修筑了城郭，名为五鹿城）。不难想见，沙麓山对东夷与中原的政治、军事交往以及经济、文化交流，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沙麓山的作用与伊尹辅助兴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沙麓山的存在，黄河从今濮阳市转而向北之后，是不会向北流那么远的。沙麓山是河北走廊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沙麓山把脚下的黄河尽力推向西去，使今邯郸市东部成为河北走廊的咽喉。沙麓山则是遏制这条走廊咽喉和门户的锁钥，其战略位置对河北的历史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

4000 多年前，商王朝的兴起正是得益于河北的地理形势，利用了这里的自然资源。帝喾时期，北方有一有娀氏部落，其首领是简狄。帝喾为了团结有娀氏，纳简狄为次妃。简狄在野外洗澡，看到玄鸟（燕子）坠下一卵，感到奇怪，把它吞下。简狄吃玄鸟之卵而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就是契。契长大之后居住在蕃（平山蒲吾村，现在黄壁庄水库之中），附近的人都知道他聪明能干。大禹治水之时，把契请了出来。契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帮助禹出谋划策，为禹尽股肱之力。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舜加封禹。同时，因契帮助大禹有功，便对契赐姓子，并把他封在商。

商在哪里？实际上就在今邯郸市东部。北京大学教授孙森在《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第一版）中作了透彻的考察分析。他认为：“无论从天文学、考古学和文献记载几方面进行考查，情况都是一致的，所以把商的起源地定在漳河流域，还是比较合适的。”（《夏商史稿》267 页）

据《史记》记载，商地是资源丰富、土质肥沃之地，子契的子孙后代得到这块宝地，其经济实力便逐渐壮大起来，而且商地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对于商字的本义，《说文解字》解释为“从外知内也”。商地是河北走廊的咽喉，无论是中原觊觎幽燕，还是北方部族窥测中原，这一带都是“从外知内”之地。子契之后，其子孙便把今河北省南部连成一片，逐渐产生入主中原之志。到子契的第十四代孙天乙（即成汤），商族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过夏，成汤则成为出类拔萃之才。他居住在毫，毫在今魏县南部之内黄县、浚县一带（今属安阳市，距濮阳市较近）。

这时，今山东省莘县出了一个能人伊尹（约前 1630—前 1550 年），名挚，是一个在“有莘之野”躬耕务农的奴隶。伊尹身材短小，但足智多谋，志向远大，看到夏王桀暴虐残忍，预见夏朝气数已尽。伊尹利用成汤娶有莘氏之女的机会，作为陪嫁奴隶到了毫。接着，伊尹利用自己高超的



烹调手艺，接近成汤，劝他高举义旗取夏桀之位而代之。成汤顿觉相见恨晚，当即命伊尹为“阿衡”（宰相）。有了伊尹的辅佐，商的力量迅速壮大。夏桀的军队很快被打败，诸侯一致拥戴成汤为“天子”而建立商朝。汤死后，伊尹辅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成汤的孙子太甲即位，不遵汤规，横行无道。伊尹便把他流放出去，强迫他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3年后，迎回太甲复位。伊尹为商朝理政安民50余载，治国有方，世称贤相，约卒于公元前1550年，葬于商，即今邯郸市成安县一带。

当然，伊尹可能没有想到，从根本上说，是沙麓山保障了商族的发展壮大，才能使他有机遇得展其才。

沙麓山遏制南北与齐桓公称霸

殷商的发祥已经有力地说明，沙麓山的存在，为北方民族造就了生存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到了春秋时期，北狄鲜虞则发展成为中原的强大外患。

周灭商后，对诸侯进行分封，并对商的残余势力实行怀柔政策。把商朝原来的土地分封为邶、鄘、卫三个方国，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了邶国。邶国就是今石家庄市北部区域和保定市南部部分区域。把商的势力封在自己的力量不易控制之地，应该说是很大的失误。果然，武庚把这一带作为与周抗衡的复辟之地。周武王死后，年幼的太子诵即位，即周成王。武庚认为有机可乘，把商朝原来的东方属国联合起来，起兵反周。周成王的叔叔周公旦亲自带兵讨伐武庚，经过三年苦战，才平定了东方十七国叛乱，诛杀了武庚。这次平叛被称为“二次灭商”，其艰巨程度大大超过武王伐纣。如果没有周公，是难能成功的。

周成王之后吸取武王教训，开始重视北方的防范，把周公的庶子封在今邢台一带，建立了邢国、軶国。但是，原邶国之地仍是周朝廷难以控制的飞地，发祥于今山西省五台山地区的狄族鲜虞乘虚而入。他们以新市（今河北省正定县新城铺）为中心，建立了鲜虞国，并在藁城西部建立了肥国，在晋州一带建立了鼓国，三个部落国还建立了城邦联盟。狄族鲜虞凭借地利，国力迅速发展，兵力急剧强大。沙麓山的存在，为北狄鲜虞造就了生存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使之成为春秋时期中原的强大外患。

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之后，东周初立，王室日微，鲜虞乘机南下灭掉軶国，继而接连侵犯中原诸侯国。处在这种强敌侵犯、生死存亡的形势



之下，各诸侯国迫切需要推举一位领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狄。于是，管仲参谋扶持，齐桓公顺应大势所趋，开始了称霸大业。从公元前 661 年开始，鲜虞接连征伐邢国、卫国，把邢国的国都（今河北省邢台市）和卫国的国都（今河南省卫辉市）也攻了下来。齐桓公听从管仲建议，出兵救援邢、卫两国，并且将邢国迁到夷仪（今聊城市东昌府区西部），将卫国迁到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还集合诸侯在这两个地方为邢、卫建筑新的城邑，使得“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通过存邢救卫之举在华夏国家中树立起威望。（见《中国历史大事典》第 25 页）

此时，中原华夏越来越认清了沙麓山战略位置之重要。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杜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管子·小匡第二十》）在沙麓山上修筑五鹿城，其战略构想，既是为了对付北狄，也是为了控制中原。在他制服宋国郑国、讨伐山戎以救燕、存邢救卫等重大军事斗争中，五鹿城都发挥了其战略作用。五鹿城的位置在今大名县北峰乡前现城村和后现城村，距离山东省界不足 4 公里。

沙麓墟与马陵之战

公元前 646 年农历八月，巨响震天动地，沙麓山的几道山峰突然崩塌，地面抖动塌陷，五鹿城陷进地下。大地张开大嘴，把沙麓山的几道山峰吞下大半。一日之间，高大秀丽的沙麓山变成了土丘杂乱、沟壑纵横的沙麓墟。从此以后，五鹿城便有了“袭邑”之称。袭邑者，陷于地下也。（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一，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 2254 页）

沙麓山崩塌之后，控扼南北的威势大减。但是，沙墟之上土丘起伏，沟深林密，而且西边就是黄河渡口，仍然是控制东西之枢纽。所以，很快就在原五鹿城的西边，选新址重新建起了五鹿城，并且在南面和东南面又出现沙（琐）、马陵等城邑。

到了战国，战争连续不断，沙麓墟的战略地位仍然相当重要。魏武侯在位期间（公元前 386—公元前 371 年），封其子公子元食邑于此，五鹿城更名为元城。到了魏惠王，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公元前 342 年，韩魏长期交战，双方均已面临“弹尽粮绝”的局势。齐威王决定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攻魏救韩。魏惠王令庞涓和太子申一起，率领十万大军迎战。孙膑避其锋芒，转向魏国军事重地



大梁进军。庞涓听到这个消息后，火速赶到大梁。此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庞涓率军加速追赶齐军。孙膑设“增兵减灶”之计，庞涓以为齐军人数第三天就由十万左右减为三万，心中大喜，舍弃一部分军队，亲自率领精锐之师披星戴月，兼程追击，一直追到马陵道。马陵道沟深林密，孙膑在此早已设下伏兵。魏军猝不及防，人慌马乱，顿时被齐军击散。庞涓拔剑自刎。齐军将魏军彻底打垮，并俘虏魏太子申。

关于马陵的地望，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注疏》中明确注为：“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卷二十六，成公七年）元城县即今大名县，现有东马陵、西马陵、郭马陵等六个马陵村，隋代曾在此设马陵县，可见隋之前对马陵地望的争议是不多的。笔者以为，马陵邑的地望应在今大名县，在现在六个马陵村这一带。从《史记》记载马陵之战的情况，“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齐军的路线只有首先向西，然后向北，最后向东。马陵之战的方位不可能在开封之东或者在开封东南。决战之前，齐军、魏军主力都应是在沙麓墟渡口东渡黄河。马陵之战决战只能在沙麓墟马陵邑附近，即今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

然而，马陵道是一条道路。马陵道可能起自马陵，或者经过马陵，然后朝东南方向，沿今莘县与河南省边界的丘壑，通到今莘县大张家镇、樱桃园镇道口村，距离几十里。孙膑指挥的是运动战，莘县大张家镇的马陵距离大名县的马陵较近，作为齐魏马陵之战的战场是有可能的。莘县已经在此建起马陵之战纪念馆。

沙麓山的奇异与山东人后裔掌控西汉政权

由于沙麓山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它的崩塌在春秋列国引起很大震动。《春秋公羊传》称其为“天下异事”（《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四年）。晋国最善于占卜的掌卜大夫郭偃占卜说：“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汉书·元后传》）预见 645 年之后，沙麓山废墟之上要有圣女出现。

据《汉书·元后传》载，汉武帝时，魏郡（今大名县一带）“群盗”起事，武帝令东平陵（今济南历城）人、绣衣御史王贺（字翁儒）惩治“群盗”以及失职官吏。武帝本来要杀一万多人，王贺却一个未杀，“皆纵不诛”。王贺以玩忽职守罪被罢官，魏郡人却很感激他。有个姓建的老先生劝说王贺不要回老家，给他看了风水，让他定居在沙麓墟之上、魏郡



元城县委粟里（今大名县东北部）。后来，王贺的儿子王禁有四女八男，次女名政君。政君年龄大了，说个婆家，没等嫁娶，男方就死去了。许给东平王，东平王也死了。18岁的时候，送到皇宫作了“家人子”（未有职号之宫女）。此时，皇太子刘奭宠爱的司马良娣病死。司马良娣死前对太子说命不该死，是诸娣妾良人把她咒死的。从此，太子恨透了他的诸娣妾良人，再也不理这些有职号的宫女了。皇太后只好让太子选家人子伺候他，太子轻率地选了王政君。以前诸娣妾受幸多次都不怀孕，王政君受幸一夜就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下一子。汉宣帝高兴极了，为孙子起名曰骜，字太孙，常常把他带在身边。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又过了三年，汉宣帝崩，皇太子刘奭继位为汉元帝，王政君作了皇后。元帝之后成帝继位，王政君为皇太后，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从此，王政君“群弟世权，更持国柄”。王家大兴，交替掌握国家大权，先后有“十侯五司马”。其中，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王政君有五个兄弟在同一天同时被封侯，被国人称为“五侯”。于是，王政君的故乡特别引人注目而被称为“贵乡”。

哀帝时，王政君就是太皇太后，但哀帝在位六年驾崩。王政君让侄子王莽当上大司马，掌握了军事大权。哀帝无子，她和王莽做主，让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衍继位，是为汉平帝。平帝不但年幼，而且常年患病，王政君俨然临朝主政。这一年为汉平帝元始元年，即公元元年，距离沙麓山崩恰好是645年。

此时，王政君伪装谦恭的侄子王莽则野心猛烈膨胀，加快篡权步伐，施展手段让女儿作了汉平帝的孝平皇后。平帝仅仅作了5年皇帝，小小年龄就死了。王莽立两岁的婴为孺子，自己作了摄皇帝。公元9年，索性自称真皇帝，篡权建立新朝。

现在，大名县传说王政君的祖籍就是该县东北部的金滩镇北沙窝庙村，其位置在沙麓山北麓，距离山东省界1公里。应沙麓山之崩塌，在六百多年之后，生出一个“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并且临朝称制、主持朝政的圣女，不能不使人惊叹沙麓山的神奇！

（作者原籍莘县，历任河北省大名县委书记、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现任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曹植与佛教音乐之我见

□刘玉新

众所周知，曹植在山东省东阿县做过三年的藩王，死后又葬在东阿境内风景秀丽的鱼山西麓。孰不知，在此期间他还与佛教音乐有一段天方夜谭般的不解之缘。最近，见到一份有关佛教音乐方面的材料，其中写到：“我国梵呗的创始人，佛典中一直认为是魏陈思王曹植，称他‘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若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田青《朝暮课诵规范谱本·前言》）这说明曹植是我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并且是在东阿的鱼山创作的。

一、什么是佛教音乐

谈曹植首创佛教音乐，应首先弄明白什么是佛教音乐。

《佛教文化》1995年第一期刊载了凌海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什么是佛教音乐》。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佛教音乐分为6种类型：



东阿鱼山“梵音洞”

- 1.佛教音乐中之赞化音乐；
- 2.佛教音乐中之教化音乐；
- 3.佛教音乐中之供养音乐；
- 4.佛教音乐中之修行音乐；
- 5.佛教音乐中之法事音乐；
- 6.佛教音乐中之民俗类。



最后总结道：“把佛教音乐归为上述六种类型，仅是依据其宗教功能划分，其实佛教音乐就总体而言是修行法门。赞佛是修行，供养是修行，教化是修行，法事是修行，随顺众生之愿也是修行。”“究竟什么是佛教音乐呢？佛教音乐是佛教修行法门，是符合佛教教义和传统的，在赞佛、教化、供养、修行（狭义）、法事、民俗等活动中，发挥修行作用的音乐。”这是凌先生对佛教音乐的界说与概论。因为我们是门外谈佛，孤陋寡闻，但从佛教音乐的发展与现状来看，凌先生的分析与结论是可取的，故录此备参。

佛教音乐，追根溯源，其实就是一种佛教歌赞，最初由印度传入中国，佛学界称之为“梵呗”。“梵呗”者，梁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解释曰：“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呗赞篇》曰：“寻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赞者，从文以结音；呗者，短偈以流颂。比其事义，各异实同。是故经言，以微妙音声歌赞于佛德，斯之谓也。”任继愈先生进一步解释道：“而‘梵呗’则是据佛经所创作的偈颂，也供歌咏之用，大概都注上音韵，歌咏时可伴之以管弦。用这种形式传教，普及佛教教义，是容易吸引民众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故《法华经·方便品》云：“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佛。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这是对佛教音乐及其功用的一个总的概括，也是佛学大德所信奉的不二法门。

二、曹植为什么创作佛教音乐

《高僧传·经师论》载：“自大教东流，乃释文者众，而传声益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以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若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这说明曹植在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中，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歌辞，还在接收外来文化、创作佛曲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因为“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王国维《静安文集·论近年的学术界》）再者说，“公元三世纪至五世纪，是中国化唱



诵勃兴之时，也是我国佛教念诵仪制的成型期。不但来华弘教的西方硕德屡有新声传世，不少精通中原传统文化的华夏佛子，亦登堂入室，融会中西，承先启后，为后世汉传佛教的唱念仪制奠定了基础。”（田青《朝暮课诵规范谱门·前言》）在这种情况下，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法苑珠林》）这就是曹植与佛教音乐的结缘背景。



东阿鱼山梵呗寺山门匾额

三、曹植创作的佛教音乐——鱼山呗

关于曹植在鱼山创作佛教音乐（佛典中称之为“鱼山呗”，又称“鱼山梵”），《高僧传》记载：他“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若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李家振先生在《佛教文化》（1992年第1—2期合刊）《梵呗清歌》主持寄语中说：“用汉语唱梵呗，始创于曹魏陈思王曹植，因当时在东阿县的鱼山删治《瑞应本起经》而成，故称‘鱼山呗’。”这说明曹植始创佛教音乐，是在东阿县的鱼山删治《瑞应本起经》而引起的。《瑞应本起经》即《太子瑞应本起经》，佛经名，内容主要叙述释迦牟尼“前世”修行故事及今世诞生、学道、出家修行、创教传教等神话传略。

史书记载，曹植曾于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被封为东阿王，食户三千。当时由于亲属之间的萁豆相煎，“抱利器而无所施”，“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又由于曹魏统治者对诸侯王的种种限制，“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在这种情况下，曹植蛰居封地，“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有诵经声，清遒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以拟所造”。（刘敬叔《异苑》）

由以上可以看出，曹植在东阿县的鱼山创作佛教音乐，一则由于删治《瑞应本起经》，二则由于“感鱼山之神制”。因此，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十九记载：“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



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

四、曹植所创“鱼山呗”流传遗绪

曹植在鱼山删治佛经，又空中闻梵，而始创“鱼山呗”。那么，“鱼山呗”其流传情况如何？

最早详细记载曹植“鱼山呗”的是梁释慧皎，他在《高僧传》说曹植“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而到了唐代释道世所著的《法苑珠林》则曰：“其所传呗，凡有六契。”也就是说从曹植首创梵呗四十二契(按：一契，即一支曲子)，至唐代释道世时的“其所传呗，凡有六契”的400年左右的时间，“鱼山呗”已失传大部。而1300多年后的今天，据田青先生考证，曹植“所创《鱼山呗》（亦称《鱼山梵》）今已无存。但当今‘俗佛仪’中的两首同曲异词的大赞《释迦大赞》（菩萨下云中）与《佛宝大赞》（佛宝赞无穷），内容皆出自《太子瑞应本起经》，似为鱼山遗绪。”（《朝暮课诵规范谱门·前言》）已故著名学者逯钦立先生早在40多年前写的《四声考》一文中也曾叹道：“佛曲渔山诸调，其转声之制，今日已无可稽。”（《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那么，“鱼山呗”真的湮没不彰了？

1996年6月，日本东寺真言宗中国鱼山参拜团来东阿鱼山参拜曹植墓，并赠送东寺创建1200年庆赞制作的铃木智辨、加藤宥雄：《声明大全CD版》和《南山进流声明集》。在《声明集》中有《鱼山蛩芥集》一部，其中有《三礼》、《中呗》、《如来呗》、《云何呗》、《散花》、《梵音》、《佛赞》、《阿弥陀赞》等唱诵曲辞32首。其曲辞分一越、平调、双调、黄钟、宫涉五调，还有一种反音曲，包括：一反、平反、双反、宫反。据介绍，这是当年曹植在东阿县的鱼山创作的梵呗，是1200多年前由日僧空海（774—835年，谥号“弘法大师”）传入日本而流传至今的。这在中国大陆则早已失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逯钦立先生所叹“佛曲渔山诸调，其传声之制，今日已无可稽”，今已“柳暗花明”。若曹植在天有灵，闻知他所首创的“鱼山呗”重新回到故里，也必定会欣喜万分的。

（作者系东阿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研究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聊城刻书考

□吴云涛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应聊城史志办之邀，搞地方史志工作。就在那年的初冬，我跟随同仁去堂邑访问和搜求过去堂邑县历史上的种种事迹，了解了一些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民间轶事。此为其中之一记。

原东昌府所属的堂邑县，距府城正西四十八里地，县城很小，是所谓“三等县”。《堂邑县志》“山川”编记载，骆驼山在城西十八里，地形隐起如伏驼，故名。这个地方根本称不起“山”，只是平地上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土沙丘子，蜿蜒起伏，绵亘数十里，好像峦陵起伏，就称它为“山”了。至于这里当初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沙岗？有这么一个传说：老早年代，这地方有一道很长的河柳，越长越大，几年的功夫，骆驼山被一片浓绿笼罩，远看像翠峰堆簇，近看是绿障滚滚。河柳和青杨汲取雨水，坚固堤崖，改变土质。以后，又栽了梨、杏、杜梨、沙果，果实可食又可换钱，使地理环境得到改善，人们从穷困生活中挣扎出希望。不知哪代祖先，从外地人手中学来一套雕刻手艺传授于后人，辗转相教相学，就地取材，辈辈继承与发扬、改进，遂成了这一地域的传统技术了。

刻镂印书的木版，由明末至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堂邑骆驼山的附近村庄，农家男男女女，都会这个手艺了。那时，东昌府的书铺子大大小小有几十家，大的书铺是“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这以下的还有“敬文堂”、“又英堂”等。他们专印书卖书，一年到头雕刻书版，活真不少。

这几家大的书铺，都有长期雇用的刻版师傅，住在柜上，食宿优待，工薪也高。不过，这些师傅，也就是专门担任“修版、补字”，不可能刻很多的书版。因此，还得交“外加工”去做（店里的活如刻版、装订、叠页，找店外人去做，按件取值）。活，是陆续不断，但是，这种活急用是



不行的。刻版工作，既细致而审慎，细工雕琢，一笔不苟，绝不允许粗制滥造、草率从事，性资浮躁、没有耐心的人是干不了的。

骆驼山近处的村子，如“后杏园”、“山奶奶庙”、“靖屯”等村庄，家家的妇女都会攥刀把。她们心灵手巧，刻字形、镌图案，达到了相当技术水平。村上的男人，无论老年、中年、少年，也个个会刻版，多是此道熟手，似乎成了这一区域农村中，辈辈传授的必学之艺。在农忙时，男男女女都下地栽山药、割谷子，去忙庄稼活，这时刻版的活也少。到春冬季节，地里没大事了，就可接很多的书版加工活件，总至一家子人忙，作为家庭主要的副业生产，也真管用。

这里农村的男女刻版的手艺人，因辈辈相传，一年到头经常地实际操作，无形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在雕刻技巧方面，时有别出心裁的革新成就出现。她（他）们这些人，虽是散处在各个村落，也常常碰头，作这方面的联系，达到取长补短、扫除缺点的要求。但并没有什么组织，那时不兴这个。不过，这里边也有“揽头”。这揽头也不是由众人推选的，是适应形势环境而自然产生的。试看赶集的集市上，每个行业，不都有“经纪人”吗？这种人专于出头露面，给买卖双方从中拉纤撮合，使其成交，他从中抽取“佣金”，南方叫“掮客”。这里所说的“揽头”，其性质和经纪人相同，刻版工人委托他进城揽活，他从工人身上捞取好处。揽头不止一个，他们奔走于书铺与各村刻工之间，所有与书铺接洽定件、商磋商工资、讨论规格款式及交件期限、批订合同等手续，全由这揽头出面。他把活揽好，再分头交给工人，各自在自己家里刻，刻好再交揽头去送柜检校。那时，山奶奶庙的徐桐沼、骆驼山的王世隆，都当揽头。他们虽然不会干活，却必须内行，懂得优劣，能挑毛病。他给工人跑腿，有他跑腿的代价，除了在工薪内有规定的佣例外，书铺里也多少有点津贴，两相利用而已。

骆驼山一带的农村妇女，刻书版的比男人多。男人多忙于庄稼、下地干活或拾掇些里里外外杂事，不可能蹋下身子刻版。只有妇女们，又心细，又乐于不抛头露面，坐在房中，清清静静地，攥着刀柄，没二两沉，多么安闲雅趣。所以，那些村子里的大闺女、小媳妇，都会这手艺，都刻得挺漂亮、仔细，称得起个中巧匠。如果按今天的评价来说，那就是“对文化事业有所贡献的劳动者”了。以前，像她们，只是知道默默地干活，挣两个钱，好补助生活，添件衣服什么的，没有什么名称，我们今天称为“工人”，在当初，她们根本听不见这话，所谓时代不同嘛。



工人刻版，是按一版的字数计资，一页称为一版。书版中，根据样稿，有章、句间的标志，也各有规定。如三个圈（○）或五个点（·），都按一个字计算。木版书中，并无什么标点符号，只有“○”或太极图代表一章节的起始。大字本的四书或有，仅作为句号而已。

雕刻书版，是选用梨木和枣木，因而，“梨枣”二字向来也作木刻印书的代名词。这种木质，坚实、匀净，细致而少裂丝，经久耐用。制版的木材，也要拣取大株的树木，浑粗的干，解开木爿，内无裹结，外无疤痕，才为上乘之材。树被解开，就把它按照所定的规格、尺寸锯成一块一块的板子，再一一刨得崭平，刮摩如镜。还得下锅，用花椒水煮它几个钟头，晾干后，才可使用。把写好的书样反贴在木板上，就可以奏刀了。梨枣木以外，梓树木材（梓，也是一种长得挺高的树，鲁东出产，别处不多），也是刻书版的好料子，因而印书也叫“付梓”。

这刻版技艺之中，也有一套由低而高的不同程序。初学者和手法纯熟者，是按他操作效能的质量而分别予以可能担任的任务。再一步步地学，由浅而深，也得细心体会，灵活掌握。粗手笨脚、马虎大意的人也是学不好的。刻版时，右手握着刀柄，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帮助推动刀尖，凝眸会神，细琢细剔地刻划。乍开始，为“发刀”，“发刀”以后为“挑刀”。所谓“发刀”是依循字样的横竖笔画，用刀尖剥划，比较容易，多是交初学徒工去做。第二步“挑刀”，这却是需要训练有素的熟手工人担任了。“挑刀”是个细致的活。一撇一点，都要仔细剔爬，使每个字的棱角、锋芒，整齐划一，体势、姿态清丽醒目。无论行距、疏密、笔触的柔和和刚劲的神气，都要深切地体会到而刻划出来。必须要达到艺术的要求，极致微处，不允许含糊其事。另一种刀法，叫做“坡刀”，下刀平划，刻划不深，其优点是使原书字体不走样，缺点是版子刷印不耐久用，肤浅易于漫患，出产成品较少。

无论哪一种刀法，笔划间隙之间，总要清镌得干净利落。板子中的木头碴滓如果剔除不净，刷印后必会全版出现一些“马碴”，好像一页清丽而明朗的字迹，撒入粒粒蒺藜一样，很碍观瞻。这一点，更要注意的。一部大本头的书，刻版工程也相当浩繁。例如《四书备旨》，版高七寸四分，宽九寸，用国产六五毛边，下七个头。全书共计四百六十六页，就要刻成四百六十六块版子。一部大套的书，如《三国志演义》，多至一千一百余页，也就刻一千多块版子。像这类的活，必须交工人分头去刻，也得费整年的功夫，才可完活。其中大字部分，由一般工人来做，小字部分，另由



高手技工负担。所谓分工合作，紧密配合，严肃认真，丝毫不苟，但都是驾轻就熟、胜任愉快。

她们承刻某一书版，如大部头的卷帙浩繁，工程艰巨，也是陆续地交活，刻完十块，或二十块，就交上去，并不等候全部竣工而一齐交纳。书坊中印刷，也是随到随印。每一张页，都有标志可查。一部大书，刻工价银也是相当可观，如《五经备旨》，全部刻完就要花费纹银一千五百多两。

骆驼山一带村庄的农家妇女中有不少的能工巧手，不光书版刻得出色，还都能雕刻出极精致的图案。像小说中的《三国志演义》、《列国志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皆有很多插图。这些插图部分，有的是从原本描摹，有的请画家创作。像《三国》和《五才子书》中的人物像，就采用“贯华堂”版本中陈老莲的绘图作为范本。又如《诗经备旨》中部分附图，及《三字经》、《千家诗》中附刊的人物故事图像，都是线条清朗、质朴而生动。刻制这些版子，更得要掌握刀法，轻镌细琢，切忌草率，必要深入地体会原图的笔意，刻划出原图的精神、姿态，尽可能使它减少和削减斧凿痕迹。这类活儿，这几个村子中的妇女，有不少工艺妙工，干活又清爽又快当。工价是按图论值，约略可等于刻半页书的银数。如小本头的《论语》，每半页刻工，是制钱三百文，刻一块图，就可拿到四百文。

骆驼山，山前山后、大村小村的妇女们，每于冬夜春宵，皆同姊妹们厮守在豆油灯下，说说笑笑，而误不了十指辛勤地攥紧刀柄，不停地刻呀刻，因为这个副业生产收入，正是她们的“小替己”（自己以劳力挣来的钱，储存起来，为个人所有）的来源呢。

三百多年来，骆驼山这一地域附近的若干村庄，是木刻书版工艺的发祥地。一直到现在，那里的这类手艺技师散流外地的，从事雕制书版工作的人员还是不少。如北至京津、晋绥，南达沪杭、苏皖，刻字业中，提到山东堂邑，提到堂邑的骆驼山，都能谈叙到同一源流，亲如一家。

以上所述，是过去东昌府木版书刻制书版之大略情况。民国以后，石印一兴，科举已停，东昌木版书，就逐渐衰落。殆一九二八年后，私塾多已改为学校，木版书等于泯没，本城书业德所藏二千块书版，于五五年劈碎作为烧柴了（书业德的书版达二千块之多，街干欲以“四旧”没收，被其主人陈季□以劈柴价卖掉），最后，有益堂的三五百部木版书为山东省图书馆买去。

（作者生前系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齐鲁文史》编委）



赵维新心学思想引论

□邹建锋 黄巍魏

聊城茌平醇儒赵维新（号素衷，1525—1616年）是山东“聊城七贤”之一。赵维新年20，从同乡北方王门心学巨子张后觉（号弘山，1503—1578年）学，而张曾亲拜王阳明（1472—1529年）高弟颜钥（1498—1571年，号中溪，江西永新人）和王阳明再传弟子王艮学生徐樾（号波石，江西贵溪人，王艮弟子）为师。赵维新50岁（1574年，万历二年）冬序老师《弘山教言》，66岁又亲自整理老师教学语录。赵素衷一方面坚持恩师张后觉以“良”字契、约阳明良知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发展良知学的知性层面，在常年透性的内心修养中，体现出重视直觉主义的意识。

学问只在本体上作

赵维新常年隐居于聊城乡野，潜心问学，通过对真心、真性等概念的研究，凸显觉悟和念头的作用，体现出较为虚空、高明的思维特色。他重新提出以“真心”为“心体”的哲学范畴，与“本体”、本原等观。在他看来，所谓的“心体”主要是包含道心、本心、良心、人心等意义的范畴集合。本体如澄清的深水，如明镜，具有极强的直觉把握能力，其主旨是对世界的真实与原本的反映。所谓“一点虚灵，宇宙同一”，故“人已原是一个虚灵”，因此，本体在反映客观世界的表象的时候，是没有价值取向的，是中性的客观模拟，不会记忆被反映的客体，即无念的客观实体，没有内在感情成分的虚廓之体，有与天地万物相独立、不被控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它的特征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表示就是“明”、“圆融”，“无声无臭、不睹不闻”、“纯白易简”、“虚灵精一”。而透性的工夫就是要



通过种种真与善的操行去除污染，让心体回复到它的本然澄明与洁白状态，实现“虚灵自照”、“体寂神澄”。

赵维新说“本体，无念也。随感而应，应而不留，念而无念也。如鉴之未照，初无妍媸之分。及其既照，亦不留妍媸之迹。与物俱化，鉴未尝有，本体如鉴之无迹焉，则廓然”，又说“本体纯白，无纤毫之翳。反观，亦纯白无翳，便是不疚。即此不疚，内境坦然，顺适便是无恶。一点清明，惺惺常在，便是天体充融，便自人不可及”，可见在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上，心体有“生物之心”、“正心”、“心神”等含义。从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因为人心面对社会习俗的污染、浸润，所以常常受到遮蔽、蒙蔽，难以让心体回复到“澄源”、“精白”的本原状态，因此“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就显得具有合理性。王阳明的工夫论发展程朱的存理灭欲的双重性，而直接以明心见性的回复本心、至善的良知心体。王阳明的重本心直透性体的工夫论，着重强调存理的层面。这与伊川、朱子着重遏制人欲的“敬”就很不同。赵维新师承阳明再传弟子张弘山，有重心体透性体的工夫论色彩。回到心体和性体本身就说明，赵维新的哲学范畴带有很强的心学色彩，心学即本心，即心体，即真心，即善心，突出心性工夫，试图通过直觉主义直接获得道德至善本体的境界。

本心即义理

赵维新说，“知妄，明心也。明心便是本心。本心便是义理”，继而他发展以“真性”为“性体”工夫论，重新提出“天体”、“真体”、“本体”等新的哲学概念，再次强调善、真的道德价值。在素衷的哲学体系内，性体本善，所以赵维新生活、教学和学术都以“为善”、“行善”、“勇于为善”为日常锻炼，在日用之间内心锻炼与学习过程中，甚至言和意都应该是善的。在赵维新语录中，“善意”和“善言”是被着重强调的。这种道德主义把儒学生活宗教化了。由于北方王门自穆孔晖习得良知学以来，其后的阳明后学对良知学的理解多有禅学化倾向。张弘山说，“人能体此良字，自然本体光明，日觉有益”，又说“耳本天聪，目本天明”，其眼中的良知学尤是。因此，赵维新说“所谓性善者，非有物可指也。无渣滓而已！胸中能无渣滓，何事不可做”，可见其性体是空灵般、去物化的知。这样的“性体”概念是很难与程朱之理相契合的，而是王阳明无所不知创生万物的良知。



赵维新说，性体是心体的工夫，目的是回复到人的天性，也就是至善的性体上。而且这种善在他看来，就是“真知”、“真学”，是“真性”，是“真实”、“真切”和“真成”的，也是一种天真的“真性”。赵维新常年淡薄地生活在乡村，生活贫苦，很容易让他的思想带有儿童般的“真境”。他把这种由真而善的转化，归结到“真闻”、“真睹”的学问方法，把握玄妙的“真机”和“真结果”，回到真实和真诚的生活。这种性体，就是天地人的“真宰”和“真旨”。所以，可以把他的学问特色归结为真性之学，性体体现出真善美的特点。他说“四境朗朗清清，一尘不挂，便是真体常在。以此真体应事，亦一尘不挂，便是真体酬酢。从此，不计事之有无，常是一尘不挂，则真体常在我矣”，又说“学问只在本体做，不必在事端上模拟，不必在物理上揣量。本体精明，则事，皆性之事。性明而事自理。物皆性之物。性定而物自正。人已原是一个，成已成物工夫，只是一件。才分人已，学问便不合一，真而非真矣”，从赵维新的真实生活与学术趋向来看，性体工夫首先的一步就是把握与琢磨透性的含义与工夫，分清学术支离与学问精微的区别，坚持儒家道统与孔孟主旨的合法性，分清圣学大路的合理性，从而坚定生活和学问的信心，即“见道”。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是透性的根本主旨。其二，日用生活的真实工夫，需要勤俭的生活和学问态度，勇于为善，真实为善，“日日本体用工”，从而本心便会自然地回复到清明纯白的状态。赵维新把这种勤俭的日用生活归结为真诚的生活与真学问，实际上与程朱的“惺惺”生活精神一致。在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格物”）来看，真学需要体会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与生意无限，体会“天道好生”的宇宙精神与天地境界，把天地之善与人间慈善相汇合，四合同春，性体学问可以得到最好的注解。透析性体工夫其实也是仁者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真实要义。赵维新把仁体与善相统合，并以“真体”来命名，有天人同一之意，一定程度上抬升儒学生活意蕴、价值观和生命态度的说服力和民间化。

常扩万物一体之怀

赵维新说“矩也者，则也，吾心之天则也……日循吾心之天则”可日入圣贤。他以人心本自有之规则为天体，重新提出真体为“天体”，提出天理和天道的重要性，让心性本体回复到天真和天和状态，实现天人之



间、道德与自然之间、内外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即让心性达到万物一体的胸怀和境界。他赞同王阳明“心即理”，但更欣赏用一心管束万理。如他说“扩一心于大地万物”、“含天地万物于一心”，试图展现“天地万物之屈伸翕辟，皆一心之真宰妙用”大化流行、万物“同春”的生生不息意境。天体即天理运行之体，表示出天道的自成性、一贯性和一体性和活泼性。他说“天体纯全澄然”，“天体湛然无疵，便是天然自有之体，亦便是天然自有之功”，故“天体用事，时时妙契”，这样就把先验道德化心学推进到圆融教理的地步。

赵维新既重申天理的至上性，强调学问的公共性，又突出以“心纯是天理”来尽性。在学问和教学上，当然容不得独断和武断。作为一个老师，平时也需要自修，增强学问的广博和精深；更需要与同事和老师交流和讨论。这样，性学本末和合人己才会互动，从而传播性学，实现“性学”的公共性与天地性。这不仅是自我与他者的开放性，也把自己与宇宙天地相开放，实现天地一体胸怀，让自己的虚灵之心涵养于至善之中，“约人心为己心，扩己心于人心”，善行天下，从而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内在意蕴。在体悟天体的过程中，默识之法尤为重要。因为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本体常明，本体昭昭，则本心常在至善之中。“随时涵养，随养默识，随识心体”，合于动静，心体常在，则天体亦常在。在“天人一理”的修行模式下，性命、体用、形神、言行、理气、生死、隐显等辩证哲学范畴都能得到有机的和谐与统一。

北方王门义理心学的终结

赵维新自觉地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他说“天地位于一心，万物育于一心”，又说“圣人者，虚灵之至也。人能全此虚灵，便是全吾天命之性”，这样抬升人心中知性在认识外部世界的作用，取消德性在人心的重要地位，与阳明心学相契。他哲学思想师承阳明学派，强调心体的自然性（虚灵、廓大）而非道德性，着重性体的至善、生意、仁和生理等美德；同时对程朱一系的“生生性理”有所涵摄。他的哲学体系不仅体现阳明后学的理学内部合流，也反映中国哲学的三家合流。他对心体、性体和天体都以真心、真性和真体等新的名词来替代和解释，带有浓浓的道家趣味。工夫论上，他多次援道入儒，摆脱程朱理学传统意义上的存理去欲、主静与主静的工夫，以内在超越的顿悟为工夫论，直指性体。他说“为学须是



透性”，而“理本平易”、“道本真实”，因此工夫着力点在本体上做，直接顿悟，以无心、无思、无为、无我、无意、无必、无形、无象诸视野、超越二元对待的方法证得道体。他说“学也者，觉也。人生如梦，必有惺惺斯觉，不惺无觉矣。觉斯闻，不觉无闻矣。善学者，识其晚而常觉焉”，以觉悟为心法心学之奥。他的“即念即行”、“即言即事”，体现出高度的合一顿悟的特点。心、仁、功、事、物、道、理、人等概念具有合一性。他的正反辩证思维模式、“归一”之学沾染道家的气息。而其工夫心境上追求的从“有工夫”到“无工夫”、“费力”到“不费力”的天机活潑心态毋宁是老子哲学的旨趣。为表示简易性，他说儒家之道具有虚、空与无物的特性，以致于被四库馆臣认为“无非禅机”。

注：本文索引均来自赵维新的《感述续录》。

（作者邹建锋，浙江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黄巍魏，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船山学刊》2009年第2期，也是作者参加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儒家文化与聊城征文活动”的征文）

附一：

“聊城七贤”简介

聊城古城内万寿观西曾有“七贤祠”，祀明朝聊城名人王道、穆孔晖、孟秋、王汝训、逯中立、张后觉、赵维新。

王道，字莼甫，谥号文定，明临清州武城县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吏部主事、员外郎中，擢左春坊谕德。著有《大学亿》、《老子亿》、《顺渠文录》。

穆孔晖，字伯潜，号玄庵，谥号文简，明堂邑县人。弘治十七年(1504年)举山东乡试第一，深受考官王守仁赏识。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正德二年(1507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正德四年(1509年)参加纂修《孝宗敬皇帝实录》，嘉靖四年(1525年)参与修《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升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著有《读易录》、《前汉通纪》、《玄庵晚稿》。

孟秋，字子成，号我疆，谥号清宪，祖籍茌平，世居阳谷张秋，明隆庆六年(1572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积升尚宝寺卿。著有《道脉说》、



《大道吟》、《气志吟》。

王汝训，字师古，号泓阳，谥号恭介，东昌府沙镇人，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改任兵部主事、都察院佥都御史、南京刑部右侍郎、工部侍郎。编撰《东昌府志》二十卷、《疏草》二卷。

逯中立，字与叔，号确斋，聊城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曾与顾宪成等讲学于东林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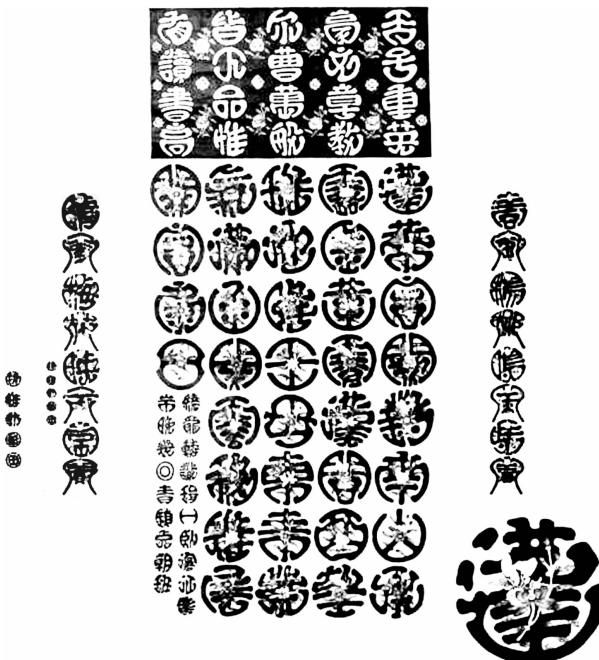
张後觉，字志仁，号弘山，在平人，后学尊称其为“弘山先生”。拜王阳明再传弟子贵溪徐樾为参师，曾主持“愿学书院”、“见泰书院”。弟子赵维新辑其言行为《弘山教言》。

赵维新，字文野，号素衷，在平人。张後觉弟子。著有《感述录》六卷、《感述续录》四卷。寿命达92岁。

“七贤”都有为官清正廉洁的品行。虽为正义公道屡遭贬斥，但安贫乐道，深究学术，提携后进。在学术思想上，都尊崇王阳明的“心学”，是生活在明代中晚期的思想家。

附二：

中 堂



明代茌平人
赵维新作。

此书画约16
平方尺，为一中
堂加整幅对联，
均很完整。

中堂上的每
个字，都是字中
有画。据介绍，
这种“字画”，其
上部寓指日月星
辰；下面指尘世
中的人，每个人
内心都有一朵花，



是“一花一世界”很好的印证。这种圆体字，《历朝圣贤篆书百体千字文》上有过介绍。张大千大师也有很多类似的作品。

中堂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宋代汪洙《神童诗》中的四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下面是杜甫《秋兴·蓬莱》：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对联是：

春风杨柳鸣金马富，晴雪梅花映玉堂贵。



武训精神旅游价值探析

□张东方

随着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为主向多种旅游产品并存的转变，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注重对旅游文化品牌的选择。

因此，推出“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努力打造一个闻名全国、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化旅游品牌，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武训精神文化旅游 品牌化的基础

21世纪是一个品牌的世纪，社会大众对品牌的认知已经贯穿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品牌是产品个性化的集中体现，是产品特性的高度浓缩，同时还是消费者认同感与产品个性的完美结合，需要有丰厚的基础来支撑。

武训精神文化是冠县所独有的完全可以成为县域文化象征的文化品牌。武训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所具有的文化个性是极其独特的。就像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不缺少慷慨激昂的英雄，但却少见像武训那样平凡坚韧像圣徒一样的英雄”。

关于武训的义举，已无需赘述，但“武训精神”的深刻内涵，仍值得



民国时期的武训电影海报



人们一遍遍地咀嚼和回味。

武训一生极贫穷却又极“富有”，是乞丐，更是“圣人”；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同时又是智者，是“百年蒙昧、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和先觉者”。从受尽欺辱到大红大紫，从被奉为神圣到被掘墓焚尸，武训“艰难不改其操，险阻不移真虑”的坎坷人生经历，具有非常突出的传奇色彩和独特性。特别是，从武训身上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感，舍己为人的精神，视道德、理想重于物质享受的品质，以及为实现理想而坚韧不拔的毅力，都是“武训精神”的精华所在，其影响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深远的，特别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武训及武训精神文化不仅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一个旅游“富矿”，有着重大的开发价值。只有将“义丐武训”这一难得的文化资源转换成文化产品，只有借助于旅游平台，将武训精神文化通过旅游媒介转换成旅游文化产品，使之产生社会效益，才能让武训文化在获得传承与发展的同时走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打造武训精神文化旅游品牌，启动“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取得最佳的经济、社会效益，就显得尤为紧迫而必要。

“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的项目策划

“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品牌建设，重点要放在与旅游经济的紧密结合上。将人文文化与民俗风情、自然风光有机地结合起来，将风格别具、秀丽异常的鲁西平原、黄河故道的民俗风物、自然景物赋予武训精神文化的灵性，使其产生出更高的旅游文化审美价值。

人文主题：以武训精神文化为主，辅以相关联的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

形象定位：“义丐”武训故里。

区域范围：以冠县境内地域为主，涉及临清市、东昌府区堂邑、河北馆陶等相关地域。





策划目标：根据开发的总体构想，将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使丰富的民俗文化、秀丽的自然风光与丰厚的人文资源优化组合，最终成为一个优秀文化旅游区。

策划指导思想

1. 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项目的策划与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到旅游者，根据产品的差异性、参与性与挑战性特点来配置旅游产品与服务，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式的巡游变为“下马赏花”式的游览，从“旁观”变为“参与”，从“领受”变为“奉献”，从“被组织”、“被安排”转变为“自己组织”、“自己安排”，从而获得快乐的旅游体验。

2. 自然的原则

“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都必须体现出“源于自然”和“高于自然”的原则。项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地域内的地方特色、文化特色，所张扬的人文主题必须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同时还要与当代的人文环境相结合。

3. 真实的原则

在保护区的设计与建设当中，必须坚持自然、真实、原汁原味的原则，保持原有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旅游观赏价值。

“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的内容策划

启动“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必须摒弃为追求单纯经济效益，盲目跟风，大上人造景观的做法，增强“地方文化自信”，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历史文化留存，最大限度地体现旅游的差异性原则，适当进行文物复原和重建，系统、饱满地展示武训文化的底蕴。

近几年，冠县大力发展旅游经济，逐步建立起度假旅游、观光旅游、文化旅游、节日旅游、教育旅游、生态旅游、康体旅游七大旅游产品体系，不仅涵盖全面，而且规模宏大、亮点众多，但是，笔者认为，这似有平均用力之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没有充分发掘出武训精神文化的深刻内涵，仍然大有文章可做。

为此，围绕“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品牌建设，提出以下设想和建议。

1. 长远规划，通盘考虑，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



应充分认识掌握武训精神文化的宝贵价值和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搞好武训精神文化旅游的整体规划，站在大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高瞻远瞩，通盘考虑，长远打算。规划形成后，要以一贯之，坚持不懈地搞下去，有重点、分步骤地认真实施，决不能半途而废。

应进一步加大武训精神文化的宣传力度，搞好经营策划。在这方面，可以尝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旅游局等部门建立联系，设立“武训教育奖”或“武训教育基金”，仿照“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公益评选活动，与上级有关部门、著名企业联手，在全国范围内评选捐资助学以及对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有所帮助的人物或单位，定期举办“当代武训”等颁奖活动，颁发奖章、奖金、证书、称号等。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扩大武训教育基金的筹资力度，在全国范围内资助贫困地区的学 生、学校等。应开动脑筋，大胆运作，让这一旅游品牌走出冠县、走出山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这方面可以参照曲阜、泰安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2. 重视旅游活动的参与性，充分体现体验式特点

应把开展体验式的教育修学旅游当作“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的重点，做足、做透、做好。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加深对武训精神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进一步获得快乐体验的新鲜感、亲切感与自豪感。

建议逐步加大对武训祠的开发建设力度。据悉，近期，冠县已聘请同济大学有关专家编制出详细规划，将武训祠由现在的 80 亩扩大到 260 亩，目前已开工建设。但硬件建设只是一个方面，还应尽最大努力增加武训祠的文化内涵。可以在武训祠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武训逝世周年纪念活动、武训精神研讨会、武训文化节等，邀请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领导、专家、学者前来参加，探讨武训精神的实质、影响及现实意义，出版武训研究专刊和书籍，建立纪念武训的网站等。应广泛搜集各种介绍、评论、研讨武训的报刊、杂志、书籍、音像资料等实物，如孙瑜的《武训传》、张默生的《义丐武训传》、《清史稿·武训传》、段承泽的《武训先生画传》、电影





《武训传》、江青与袁水拍等人炮制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等原件，仿制清堂邑知县郭春煦、山东巡抚张曜奏请皇帝恩赐建坊的奏折、御批原文，武训讨饭时用的褡裢、铜勺、善书、化缘簿、地契、账单、“乐善好施”牌匾等，重建武训纪念厅，在大厅以展板或橱窗的形式进行展览。可批量制作武训先生画像、纪念瓷盘、纪念册、纪念章、纪念币等旅游纪念品，由武氏后人在武训祠内签名盖章出售。

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体验式旅游的要求，下大力搞好武训义学修学感动游。可以仿照曲阜“三孔”的做法，在武训祠内举办武训义学旅游修学活动。在柳林崇贤义塾原址，仿建武训义学学堂，让游客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诵读、学习古文，用毛笔临帖，进行象征性的考试，然后颁发结业纪念证书，与扮演武训的演员共同合影留念。学校的工作人员可按照清末人物的穿着打扮，摇铃开学，敲钟下课。应在武训祠内重建武训塑像，建设武训纪念碑廊等，组织游客开展一系列瞻仰纪念活动。此外，还可以考虑在武训祠附近建设一处免费电影院，规模不一定太大，每天按时轮番放映电影《武训传》，设置留言簿，让观众写下自己的观后感想。也可搞一些反映武训生平事迹的地方小戏，用当地方言和“蛤蟆嗡”等地方剧种来演出。待条件成熟时，可适时推出武训家乡婚俗游、武训故里除夕游、书法碑刻游等。

3. 以点带面，红线穿珠，构筑大旅游格局

在集中力量、攥紧拳头、下大力打造“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这一品牌主线的同时，还应提纲挈领，整体推进冠县整体旅游经济的发展，把武训精神文化深厚的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文化、自然风光等旅游资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着眼于冠县，涉及临清市、东昌府区堂邑及周边，近可以带动县域内的北宋肖城遗址、冉子庙、太子墓、晓春亭、元好问纪念馆等人文景点以及马颊河森林旅游度假村、百里黄河故道林海、千顷梨园的旅游专线，远则可以辐射聊城江北水城、阳谷景阳冈、临清舍利塔、东阿曹植墓等旅游景点，形成大旅游圈，加速旅游产业化格局的形成，实现文化、经济、社会效益的共赢。

总而言之，武训精神文化是非常丰富的、独特的，具有极强的现实及长远意义。“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是一篇大文章、是一个极有开发价值的大品牌。只有充分注重和尊重文化旅游的特点和规律，认真发掘整理，努力展现地方色彩，形成个性化的旅游品牌，才能使这一旅游品牌享誉全国乃至世界，才能使旅游这一“朝阳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充盈活力。

力，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作者系聊城日报社地方要闻部主任、主任编辑，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该文原载2006年出版的《第三次全国武训精神研讨会论文集》，题目为《“武训精神文化感动之旅”品牌战略论稿》，个别地方有改动)



名人与聊城



临清有座彭祖墓

□吴文立

长寿之星彭祖的墓地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争来争去、至今仍没有结论的话题。不过，我们聊城的县志倒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彭祖墓在今天的临清。

一、历史记载

清光绪《馆陶县乡土志》载：

彭祖墓在城东三十里彭祖店村西南。考《舆地广记》：彭祖，古陆钟氏第三子篯也，自唐历夏、殷，封于太彭，号彭川。周末，浮游四方，晚入蜀。彭祖宅近彭山，在象耳山下流寓。一名彭齡，字幼朔，不知何许人。寓蜀之潼川，自称邹长春，来吴中，号曰甔甀子。游楚中，又称祝万寿，又改冯姓，居涿州。或问何故数更姓名？曰：此逃劫法也。阴府无常鬼，智力短，不能出五百里外。五百年劫数将到，变姓名，遁五百里外，又过一劫矣！时有杨涟者，濒死，齡袖出药一粒活之。与人谈皆百余年前事，又常言与某某等同朝，竟莫知为何代人也。死后两月，有人乘马携尺素叩李祖修门，发之，则齡手迹。后一年，



彭祖墓(选自《馆陶县乡土志》)



又有人见登莱山中。终于武阳郡。在馆陶县东北彭祖店，有墓焉，至今遗址尚存。

史载：彭祖，黄帝后裔，陆终之子，姓篯，名铿，舜时曾为大臣，寿八百余岁。

《史记·楚世家》载：“陆终生六子，坼剖而生焉”，“三曰彭祖。”

《列仙传》谓：“彭祖者，殷大夫也。”“历夏至殷末，寿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

民国 25 年《馆陶县志》有照片一幅（见照片），并载文说：

彭祖墓，在县治东北三十里彭祖店村西南，高六七尺，占地二丈余。

彭祖墓	
在縣治東北三十里彭祖店村西南高六七尺佔地二	
祝齡	太考
萬字	彭地
壽幼	號興
晚朔	彭廣
寓禹	川記
源蜀	周彭
州之	末祖
紹濱	浮古
於川	游陸
武自	四終
陽都	方氏
郡鄧	入弟
彭良	蜀三
祖春	有子
店入	宅繼
村吳	在也
卽號	象白
以龜	耳唐
此賦	山歷
得子	下夏
名游	一殷
楚稱	名封
	彭於

县志上记载的彭祖店村的彭祖墓，到底在哪里呢？

二、现状

可是，找遍馆陶县，没有发现彭祖店村。

这是因为，由于区划变动，彭祖店村已不在今天的馆陶县了。

编写县志在民国 25 年即 1936 年，当时的馆陶县治即今冠县北馆陶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区划变动，卫河东部原馆陶县辖区划归山东省冠县和临清市，卫河西部原馆陶县辖区仍名馆陶县，属河北省。区划变动后，原“彭祖店村”属于今临清市辖区。专家勘察后认为，这里属于龙山文化遗址。

《舆地广记》载：“终于武阳郡彭祖店村，村即以此得名。”武阳郡，隋置，改魏州为武阳郡，治所在贵乡（今河北省大名东北），唐代又改为魏州，辖区相当今河北省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成安、广平、馆陶，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及山东省冠县一带等。《舆地广记》所载，当是此境，只是由于区划变动，彭祖店的具体位置已由原来的馆陶县归属于今临清市。

又据《馆陶县乡土志》载：“松滋监：在县东北大章保，见霍尔赤传或误为彭祖店。”这说明，确实有彭祖店村这个地方，只是传说错了而已。

临清市地名办公室公布的资料显示，现临清市八岔路镇有三个紧密相



连的自然村与彭祖有关：

1.迟彭店。据《迟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八年(1410年)，迟姓由山东登州府福山县迁来，定居于当时彭祖庙和彭祖坟遗址附近，形成村庄后，命村名“迟彭祖店”，后演称“迟彭店”。

2.杨彭店。明洪武年间，杨姓由山西洪洞县迁至临清市考棚街，再迁至此处彭祖庙西北角处，立村取名杨彭店。

3.潘彭店。据传，明永乐八年(1410年)，潘姓由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东关应诏迁此，在当时此地原有的彭祖庙附近立村，命村名潘彭祖店，后简称潘彭庄。

由上面三个自然村的资料可知，彭祖店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里不仅有彭祖庙，还有彭祖坟遗址，只是因后来迁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原来的彭祖店已经分化成三个紧密相连的村落了。同时，电子地图测定，这三个村至今北馆陶镇驻地（原馆陶县县治）的直线距离是13公里，与旧志记载相符。

由以上分析可知，上述三村即是县志记载的彭祖店范围。

三、质疑

资料显示，彭祖的墓葬地在全国至少有五处，即江苏徐州、浙江临安八百里、河南鄢陵、陕西宜君县彭镇彭村、四川彭山县。彭山县公布的材料说：“通常认为彭祖墓葬地在四川彭山县彭祖山，至今仍存的彭祖墓，历史悠久，香火不断，其他地方的彭祖墓可能是衣冠冢。”

临清的彭祖墓是不是衣冠冢，并不能依彭山县人的话来决定。笔者以为，从聊城自远古以来的历史变迁进行分析，或许不无裨益。

远古时期的聊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批非常著名的人文先祖和圣贤大哲在聊城生活过。最具代表性的是：

(一) 伏羲在阳谷教民种谷。清康熙十二年修纂的《阳谷县志》记载：“阳谷北境有宓城，太皓伏羲氏之城也。”伏羲或谓宓羲，宓城即为伏羲城，城在县治东北（非指现在的县治，而是旧县治），阳谷在伏羲城以南，为伏羲教民种谷之地。

(二) 神农氏发掘古阿井。神农氏，又称烈山氏、厉山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一日，他在深山采药，忽然望见一处清澈见底的清泉涌动，他掬而饮之，顿觉甜润可口，神清力增，忙招人来这里掘井，因为周围长着阿魏草，相沿呼为阿井。阿井在今阳谷县城东阿城镇西北约3公里处。古阿井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时的《本草》：“真胶



产于古齐国之阿地，又以阿井煮水之最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阿水》中有对阿胶的记载。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东阿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可见古阿井水源为古济水。

(三) 黄帝生于古寿张县桃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委员张长城先生考证出“黄帝生于寿丘”，即“黄帝生于寿张县桃丘”，具体说，“寿丘就是寿张的前身，即远古时候的桃丘，古址在今阳谷县东南的陶城镇及台前县东端的徐堌堆”。这一观点，是继山东曲阜寿丘说、河南新郑寿丘说、甘肃天水寿丘说之后，提出的第四种观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高士巢父隐居聊城。巢父，传说中的高士，因筑巢而居，人称巢父，在聊城以放牧为生。尧要让天下给巢父，巢父不接受。巢父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人们在他生活放牧的地方，修建了巢父墓。《聊城县志》载：“巢父墓在城东南十五里，旧治十字街东南。”此处的“旧治”，是指巢陵故城的旧聊城县治所而言。清嘉庆《东昌府志》载：“石晋陵城，开运二年河决，王城毁……曾在聊城一带放牧，尧以天下让巢父，不受，死后葬于聊城。”聊城古有巢陵城，为巢父葬处，在今聊城市东昌府区许营村西北二里许的大石槽村西。聊城县治曾移此。其墓旁传为当年“巢父遗牧处”，为聊城古八景之一，曰“巢父遗牧”。

此外，聊城著名的古墓葬还有“字圣”仓颉墓（东阿）、蚩尤墓（阳谷）、颛顼墓（聊城城区西北）、尧王坟（聊城城南）等。高唐县有少昊司寇（刑官）爽鸠氏之墟，东昌府区堂邑镇是黄帝第五子清阳氏旧所，鲧、禹父子治水的传说流传至今。

四、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有专家认为，古济水西岸是中国文明发达最早的地区之一，曾是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特殊的地域，特殊的环境，导致了这一圣贤竞相而聚的现象。

聊城是黄河冲击扇形地，境内有古黄河、济水、徒骇河（古漯川）等主要河流。

古黄河，经过地质构造运动形成黄河河道，在尧舜时期和大禹治水后，又称禹河。《禹贡·导水》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碣石，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尔雅·释水》说九河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九河都分布在鲁西北和



鲁北一带），即向东经过洛河转弯处，达到浚县附近的大伾山，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向北进入华北平原（河北平原中部），通过漳河（“洚水”），又向北分若干条支流，都在渤海湾西岸潮汐河口、青县以东、天津等地入海，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在其后历次变迁河道的最北边，无地上河出现，聊城境内属平原地带，古黄河河道在此屡经变迁，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黄河经冠县西，过馆陶，越临清南、高唐东南，向东北入海。

古济水，也作“沛”，包括黄河南北两部分。黄河北部——《禹贡》中这样记载：“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黄河南部——“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上的太乙池。源水以地下河向东潜流七十余里，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形成珠（济渎）、龙（龙潭）两条河流向东，不出济源市境就交汇成一条河，至温县西北始名济水。济水流经河南、山东两省入海，大体路径是荥阳县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定陶县西，折向东北入巨野泽，又至泽北出经梁山县东，至东阿旧治西，自此至济南市北泺口，略同小清河入于海。据考，聊城境内存在古济水，古阿井之水源于古济水。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东阿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如果说，古阿井之济水是地下潜流，那么故河道极有可能是古济水河道出露于地表的部分。目前根据聊城龙山文化城及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规律认为，聊城境内的古济水在阳谷、东阿、茌平等地穿境而过，聊城远古文明大多在济水以西，古济水也是兗、青、徐三州的边界。

徒骇河，为古漯川水系。孙炎《书疏》曰：“禹疏九河，用功最广，众惧不成，故云徒骇。”《水经河水注》载：“漯川故道自今河南浚县黎阳山别黄河东北流经濮阳、范县、莘县、聊城、茌平、高唐、齐河、禹城、临邑，至利津入海。”但是，今之徒骇为古之漯川。《孟子·滕文公上》载：“禹疏九河，渝济漯而注诸海。”由此可见，徒骇河虽非九河之一，但却是大禹曾经治理的河道。徒骇河由南向北流经阳谷、东昌府、茌平、高唐。

聊城的先民们就是在这黄河冲击扇形地上生存。考古发现，他们的生活范围主要是在济水西岸的茌平、阳谷、东阿、莘县、东昌府、冠县、馆陶、临清等地聚居，以原始农业为主，渔猎为辅。时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聊城远古先民在这一时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共留 44 处遗址：



——距今大约 7000—4600 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聊城是山东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汇合地，仰韶文化遗址曾在阳谷、东阿发现。聊城境内在阳谷皇姑冢、东阿香山发现有仰韶文化痕迹 2 处，这 2 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现了仰韶文化特有的典型器物——大量的红陶钵口沿、1 个小口尖底瓶（残片不全），目前不能确定境内是否存在过仰韶文化，这有可能是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境内有大汶口文化遗址 18 处，在茌平县有尚庄、韩王等 13 处遗址，阳谷县有红堌堆等 3 处遗址，东阿县有香山 1 处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在平地上凸起的小块高地，俗称堌堆，数量较少，分布零散。由于聊城境内属黄河冲击扇形地，在几千年的的时间里，地面海拔越来越高，已有许多遗址被埋在黄沙里。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在阳谷、寿张等地，曾存在过不少“堌堆”，估计这些“堌堆”就曾是一些遗址群。

——距今约 4600—4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聊城境内有龙山文化遗址 41 处，在茌平县有教场铺、尚庄等 21 处遗址，阳谷县有景阳冈、皇姑冢等 9 处遗址，东阿县有香山、青冢子等 6 处遗址，东昌府区有权寺、白庄等 5 处遗址。聊城有 9 座龙山文化城，其中，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是全国最大的龙山文化城，有“都、邑、聚”等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东昌府区、茌平县遗址大多分布在干涸的古河道两侧高台地上，尤其是在茌平县的遗址分布更密集，以县城为中点，在一条西南至东北方向的故河道两侧，每隔三、五公里就有一处，徒骇河以西遗址很少。阳谷县遗址大多集中在赵王河以东，东阿县遗址大多在中东部，遗址类型多为堌堆式，由西南向东北呈条带状分布。很明显，这样的遗址分布规律与古济水有关。

根据聊城地方史料零星记载和多方研究成果，并结合重要的考古发现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发现，在“三皇五帝”时期，伏羲、神农、少昊、黄帝、蚩尤、颛顼、尧、舜、禹等部落首领和帝王曾在聊城活动或建都。知名考古学家、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研究员提出，景阳冈文化城极有可能是古穷桑，古穷桑是古史中传为穷桑帝少昊登帝处、黄帝登帝处、颛顼之都、虞舜之都。古聊城境内曾是少昊领地、蚩尤领地、黄帝居地、颛顼居地、舜的有虞氏所在地，是东西文明的交汇地，这说明聊城曾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

聊城地处冀鲁豫交界地带，该地带是黄河中下游和华北、东北最先接触交融争夺的中心区，是水患最严重的地区，是古史演进的极其重要的舞台，五帝时的重要历史事件大多发生在这里，具有国家形成的条件。河济



之间存在着大量有关军事战争中以水为兵和治水的故事，显然，正是水患因素，才极易引发部族间的战争，直至今日国境内还年年防汛抗旱、存在水事纠纷，可以想见远古时期“水”的因素何其重要。传说中的共工曾以水行霸，鲧、禹、四岳在此治水。为了治理水患，人们不得不疏通河道，修筑堤防、统一规划、共同实施，这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也就是说，水害虽然给聊城先人带来了苦难，但也是磨炼先人、激发先人智慧的有效途径。于是，久经磨难的聊城先人极有可能最先脱离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其标志即是出现了军队和城，进而在虞舜之时诞生了国家。聊城境内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这两座规模宏大的远古文化城恰恰能印证这段历史。其后大禹通过治水立德立威，从方国形成了帝国，为夏启“家天下”奴隶制国家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特殊的地域，造就了聊城领先的文明（以此推断，聊城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体说，我们只是在华夏文明中心区内的东部，绝非一些专家所称的“东夷”），于是人文先祖和古代圣贤陆续在此带领聊城先民生活，并以此为基地开疆辟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高寿 800 岁的彭祖选择这里作为终老之处是非常自然的事。

五、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全国各地虽然有多处彭祖的墓地，很可能其他地方的彭祖墓是衣冠冢，而聊城的这个彭祖墓才是真的！只是，其他各地重视挖掘这个资料，早就开始了宣传攻势，以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

相比来说，我们虽然有真的墓地，但却无人重视，甚至视而不见。养生伪专家张悟本的倒掉已真切地告诉我们，在人们日益富裕的今天，养生需求市场是何等广阔，如果我们能把做好彭祖长寿文化这篇大文章，前景可想而知。

该是我们向徐州、彭山等地好好学习的时候了。

（本文原载 2010 年 6 月 9 日《聊城日报》，个别有改动）



附：

探访彭祖墓

□洪 祥 孙维华 刘玉生

按：2010年6月9日《聊城日报》刊发了《临清有座彭祖墓》这一报道，引起了热心读者的关注。但《临清有座彭祖墓》只是就旧县志中的记载及彭祖墓的真实性问题做了些探讨，并未涉及其他问题。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这个古墓还在不在？如在，现状如何？为此，聊城日报记者专程采访、撰写了下面这一报道。从情况看，墓地仍在，据村民说，从明初移民来到这里时，彭祖墓就存在，而且当时十分繁华，有彭祖庙、彭祖井等。当时的移民就是感到这里“风水”好，想沾一下彭祖的光才决定定居彭祖墓周围的。可惜，彭祖庙已毁于1947年，彭祖井已填实，孤零零的彭祖墓也因村民取土变得越来越小，而且盗墓者也不断光顾，公然留下多处盗洞。面对此景，许多村民也很无奈，也未见各部门采取过保护措施。我等也无能为力，索性就把这个报道刊发于此，暂作彭祖及彭祖墓的祭文吧。



彭祖墓现状

伴随着小麦联合收获机马达的轰鸣声和麦香气味，记者踏上黄河故道重镇——临清市八岔路镇的沙土地，来这里探访临清彭祖墓的历史遗迹。踩在细

密的沙土地上，远眺彭祖墓，浓郁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2010年6月9日，聊城日报刊发了《临清有座彭祖墓》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继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彭祖山、江苏徐州彭祖墓、浙



江临安彭祖墓、陕西宜君彭祖墓、河南鄢陵彭祖墓之后，山东临清彭祖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解临清彭祖墓现状，记者专程赶到这里，对临清彭祖墓进行探访。

明初移民见证了六百年前的殿阁辉煌

6月18日下午4时，记者来到临清市八岔路镇潘彭庄村，在76岁的潘文安老人带领下，记者来到彭祖墓。“你别看这墓小，但是你仔细看看周围的地势，就会发现，墓周边面积很大。这里曾经有一个井（可能叫彭祖井），深不见底，很多人用手电都照不到底，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彭祖，一作彭铿，传以长寿见称。彭祖是上古帝王颛顼的孙子（黄帝的第八代孙）。帝尧的时候，他因为进献雉羹，尧便把彭城封给他，所以后世称他为彭祖。舜的时候，他从师尹寿子，学得真道，遂隐居武夷山。到商代末年，已有767岁（或说有800余岁）。尽管这么大年纪，可他仍不显衰老。他自幼喜好恬静，不追求名誉，不汲汲于世事，不刻意打扮自己，终日以养生修身为事。

潘文安老人拿出今年（2010年）的祭祖文，祭文道：“吾始祖彥美携子孝忠两公于公元1410年，应皇昭由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迁来卫水陶山郡，经北馆陶，路遇彭祖庙，见殿阁辉煌，相貌整齐，参拜毕，谓其子曰：‘孔圣尚云夏商之贤臣，窃此吾人何不乐就范，遂创室于侧而居焉，定村名为潘彭祖店，至今六百年正。’”由此可见600年前彭祖文化的鼎盛。

盗墓贼经常光顾，封土面积不断缩小

历史遗迹作尘埃。这是记者第一眼看到彭祖墓的强烈感受。高不到2米的彭祖墓，只留有6平方米左右的“坟头”了。据潘文安介绍，20年前封土的高度达到9米，是远近闻名的土山，但是由于当地村民对彭祖墓了解不深，加之取土平整土地，彭祖墓不断遭到破坏，封土面积不断缩小。在彭祖墓封土周围记者看到，这里仍有人为取土痕迹。

“1947年，迫于当时的大环境，当地村民把这里的大庙给拆了，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改革开放以前，彭祖墓的高度是9米以上，面积很大。后来大家都在这里取土，平整土地，古墓的高度慢慢成为现在这个样



子了。”

记者在潘文安的指引下，细心观察了彭祖墓周围的地形，在封土周围20米的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凸起，而20米开外则形成洼地。“三五年前，这里的土堆还很高，小孩们经常到这里来玩耍。20多年前，这里可是远近闻名的土山。”当地村民的讲述也印证了潘文安的话。

“这里四个盗洞的痕迹非常明显，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盗墓贼光顾过了。”潘文安老人指着彭祖墓顶端的盗洞非常惋惜，“但愿由于封土太大，古墓没有被盗。”记者了解道，很多当地的年轻人都知道潘彭店的彭祖墓，但是对历史传说并不清楚。

需要强调的是，在彭祖墓的西方5公里，东方2公里，分别有潘家祖坟和霍家祖坟的巨大封土。这些家族祖坟虽然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仍保存基本面貌。据潘家和霍家老族人介绍，这一带自明清起就是家族显贵的分封墓地。

记者呼吁，多方采取措施，救救彭祖墓

记者通过再次深入采访临清彭祖墓，所见所闻，深刻感受到彭祖墓所折射出的，是我们聊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且看，明初的移民曾经亲眼见证了当初彭祖墓辉煌一时的殿阁，这里面隐藏的历史讯息，难道不是十分的耐人寻味吗？彭祖墓肯定自有其久远的历史，六百年前的辉煌至少表明一点，此墓很有可能有着千余年乃至几千年的绵长历史。中华文明不绝如缕，彭祖墓从远古到现在，我们在慨叹之余能不倍加珍惜吗？彭祖作为幸福长寿的象征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之中，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长思之的。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指出的是，至少不应忽视对本地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侵蚀，潘彭店周边的古墓遗迹依然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但是，令人痛惜的是，彭祖墓因无人保护，被不断盗挖、蚕食取土。这么深厚的历史遗存，不去加以关注、保护，却听任它湮没在原野之中而不彰，这难道是明智之举吗？记者在此呼吁有关各方面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彭祖墓。本报对于彭祖墓的报道，但愿不是结束，而是重视、保护的开始。



中医汤剂创始人——伊尹

□谷万里

聊城文化遗存丰富，人才辈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伊尹、成无己等与中医药文化密切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

中医药处方的药物剂型，渊源久远。相传早在商汤时代，伊尹曾撰述《汤液经》专著，至《黄帝内经》又有“汤液醪醴论”专篇。所谓“汤液”，初为五谷之液，后发展为药物煎剂(即俗称之“汤药”)；“醪醴”属于酒类(或药物与酒剂相融合之药酒制剂)。在汤液、醪醴之后，又相继产生了丸、散、膏、丹等药物制剂。

伊尹（？—前1713），商代初期的大臣，名伊（一说名挚），尹是其官职名称。相传伊尹生于空桑，《吕氏春秋·本味》对此有一段传奇的记载：“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妇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抛开神话的部分，伊尹出生在伊水之滨，洪水过后，成为孤儿。

伊尹成年后流落到有莘氏，以耕地为生，地位虽卑，而心忧天下。据《孟子·万章上》记载，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就是说伊尹在辅佐商汤之前曾经在“有莘之野”（今聊城市莘县境内）躬耕务农（后来莘县城北之地一度被称为“伊田”）。

伊尹见有莘氏国君有贤德，想劝说他起兵灭夏。为接近莘国君，他自愿沦为奴隶，充任有莘国君贴身厨师。国君发现其才干，提拔为管理膳食之官。经长期观察，伊尹终于发现，有莘氏与夏同姓，均为夏禹之后，血缘联系难以割断，况且有莘国小力弱，不足以担当灭夏重任。只有汤才是理想人选，便决定投奔汤。



其时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妃，伊尹自愿作陪嫁的奴隶，随同到商。后来伊尹成为成汤的厨师，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以烹调、五味为引子，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劝汤承担灭夏大任。汤由此方知伊尹有经天纬地之才，便免其奴隶身份，委以重任。后伊尹辅佐成汤攻灭夏桀，建立了商朝。后又辅弼国政，被商汤尊为阿衡、保衡（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历经外丙、中壬，曾放逐太甲，“摄行政当国”，直至太甲悔过。

伊尹为商朝理政安民六十余载，治国有方，成为商朝权倾一时的三朝元老，卒于沃丁时，享年百岁，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续修莘县志》载：“莘之北门曰伊尹田，伊尹田之北八里有莘亭，世传伊尹躬耕处也。”莘亭，始建于汉代，后亭废基存。清康熙五十五年（1676年），东昌府知府程光珠访求古迹，亲书“莘亭伊尹耕处”六个大字，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虎云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重修莘亭，以永志之。其碑今在莘县城北莘亭镇大里王村西200米处，碑文大部清晰可辨。另在莘亭东古有伊尹庙，又称任圣祠，为汉时创建，后多次移址重修。

清代移于城内，有正堂三间，门一间，周环垣墙，院内松柏参天，气象幽森，“伊庙清风”为旧时莘县八景之一，历代地方志乘多有记载和题咏。



“莘亭伊尹耕处”碑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之师，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医药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苏东坡曾经著《伊尹论》称赞他“以其全才而制天下”。伊尹不仅是后世政治家崇拜的贤相楷模、与孔子齐名的“元圣人”，还是后世厨师们奉为神灵的“厨师之祖”。在医药上，他则是中医汤剂的发明人，学中医的人都知道“伊尹制汤液”。

《吕氏春秋》记载：“汤问伊尹取天下之道。伊尹答曰：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尽其天年。”在这里，伊尹没有直接答复商汤，而是借用中医的医理来比喻取天下之理，颇为精当。可见，伊尹深通中医医理，有高深的医学造诣，加之擅长烹饪，精于本草药



性，熟知食物的治病作用，进而总结民间运用食物治疗疾病的经验和药物的治疗性能，创制了中药汤剂。

晋代的医学家皇甫谧在其所撰写的针灸学著作《甲乙经》的序言中说：“伊尹，亚圣之才，闵生民之疾苦，做《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宋代的太子右赞善大夫高保衡、尚书屯田员外郎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林亿等在《伤寒论序》中说：“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资治通鉴》中也记载说：“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

上述历代中医古籍中的记载表明，伊尹是历史上公认的中医汤剂的创始人。

（作者系聊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青岛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聊城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鲁仲连与聊城

□张东方

鲁仲连，战国高士，亦称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鲁连。今茌平人，善于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排难解纷。他是我国继孔孟圣贤之后的五贤之首，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饱读诗书，雄才大略，能言善辩。有关他的许多典故，如“射书聊城”、“说魏救赵”、“义不帝秦”、“千金不受”等流传至今。

一、一生事迹

关于鲁仲连的生卒年代，史无记载。钱穆先生推算约为公元前 305 至前 245 年。《鲁仲连杂考》（作者王德敏、周立升）认为，鲁仲连最早的事迹是批判孟尝君“好士未也”（《战国策·齐策四》），约在前 303 年至前 294 年之间。其最晚的事迹是前 257 年说新垣衍义不帝秦。这样看来，其

生卒年约为前 320 年至前 250 年比较合理。

(一) 前 320—前 300 年

鲁仲连少年时曾师事徐劫（《史记·正义》），从他学过“势数”之学。徐劫，《汉志·儒家》载有《徐子》四十二篇，班固自注：宋，外黄人。前 341 年齐、魏马陵之战

鲁仲连者，齊人也。好奇偉博，潔廉而不肯仕宦。任職薛公高師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殺獲四十萬。秦兵遂東圍趙都。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轍空，趙王使將軍辛垣衍叔擊嬰齊，至於溫陰，不進。驕王使客屬軍皆歸趙。趙王曰：“秦所為急憲，趙者，弱與齊，潛于事，誠為帝已而復歸。苟今已擊弱方今，唯存延天下，此必非貴將。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擊秦，則秦王為帝秦必喜。勝去平原君擊預未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謂辛垣衍曰：‘請易平原君以見平原君。’平原君曰：‘事將奈何？’趙王曰：‘勝也何難？事尊何如？’曰：‘吾知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榮客客。’
卷之二



时，徐劫曾向魏太子申讲“百战百胜之术”。

名师出高徒，徐劫也常对人夸奖学生鲁仲连：“我弟子虽少，千里驹也。”据说，鲁仲连十二岁时曾责难田巴。田巴是当时有名的稷下辩士，他“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鲁仲连往见田巴，以“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的例子阐明了人做事应该先急后缓的道理，提醒他国家危机四伏，那种为辩而辩、脱离实际的辩论毫无意义。田巴败得心悦诚服，并与次日当着徐劫之面赞美鲁仲连说：“先生之骑乃飞兔驥也，岂特千里哉！”（《太平御览》卷464）田巴从此杜口易业，终身不复谈。

（二）前299—前291年，鲁仲连三次与孟尝君论辩

第一次，批评孟尝君并非好士（《战国策·齐策四》）。鲁仲连先用“雍门养椒亦，阳得子养”的例子反衬孟尝君养士的虚伪和吝啬，批评孟尝君薄士、贱士的做法，待孟尝君狡辩不是自己薄士，而是今士不如古之士时，他又用孟尝君厚待所有的马结果终得良马、厚待所有的妃子结果终得美女的事实，类比出“应该厚待所有的士以求贤才”的观点，提醒孟尝君应该普遍提高士的待遇，平等真诚的对待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像古士那样的贤才。从当时孟尝君“厩马百乘”、“后宫十妃”的气派看，这次谈话当为孟尝君任齐相时。

第二次，是劝孟尝君勿逐舍人（《战国策·齐策三》）。鲁仲连列举了在一定情况下猿不如鱼鳌、骐骥不如狐狸、曹沫不如农夫的事例，告诉孟尝君人各有所长、各有其短，用人的关键在于用其长而不用其短，指出遗弃人才会树敌招祸的危害，规劝孟尝君勿逐舍人。观此文中二人对话语气，亦当在孟尝君为相时。

第三次，与孟尝君论“势数”（《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连子》）。鲁仲连深得徐劫势数真传，不但理论上炉火纯青，而且在实践上运用自如。他在跟孟尝君讲势数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深入浅出，形象直观地用“关门”这一日常行为做例子，简明扼要地点明“势数”的本质——“彼所起者非举，势也；彼可举然后举之”，从而准确通俗地向一个外行人解释了势数，让孟尝君明察“可”与“不可”的形势，以便伺机而动。

（三）前290—前260年，重要事迹有二

1.论田单攻狄城。前284年，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半年内攻下七十余城。前279年，田单反攻复国，“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唯狄邑的统治者负隅顽抗。“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鲁仲连说：当初你在



即墨时与士兵同甘苦，临阵身先士卒。那时候“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故能胜利。如今你被封邑加爵，“黄金横带”，只顾养尊处优，“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田单大悟，第二天亲临前阵，巡视城防，擂鼓挥旗，一举攻克了狄城（《战国策·齐策六》）。

2.射书救聊城。燕昭王命上将军乐毅率军侵占齐国72城。后来燕王听信谗言把乐毅罢官回乡。齐将田单趁机反攻，收复失地71城，只有齐国西界的聊城一年多没能收复。田单请鲁仲连商讨对策。鲁仲连分析：守城将领乐英是乐毅侄儿，自幼跟叔父长大，骁勇善战，但燕王昏庸，乐英不受燕王信任，不敢回燕国。可是要投降齐国，又怕落个不忠之名。齐军以武力相逼，他一定不服，若修书一封，射入城中，晓以利害，可使他三思而行。果然，乐英收到箭书后，再三阅读，大哭，三天不能决断，后大吼

一声，拔剑自刎而死。于是，齐军很快收复了聊城，地方黎民百姓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四)前259—前250年

“义不帝秦”、“千金不受”（《战国策·赵策》）。邯



郸解围后，平原君要封赏鲁仲连，鲁仲连终不肯受。平原君又“以千金为鲁连寿”，鲁仲连却轻蔑地一笑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别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史记·本传》云：“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超人的智慧，传奇的色彩。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功成身退，销声匿迹，隐之大者。从鲁仲连的“七事”，可以总结归纳出鲁仲连在思想上、人品上、辩术上异于并超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在思想方面，他是一个融会贯通、多元并存的综合体，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结出的硕果和奇果。在他的身上，有纵横家的影子，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作风，又与苏秦、张仪背信弃义、贪图富贵的做法截然相反；他受名家辩士辩术的熏染，而又能跳出“为辩



而辩”的泥沼，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他有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但他“不在其位，亦谋其政”的平民参政意识和彻底摒弃富贵金钱的高士作风，又与孔孟之道决不苟同；他受墨家影响，有很明显的“兼爱”、“非攻”行为，但行动又远比墨家大气、积极；他隐居海上，有道家遁世之风，但又不完全归隐，决不肯老死山林，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积极行动。在人品方面，鲁仲连的爱国爱民、排患解难、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敬佩、感奋；在辩术方面，鲁仲连善用譬喻，善于举例，善于分析形势和说话人心理，语言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语言财富。可以这样说，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超人的智慧，组成了一个富有个性和传奇色彩的鲁仲连。

正因如此，鲁仲连在历史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司马迁评价他：“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好持高节。”且对他“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拙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的品质和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并深表敬佩。

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墨客为他写下了不朽诗篇。

晋人左思在《咏史》诗中说：“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诗仙”李白《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诗：“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其在《古风》中又写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唐代诗人汪遵专门写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诗：“刃血攻聊已越年，竟凭儒术罢戈鋋。田单漫逞烧牛计，一箭终输鲁仲连。”

元好问《箕山》诗：“鲁连蹈东海，夷叔采薇蕨。”

周恩来总理在年青时的著名诗作《大江歌罢掉头东》中借用“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鲁仲连遗事，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豪情。

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当选后的演说中特别提出：“（我将）关注澳门社会的稳定发展，甚至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乐为鲁仲连，促进各界人士的团结。”非常仰慕鲁仲连不畏权贵、不慕福禄、淡泊名利、乐善好施的高风亮节。

可以说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鲁仲连”们，承袭鲁仲连的精神，把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善良聪敏的民族，不断地推向繁荣富强，不断地推向幸福和光明。



二、故里遗迹

1.望鲁店村

在今茌平县城东北 20 里冯官屯镇有望鲁店村，鲁仲连就出生在这里。

村名的由来与孟子有关。传说亚圣孟子因仰慕鲁仲连，从鲁国风尘仆仆地来到齐地拜访他，熟料行至刘集店中病倒，无奈之下，瞭望鲁仲连故居许久，不及而返。后人为纪念这两位圣贤，将该村命名为望鲁店，即眺望鲁仲连故居之意。

清康熙二年，知县王画一重修鲁仲连墓，筑垅立石植松柏。通判路遵正又重修鲁仲连故宅、祠堂，使得望鲁店的名声越来越大。古人曾有诗曰：“城之东北，望鲁店前。仲连故址，村落连绵。迂雾溟朦，隐有人烟。海市蜃楼，望之俨然。”因称“连村烟市”。民国《茌平县志》将“连村烟市”列为茌平八景之一（见上面照片）。《东昌府志》、《山东通志》等也均有记载。

2.鲁仲连祠

鲁仲连祠历史悠久，但始建于何年不得而知。据《山东省志》、《茌平县志》记载，自清康熙二年茌平知县王画一修复距今已有三百多年。1995 年，茌平县有关部门重新修复了鲁仲连纪念祠。

重修过的鲁仲连祠坐落在古朴幽静的村子中央，粉垣环护，端庄瑰丽，古色古香。大殿五间，供奉着鲁仲连塑像，炉烟袅袅。院内苍松翠柏，幽静闲雅。大门之上层楼高起，崇阁巍峨，著名的“奎星阁”匾额由



连村烟市



鲁仲连祠旧貌(宋代)



新建鲁仲连祠大殿



著名国画大师黄胄书写。“鲁仲连纪念祠”牌匾由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田纪云题写。国防部原部长耿飚，海军原政委李跃文，司法部原部长邹瑜，文化部原代部长、诗人贺敬之，外交部原副部长、孔子基金会会长宫达非，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孙轶青、张德勤，著名书法家柳倩、欧阳中石等，都曾为鲁仲连纪念祠挥毫泼墨、题字题词。

3.四贤祠

祠在茌平县文庙西邻，祀鲁仲连、淳于髡、马周、张镐四位茌平籍著名人物。

4.鲁仲连台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昌知府陆梦履为纪念鲁仲连“射书救聊城”，于三迁后的聊城东门外初建“鲁仲连台”，亦名“高士台”。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县令黄汝铨重加修葺，“为楼于其上”，书曰“射书处”，楼与城墙齐高。

清嘉庆二年，知府毕亨再次重修高台，且撰《鲁仲连射书台记》，树碑记之。此台在聊城古城东门外的水桥东，“台高七十余尺”，上嵌石匾的东西两面分别刻有“鲁仲连台”和“旷古高风”四个大字，其上崇楼壮观。

清代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

丙午，晨刻，同陈冰远步五里，渡浮桥，入东昌北门。城坚濠广，先朝铁铉之所守也。光岳楼当城之脊，凡四层。其架栋如井字，俗传鲁班之斤，妄也。碑刻俱荒猥，且不详其所始。寻出东门，即鲁仲连射书处。往年大水塞东门，由此门入。仲连祠尚岁祭。祠废于水。

民国初，楼即不存，台基完整。1935年，范筑先将军拓宽东关大街时将该台拆除。据老人们讲，50年代初还有石碑、石匾散落路边。

八十年代，聊城有位老人曾发现过一块刻有“鲁仲连射书处”的石碑，并亲眼见到民工将石碑埋在地下。1985年，这位老人又在清真西寺无意中发现了“鲁仲连射书台记”石碑。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聊城市有关部门后来在清真西寺找到了被当作台阶用的康熙三十一年的“重建鲁仲连射书台记”石碑。

进入二十一世纪，聊城市委、市政府在建设“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进程中，把重修鲁仲连射书台当作一项重要内容，使之成为聊城古城保



护与改造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有关射书台的规划和设计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届时，古老的聊城又将重现这一著名的历史景观，为中华水上古城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孔门弟子与冠氏邑

□戴敬仁

据传，晋国有一位战将立下赫赫战功，被天子赐姓冠氏，将封地取名冠氏邑。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冠氏邑位于晋国、齐国、卫国的交界处（今山东冠县东古城），其地域范围大约在今天的山东冠县和河北馆陶县及其周边一带，古黄河穿境而过。《左传》载：“齐为卫故伐晋冠氏。”由此可见，冠氏邑为诸侯国必争之地，在那时已是很有名气的要地了。春秋末期，鲁国出了位大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创立了儒家学说，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名。孔门弟子中有不少与冠氏邑结下不解之缘。

子夏授徒西河寨

子夏（前507年—？），姓卜，名商，字子夏，晋国温地（今河南温县）人。七十二贤中，在文学方面，子夏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读书时，孔子和弟子们讨论《诗经》时夸奖子夏说：“最能阐明自己学问的是卜商。”（《论语·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鲁国国君见到孔子，请他介绍品学兼优的弟子到鲁国做官，孔子便推荐了子夏。子夏来到鲁国做了太宰，兢兢业业，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时间一长，他看到官场腐败、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便坚决辞去官职。有一次，子夏和孔子谈起了志向，表示打算像老师那样传业授徒，终身弘扬儒家文化。孔子满怀深情的告诫他：“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思是要求子夏做一位优秀的传承者，培养出一代国家的栋梁之材。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了，子夏便离开了鲁国，开始了传业授徒之旅。这一天，他沿着黄河（当时称黄河为河水）来到位于西岸的冠氏邑，



见到了这里民风朴素好学、水美草肥，便决定在这里留下来。他来到西河（今河北馆陶县西河寨），办起了学堂。当时，诸侯争霸，战火仍频，国家急需人才。各诸侯国的有志之士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慕名前来拜师学艺，一时间，宾客云集于子夏门下。据史书记载，子夏在西河授徒三百。子夏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汲取历史教训，防止臣下篡夺，宣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提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和“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或也”等观点。他把“仁”作为教育学习的中心内容，极力宣扬“忠孝节义”。他认为择妻应重德不重色，事亲应竭尽全力，事君要不惜身，交友要言而有信。只要能做到这几点，便符合仁的规范了。当时晋国有一位市井无赖段干木也来到这里，子夏并不歧视他，悉心教导，很快使之成为得道的儒徒。魏国的国君魏文侯魏斯亲自来到西河向子夏求学，悉心学习儒家经典，子夏向其传授《春秋》、《诗经》，使他受益匪浅。后来，子夏中年丧子，悲痛万分，竟哭瞎了双眼。魏文侯请他到自己的身边为官，子夏感到力不从心，便推荐自己的弟子段干木、李悝、吴起、公羊高等人。李悝，魏国人，任魏文侯相 10 年，主持变法，是战国法家的始祖。李悝向魏文侯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教民间种、套种，勤奋耕作，收割要抢农时，种桑树、瓜果、蔬菜，扩大副业收入；由于魏国常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军事上，教民争相练习射技，日夜不停。与秦国人作战时，由于魏军射技精良，因而大败秦军。这一切，逐步使魏国走向富强。有一次，魏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魏文侯就任命吴起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五座城邑，壮大了魏国的声威，使秦国不敢再向东进军。魏文侯死后，吴起遭陷害，投靠楚国，率兵南平百越，西胜强秦，屡立战功。子夏在西河活了 80 多岁，病逝于西河。后来，人们就在其讲学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以祭祀这位贤人。西汉后，这里归属馆陶县。据《馆陶县志》记载，在城西南七十里的西河寨村，有一庙，其貌巍巍，内有经阁，即子夏设教西河处。

冉子亡断黄河旁

冉子（前 522 年—前 466 年），名雍，字仲弓，鲁国人，是著名的“十二哲”之一，在各地的文庙祭祀之中，他排在孟子和闵子骞之后，位列第六。冉子出身非常低微贫贱，但是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花牛生的小



牛，照样可以毛色纯正，双角端正，可以用作大典的祭品。”（《论语·雍也》）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在众多弟子中，孔子最器重冉子的品德：“雍可以使南面。”意思是冉子的品德，足可以做诸侯王。冉子也是孔子做学问最精深的弟子，汉代儒家学家郑玄说：“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又说：“‘论语’二字，仲弓所题。”能够为尊师孔子儒家之经典题名之人堪称三千弟子之中的佼佼者。

孔子死后，冉子把传授儒家之道当作己任，奔走于诸侯之间，极力宣扬中庸之道。多年的奔波，使他身心疲惫不堪。公元前466年的一天，他沿黄河到齐国路过冠氏邑，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人们请他讲授为人之道。他一连讲了多天，直到最后人们还是不舍得让他走，怎奈他决意赶路，人们便赶到黄河边为他送行。出得城来半个时辰了，一连送出十几里地，冉子和送行的人们挥手话别，突然感到眩晕，倒在了古道旁边。他还是决意赶路，赶到齐国讲学，人们把他抬到牛车上。在人们的目光中，牛车慢慢地走向远方。颠簸的牛车上，冉子望着流向齐国的黄河水，安详地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见此情景，他的弟子们哭声一片，冠氏邑送行的人们，涌来围在车旁，嚎啕大哭，祭奠冉子。依照古代随地而葬的习俗，在众人的帮助下，弟子们把冉子葬在黄河边。为了纪念这位客死在冠氏邑的圣贤，人们把冉子倒下的地方称作“添病”（今冠县田平村），去世的地方称为“亡断”（今冠县王段村），人们祭奠冉子的地方称为“孝子哭”（今冠县孝子哭村）。这些具有纪念和教育意义的地名，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风雨洗刷，仍然保留得如此清晰，可见冠氏邑的后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崇拜和影响多么深远。

冉子倒在了讲学的路上，人们在他的墓前建起了祠堂。关于这座墓的记载，最早见于晋朝的《水经注》。冉子以德行著称，历代统治者多有封赐：汉高祖时封陶子，元帝时封陶侯，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封鲁侯，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薛侯，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增封下邳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冉子。隋朝时，这里改属冠县辖地。据《冠县志》载，位于今天冠县万善乡高王段村的冉子仲弓墓和祠堂，在清朝已具有相当规模，正殿三间，雕梁画柱；殿前碑刻为历代文人骚客所题；殿后墓园，苍松翠柏环绕其间；东跨院青砖碧瓦，为历代官员祭奠时休息的场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场浩劫之后，这些建筑荡然无存，仅留遗址。



孟子晓春唱千古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人。他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有一年，孟子率领弟子由齐国至魏国，路过冠氏邑时，受到百姓的欢迎，人们慕其名纷纷提着水壶来到大路旁欢迎这位圣贤，在这里至今留下村名“提固”和“千家店”，即今天冠县提固村和店子村。当时，冠氏邑有一位名叫景春的人，对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出名的纵横家十分崇拜，想找孟子请教一下，于是就上前拦住了孟子的车。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怒诸侯就非常恐惧，安稳下来天下的战火就熄灭。”

孟子“止车而立”（孟子“止车而立”处，至今仍叫“直立村”），晓谕景春说：“这怎能算是大丈夫呢！住在天下这座房子里，实行天下的大道理；能实现抱负就与百姓在一起，不能实现抱负就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这晓谕景春的精辟论断，无疑是一声巨响，使张仪之流立即黯然失色，时至今日，依然令人震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流传几千年的绝唱名言，竟然发源于冠氏邑，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的共同品格，成为人生价值的道德规范。

孟子晓谕景春的故事流传至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重要地位，身为太史令的东汉文学家、科学家张衡（字平子，曾花十年心血创作《二京赋》）认为，“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获，而耻智之不博”。这和孟子的大丈夫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一年，他来到冠氏邑，为纪念孟子晓谕景春这件事，在此建有晓春亭。晓春亭遗址位于冠县县城东北5公里的张平村。后人为尊崇亚圣孟子，在晓春亭旁又建了孟子庙，成为地方官绅、儒生及百姓祭祀孟子之所。

（作者系冠县北馆陶镇民营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冠县招商局北馆陶镇分局局长，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段干木归葬冠县

□戴敬仁

提起山西介休的绵山，许多人会想到介子推，就是那个寒食节的由来的地方。其实，登上绵山之后，你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山道上有木牌竖于侧，上面写着：

此段干木当年隐居后经常会友的地方。段干木，战国时魏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却拒不做官。魏文侯登门拜之为相，他决意避而不见，逾墙逃来绵山。文侯每乘车路过绵山，都要向他伏轼致敬。

《大唐汾州抱腹寺碑》也有‘轼干木之故里’记载。

更令你想不到的是，这位战国时期的名士，其墓地就在在今冠县北馆陶镇北关北。

段干木(？——约前400年)，复姓段干，名木，战国初年魏国名士。师子夏，友田子方，为孔子再传弟子。因其三人皆出于儒门，又先后为魏文侯师，故被后人称为“河东三贤”。

一、生于乱世

春秋战国时期，今天的冠县属晋国冠氏邑。公元前602年，多沙常淤善徙的黄河穿境而过，至今尚有故道。当时，晋国国内韩、赵、魏、范、中行、智等六卿展开激烈的斗争，先是范氏和中行氏联合郑国和齐国攻伐赵氏，结果反被赵、韩、魏、智将地盘瓜分，再后来韩、赵、魏三家联合攻灭智氏，分别建立起封建政权，三家分晋，冠氏邑隶属于魏国。

春秋末期，段干木就出生在冠氏邑黄河岸边的小乡村。段干木自幼勤奋好学，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动荡混乱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坚强倔强的



性格，于是他决定离乡求学，云游四方。他沿黄河西行准备到周天子的都城。路上，连年的战争和灾荒造成的人们老幼相扶背井离乡的凄凉景象，使他更加坚定了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信念。

二、浪迹市井

为了生活，段干木一边求学，一边做起了生意。他来到安邑(今山西夏县)，作为魏国国都，这里商业空前繁荣，经商成为风气。由于连年战争，北方的马匹运不过来，他同朋友做起了马匹生意，后来干脆做起了经纪人。由于他勤于思考，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在商界大有名气。《淮南子》云：“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这时他早已是魏国有名的市侩了。

但是段干木却落下个很坏的名声。这可能是由于战国时人们看不起这种职业，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段干木浪迹市井，不免染上商人奸猾狡诈的习气。在《吕氏春秋》中，把段干木同颜涿、子石、索庐参、子张等划为一类，统称之为“刑戮死辱之人”。

三、勤奋好学

段干木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形象。经济上的富有并没有使他忘记求学，经营之余勤学儒家、道家、墨家等学说，尤对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一次，他招待家乡来的一位朋友，席间听说孔子的弟子子夏正在家乡西河(今河北馆陶西河寨)讲学，他就告别朋友，收拾起行李赶回了西河。

子夏(公元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是孔子最著名的七十二弟子之一，也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和弟子论诗经时曾夸子夏“能够阐明我学问的是卜商啊”。子夏曾对孔子表示，只愿做学问不愿做官，孔子告诫他“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段干木到了西河后，拜子夏为师，认真学习《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进步非常快。几年下来，他学识德行大有长进，精通六艺，身怀经邦纬国之才。皇甫谧说段干木“有文有行”，“怀君子之道”，遂“声驰千里”，名重一时。

四、隐居家乡

战国初期正处于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战争



频仍，社会动荡。战国七雄争霸，新兴的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大量的政治军事人才治理国家，都想尽千方百计招贤纳士，士多朝秦暮楚，奔走于王侯之门。这样的社会环境为矢志仕宦之途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展抱负的良机。如果段干木想步入仕途的话，还是大有希望的。但段干木厌倦战争，看透了官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学业完成后，他便悄悄地回到自己家乡，在黄河之滨结草为庐隐居起来。

公元前 445 年，魏文侯即位，他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好君主。魏文侯自国都安邑来到东部别都魏(今河北魏县)，专程拜访子夏，请他做丞相，子夏年纪大了，双目失明，于是推荐了段干木。魏文侯立即乘车到段干木隐居处拜访。听到这个消息，段干木从屋后跳过墙头跑了。魏文侯并没有怪他。魏文侯为了向天下表达自己招贤纳士的诚意，在别都东郊投巨资筑起了一座“礼贤台”，台上楼房瓦舍，金碧辉煌，并再次亲自乘车把段干木请到“礼贤台”拜他为师。后来，请段干木到国都安邑，魏文侯专门为他建起了公馆。每遇大事，魏文侯就到那里求教，让段干木坐在椅子上，自己站在旁边恭恭敬敬地听，就是累了也不敢休息。魏文侯以贵客的礼节对待他，每次出门经过他的门前，都要抓住车上的扶手，一副随时准备下车的样子。仆人说“你为什么这个样子？”魏文侯说：“段干木是贤人哪。他不追求权势和利益，身怀君子的品德，隐居在贫穷的小巷，却闻名千里之外，我哪能不对他恭恭敬敬啊？他以德行占先，寡人以权势占先；他富有的是道义，寡人富有的是财富；可是，权势不如德行贵重，财富不如道义高尚啊。”接着，魏文侯请他做丞相，又被拒绝了。

后来，段干木为魏文侯精诚所感动，就把自己的师兄弟李悝、吴起推荐给了魏文侯，后来李悝做了魏丞相，吴起做了魏统帅，都为魏国强盛立了大功。据《淮南子》记载，有一年，逐渐强大的秦国准备攻打魏国，司马庚对秦王说“段干木是一位著名贤者，他德高望重，主张仁义，反对战争。魏文侯以礼待他，各国都知道这件事。现在我们要起兵攻打魏国，不是有害于正义吗？”慑于段干木威名，秦王罢兵休战。此事更使段干木名气大震，四方贤士纷纷投于魏文侯幕下，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一大强国。

五、归葬故里

约公元前 400 年，段干木因病去世。按照遗嘱，魏文侯亲自扶灵柩将段干木遗体送回家乡安葬，并修碑亭纪念他。时光转换，沧海桑田。2400



多年来，朝代更迭，地方官换了几百次，墓前碑亭建了又修，修了又建，直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位于今冠县北馆陶镇戴庄村西北的段干木墓墓高 2 米多，占地 1000 多平方米，墓前有石碑，周围有古柏，但后来毁于文革时期，现夷为平地。清代诗人刘廷瓛有诗云：

负国毛州外，相传千木丘。
清风兴儒立，高节抗贤侯。
残碑一旁古，花园几树秋。
西河源不断，千载共长流。

段氏子孙以段干木为荣，沿袭千年不离家乡故土。据《馆陶县志》记载，唐朝馆陶曾因西依永济渠改名永济县，时有名儒段道超（715 年——783 年），馆陶人。祖父段仁宗，父亲段赵生，他们都学习儒业，也和其远祖一样，身怀经国之才不入仕途。道超居家简朴，遵从祖德，深居简出，不趋势禄，方圆百里，远近倾慕。当时，馆陶为毛州治所，州县的官吏经常到家礼拜访、请教，道超为他们出谋划策，把州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六十八岁那年，道超病逝于故里，亲朋好友都非常惋惜。还有元代段伯豫，做过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镇守杭州路，相传也是段干木后代，现在馆陶清阳城西还有其墓。

另据资料，段干木故里所在，众说纷纭。又有一说安邑(今山西运城安邑)，一说芮邑(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两地现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并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段干木晚年过着恬淡安逸的寓居生活，读书之余，设堂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乐之学。邑人杨玠推测上下段村的由来，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段干木曾经迁居，两处均为故址；一种可能是他读书讲学的地方，后人慕名而称为段村。安邑上下段村、芮城段村或许都是段干木晚年读书讲学的地方。

不管如何，位于冠县北馆陶镇戴庄村西北的段干木墓确实存在，为旅游计、为文化计，何时能修复段干木墓呢？



附：

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

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先秦歌谣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羈，遭难能解纷。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蝶，对珪宁肯分？

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

——晋·左思《咏史》其三

干木布衣者，守道杜衡门。

德光义且富，肯易王侯尊。

魏主钦其贤，轼庐情亦敦。

秦兵遂不举，高卧为国藩。

——唐·吴筠《高士咏》



文天祥过聊城

□吴文立

文天祥（1236—1283年）是备受世代敬仰的民族英雄，他的《过零丁洋》、《正气歌》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他被俘后押解元大都（今北京）的途中，曾路过聊城，并留下了两首诗作和动人的故事。

宋帝昺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兵溃被俘。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十三日过崖山，元将张弘范向文天祥索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天祥赋《过零丁洋》诗，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二月六日，崖山破，宋兵大溃，陆秀夫负少帝蹈海死，张世杰亦溺死，天祥哭以长诗。

四月二十二日，文天祥被押解赴大都，始发广州。

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江西大庾县），开始绝食；

经赣州、吉州，六月二日至丰城，绝食八天后复食；

经隆兴、建康，北行渡江，过真州、高邮、淮安、桃源、邳州、徐州、沛县、鱼台、潭口，过黄河，经汶阳、郓州，来到东阿所辖的张秋镇，并赋诗一首《过张秋》（又名《发东阿》）：

东原深处所，时或见人烟。

秋雨桑麻地，春风桃李天。



贪程频问堠，快马缓加鞭。
多少飞檣过，噫吁是北船。

九月十七日，夜宿高唐，在这里他还留下了“风尘未掸救幼树、古槐有灵悼恩人”的故事：

高唐地处南来北往交通要冲，高唐驿站设在北关街的东侧。来往信使、钦差、官员在此换马或暂住。

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北风劲吹，落叶满街。官道上有一队身穿元军号衣的骑兵，拖着一股黄尘由南向北疾驰而至，停在驿站门前。骑兵队前后的号衣官兵，将队中间那位须髯长蓄但不蓬头垢面、头发花白却不露衰相、面容憔悴但仍气宇轩昂，身着宋朝官袍、年约四十余岁的男子扶下马鞍。从双方的态度可见，这是长途押解，虽不戴刑具，但肯定该中年男子是元军的囚犯。这位男子即是文天祥。

文天祥下得马来，活动一下手脚，只见高唐驿站小门小户，乃是借一家临街客店改建而成。门前路边一字排开植有六棵国槐，北边的五棵因车碰马啃，枝干早成鹿角，已是生气无有的拴马桩了。南边一棵最小，身如锄柄，高不过丈，叶已落光，不知何故被连根拔起，歪在一旁，命在旦夕。

文天祥进入驿站之后，一刻未停，风尘未掸，不顾神劳身疲，趁钦差去吃饭之机，从驿站借得镢锨，在差人的跟随下来到街上，小心地将这棵国槐重新栽好，并以碎砖围起护栏，浇上井水后才回驿站吃晚饭。自命难保的文天祥，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棵小树的生命。

夜过子时，文天祥仍端坐在烛焰跳动的桌旁，注视着自己忽长忽短、摇晃不定的身影，思绪万千：大好的河山、坎坷的人生，为宋朝的败灭而愁，为失去报国的机会而忧，为国为民决心赴难……低吟几句后便索纸提笔一挥而就，写成了《夜宿高唐州》诗一首：

早发东阿县，暮宿高唐州。
哲人达机微，志士怀隐忧。
山河已历历，天地空悠悠。
孤馆一夜宿，北风吹白头。

文天祥一腔爱国鲜血化为碧玉永照千秋。他在高唐扶植的那棵国槐便成了高唐人对其思念的载体。天旱时有人浇水，春秋季有人施肥。再无人以其拴马，更无人采叶折枝，在格外的照顾中，这棵树根深叶茂地长了起来。每年的春节、清明，更有不少人特意前来守着这棵槐树站一会儿。斗



转星移，随着时间的流逝，槐树逐渐长大了，但人们对文天祥的思念却没因时空渐远而冷漠。专注的思念插上想像的翅膀，与变化的环境多次印证的结果往往出现奇迹：“古槐哭泣了”、“古槐永记救命之恩”的说法不胫而走。

原来，槐树东临两丈多深的排水沟头。此沟呈喇叭状向东扩展开来，与天齐庙湾成为一体，向西逐渐缩小进入槐树下一个高宽各两米有余的砖砌拱形涵洞。涵洞在地下穿过北关大街直连东城门外侧的护城河。这特殊的地形遇有东风或北风时，空气由无遮拦的天齐庙湾水面吹向涵洞，气流由广路进入窄口，在涵洞口便发出响声，再加上洞内回声共鸣，便成“嗡嗡哄哄”的声响；遇有南、西风向时，气流由护城河入涵洞，同样产生低闷的回声。这便是来自古槐树下的“哭泣”。

至今，文天祥当年亲手救活的古槐仍屹立于高唐官道街南首，树龄逾700多年，半枯半荣的树干，纠结盘亘的枝丫，仿佛诉说着历经的沧桑，见证着历史。

九月十八日，文天祥离开高唐继续北进，经平原、陵州（德县）到献县，过滹沱河，至河间，经保州、涿州；

十月初一日夕至燕京（元大都，现北京）。文天祥自宋帝昺祥兴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从广州北上，至是年十月一日夕到达元大都燕京，路途157天。

到达北京后，元世祖或逼或劝，或刑或诱，历时三年，文天祥始终未屈，坚不降元，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3年）农历十二月九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被杀害。临刑，他颜色不稍变，南向再拜后，从容就义，是年四十七岁。

据蔡东藩《元史演义》第二十二回：

天祥被押至柴市，态度从容，语吏卒道：“吾事毕了。”南向再拜，乃就刑，年四十七岁。忽又有诏敕传到，令停刑勿杀，事已无及。返报世祖，并呈天祥《衣带赞》，大书三十二字，分作八句：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是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世祖连读连叹，且叹息道：“好男子！好男子！可惜不肯为



我用，现已死了，奈何！”能令雄主赞惜，毕竟忠义动人。乃赠天祥大元朝“卢陵郡公”，谥“忠武”。命王积翁书神主设坛祭饌，饬李罗行奠礼。

李罗方临坛奠爵，忽然狂风大作，烛灭烟销，上面摆着的神主，好似生有两翼，陡然腾起，卷入云中。此事见诸正史，并非作者捏造。李罗大惊，乃令改书神主，写着“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数字，仓皇祭毕，天始开霁。燕京人民，相率骇异。

由上可知，文天祥死后仍不降元，其气节令天地变色，今日读之仍觉凛凛如生，令人钦佩不已。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录·扬子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文天祥一曲《正气歌》，传颂千古，正是人间正气，激扬历史，激励一代又代的仁人志士奋发进取。因文天祥在聊城留下诗篇，更增添了这位仁人义士的传奇色彩，因此，我们更有理由、有责任来纪念他、学习他。



紫柏真可与聊城隆兴寺

□吴文立

据 2010 年 12 月 8 日《聊城日报》：

12 月 7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峰海主持召开 2010 年度市规划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聊城护国隆兴寺规划方案》等。会议指出，恢复重建隆兴寺是群众的希望和要求，一定要遵循民族宗教政策进行，建筑设计要体现寺庙风格。要按照一流的规格进行恢复，建设规模和档次要高。要做好铁塔的保护，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进行处理。规划修订完成后要加快推进实施。

由此，聊城护国隆兴寺的重修再次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聊城护国隆兴寺的历史情况是怎样的？初建于何时？兴盛于何时？历史上有哪些高僧大德与此寺有联系？寺院属于禅宗还是其他门派？典籍有什么记载……

回答这些疑问，对我们重修隆兴寺是十分必要的。可惜，一直到今天，无论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是一直热心于重建工程的聊城佛教界人士，都没有做出答复。碰巧，因查阅资料，笔者将自己发现的有关资料及相关想法汇报于此，供大家参考。

有研究者在博客发文说：

聊城护国隆兴寺始建于北宋，兴于明初，为洪武帝朱元璋八大护国祝圣道场之一。据《乾隆大藏经》记载：明末四大高僧之紫柏真可禅师曾住锡于此，并为之做《隆兴寺重修募化缘起疏》。

是否如此？笔者发现，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确实撰写过《隆兴寺重修募化缘起疏》，我们不妨以此稍作分析。



一、紫柏真可介绍

紫柏真可（1543—1603年），俗姓沈，名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吴江（江苏）人，以发起并坚持刻制私版《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楞严寺版》、《方册藏》）而闻名全国。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紫柏与聊城人傅光宅、袁了凡（有《了凡四训》留世）、德清（号憨山，明末四大高僧之一）、道开（字密藏）、法本（字幻余）、陆光祖、冯梦桢、陈鑑等发愿作新刻佛教大藏经。慈圣皇太后（万历皇帝的生母李氏）获悉后表示愿全力成全，但紫柏却不愿接受，表示“宜令率土沾恩”，言明此事应让全国民众共同出资营办，普沾法益。历经多年辛苦筹备，在万历十七年创刻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以明代北藏为基本，对校明代南藏。后因山中苦寒，不便刻经工作，再加以地处偏僻，材料运送十分费事，四年后即南移至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续刻，故以《径山藏》（《明藏万历版》）称之。笔者分析，或许是在为筹刻《径山藏》过程中，紫柏大师路过东昌府，暂时停留于隆兴寺，于是应寺僧之邀，作了此文。

二、《隆兴寺重修募化缘起疏》

此文载于《紫柏尊者全集》卷之十三（收入卍《新纂续藏经》第73册No.1452），其文曰：

东昌东郭二里许，有寺曰隆兴。肇自洪武初，乃祝圣道场也。地势幽朗，高林垂阴，古塔昂霄，钟梵流响。或悲风尘而登临者，顿觉烦襟洗然，徘徊卒不忍去。良以如来说法，权实迭唱。或以香饭为阶梯，放光为舟楫，寄文字以传心，施棒喝而启悟。乃至楼台碍日，觉路铺金，通而会之，无非广长舌之波澜也。大凡人情无常，善恶从境。故以善境诱之，则善心生；恶境熏炙，则恶念起。圣人有见于此，弗吝弘慈，分身散影，应质垂躯。饰以奇特庄严，广以无边妙刹，使夫众生磕着撞着，触处善境，冥移其习，密化其恶。所谓铸顽成仁、陶痴为慧者也。或者不达此意，以浪费民财短之，是数二五而不知十也。夫行一善，则息一恶；息一恶，则省一刑。一刑省于家，十刑省于里，万刑省于国，谓之无补于治道可乎？隆兴大殿，及支官旁宇廊庑，且以年深日久，风霜虫剥，摧颓极甚。若不修整，非惟祝圣失古，即广长舌坏，说法器残，而雷音亦无闻矣！寺僧觉莲课公慨于兹，乃谋诸侍御傅居士，并一切黑白贤豪，誓续旧绪。余甚敬其识卓见殊，以故缀数语，代为十方白云。



由上文可见：

1. 紫柏大师了解到的信息是，此寺“肇自洪武初”（意思是创建于明朝朱元璋当政的初年。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寺僧这样介绍的），并非源自北宋。

2. 此寺“乃祝圣道场”，但并没确指列入朱元璋指定的八大护国祝圣道场。

3. 寺僧觉莲课公与“侍御傅居士”等商定修复隆兴寺，请紫柏大师作了此文。

4. “侍御傅居士”，当是“御史傅”傅光宅的族人，或亦有可能是“阁老傅”的先人。“阁老傅”这一名称源于清代第一名状元傅以渐，自明成化年间，傅以渐祖上占籍聊城，四世后生傅以渐。

三、《与马君侯》

此文载于《紫柏尊者全集》卷之二十四：

夫雨有天雨、人雨。不祷而雨者，天雨也；祷而雨者，人雨也。此古人成训。而人之祷天在德不在爵，又非奇术可能也，诚而已矣。大藏之中，有《请雨经》三帙，乃大觉圣人，慈悲真诚，济旱之良方也。明公既以苍生为念，诚发于中，则精彻天地，雨可必致。然须择请戒行高僧，设坛净地，依科奉行。请雨之法，必得雨以为期。隆兴寺僧能课，颇亦真诚，行著乡党，当敦请主坛。加以僧官能锡，辅弼奔走。建坛之后，再得一禅僧，夜夜放焰口斛食一筵，亦得雨为限，良以亢旱所自，必由乎所屈。屈而不伸，则抱郁而怨生，怨生则悖戾之气作，下有所感，上必应之。若不仰仗大觉慈光，实力神咒，并守土诸侯，卑躬虔祷，则屈不可伸，怨不可解，雨乌可得哉？怨有多种，难卒备言。即人情而推之，可以意悉。惟明公大虚己灵台，照野人之衷曲。凡坛中一切费用，资具项件，但凭主坛者所须。在处公所，当供养大悲云生如来圣位。至于命各州县禁屠，又皆明公指挥之下也。且禁屠大都有名无实，童蒙孺子，尚不可欺以不实，况上天之高明哉？此又当榜以哀惨告示，遍晓州邑，至紧至紧。

由此可推测：

5. 由“命各州县禁屠”一语可推知，“马君侯”当为东昌府知府或同知，姓马。查嘉庆《东昌府志》卷十五，明代东昌知府中无姓马的，而同知中有“马相，冀城人，（万历）十六年任”。《隆兴寺重修募化缘起



疏》没有注明写作时间，如马君侯确为马相，相应可推知紫柏大师来聊当在此时。

6.“隆兴寺僧能课”，可能就是《隆兴寺重修募化缘起疏》中的“寺僧觉莲课公”，即当时的隆兴寺住持。

7.当时的聊城久旱，马同知去信想请紫柏大师出面求雨。

四、《赠姚国宾》

此文载于《紫柏尊者全集》卷之二十八：

柱史归来一篋霜，其谁问疾到东昌。

汾河片影巢陵月，千里关山不尽光。

由上诗推断：

8. 大师曾“到东昌”；

9. “汾河片影巢陵月”，诗中的“巢陵”是聊城历史上的一个治所，为巢父放牧之地，这里有巢父的墓地，故称“巢陵”，旧志曾将“巢父遗牧”列为古聊城八景之一。当时大师或许曾亲到过“巢陵”，或听人讲起过“巢父遗牧”的美景。

10. 后来聊城久旱，马长官想请紫柏大师出面求雨，而紫柏大师则回信说“隆兴寺僧能课，颇亦真诚，行着乡党，当敦请主坛”，并“加以僧官能锡”。

由上述综合分析可知，紫柏大师不但住锡过（谓僧人在某地居留。锡，锡杖）隆兴寺，而且对当时的该寺住持能课法师十分赞赏，“甚敬其识卓见殊”。在聊驻足期间，大师可能游历过聊城的一些胜迹，如巢陵等地。后来，东昌府久旱无雨，因紫柏大师十分闻名，时任东昌府同知的马相专门去信给这位曾与聊城结过缘的贵客，提出想请紫柏大师主持佛教祈雨法事。或许因大师无法返聊等原因，又发现隆兴寺住持能课法师道行高绰，于是回信推荐了能课法师主持法事。

隆兴寺虽然只是停留在聊城人的回忆中，但12层铁塔（见下页图）仍存，并列入“东昌三宝”之一（“三宝”指古楼、铁塔、玉皇皋）。据文物部门考定，此塔建于北宋（可能建隆兴寺前就存在）。近几年来，各界人士呼吁重建护国隆兴寺，有些热心的佛教界人士还捐了不少钱，政府也留出了空地，但时至今日，仍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除已经锈迹斑驳的铁塔仍然独自屹立在原址，仍看不出有一丝变化。好在喜讯也是有的：早年由铁塔地宫发掘出的舍利，已按照佛教仪轨供养于聊城的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供世人礼拜。而12月7日市规划委员会会议专门审议



《聊城护国隆兴寺规划方案》，相信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外，笔者对重修隆兴寺有自己的看法。这几年，重修工作主要由民间佛教界人士担纲，工程进展几无，一些闲言也陆续传出，只是不知是否属实。市佛教协会已经筹备了几年了，至今仍没能正式成立，其原因虽不知为何，但不同说法还是有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是否可以采用政府出面，将此寺作为旅游设施招商建设，建成后由旅游、宗教、出资者等组成管委会，聘请适合的僧人入住寺中，由管委会负责全面事务，而僧人只负责与佛教活动有关的事。供奉释迦如来佛牙的汶上县宝相寺就是这样搞的，很成功。因为，一个佛教寺院的修建，不仅仅是宗教界、佛教界的事，也是社会各界的事。各界共同建设，共享文化成果，有什么不好呢？

上述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但愿对读者有些许启发。



隆兴寺铁塔



元好问在鲁西的生活与创作

□任金光

元好问（1190—1257年），金代诗人、文学家、史学家，文坛一代宗师。

公元1233年（金哀宗天兴三年）—1238年（蒙古太宗十年），元好问先后在聊城、冠氏（今冠县）居留了6年，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也成为聊城文化史上值得探究的一段往事。

当时的形势是：自蒙古民族崛起于漠北，铁骑频频南犯，金王朝不堪其扰，虽将京城南迁至汴京，亦未能避祸。自1231年起，蒙古大军在窝阔台的统帅下，开始了灭金的最后战役。汴京被长期围困，粮草断绝，升米价银2两，王孙公子多有沿街乞讨者，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1233年4月，金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开城投降，将皇室宗亲、后宫嫔妃500余人献给蒙古，后男性被杀，女性被掠往草原。当时，元好问正任左司都事（正七品），和许多官员一起成了俘虏，被押往聊城监管，开始了在鲁西六年的亡臣生活。这六年，他身陷囚拘，亲友离散，困顿屈辱。在痛定思痛的反省和思考之中，元好问的思想、情感和创作风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期间，他创作的“丧乱诗”，把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寄予吟哦，以沉郁苍凉、慷慨悲歌而成为他全部诗作中的上品。这六年，成为元好问一生最重要的阶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但是，由于岁月无情，治乱无常，战火频繁，兴衰数易，元好问在我们这方土地上的遗迹旧事已很难寻觅了。本文只能从他的诗文中去搜罗，去探寻，去考证，希望能用这些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碎片，来拼接成一幅尽量接近事实的画面。

元好流寓鲁西共分两个阶段，前后历6年。

公元1233年5月—1234年夏，在聊城，居至觉寺。



公元 1234 年夏—1238 年 8 月，在冠氏。后返山西忻州。

其间大致经历：

1233 年 4 月，金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开城投降蒙古军，汴京沦陷。元好问一家于 4 月 29 日被押送出京，北渡黄河到了聊城，囚拘在至觉寺一间长宽不到一丈的小屋里，用他的话说就是“去年住佛屋，尽室不盈丈”。

大约 1234 年夏末秋初，已经投降蒙古的冠氏地方豪强、官至左副元帅、大名府路兵马都总管、冠氏县令的赵天锡把他救到冠氏，并拨给 3 亩荒地修盖了新居。他在《学东坡移居八首》之一中写道：“废地三余亩，十年长蒿莱。瓦砾杂粪壤，白骨深苍苔。孤客无所投，即此营茅斋。”“伐木荒林中，运甓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谐”。但新屋落成后不久即失火焚毁。赵天锡旋即派儿子监工，在学宫中重建。“十寒一曝半载强，方得安床置铛釜”，这所房子就成为他在战乱之中得以安身立命、生活创作之地。

1238 年 8 月，华北局势初定，元好问思乡心切，举家返回山西秀容（今忻州市）老家。

据有关资料，当时在聊、冠期间，元好问一家共十口，大概包括以下这些人：

元好问和继配毛氏、元好问的次女元严和长子元抚（阿千）、白朴和他的姐姐、4 个仆人或丫鬟。

元好问原配夫人张氏，生有三女一子，于 1231 年病逝。续娶毛氏，临清人。

元严，元好问次女，是否在此存疑。此时，长女元真（23 岁）已嫁，三女阿秀死于围城中，年方 13 岁，据此推断元严年龄当十七八岁左右。若未嫁，当同在。元严当时以“美而文”出名。据载：有个张平章闻元严之名，前去求婚。元好问推以“听女意”。张即去见元严。元严正以纸补天花板，张问最近有何新作，元严口占一诗答道：“补天手段暂施张，不教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平章羞愧而去。元严后来出嫁，夫死，遂出家做了女道士，平生仅这首《补天花板诗》存世。

元抚，字叔仪，小名阿千，元好问四十岁时才得之，此时方 3 岁。元抚后来仕元，官至汝州知州。

白朴姐弟。白朴之父白华，和元好问为世交，时任枢密院判官。围城



时，白华奉旨出使，遂降宋，后又降蒙古。汴京破，白华夫人被蒙军掠去，白朴姐弟被元好问收留，一起到聊城。白朴此时方 8 岁，聪慧异常。元好问爱如己出，教其读书。白朴长大后不愿出仕，后成为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白、郑、马）之一，作品有杂剧《梧桐雨》等。

元好问在聊、冠期间，心情始终处于悲愤、压抑、消沉之中。这种情绪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元好问在聊、冠的几年中，目睹故国山河破碎、强敌野蛮残暴、家乡远隔千里、故旧星流云散的悲惨局面，万千感慨，发而为诗。悼亡之悲、丧乱之恨、怀旧之怨、思乡之愁，成为他创作的主题，也使他的诗风更加沉郁顿挫、慷慨悲凉。

据统计，在这一期间，元好问创作诗歌 130 余首，从内容上分大致有以下 6 类：

一、怀念故国，感慨旧事。如《甲午除夜》：“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已恨太官余麴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二、揭露蒙古兵的凶残暴虐。如以民歌曲调写成的《续小娘歌》：“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

三、抒发自己身陷囚拘、屈辱困顿的悲苦之情。如《学东坡移居八首》之四：“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识瓢饮乐。敌贫如寇雠，自信颇亦憝。儿辈饭箩空，坚阵屡为却。”

四、写景、状物。如《纪子正杏园宴集》、《济南杂诗》等；

五、送别、赠答、唱和。如《别冠氏诸人》等；

六、评诗题画。如《题温飞卿山水卷》等。

除了写诗之外，元好问在这里还写了不少的碑铭、题跋类文章。

除此之外，元好问在冠氏还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搜集资料，准备修史。元好问精通史学，久存修史之志。他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他访问金朝故老，寻访典章文献，回忆当年旧事，编成了《壬辰杂编》二卷、《南冠录》一卷，后成为元朝编纂《金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是整理编辑金朝诗集。他把金朝百余年间的 240 多位著名诗人和 36 位著名词人的作品及小传，整理编辑成《中州集》，为保存金朝文化做出



了杰出贡献。

另外，元好问还注意搜集奇闻异事，编成《续夷坚志》，其中不少来自聊城冠氏。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元好问在聊、冠期间，心上压着一块沉重的大石，那就是所谓“崔立碑事”。原委是：当时汴京被围，崔立开城投降。他以“救全城生灵”为功，令元好问等人为其撰文立碑，歌功颂德，并升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由于这一点，元好问被认为“气节有亏”，被很多人诟病，成为他终生不愈的心病。他自己辩解“苟活”是为了“修史”，但终难服众。以至于他晚年留下遗言，死后墓前只立三尺短碑，上书“诗人元好问”足矣，所有职务一概不提。

顺便说一句：现在不少介绍元好问的文章，仍称他为“左右司员外郎”，这其实是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伪职”。他的正式职务仍是“左司都事”。

说到元好问乔寓聊、冠，有一个关键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赵天锡。赵天锡，生于冠氏豪强之家。动乱之际，他和父亲、兄弟、还有他传奇人物般的姐姐起兵保家，雄霸一方。赵天锡虽是军人，但“所与游皆天下名士”。他“在军校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在乱世中，赵天锡以超人的见识保护了一大批落难文人，“人有以急难来归者，力为周恤之，脱之于奴虏，活之于屠戮者，前后不胜算。”以至于小小冠氏，“登版籍二万余户，乔寓之民，又倍而三焉。”当时，除了元好问，赵天锡救护的还有后来成为元朝开国名相之一的商挺、号称“关西夫子”的著名文人杨奂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在冠氏4年，元好问和赵天锡结下了深厚友谊。1238年秋，元好问要回故乡，和出兵的赵天锡结伴同行。元好问写道：“余与之谐，分道新乡。置酒行营中，夜参半，把烛相视，不觉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语曰：‘欲与吾子别，而情所不忍，惟有勿相忘而已。’于是疾驰而去，不反顾。呜呼！此意岂可忘哉！”然而，此别竟成永诀。赵天锡出兵，半途病还，于第二年去世。

而今，这段旧事已过去773年。先贤远矣，其流风余韵正待我们去发掘，去继承，以发扬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彰显我聊城丰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系冠县文化局原副局长，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傅光宅与戚继光

□路子强

傅光宅（1544—1601年），字伯俊，别号金沙居士，聊城九州洼（今东昌府区许营乡）人。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提督四川学政。在任政绩卓著，以耿介著称。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书摩黄庭坚，苍郁有致。戚继光（1528—1587年），字远敬，号南塘，明山东蓬莱人。嘉靖中任浙江参将，抵抗倭寇，所率部旅闻名当时，号为“戚家军”。隆庆初年，调镇蓟州，一任十六年，边境无事。后遭贬调镇广东，再贬还乡。傅光宅虽比戚继光年龄略小，但同为朝廷效力，又是山东老乡，同是耿介之士，有相惜之情。在戚继光遭贬期间，傅光宅不顾个人仕途，为戚继光上疏复任，并因此而遭罚俸处分。

万历十三年（1585年）傅光宅受召进京，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十四年冬十月，傅光宅奉命到京东经贸和军事重镇台头营——蓟镇东协台头路（今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县台营镇）巡视。早在隆庆三年（1569年），戚继光从浙江升任蓟镇总戎，之后在此16年，增设台头路，修筑城池、关隘，保证了边境安宁。此处有一株高大的松树，铁杆虬枝，苍颜古老，相传为西汉时期飞将军李广所栽。傅光宅来抬头路的时候，正值戚继光遭谗离



戚继光书“天马山”



任，他与戚继光是老朋友，戚继光在此修筑城堡、训练士兵，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却被排挤到广东。面对千年的松树，面对好友的离去，傅光宅有感而发，写了一首《题台头演武台松树》，作为对挚友的怀念：

细柳环金甲，孤高见此松。

名应留汉将，爵不受秦封。

云影来归鹤，风涛起卧龙。

清霜十月尽，苍翠照千峰。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三日，傅光宅来到台头营城东南的天马山，看到戚继光题写的“天马山”三个大字，更是睹物思人，也题写了“天马行空”四个大字。后来众将士把傅光宅的字刻到玄真观的北山石壁上，与戚继光的“天马山”相映，至今熠熠生辉。

戚继光从蓟州调任广东后，悒悒不得志，过了一年即得病，后再遭弹劾，罢职归家。三年后，傅光宅上疏请求重新起用，触怒皇上，被罚俸禄，戚继光也很快去世。



傅光宅书“天马行空”

(作者系聊城日报记者、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



杨以增与林则徐

□丁廷峰

海源阁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清朝末季，政局动荡，战乱频繁，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起北方最大的藏书楼，必有诸多因素促其成功。海源阁的产生，既是家族文化的结晶，也与当地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更与其主人自身的学识、秉性息息相关。在对杨氏藏书原因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杨以增的交游甚广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清末大臣林则徐就是与杨以增众多交往友朋中的一位。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号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县人。嘉庆进士，授编修。林则徐于从政之暇，尤喜藏书，家有“七十二峰楼”，专用于储书，积三十余楹。贬谪伊犁时，以大车七辆载书二十箧。

杨以增最早与林则徐结交时间为道光十七年（1837年），时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杨以增署安襄郧荆道员。是年四月十八日，杨以增来省见林则徐，初交订谊。时以增子绍和七岁，聪慧能诗，遂执贽为弟子。翌年，交往愈深。道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父杨兆煜卒于襄阳道署。六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已刻公祭杨太翁。六月三十日卯刻，杨以增往襄阳奔丧，林则徐与同人赴其寓中送之。¹道光二十二年七月，黄河于河南祥符决口，情况危急，军机大臣王鼎奏请被贬往伊犁途中的林则徐回河工效力赎罪，皇帝准旨。这样，时任开归陈许道员的杨以增与林则徐又一起同甘共苦堵黄



杨以增像



决口达六个月。道光二十六年三月，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十月，杨以增擢陕西布政使。时陕西大旱，林则徐年迈多病，力不从心，于是力荐杨以增署理抚篆。十月十三日，林则徐致信杨以增云：“弟九月间卧疾数日，已觉精神大减。本月初在校武外场，又复重感风寒，致仍大咳失音，至今未愈……自知如此病躯，若一冬勉强从事，断受不起。且目睹天时之旱，麦不能种，种不能生，蒿目焦心，只有添疾，而不能减。如不去官，则恐为嶰翁之续。此心已决，惟待相机而行耳。”²十月十四日，又致信以增云：“不得已曲体其请，委会兼署，现已叙折由驿具奏矣。此席首推阁下，计于月初，必可奉到恩纶，不胜欣盼之至。”³十一月十六日，林则徐在上奏皇帝《患病未痊请开缺调治折》中正式奏请由杨以增护理巡抚印务，《折》云：“奏为微臣自十月患病，至今未痊，现仍力疾办公，谨沥下清，据实具奏，请将印务责交新任藩司杨以增……该司历在湖北、河南、甘肃等省，办理诸务，臣见其诚正清勤，明敏谙练，实为臣所不能及。……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念臣患病实情，准令杨以增先在陕西护理巡抚印务，俾臣得以交卸调治，庶免误公。”⁴十二月一日，又致信以增促其早日迁居，并为其准备停当。十二月二日午刻，林则徐接到准奏谕旨，心情甚快，即日致信以增云：“陕藩一席，人人无不推袁，顷于初二午刻接奉谕旨，果如众望。可见天从人愿，欣快莫可名言……弟即先奏明，将抚篆交台端署理，以便弟调摄夙疴，不胜欣盼之至。”⁵十二月七日，林则徐又上奏皇帝《即将巡抚关防交藩司杨以增护理片》云：“臣因患病日久，于十一月内恭折奏恳圣恩，开缺调理，请将陕西巡抚印务交新任藩司杨以增护理，并声明该司未到任以前，臣仍力疾办事。近日以来，复添气喘之症，夜不能寐。正觉难以支持，兹杨以增业已行至咸阳，即可进省，拟于十二月初十日将巡抚关防委员责交该司护理……”⁶林则徐得恩准赏假调理三个月，杨以增代理巡抚诸务。在此期间，林则徐又致信以增敦促来西安办理公务，并为以增准备好住所，以增出于礼节制度，一直未到西安，但奏折则以邮递形式共同商议后两人联合署名。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皇帝谕令以林则徐为云贵总督，杨以增正式接任陕西巡抚。同年四月十四日，林则徐偕夫人、小女，自西安起程，经四川赴滇。新任陕西巡抚杨以增派戈什哈等六人，专程护送到四川成都。分别时，林则徐把自己一直佩戴的宝剑赠与杨以增作为纪念。在赴滇途中，两人通信频繁，林则徐常将行途艰苦情形告知以增，并委托以增办理一些家务和其他事情，而以增亦以则徐有病之体长途劳顿，倍加呵护，常寄资接济。两人拳拳之谊，令人



感动。

道光二十六年孟秋，杨以增著成《志学箴》，《跋》云：“……因作《志学箴》，发明疏证。盖有志未逮也，愿学非能也。质诸先生，请事斯语。”⁷《志学箴》寄与林则徐，回信言：“昨读大著《志学箴》，语简意赅，洵足提要钩元，为正学树之正鹄。而分注及后跋，犹复过自卑牧，且于鄙陋推奖逾情，读之但多愧汗耳。谨将抄本留于儿辈，想檀几上别有副墨，即不复奉缴矣。”⁸林则徐生前将自己收藏的珍贵写本《铁堂诗草》二卷赠给杨以增，高均儒《跋》是本云：“一昨侍郎又语均儒，此写本为林文忠公以贻，且述文忠之言曰：‘吾□少攻帖括，长规规于试事。比宦成，以□□之晦操管，辄欲饰古作者，夫何能及□？观斐然成章，如许先生所作仅存，尚患泯焉。’□□亦奚以为文忠是言允为天下之学而仕，仕而学者。”⁹可见，杨以增从林则徐亲聆教诲不少。

杨绍和于《〈海源阁珍存尺牍〉序》中云：“林文忠公与先君同宦楚、豫、秦、陇，投分最密。丙午（1846年），文忠抚关中，将引疾归，适先君擢藩两陕，遂举以自代。……古所谓知己者，非欤？”许乃晋云“林文忠公深契公，至举公自代”¹⁰。梅曾亮云“林文忠公可谓知人矣。其言曰：杨至堂乃圣贤门中人也。……于是益叹文忠为知人也。”¹¹两人之交，已传为后世佳话。

参考文献：

1. 见《林则徐日记》相关条目。《林则徐日记》，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林则徐致杨以增手札》第1封，《文献》，1983年7、8期。
3. 《林则徐致杨以增手札》第2封。
4. (清)林则徐：《奏折卷》，《林则徐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页84。
5. 《林则徐致杨以增手札》第5封。
6. (清)林则徐：《奏折卷》，《林则徐全集》第四册，页90。
7. (清)杨以增：《〈志学箴〉跋》，《志学箴》卷末，咸丰三年杨以增刻本。
8. 《林则徐致杨以增手札》第11封。
9. 杨氏抄录副本今藏山东图书馆，见第五章第三节抄本部分。
10. (清)许乃晋：《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墓志铭》，《耆献文征》卷下，



《聊城县志》，宣统二年文行出版社印行。

11. (清) 梅曾亮：《兵部侍郎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家传》，《柏枧山房文续集》，同治六年杨绍谷、杨绍和补刻本。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何思源与武训

□邢培华 邢 莉

民国时期，何思源领导了山东的武训研究。他亲自视察武训学校，组织大型纪念武训活动，利用武训和武训精神推动了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山东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把武训研究推向全国，形成了民国史上第一次武训研究高潮，在武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何思源（1896.7—1982.4），山东菏泽人，字仙槎，乳名金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来留学于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柏林大学与巴黎大学。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1928年至1944年，他一直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后来担任两年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在这段时间里，他为当时的山东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利用武训提高教育的地位，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就是他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与武训结下的不解之缘，对于弘扬武训精神做出的重要的努力，在鲁西乃至山东及至全国都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他把武训精神与武训研究推向全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武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

何思源对武训问题情有独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思想原因。

首先，这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及家庭有关。何思源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他的父亲何嵩山，为光绪秀才，优等廪生，为人耿直，不善逢迎，以教书、行医为生。何思源受家风影响，勤奋好学，虽历经战乱之苦，仍然好学上进，进入高级小学、菏泽普通中学读书。他考入北京大学后，又出国留学多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长期的学习生涯，改变了他和一家人的命运。在中学，受老同盟会会员、维新志士王



鸿一等的影响，他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和科学知识。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受到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影响，不仅积极参与爱国的“五四运动”，而且使得各科知识都获得了迅速的增长，精通了英语，学会了法语，通读了大量西方原版的学术著作，逐渐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在他看来，要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国民素质，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他的女儿何鲁丽曾经指出：“父亲何思源一生热爱祖国，爱护百姓”；又说：“父亲何思源尊师重教。他在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十余年中，不管省政府其他官员如何反对，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多给教育投入。他认为，教育是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的大事情，必须重视。”

其次，这是当时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自三十年代起，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历史时期。国民党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为教育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可能。尽管这些措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却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在何思源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这一时期，山东省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积极的发展，省立中学由 8 所发展到 13 所，增设了 8 个师范学校、几所初中和职业中学，还参与筹备了国立山东大学等，经过他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国立山东大学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何思源的这些行动，对于促使当时山东更加重视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从清末开始的经济衰败和长期的军阀混战以及军阀割据，导致了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因而教育更加凋敝不堪，出现的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了一大批诸如蔡元培、胡适、陶行知、傅斯年、何思源等一批比较知名的平民教育家。这一批平民教育家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当时的教育事业，不仅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更加注重兴办学校，大办平民教育事业。于是，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关注到武训兴学的典型性和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使得大规模地纪念武训与研究武训有了合法的可能。

第三，与何思源“求生”教育思想的指导有关。在这个时期，教育救国的思想在一些平民教育家和爱国人士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旧中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太落后。要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其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兴办教育，通过大办教育来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我们国家的国力。受教育救国思想



的影响，他形成和提出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求生”教育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和发展了山东的教育事业，使之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全国也成为搞得较好的一个省份。但就当时的山东省整体情况看来，山东省的教育事业仍然根本不受重视，教育经费毫无保障、经济拮据、教育经费被侵吞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存在着师资水平下降、学校数量日益减少、学龄儿童失学率逐渐上升、教学内容陈旧、教育方式落后的状况。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何思源出任了山东省教育厅长并长期负责山东省的教育工作。而利用武训、研究武训就成为他提高教育地位、促进山东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二

何思源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办好山东的教育事业，正在这时，一位友人送他一本武训兴学的书籍，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亲到鲁西了解有关武训兴学的实际情况。他体会到，扩大武训的影响，肯定会起到推进山东教育发展的作用。从此，开始了他所领导的武训纪念活动。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训纪念活动，从而使山东的武训研究和纪念活动成为全国的中心，被学术界誉为民国时期形成的第一次武训研究高潮，达到了他利用武训精神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目的。

其一，视察武训学校，支持武训学校发展。1928年，他当教育厅长后不久，就专程到鲁西，视察武训生前所办的三所小学。在柳林，他视察了武训的第一所学校——崇贤义塾，还参观了武训墓园，接见了武训的后人。在馆陶，他视察了武训所办的第二所学校——育英堂。在临清，他视察了武训所办的第三所学校——御史巷义塾，还见到了学校历年的捐款册子，那上面有过去的巡抚、侍郎、督军、省长、富绅、名流等有影响的人物亲笔签名捐款的记载，他随即提笔捐款500元，慷慨答应将武训小学改为武训中学，提议由省政府给以津贴帮助。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曾在武训小学读过书的柳林一带的老人们，还传送着当年他骑摩托车来视察并讲话的情景。不仅如此，他还参与发起1928年临清武训学校募捐活动。当年，临清武训学校募得大洋3500余元，扩大了临清的武训学校规模。1931年，他所领导的教育厅为临清武训学校增加补助费300元，以后资助临清武训小学成为山东省教育厅的惯例。他并给继武训办学之后的“武训



第二”王丕显先后颁发“热心教育”、“以德树人”匾额。1933年，由于何思源的支持，由张道平、李瑞阶先生所提议的堂邑武训中学经过蔡元培先生批准备案而创办，这个学校为抗日救国培养了一批仁人志士。

其二，大力提倡“武训精神”。何思源视察武训学校之后，遂决定印刷《武训传记》和武训画像，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散发。之后，他又利用学校、课本、报纸、杂志、社会民教及其他文化机构工具，大力宣传武训精神，宣传武训的行乞兴学。以学校和课本来论，当时在山东可以使三万数千所中小学及一百四十多万学生在短期时间内受到武训精神的教育，这样，就把一个死武训变成了许多活武训。他的这一重大举措，对于办好山东的教育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当时的山东，办教育的人处处受到歧视，省教育厅、县教育科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机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被视为无关轻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何思源利用武训精神，既可以提高教育界的地位，支持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山东的广大教育界同仁给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同时也能鼓励广大学生用功学习，成人成才。何思源在山东教育界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固然有许多因素，但也与利用武训精神提高教育地位不无关系。

其三，发起组织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大会。1934年12月5日，是武训九十七诞辰纪念日。为更好地利用武训精神来办好山东的教育事业，由他主持，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训纪念活动。为搞好这次活动，他先将《武训传》及《武训画像》翻印出来，分发全省各地、各学校，通令全省各学校，以武训生平事迹做中学教材，将武训故事列入小学课本。又令全省各民众教育机关加紧进行武训精神的宣传，预备在临清召开一个扩大的武训纪念会。同时，他又在河北房县购到一块汉白玉，请人为武训雕像。他一面用省政府名义致电蒋介石、教育部及全国各名人，征求匾额赞词及其他表扬物品，并通知鲁西北20余县的学校、教育机关，县、区、乡、镇主管及地方乡绅、名流届时参加大会。会议这天，他亲到临清，主持了大会，发表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讲话，还为武训像进行了揭幕典礼。按照传统习惯，还演了好几天义务戏，使这次会议进行得有声有色。会后，出版了大型纪念集《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他亲自为纪念册题签，还为纪念册题写了《武训先生赞》的题诗。这次会议是武训有史以来的重要会议，这本纪念册也是武训有史以来的大型资料书。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把武训推向全国的武训研究活动。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何思源征集到的大量题词。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当时国民政府



要人的题词，比如蒋介石题“武训先生传赞”，文曰“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吁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艰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林森题词“艰苦培才”。何应钦题词“教泽千秋”。邵元冲题词“兴顽立懦”。黄郛题词“崎行不朽”。王世杰题词“精神不死”。熊式辉题词“至行过人”。这些题词体现了纪念武训的合法地位，也从名义上说明了对于教育的重视。但由于他们的反动本质所决定，整个民国时期的教育始终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不重视教育的问题。但这一名义上的重视武训，却为武训研究开辟了道路。一部分是爱国将领、爱国人士的题词，比如冯玉祥题词“特立独行，百世留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学良题词“行兼孔墨”，杨虎城题词“风兴百世”，宋哲元题词“艰苦励成”，傅作义题词“高风千古”，李宗仁题词“惟精惟一，有始有终”等。爱国将领张自忠做《武训先生九十七周年纪念》一文，盛赞武训兴学“精神永存”。从他们的题词来看，有相当大的成分是从爱国、救国的角度来歌颂武训。虽然他们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题词角度也各有侧重，但他们在利用武训研究强调爱国救国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样就把学习武训、开展武训研究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了，赋予武训研究以新的内容与含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第三部分是一些教育家和进步人士的题词。他们把纪念武训、研究武训与办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教育水平结合起来，却有一番进步意义。比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题为“武训先生提醒我们”题词中说，“武先生看出文盲的需要教育，与饿丐的需要饮食一样，而普通人虽肯以余食施饿丐，却不肯以余钱助教育，这是一种近视的习惯。武先生利用这种习惯乃以饿丐为需要教育者的象征，以饿丐所得余食与余钱为教育经费的象征。”指明了武训行乞兴学是为贫寒儿童争取教育权的实质。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题词为“义闻千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题词为“懿行千古”，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星拱题词为“苦节宏愿”。陶行知先生则写了一首“兴学的乞丐”，以诗歌的形式讴歌了武训的行乞兴学。郁达夫也写了一首诗来赞颂武训兴学。他们以武训研究为契机，力图通过武训研究，提高教育的历史地位，是对教育救国道路的新探索。第四部分是一些落魄军阀的题词，比如段祺瑞题写“武训学校纪念词”，吴佩孚题写了“奇人奇事，有志竟成。歿而可祀，是乡先生”的题词。此时，他们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军事上一败涂地，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教育和武训的重视。还



有一些地方人士和武训学校师生的题词、题诗等。从这些题词的人物来看，上至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党政军各界人士，下至各有关省、市、大学的领导人，还有一些地方人士，真可以说是阵容强大，推动了全国性武训纪念活动的开展，把武训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是一次涉及党政军要人最多、亲笔题词最多、宣传最广泛、影响比较深远的一次纪念活动。假如没有这次把武训研究推向全国的九七诞辰纪念活动，武训兴学的影响是不会如此之大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次武训纪念活动的规格虽然很高，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十分准确地科学地评价武训行乞兴学的历史地位，更不可能触及武训行乞兴学的实质。尽管这样，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武训、科学地评价武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我们也应明确，蔡元培、陶行知等具有进步思想的教育家对于武训行乞兴学的评价，对于今天的武训研究确实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进步意义。

其四，筹备武训百年诞辰纪念。本来，在1934年武训九七诞辰大会时，何思源就准备在1937年武训百年诞辰时，再举行更大规模的全国性武训纪念活动，并积极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1936年11月30日，山东省成立武训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由他向全国各名人致函，函曰“敬启者：堂邑武训先生，一生行乞，积钱兴学，惠洽堂邑临清馆陶三县，其婆心宏愿，苦节卓行，洵属空前绝后。比近先生百年诞辰，高风云邈，遗泽犹存，追念乡贤，不胜钦仰，爰商承韩主席（指韩复榘——笔者注），征求贤达名流，共同发起，筹备纪念，用以彰有功而式来兹，尚荷赞同，请署台衔赐复，无任盼望，专此奉恳，顺颂勋绥。何思源拜启（印）。附武训先生传略及筹备委员会简章各一份。”简章共十条，载明武训百年纪念会由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任会长，何思源兼任副会长。筹备委员会主要任务，一是征求发起人，二是征集纪念品及募集款项，三是修葺武训祠墓及其祖茔，四是编印武训纪念册，五是办理其他足以纪念武训事项。4月26日与5月23日，他先后接受了天津《大公报》、《大中时报》记者采访，介绍了筹备工作的情况。首先，成立了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他本人为首的武训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在他主持下，于5月23日下午3时，在济南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人员主要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筹委会发起人代表何思源、济南市长任居建以及各厅局代表李树春、王向荣、张绍堂等共68人。他本人担任大会主席。在他领导主持下，报告筹备经过，研究决定了关于武训百年诞辰的许多有关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的议决案。在这次大会上，第



一，何思源宣布了 12 月 5 日准时在武训故乡柳林镇召开武训百年纪念大会。第二，何思源报告了百年诞辰纪念会筹备经过，主要有以下几项：1.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发起人，发出 293 函，已经得到答复列入发起人名单的有 281 人。2.为急于在柳林镇购地植树及修整武训祠墓，已向省政府借到国币 5000 元，并于会后委派王继仲、周拔夫前往堂邑柳林镇（今属冠县）武训墓地查勘，接洽购地一切工作，皆顺利进行，又派省教育厅稽核委员会干事杨运斗携款前往丈量已购妥土地，进行栽树及筹备开工，修整武训祠墓。这就是修武训墓、开武训河、植武训林等工作。3.报告了为扩充武训林墓购地 32 亩外，另有学田 5 亩 6 分及柳林镇捐赠 8 亩的情况。这些土地归入柳林武训学校，基本奠定了自那以后武训学校的占地面积和版图。4.报告了在柳林已经植树 1000 多株的情况，其中堂邑县捐赠杨树 270 棵、柏树 600 余棵，其他不足之数，现尚陆续购置，并在植树节派员督工栽植的情况。5.报告了武训祠墓勘修以及动工修整情况。第三，会议议决修正通过了武训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的简章。第四，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推举丁惟芬、宋哲元、张自忠、于学忠、韩复榘、沈鸿烈、何思源、孔德成、范筑先、傅斯年、孔令灿等 23 人为委员。大会在何思源的主持下，议决通过的主要决议案有：1.呈请中央党部摄制武训行乞兴学电影；2.呈请行政院在南京筹设武训中学（通过）；3.呈请行政院转请国民政府褒扬并请拨款扩充武训林墓及武训手创三小学；4.呈请教育部将武训行宜编入教材（通过）；5.征集国内各界关于武训诗文及题词（通过）；6.函请建设厅及第四、第六两区专员公署修筑武训公路，其具体地段为柳林至临清、柳林至聊城之汽车路（通过）；7.函请发起人及各界自由捐款或捐赠纪念之书信物品（通过）；8.印刷武训纪念册（通过）。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几十年之中，对于武训的历史评价经历了一个从短暂的肯定、否定到再评价的历史过程。但是，何思源利用武训精神为山东教育所做的贡献和为弘扬武训精神所做出的努力是不可磨灭的。胡乔木曾经指出，“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今天，在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时，重新回顾这些往事，把这些历史事实介绍给大家，对于推动和发展武训研究，对于利用武训精神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者邢培华系聊城大学档案馆馆长、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邢莉，系聊城大学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华魂

——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颂

□王 鲁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则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楚辞·国殇》

前 言

泰岱钟神秀，中华多英雄。代涌不间断，辈现层不穷。
抗日第一将，山东张自忠。为国为民族，壮烈而牺牲。
大仁又大义，至勇也至忠。浩气壮山河，正气贯长虹。
军人楷与模，神州光与荣。中华民族魂，国家之干城。
功勋昭日月，忠贞震寰瀛。近代岳武穆，举世皆称颂。
大陆与港台，有口皆碑铭。写书修史志，编戏拍电影。
迎入忠烈祠，修筑衣冠冢。建馆办展览，树碑表忠勇。
我遵众人意，赋此将军颂。彰其德与品，追记勋与功。
望我同胞们，努力学英雄。为国为人民，积极作献奉。

将军少年 与众不同

山东省西界，有州曰临清。卫运汇流处，水陆皆畅通。
南通杭州府，北达北京城。宋元至明清，远近都闻名。
船桅密如林，商贾似云涌。南商与北客，争相来经营。
临清西南方，三十余里程。有个唐园村，围寨如小城。



树木蔽天日，清流绕村行。老少练拳术，习武为村风。
全庄百余户，张氏为大姓。有房百十间，有地十余顷。
光绪十七年，七月七日中。张家大院里，喜添一男婴。
排行为第五，取名张自忠。荩忱为其字，宝勤是乳名。
名字虽有别，寓意却相同。望其做忠良，报国尽精忠。
父亲张树桂，表字曰冬荣。清口做巡检，廉洁而勤政。
后晋五品官，赣榆任县令。不幸早离世，寡母撑门庭。
母亲无名字，只知姓氏冯。乐善而好施，争强且好胜。
治家有方略，颇具孟母风。择师严训子，教忠读孔孟。
先读三百千，再读四五经。后到州学堂，学习新课程。
新学教法新，课程门类丰。眼界大开阔，处处觉新颖。
少年张自忠，英俊好后生。身材颀而伟，举止颇文明。
额方膀颈长，浓眉大眼睛。眼底藏智慧，眉宇透聪明。
刚毅贮肝胆，忠勇盈心灵。喜欢交友谊，爱打抱不平。
待人慷慨而慨，钱物看得轻。同情弱与残，惜老怜贫穷。
收割去看地，任拿不吱声。遇卖桃李者，整筐买个净。
分给众乡邻，不吃不高兴。在校读书时，乐助穷学生。
书籍与文具，慷慨相馈送。酷爱看三国，嗜好读精忠。
对汉霍去病，对蜀云长公。对宋岳武穆，对明戚元敬。
心驰神也往，由衷崇与敬。

忧国忧民 投笔从戎

自忠少年时，国弱民贫穷。光绪欲变法，慈禧乱干政。
水旱蝗灾连，人祸更严重。腐败清政府，疯狂刮百姓。
人民如处于，水深火热中。饿殍遍荒野，饥民似潮涌。
世界诸列强，争相来欺凌。寻衅挑事端，动辄加刀兵。
强迫订条约，条条不平等。如虎似豺狼，所为尽兽行。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洋人吓破胆，八国联军攻。
杀人又放火，侵占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社稷遭辱凌。
火在京都燃，烧在自忠胸。少年发冲冠，义愤而填膺。
国家兴与亡，匹夫责任重。发誓救中国，否则改姓名。
一九一一年，辛亥大革命。清廷被推翻，民国喜诞生。



为建新中华，求学到天津。加入同盟会，立志闹革命。山东为全国，较先独立省。复转到济南，继续学法政。大盗袁世凯，窃国做总统。独立被取消，盟人临危境。有的被杀害，有的追逃命。革命遭流产，全国人心痛。孙中山号召，二次大革命。忠和同志们，积极来响应。一九一四年，欧洲起战争。日本乘虚入，侵华成元凶。侵占胶州湾，兵临济南城。要挟袁世凯，欲夺山东省。自忠年渐长，阅历与日增。事变促人悟，一理洞然明：秀才若造反，十年难成功。中华要强大，必须有干城。宁为百夫长，不做弱书生。决心弃学业，投笔去从戎。坚拒家人劝，严辞友挽情。毅然而决然，离妻别稚童。约伴五六人，一齐闯关东。日夜奔奉天，投军去当兵。至营囊未解，即遣去劳动。军田抢收麦，劳苦难形容。双手磨起泡，腰酸腿也疼。同伴受不了，星夜返山东。唯有张自忠，终不改初衷。长官反复问，回答总坚定。见其意志坚，答应留在营。被补作副兵，正式编入棚。挑土抬煤炭，构垒挖壕坑。手脚都冻裂，两肩磨红肿。同伍众兄弟，不解自忠情。有的好心劝，有的嘲与讽：“中国有句话，老少谁不清。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我等来充军，是为填穷坑。你有福不享，跑来做苦工。丢下笔杆子，来拿拨火统。自己讨苦吃，天下大冤种。”同伍苦相劝，自忠不作声。鸿鹄翔天志，燕雀难以懂。体肤虽然苦，内心颇充盈。天将降大任，必先劳其行。

千锤百炼 身体力行

民国五年时，被荐转投冯。冯氏见自忠，颜开内心兴。名将遇良才，感情由衷生。伯乐逢骐骥，灵犀一点通。天生军人胚，难得好武星。璞玉经琢磨，必然现精英。左掌拍其肩，右拳打在胸：留下好好干，前途准光明！初派作差遣，编为另册兵。送进军官校，操练习课程。因为初来到，人疏地也生。情况不熟悉，孤身无亲朋。有人常刁难，处处挑毛病。委曲以求全，逆来顺受应。



心胸阔如海，坦荡君子风。严以律自己，宽以待弟兄。民国六年时，讨伐辫子兵。英勇而善战，赫赫立战功。时不到一年，脱颖而出。人人另眼看，个个都敬重。后入教导团，复把军事攻。勤学刻苦练，成绩列头名。品学皆优秀，标准士官生。论有高见地，演有创造性。团长鹿钟麟，对忠颇器重。称有大将才，赞有统帅风。屡教官和兵，学习张自忠。力向冯氏荐，恳请予重用。只有耕耘勤，才有收获丰。成绩和辛劳，总把正比成。吃尽苦中苦，方成兵上兵。千锤与百炼，官阶步步登。差遣升排长，旋调带学兵。先带学兵连，继带学兵营。后带学兵团，级级连续升。一九二四年，率部卫北平。丰台火东站，久踞英国兵。趾高而气扬，猖狂且骄横。野蛮逞霸道，任意欺百姓。当时为政者，普患恐洋症。对帐以屈膝，闻语而心惊。莫忧大无畏，不怕洋人凶。大智兼大勇，先礼而后兵。赶走英国佬，车站回手中。同胞齐称赞，同伍鸣炮庆。受命团长时，一再递辞呈。上峰与恳谈，勉强才答应。不觉官做大，只知担子重。耐心教学兵，精心育群英。严以教军事，更重教品行。玄典变白话，通俗而好懂。爱民诸歌曲，经常唱与咏。处处做表率，人人相崇敬。麾下多英才，弟子遍军营。一九二五年，深秋枫叶红。升任为旅长，统率几千众。五原誓师后，冯任总司令。委忠副官长，再次受重用。冯在开封府，清朝演武厅。举办军官校，校长委自忠。革命军北伐，一路节节胜。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生。国人齐声讨，自忠愤填膺。部队辗转调，军职几变更。身存报国心，治军不放松。恩威兼而用，赏罚严且明。奖励有分寸，处分有轻重。一身皆正气，两袖满清风。不贪一分钱，财物账目清。爱民如爱子，视民如弟兄。视兵如骨肉，对兵手足情。常拿己薪俸，赏赐官和兵。常将己衣物，送给部下用。有时饷拮据，函索家汇送。谁要克军饷，严惩不留情。深夜巡兵寝，关心热和冷。对待伤病员，关照倍热情。行军不骑马，让给伤与病。教兵学文化，教兵把礼明。禁酗酒嫖赌，以防坏德行。



圣日之爱护，犹如沐春风。春风绿万物，强将育精兵。

长城抗战 出奇制胜

一九三一年，烽烟起关东。九一八事变，日占东三省。
忠部时在晋，驻扎平定城。通电致全国，请缨抗倭兵：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誓雪国之耻，奋斗去牺牲。
教兵记国仇，唤兵早清醒。每日朝会上，都行问与应。
每逢国耻日，禁食一天整。教导官与兵，牢记敌罪行。
官兵铭国耻，知耻而后勇。为了灭敌寇，太行大练兵。
劈刀和刺杀，射击与投扔。对抗大演习，追撤防和攻。
从春练到夏，从夏练到冬。夏天练三伏，冬天练三冬。
盛暑正午练，赤足且负重。大地如蒸笼，暑热可烙饼。
上炙下边烫，蒺藜扎脚疼。将军头前走，官兵疼又敬。
十冬腊月天，北国大地冻。寒风如利刃，滴水成冰凌。
雪地急行军，挽腿赤足行。急行三十里，行毕作讲评。
将军伸出脚，脚板血染红。百姓满眼泪，官兵泪满盈。
功夫不负人，将士不负忠。一支劲旅出，铁军终练成。
豺狼贪无厌，魔鬼欲无境。侵占热河后，又出虎狼兵。
意欲长驱入，突破古长城。妄吞我华北，占据津与平。
长城在告急，北疆虎狼凶。华北各驻军，纷纷都请缨。
国军二十九，奉命防察省。一九三三初，开拔到长城。
忠任总指挥，驻扎三屯营。战前作动员，忠义惊苍穹。
句句透肺腑，字字如山重：人总有一死，抗日死最荣！
一九三三春，三月上旬中。日军倾巢出，猛扑我喜峰。
十万火急报，传递如流星。旅长赵登禹，奉命率部迎。
跑步三十里，抢占孩儿岭。敌军来势猛，如同虎狼凶。
攻守训有素，兵多武器精。近有机关枪，远有大炮轰。
上有飞机炸，下有坦克冲。我军装备差，卫国不惜命。
前仆后者继，愈战愈英勇。怒发冲冠起，愤眼皆圆睁。
拼命守喜峰，舍命卫长城。得而又失去，失而复占领。
血战两天多，损失逾千众。召集军官会，集思研战情。
采用新战术，以奇来制胜。组织敢死队，官兵争报名。



两侧出喜峰，轻装乘夜行。樵夫做向导，抄道走小径。
渴了抓把雪，饿了啃块饼。越过险山头，翻过摩天岭。
悄悄到敌后，神兵从天倾。日军侵华来，如入无人境。
气焰高万丈，眼睛长头顶。晚上脱衣眠，围圈做美梦。
马放大街上，枪架屋当中。骤然杀声起，天地鬼神惊。
大刀寒光闪，手榴弹轰鸣。秋风扫落叶，刀光映血影。
敌军身首离，头躯各西东。身首未离者，抱头急逃命。
纷作鸟兽散，狼豕奔西东。侥幸逃出者，又遭我伏兵。
植田支队长，逃中被毙命。歼敌两联队，毙敌几千名。
获炮几十门，坦克数十乘。轻重机关枪，高倍观测镜。
各样战利品，多得难数清。日军侵华来，首次知道疼。
退后几十里，一片嚎哭声。不唯死伤多，士气受挫重。
刮目看我军，怯战心滋生。日本人迷信，头断难转生。
做了断头鬼，永在冥府中。害怕脖颈断，夜间难入梦。
特制铁围脖，颈项绕几重。长城歼敌寇，抗战树先声。
捷报传四方，全国皆大庆。祝贺电和函，犹如雪片涌。
人人都欢呼，个个都赞颂。日军不可胜，神话成泡影。
大刀进行曲，由此而产生。妇孺皆知晓，二十九军名。
工农商学兵，都颂张自忠。

主政天津 不辱使命

碰壁古长城，倭寇始知痛。处心积虑谋，少动枪和兵。
几经密策后，塘沽搞协定。华北特殊化，立伪冀察政。
自忠率其部，受命主察省。除奸防破坏，剿匪安百姓。
把守北国门，日夜卫长城。防御紧而严，治省不放松。
日寇恨又怕，视为眼中钉。极力造谣言，用以来惑众。
诬忠与日军，暗把秋波送。扬忠和日有，君子之协定。
国人不明真，将信将疑生。函电接连至，告劝忠敛行。
谣言可不理，误解触心痛。剖心亮肝胆，公开发声明：
自忠虽不才，大义尚且懂。绝不负国家，绝不辱祖宗。
一九三六夏，势态更严重。日军在天津，偷把铁道轰。
蓄意挑事端，驱赶肖振瀛。忠率官和兵，奉命调天津。



委任为市长，受命危难中。辛丑订条约，屈辱不平等。
二十里以内，禁驻中国兵。帝国主义者，群狼入天津。
耀武扬其威，直撞和横冲。日帝尤为甚，驻兵海陆空。
北宁路沿线，驻有大批兵。西郊海觉寺，建有大兵营。
塘沽大沽口，日舰常年停。建有飞机场，日机霸领空。
堂堂天津市，成倭大本营。日特逞霸道，汉奸做帮凶。
竟在市府前，便溺撒野风。自忠主津政，日军紧紧盯。
软硬兼相施，又打又拉拢。忠与洋鬼子，斗智又斗勇。
精心理市政，潜心整市风。部队换便衣，秘密行与动。
搜捕不法徒，抛入海河中。日军提抗议，忠推不知情。
吃了哑巴亏，不敢乱逞凶。英人打车夫，发动齐罢工。
外商不纳税，扣船不放行。洋人大收敛，市民得安宁。
混乱天津市，变得平与静。日寇诡计多，一宗复一宗。
对我将与官，分化和拉拢。使用离间计，妄图拉拢宋。
一九三六春，邀宋访东京。不去得罪日，去则落骂名。
宋行脱壳术，委派张自忠。自忠接宋令，脑海直翻腾。
军人应守命，却之为不恭。去则犯众怒，招来汉奸名。
跳到黄河里，难以洗得清。身正不惧邪，曲伸皆壮行。
含垢去访日，忍辱赴东京。东渡日本后，如同履薄冰。
随机应其变，谨言而慎行。国际博览会，正在日举行。
请忠为剪彩，忠先察其情。日本设圈套，骗人进陷阱。
面对中国馆，搭设伪满棚。国名横门上，国旗悬高空。
稍一不注意，落入陷阱中。自忠愤抗议，辞严而义正：
东北中国地，称国为逆行。倘不闭满馆，立即回天津！
日闭伪满馆，阴谋化泡影。自忠访日本，国人疑窦生。
山东同乡会，寻忠问实情。忠去做讲演，意赅言简明：
此次来访日，悉奉上峰命。忠不负乡亲，忠不负山东。
忠不负中国，自忠永远忠。

临危受命 忍辱负重

一九三七夏，北平不平静。日军在宛平，兴师又动众。
连续搞演习，枪炮声不停。针对我军民，显具挑衅性。



七月七日夜，借口兵失踪。要进宛平城，调查失踪兵。
蛮求遭拒绝，炮轰宛平城。炮轰芦沟桥，炮轰我兵营。
铁军二十九，全体官和兵。奋起来抗战，全国齐响应。
将军张自忠，治病在北平。抱病回天津，动员待命令。
日与我谈判，时紧时放松。以谈作敷衍，暗中大调兵。
忠向宋建议，派员急报京。抓紧准备打，调兵北平城。
七月二十三，宋哲元下令。赵登禹率师，急行到北平。
枪炮弹上膛，日夜时警惕。七月二十八，日袭南苑营。
师长赵登禹，麟阁副军总。率部浴血战，英勇而牺牲。
宋带官和兵，撤退至保定。为与敌周旋，将忠留北平。
宋书三手令，桂冠一顶顶。忍痛接手谕，含泪送弟兄：
你们成英雄，我将落骂名。汉奸卖国贼，千古难洗清！
同仁齐安慰，掩泪告自忠：战争刚开始，盖棺才论定。
请君多留神，望兄多保重。接下三职衔，如同千山重。
想方应付敌，设法撤军兵。努力保文物，尽力护百姓。
胸存刻骨恨，表面虚承应。内心酸疼状，言语难以明。
杂志连篇载，报纸满版登。登载张卖国，报道忠逼宫。
打倒大汉奸，打倒张自忠。全国舆论界，一片唾骂声。
今日张邦昌，日人之犬鹰。咒声不绝耳，骂声遍宇中。
三十八师人，被诛落骂名。朋友断友谊，亲戚绝亲情。
家门被砸烂，庭前路被坑。公馆诸佣人，一一愤辞工。
侍卫廖保祯，暴跳难镇静：你是真老包，还是假包公？
你是真岳飞，还是假精忠？自忠非草木，自忠耳不聋。
众判亲友离，心如刀割疼。泪水腹中流，委屈荡在胸。
心中如刀绞，强自做镇静。正言语侍卫，含泪告卫兵：
中国历史上，伟哉数周公。公尚有流言，何况我自忠？
我不通梵学，但略知佛经。如来告人们，舍己求众生。
国家和民族，处在危亡中。我不入地狱，谁去最底层？
个人荣辱小，国家民族重。救民应舍身，为国当牺牲。
将骨碾成粉，放到笼里蒸。若有汉奸味，绝非张自忠！
北平二十九，悉数撤尽净。天津自忠部，猛攻日兵营。
自忠在《晨报》，公开发声明。辞去所代职，甘做老百姓。
日军大光火，怒对张自忠。公所被占领，寓所被查封。



疯狂搜与捕，特务紧跟踪。几次试出城，均未能成功。一日几迁移，只身陷孤城。先藏德医院，后移友家中。化装为司机，潜逃至天津。乘船至塘沽，转轮到山东。外界不明真，攻讦仍不停。有要撤职办，有主正典刑。精神憔而瘁，身患菌痢病。稍事休息后，奉召赴南京。忠蒙不白冤，部属皆不平。纷纷派代表，到京观动静。教授胡适之，玉祥冯先生。都向委员长，为忠去求情。负荆请责罪，自忠告蒋公：奉命守北疆，失地丢百姓。丧权又辱国，恳求予严惩。蒋公沉沉言，告慰张自忠：丢民失城事，一下难说清。责在委员长，敝人蒋中正。君在北方情，诸事我皆明。请君先休息，好好治疗病。后回五十九，重任军之总。如龙入大海，如虎归山中。

重膺军职 旗开得胜

忠回五十九，重任军之总。全体官与兵，个个热泪盈。列队迎军长，欢声如雷动。语重心意长，自忠告弟兄：国破山河在，虎狼入室中。宁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要学岳武穆，要学韩世忠。要学戚继光，要学郑成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九三七末，天寒大地冻。日本侵略军，陷我南京城。奸淫烧杀抢，野蛮大屠城。杀害我同胞，三十多万众。满城腥风飘，长江水变红。人类历史上，最惨之暴行。全国人切齿，自忠裂眦痛。召集全军会，愤慨告官兵：同胞遭此劫，敌人如此凶。眼睛不忍看，耳朵不忍听。中华五千年，岂容倭寇凌。神州健儿们，何惧三岛虫。养兵为救国，当兵为百姓。堂堂男子汉，炎黄子弟兵。倘不杀倭寇，无颜回江东！陷京侵略军，过江向北冲。妄与北路敌，南北相接应。打通津浦线，会合徐州城。侵占我华北，吞并我华中。淮河防线上，守将于学忠。率部血战敌，以寡难敌众。临淮小蚌埠，都被敌占领。淮河防敌线，危在旦夕中。忠奉上级令，驰援于学忠。心怀刻骨恨，行动急如风。到达即布阵，当夜就反攻。将军不惜死，官兵皆用命，



敌一联队长，当场被毙命。一个旅团敌，全被消灭净。
将军重上阵，奋御振长风。苦战十余日，复地收失城。
回军第一仗，旗开就得胜。淝水古战场，荣立新战功。
却敌淮河南，破敌会师梦。国人齐欢呼，军民士气兴。
援于获胜后，移师驻济宁。阻寇向南侵，抱戈待命令。

驰援临沂 荣立战功

板垣和矶谷，侵华急先锋。矶谷沿津浦，南下气势凶。
板垣沿胶济，西来如恶风。行至潍县时，转向奔沂蒙。
飞机加大炮，坦克装甲兵。如虎似豺狼，直扑临沂城。
矶板两师团，东西相呼应。拟会台儿庄，进逼徐州城。
鲁南临沂县，战略之要冲。徐海二州障，历代兵家争。
临沂城告急，千钧一发中。守将庞炳勋，请速派救兵。
长官李宗仁，决计调自忠。忠在喜峰口，抗日早出名。
英勇而善战，能守也能攻。离忠别莫属，非忠难接应。
忠庞有宿怨，恐忠不从命。劝忠去前嫌，能以大局重。
自忠告长官，字字金石声：庞氏系同胞，庞军皆弟兄。
救庞关国运，援临系百姓。用兵贵神速，请君即下令！
迅即挥兵马，日夜兼程行。辕门告诉记者，坚毅而坦诚：
军人要报国，当即去牺牲。为了国家死，就是最光荣。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何愁倭不败，岂有战不胜！
三月初十日，夜晚离峰滕。一级急行军，兵马脚步匆。
沿途老百姓，热情相迎送。争相告敌情，自动把路领。
纷纷送茶汤，食品数不清。大枣红鸡蛋，煎饼卷大葱。
一百八十里，一夜一日程。三月十一晚，抵达临沂城。
庞氏遇救星，两眼泪纵横。急欲将城防，交给张自忠。
自忠侃侃言，成竹已在胸：主动去出击，胜过待敌攻。
痛击外线敌，围魏救赵兵。出敌于不意，从速来进攻。
以攻来代守，被动变主动。利用我优势，发扬老传统。
采取近战术，夜间来行动。深夜渡沂河，左右出奇兵。
凌晨三时整，全军齐反攻。日军正做梦，一下被打懵。
鬼哭狼嚎叫，上下乱了营。死尸一片片，鬼魂返东京。



兽兵吓破胆，抱佛战兢兢。城里和城外，内外相夹攻。
防线被突破，板垣如发疯。我军气若虹，将士不惜命。
火网密如织，勇冲弹雨中。以勇来制恶，以死来求生。
沂山遍地血，沂河水变红。反复冲与杀，逐村逐巷争。
攻下茶叶山，占据五太平。我军伤与亡，高达六千名。
原来连排长，几乎全牺牲。长官李宗仁，发来暂停令。
令忠暂停火，休整和补充。忠向李长官，再三做恳请：
我惨敌更惨，我疼敌更疼。我军和敌军，都是在苦撑。
胜负决定于，最后一秒钟。谁若能坚持，谁就打得赢。
忠临最前线，指挥若早定。阵地重部署，挥剑斩长鲸。
有胆也有识，有谋也有勇。远距奔敌后，寻机摸敌营。
夜袭敌阵地，全军把金鸣。敌军狼狈逃，我军获大胜。
“二野”不复野，饭原成饭桶。步兵五千余，骑兵四百名。
板垣三联队，几乎被歼净。缴获战利品，多难数得清。
板垣玉印章，亦落我手中。残敌逃汤头，窜进莒县城。
闭门守城池，龟缩待援兵。忠部被急调，去守滕县城。
日军乘虚入，集残调援兵。疯狂来反扑，再攻临沂城。
忠率五十九，援临复转东。战争更残酷，咬牙苦相撑。
坚持五昼夜，歼敌四千名。再次战临沂，可泣更可颂。
中国杂牌军，败敌精锐兵。打得敌丧胆，打出我威风。
威名震世界，威风惊东瀛。板垣欲自杀，东条叫头疼。
矶谷西边呼，东边无人应。两军会师梦，成为一场空。
抗日将士们，信心皆大增。对台儿庄战，起了大作用。
久战虽疲劳，减员虽严重。对台庄会战，积极做策应。
阻击敌增援，牵制敌军兵。组织游击队，破坏敌交通。
临台大惨败，气煞敌司令。企图大报复，多方调集兵。
纠集十个师，围攻徐州城。妄将五战区，全军歼个净。
识破敌诡计，侦知敌行动。五月十八日，我军大撤兵。
忠部接指示，掩护殿后行。军事常识云，掩护需精兵。
临沂血战时，忠部损失重。一仗接一仗，无暇作补充。
整个五十九，只剩八千兵。将士疲且倦，张却慨然应。
过人胆与识，超人智和勇。一边阻日军，一边作收容。
孤军陷敌阵，将军仍从容。临危心不惧，遇变随机应。



有条而不紊，军容齐而整。秋毫也不犯，军纪严且明。
敌知自忠部，善战而骁勇。不追不甘心，追又怕灭顶。
大军头前走，忠在后面行。车马让伤病，官兵热泪涌。
且战且前进，安然抵永城。我军安全撤，敌人扑大空。
援临掩撤退，荣立大功。部队受嘉奖，自忠又晋升，
调到军团里，担任总司令。

转战豫鄂 功勋彪炳

日军在临沂，损将又折兵。妄图围徐州，结果扑个空。
损了武士道，震怒大本营。决心挽颜面，转向再进攻。
妄图占武汉，深入我华中。欲打速决战，速战速决胜。
武昌和汉口，水陆之要冲。平汉接粤汉，长江汉水通。
东有鄱阳湖，南面临洞庭。东南连吴会，西与巴蜀通。
九省通衢地，军工商贸盛。自从秦以来，代代兵家争。
三八年六月，盛暑炎夏中。日本侵华军，多路来围攻。
保卫大武汉，全国齐行动。开展游击战，牵制敌军兵。
部署主力军，持久战与争。重点放外围，以便争主动。
阻击敌推进，猛挫敌凶锋。消耗敌军力，粉碎敌进攻。
忠率五十九，转战从未停。坚守武胜关，奔援固始城。
激战春和铺，死守潢川城。与敌十师团，殊死相抗争。
黔驴尽其计，无奈中国兵。违犯国际法，施放毒气瓶。
冒毒惩凶顽，抵御超时空。阻敌前推进，保障我布兵。
转战卓贡献，抗日立大功。上峰委重任，职阶又晋升。
三三集团军，担任总司令。肩上担重增，械弹又不整。
为了不负国，只有靠拼命。视民为主人，根扎百姓中。
恤贫济苦难，敬老扶残病。与民同联欢，邀民看电影。
帮民修灌渠，助民搞农耕。组民搞军训，卫国御敌兵。
深受民爱戴，军民鱼水情。刻石老莱山，为忠永留影。
故事一串串，神秘相传颂：将军有宝贝，穿山透海镜。
出师有神助，可以调天兵。鄂北和鄂西，地位特别重。
左面连川陕，右边通华东。既有大山踞，又有江河通。
对于武汉市，随时可进攻。倘若沦敌手，云贵州失屏。



东西通路断，后果特严重。一九三八年，冬月中旬中。
战区李长官，发布委任令。委忠右兵团，担任总司令。
肩保鄂西北，光荣之使命。烽火映江汉，将军镇华中。
敌闻将军名，胆战心也惊。随县和枣阳，鄂西深山中。
北边有桐柏，南面有大洪。西可蔽襄樊，北为河洛屏。
三九年五月，敌军十万众。大炮二百门，战车百余乘。
进行扫荡战，妄图随枣城。进而控桐柏，再进制大洪。
司令张自忠，决然率部迎。亲临最前线，从容挥长缨。
截断敌后路，迂回敌后攻。激战五昼夜，天地鬼神惊。
击毙敌少将，联队长一名。生俘松井部，百余官和兵。
百匹洋战马，二百橡皮艇。敌呼张自忠，中国活关公。
一九三九年，冬月天气冷。忠率八个师，奉命齐出动。
十一月二十，渡到襄河东。常把司令部，设在敌射程。
房瓦被打碎，屋宇遭炮轰。谈吐如常时，神情平而静。
苏联顾问赞，英雄莫过忠。忠临最前线，将士勇倍增。
为国为民族，誓死来效命。战斗特激烈，伤亡颇严重。
大战一个月，取得全面胜。复地上百里，歼敌逾万名。
鄂北获大捷，冬攻大成功。我军统帅部，发下嘉奖令。
忠获最高奖，勋章名“宝鼎”。

荩忱不死 民族永生

一九四〇春，天气阴转晴。国际大战开，德意危机重。
自身都难保，无力顾东京。日兵多厌战，日民反战争。
补给困无力，国库早已空。以战来养战，成为泡与影。
日在各战场，到处都碰钉。速和和不了，速决决不成。
扶个汪傀儡，倒起反作用。更引人民恨，更激抗日情。
恼羞变愤怒，六路犯襄东。妄图会枣阳，合击鄂豫兵。
占领江汉地，威胁我重庆。忠之右兵团，首先当其冲。
敌攻五昼夜，死伤惨且重。恐再打下去，全军遭灭顶。
调头向北窜，欲占唐河城。将军令其部，尾追不放松。
率军渡襄河，到达河以东。忠在渡河前，修书共两封。
一致冯治安，一致诸将领。信中肺腑言，见其诚和忠。



英气充满篇，字字千钧重：观察最近势，敌欲再碰钉。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别无其他法，与弟共牺牲。
抱定此决心，抗日必获胜。只要石不烂，只要海不清。
为国为民死，半点不变更！率部追逃敌，一路斩杀众。
追至吴家河，复接上峰令。大敌朝东溃，迅即追向东。
五月十三夜，追上敌退兵。拂晓痛击敌，敌军死伤重。
俘马数十匹，文件许多种。当晚又接电，截击急西行。
抵达方家集，追上西逃兵。鏖战一整天，方集被夷平。
一天没沾饭，饥肠辘辘鸣。饥吞生豆芽，渴饮溪水腥。
重新作部署，分为左右纵。尾截侵略军，重创日本兵。
围敌南瓜店，发动猛烈攻。敌作困兽斗，拼命死扎挣。
为救司令部，回军突反攻。增炮二十门，增兵上万名。
飞机几十架，轮番连续轰。战局骤然变，部署需顺应。
五月十五夜，据情做调整。部署尚未完，四处炮声隆。
十里长山上，一片火海红。五月十六日，清晨天刚明。
我军指挥所，遭到敌炮轰。电台被炸坏，音讯无法通。
将军及总部，陷敌重围中。身边除侍卫，只有特务营。
浴血战敌寇，往返杀与冲。血战十小时，将军六创重。
裹伤亲督战，忘我奔西东。狂呼杀敌人，声如擂鼓钟。
激励众将士，杀敌荣立功。卫兵哭相劝，司令应珍重。
犹如泰山立，巍然而不动。一弹复中颅，再也难支撑。
最后一丝气，发出微弱声：对国对民族，良心得安生。
死亦可瞑目，有颜见列宗。汝等众兄弟，努力杀敌兵。
精忠报国家，完我未竟功！将军悲壮归，官兵血泪涌。
赤膊杀敌寇，拼命反冲锋。枪弹打完了，就用石头扔。
就用大刀砍，就用刺刀捅。械弹全用完，官兵尽牺牲。
同难官与兵，共计五百名。将星陨落后，天空昏蒙蒙。
日月失其光，雷霆失其鸣。泰岱失其高，金石失其贞。
噩耗传开来，举国皆悲恸。灵梓移重庆，沿途尽哭声。
一路军民祭，肃然而起敬。纵有敌机来，纵有警报鸣。
无人去回避，照祭表衷情。农家老太太，特做北方饼。
焚香慰忠魂，杀牲摆大供。军民泪痛流，长江悲涛涌。
滚滚江河水，日夜呜咽声。灵至重庆时，汽笛长时鸣。



工农商学兵，倾城出相迎。中正委员长，玉祥冯先生。
亲自到船上，拜祭将军灵。扶棺放声哭，如同失股肱。
含泪致悼词，表露至痛情。机关与团体，军人老百姓。
前来哀悼者，半年不见停。追晋为上将，特颁褒扬令。
安葬梅花山，活在万民中。延安毛朱彭，重庆蒋林冯。
知名人和士，撰文慰英灵。杂志出专刊，报纸连续登。
全国皆痛悼，极尽哀与荣。济南和徐州，天津与北平。
商丘和汉口，南漳和临清。均以张自忠，命名路校名。
湖北宜城县，改名为自忠。籍以永纪念，抗日张将领。
英雄永不朽，千秋留芳名。事迹传万代，丹心照汗青。
精神励后人，振兴慰英灵。民族魂长在，中华永昌盛。

后记

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字荩忱，1881年8月11日生于山东省临清唐园村。父张树桂，清末从政海州，由清口巡检升至赣榆县知事。母冯氏，夫人李敏慧。

张将军幼入私塾，继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后考入天津政法学堂，加入同盟会。1912年转入济南法政专门学校。他出于爱国激情，1914年投笔从戎，初投车震部，1916年转荐于冯玉祥将军，在军旅千锤百炼，坚韧不拔，自学兵叠升为师长。1933年日军犯我华北，长城告急，将军时任29军38师师长，奉命开赴长城抗战，任前线总指挥，率军痛击敌寇，出奇制胜，卓著战功，全国大震。后他主察政，长天津，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斗智斗勇，忍辱待时。“七七事变”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留守北平，与敌虚与委蛇，忍辱负重，城陷后冒险脱离虎口。

重膺军职后，先后任59军军长、27集团军军团长、33集团军上将衔总司令、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将军以“誓死杀敌，精忠报国”和“以死求生，以死求胜”的精神身先士卒，驰骋于抗日前线。首战淝水，旗开得胜；驰援临沂，荣立战功；徐州会战，遇险不惊；转战豫鄂，功勋彪炳，威震敌胆，举世称颂。

1940年5月，他率部东渡襄河，截击敌军，反复冲杀，5月16日在湖北省宜城县十里长山陷敌重围，身被七创，浴血督战，壮烈殉国，为我国八年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50余个同盟国牺



牲于前线的最高将领。他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奇功殊勋，功昭日月，气壮山河，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国之瑰宝、民族之魂。

将星陨落，举国痛悼，国共两党都给以高度评价，各界知名人士都题词撰文彰其忠勇。国民政府1940年7月7日特颁褒扬令，1942年12月31日又明令入祀全国各地忠烈祠，1946年5月又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为了广泛地宣传英雄的事迹，本文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统的“好记忆、便传颂”的诗歌形式，将英雄的光辉业绩、高风亮节记叙出来，以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学习英雄报国之志，努力振兴中华的目的。

在本文酝酿和写作过程中，山东省政协、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及张将军的部属、亲属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方便，特别是将军的女儿张廉云提供了家藏的大批珍贵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王 鲁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日于泉城

(作者为莘县人，系中共山东省纪委史志办原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史志学会会员、山东省版权学会会员，编审)

附：

《中华魂》书法长卷介绍

上世纪90年代初，王鲁先生的长诗《中华魂》问世后，社会反响热烈，文史名家吴云涛先生用毛笔写成繁体书法长卷。长卷问世后，在当地引起轰动。著名书法家、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李骏昌先生为《中华魂》题签。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女士曾给予高度评价。



武进士黑鸣凤事迹考略

□井 扬

明清时期，临清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交通重镇，四方云集，经济文化发达。来此定居的回民不但人数多，而且“文化卓然，人才蔚起，尤非他教所及”^①。回族中科举者甚多，仅进士一级便有黑鸣凤、马灿、王廷英、洪梦龄、洪毓琛、马元瑞、马兆瑞等，其下举人贡生则不胜枚举。其中，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武进士黑鸣凤便是杰出代表。他是回族中的刻书家，并著有《天方性理本经注释》一书，对汉文伊斯兰教义书籍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数月前，笔者有幸读到《山东临清黑氏宗谱》，并翻阅了《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回族人物志》等典籍，对黑鸣凤研究略有管见，今不揣浅陋撰一小文，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一、黑鸣凤生平小考

黑鸣凤事略，光绪《山东通志》、乾隆《临清直隶州志》、民国《临清县志》均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临清县志》记载如下：

黑鸣凤，字羽辉，号朝阳，康熙癸未武进士，授侍卫，赏赉频加。少孤，事母至孝。丁亥扈驾南巡，至德州，赐克食，鸣凤怀以遗母，帝嘉之，特赐克食二盘，鸣凤驰遣奉母。

至西湖行在，即除浙江省提标右营游击，历象山协副将。己丑，一念和尚聚党大嵒山，总督委宁台道迹之，被困。提督举鸣凤往剿。先领数骑上山开道。其党惧，航海逃。上其事，加军功一级。尝下海靖盗，擒贼数百，内有被劫商民，鸣凤廉得，尽释之。鸣凤娴于武，而善属文、工书法。抚诸弟成名，皆手画口



授。^②

白寿彝先生在《回族人物志》中，对黑鸣凤作了评价，并考证了其与伊斯兰教著名思想家刘智的交往等情况：

黑鸣凤、袁国祚、马大恩，是回族中的刻书家。他们对汉文伊斯兰教义书籍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黑鸣凤对伊斯兰教义信仰甚虔，尝以“吾教言性，本乎实有，归于一真。理有一定，言确可征，与佛氏之虚无，大不相同。苟有卓犖杰出之士，会通翻译，发明精义，与世共证，裨益斯道，当非浅鲜”。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春，刘智《天方性理》既成，南游至杭，鸣凤亟请相见，诵读《性理》，亟为推崇，说：“三复斯传，精言妙义，坚卓不磨。大慰予怀。”他以研读所得，附志于《性理》各篇之后，还写了序跋，分别置于全书的首尾。他把所写序跋和加有附志的本子刻了版，公开问世。这是汉文伊斯兰教义书籍有了私人刊本之始。鸣凤又为《天方性理·本经》五章作注释五卷，旨在以浅显的文字解说深奥的道理。这书甚为学者所推崇，认为其功不在刘智原书之下。他在《自序》中说：“并负笈亲聆一斋之指示，庶茅塞少开，遵从有自”。可见鸣凤的解说，是受到刘智的亲自指点的。这里所谓“一斋”，就是刘智。^③

至于其生卒年月，上述典籍及《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冯今源主编）等书均不载，或说“生卒年不详”。笔者查到的《山东临清黑氏宗谱》则载有黑氏十五世黑有光为其祖父黑鸣凤所撰的传记文，文中交代了黑鸣凤生卒年月以及武功懿行、受封、修谱、孝养、注经等事迹，颇可补正史之不足。文曰：

我祖羽辉公，讳鸣凤，号朝阳，生于康熙乙巳年四月初七日。中式庚午举，癸未进士。钦点二甲花翎侍卫。丰姿秀雅，武而能文善书。乙酉扈从热河，诏内庭作诗，大悦龙颜，赐御书诗扇一柄、青马一匹，又赏锦缎及油粉香囊牙器等物。凡内所用，赏无应日。冬月，因我祖勤劳干国，赏蟒袍狼皮褡裢各一、元宝二。丙戌因我曾祖母病，告归省视，恩赏药饵名珍十数件。丁亥随圣驾南巡至德州，赐御膳素克食数次。至浙江杭州府，钦命题匾西湖，赏彩缎四、荷包带子六、元宝四。特放宁波提标游击。己丑，一念和尚作乱大嵐山，防守千总娄被杀。制宪范委宁台道



曹探访，被困于山。提宪曰：“非黑游击不可。”我祖承命，即率精兵上山开路，逆党闻风由山后航海而逃。提总宪会，题加军功一级，升署大荆营参将。庚寅随提宪王下洋拿贼，得海船一只，内有数百人，称冤莫辨，咸云系被劫商民。我祖密稟明，尽行求细加审讯。提督即委海涯细讯，凡有账目店主伙计者，稟明尽行释放。镇海关内外，盈途焚香。洋商在定海县立有感戴不忘碑。癸巳，制宪委署象山营副将，甲午署定海镇总兵。丙申告病旋里。在任时，注《天方性理》一部。少处家庭，父早世，寻母欢心，即行常小事，必稟母前，出入必告。所获地租，籽粒俸银毫不敢私蓄。少弟二人，鸣鹏公入文庠，鸣雷公登丁酉乡榜，皆我祖口授指画之功也。我祖之高祖讳文耀，任陕郡司马，由陕带来天经三十册，桧树四百余株，栽祖莹。所藏祖谱，明末遭兵燹之变，化为灰烬。而天经在泥土灰烬之中拣出，片册未损，至今供奉。后桧以故去，又在祖莹栽柏树数百株，永作坟荫。我祖以家谱无存为憾，因遍访同族，幸在通州潞河县任武昌道我祖之叔祖讳星处，得抄谱数帙，又于冠县我祖之兄讳奎处，得宗图一卷。源源本本，对阅无讹。敬为修整以补失守之愆。嗟乎！我祖忠于事君，孝以事亲，诸事殚尽心力，积劳成疾，于康熙己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寿终，时年五十有五岁。入本州人物艺文志，家有事迹册一本。我父仁白公，累于家计，无暇录叙。临易箦时，谆谆嘱光继承其志。不亦恐再传失守，故仰思先人之德，谨叙以传信于后云。

嗣孙有光谨识

由上可知，黑鸣凤生于康熙乙巳年(1665年)四月，卒于康熙己亥年(1719年)十二月。文中还提到了黑鸣凤能文善书的轶事，如“诏内庭作诗，大悦龙颜，赐御书诗扇一柄、青马一匹，又赏锦缎及油粉香囊牙器等物”。“至浙江杭州府，钦命题匾西湖，赏彩缎四、荷包带子六、元宝四。”今故宫博物院藏有黑鸣凤纸本行书七律轴书法作品，从中或可知其书法风格。

二、黑鸣凤著述及思想浅析

黑鸣凤之著作《天方性理本经注释》，已收入由王建平先生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为咸丰八年冬月重镌、榆城马复初重刊本。该书



是对刘智《天方性理》本经的注释本，在伊斯兰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刘智（1660—1745年），字介廉，晚年自号一斋，江苏南京人，清代著名穆斯林学者。自幼从经师袁汝琦学习伊斯兰教经籍。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天官律数及佛、道典籍，深得儒学精微之旨。他立志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结庐金陵清凉山麓，闭户山居10余年，会通诸家而折中于天方，著译《天方性理本经》、《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书，是明清回回理学集大成式的学者。其著作《天方性理本经》，是最能体现刘智非凡功力的代表作。刘智在《自序》中言，该书“凡五章，首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言总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化之精义，而归竟于一真”。《本经》篇幅很短，仅1961字，却是伊斯兰文化著译的经典之作。它以儒语传天方之经义，行文规范，四字一句，对仗工整，非精通伊、儒之学问，文字功底深厚者不能为之。黑鸣凤读之叹服，为其刻版发行，并作序跋；另作注释五卷，以阐述《本经》之微言大义，此即为《天方性理本经注释》。

黑鸣凤在为《本经》作序时，讲道：“吾教言性，本乎实有，归于一真。理有一定，言确可征。”反映出其对性理学的坚定信仰。黑鸣凤还提出：“第惟性理，人所共具。性理之学，人所共言，以公言公，宜无不同。奈乎诸家，言人人殊，说物物异。纷纭聚讼，终无旨归。天方教人，理有一定，认理维真，毋庸疑猜。言有万殊，立言务确，毋庸游移。一涉疑猜，即流异学，一语游移，随起讥毁。”又讲道：“诚以吾教性理明于天方，犹未通于中土；明于通人，尚未辨于肤浅也。盖中西同此性理也，同此性理则言性理宜无不同，同则自不得歧而视之。”这反映出刘智、黑鸣凤等人已将伊斯兰哲学与儒家理学思想高度融合，顺应了其中国化、本土化的趋势，推动了回族这个移民群体对中国的适应。正是基于“中西同此性理”、“教虽不同而天人之理无不同”的认识，黑鸣凤作《天方性理本经注释》五卷，对《本经》“注解悉宗经旨，间或博摭见闻，或近参讲论，以补图说之未尽”，并“通章、挨节、按句、逐字综其大义，而解其意”，旨在达到“义实相贯，以浅语注深文、以俗情话至理”之目的。故该书语简义明。《性理本经注释》初刻版问世约与《天方性理》同时。光绪元年（1875年）广邑马思芳、马德泰重刊序称：“入道法门，必当自此书始。”光绪甲申（1884年），有马福祥、马汝邺、孙希文刊本。孙希文在序中言：“作者固难，注尤不易。爰有刘子介廉，本儒理之渊微，羽翼



五经。适得黑氏在军，即浅言之训诂，发明奥义。苟非学深根抵，道彻天人，亦胡能义析微茫，凿天心而探月，协窟观开奥妙，空千古而括数言。”马汝邺则称：“是书合印，凡究心性理之学者得之，当如浮大海者之得宝筏也。果能熟读深思，身体力行，何难诞登圣域？”他们对《天方性理本经注释》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黑鸣凤与《山东临清黑氏宗谱》

山东黑姓回族，其源在临清。天津、通州、辽宁、宁夏、陕西多处黑姓与临清黑姓均有着某些血缘亲情。《黑氏家谱》始立于何时，无明确记载。从大连海运学院研究员黑家第二十二世后人黑祖昆提供的《黑氏家谱》^④来看，该谱曾经八代孙黑鵠眷录、崇祯五年黑永禎重录。黑氏辽宁谱序(即黑鵠所眷录序)载：其“祖原名黑资哩”，“系西域一头目”，落籍山西；明朝时，“我太祖登基，吾祖仍授前职。次年大封诸王于天下，吾太祖百让去蜀护卫随驾成都。二祖百可不愿入川，亦受赐勘合收执，遂为清源之民，任其开垦……”可知黑氏族人的先祖由西域而来，任武职，后落籍山西，明太祖时有军功，兄百让去蜀，弟百可来清源（临清）为民。还表明，黑氏明代已有家谱。黑鸣凤系在明代家谱基础上，对黑氏宗谱之体例进行完善，成为清代整理、修订黑氏家谱第一人。笔者看到的《山东临清黑氏宗谱》，中有序、跋、志、传、行述等约24篇，其中主要的九篇均为黑鸣凤手笔，如《黑氏家谱序》、《黑氏家乘凡例》、《发祥记》、《墓志》、《七世祖公行述》等。特别是《黑氏家谱序》，反映出黑鸣凤对伊斯兰教的执着信仰及独特的回族谱学观。其文曰：

圣人教人归真复命者，何也？溯吾性所自出也；圣王教人孰本睦族者，何也？盖吾身所自出也。允若是，则凡遵古圣先王之教者，其于吾全事公，固尽人所当亟明者也。然溯吾性，而或囿于气禀，狃于物欲，未易明焉则止。吾自昧耳。其虚灵之体，固弥六合，亘终古自昭昭也。若溯吾身，而或尊卑失序，亲疏失等，则吾真自昧矣。且不仅自昧，而并使子孙、宗族俱昧昧矣。噫，吾既受真宰之赋畀，绍祖父之箕裘，舍灵其体，立于万物之表，其亦何忍？因吾赋性之愚，宗绪之失，竟甘诿诸空桑哉？故夙总角时，即聆先君子明训，遂惴惴于衷，惟期仰成先志为慰。然赋质颛蒙，好事铅槧；谬叨甲第，随侍禁庭。其于立身安命之



事，曾无暇及。迨今服官之余，虽忘固陋，勉注圣经，附参性学。终以圣域宏深，性功宥密，莫窥涯涘为疚。若夫宗谱较之性学宜易易焉。乃溯吾宗会时鼎革，若罹兵显，丘里为墟，高曾矩彟，悉化劫灰。今犹幸获金事六一公抄谱数帙，于蠹穿鼠啮之余，奈桉现在宗支，固类辰星硕果；及考播迁分緒，又成断梗飘蓬。抚编之下，徒叹榛苓，是吾于身性二者，毕半世之功能，仍无一得，悠悠岁月，能不更滋予戚哉！虽然，尝观士君子自命，孰不惊于高远？而优游垂暮，卒无成者，非果所造之难也，其事率阻于求全，其志多隳于姑待。困亨显晦，何地不可以潜修？衾影舟车，何时不可以覲主？而必曰功成拂衣，然后可以入道，是终无入道时也。洋洋如在，百世之音容不远；亲亲有杀，一堂之昭穆攸兮。而必曰：搜罗齐备，然后可以修谱，是终无修谱时也。故夙有鉴于此，其于圣经性理，不避固陋，即据臆见，注之参之。倘自此此后，更有见闻，再为袁正，亦毋伤也。其于家乘，不以缺略，即据残谱订之，修之。倘自此此后，再获全璧，另为增续，益所愿也。盖天下事，遇可为之事，当可为之时，即当为之，而犹虞为后，此之莫保。即如金事公之抄谱，当日非不全备，何不越数世而残阙如斯？使有志是谱者，而必欲求全姑待而后成，则此吉光片羽，又焉知不为虫臂鼠肝乎？故夙遵古圣先王之遗教，而修家乘，与注圣经，孜孜汲汲，皆为此也。后之览者，其亦鉴区区鄙忧而毋嗤阙略，购全谱而续之宝之，为万世珍，是夙所厚望也。

嗣孙鸣凤谨识

黑鸣凤认为，圣人教人归真复命，是因为人的性理都出自“真宰之必然”；同样，修家谱的作用也是明各自之所出，不忘根本，孰本睦族。无论是注经还是修谱，“遇可为之事，当可为之时，即当为之。”他还提出，世间诸事“非果所造之难也，其事率阻于求全，其志多隳于姑待。困亨显晦，何地不可以潜修？衾影舟车，何时不可以覲主？而必曰功成拂衣，然后可以入道，是终无入道时也。”此功修之观点，尤为有价值。

黑鸣凤续修家谱，是在明清鼎革之际，原家谱“悉化劫灰”的情况下进行的，其艰辛自不待言。据《黑氏家乘凡例》，其修谱是“就金事公抄谱为主，参之丕昌墓叙，因四代无考，遂暂以忠公为五代祖，草创绘图，然终以阙略为憾。迨壬辰冬，得乘入覲，顺道归省，遍为諮访，幸于亥明



兄手获宗图一纸，始知忠公上有五世，复另绘图，而木本水源，一本相承，了然如在，遂为全璧。”之后，黑氏宗谱几经修订，均以黑鸣凤续修家谱为根本。这些谱牒成为研究明清时期山东回族文化的珍贵资料。笔者从续谱中知悉，著名书画家黑伯龙先生亦是七世泰公之后，系二十世。挖掘整理黑氏家族文化，对于临清建设经济文化旅游强市将起到积极作用。

- ①民国《临清县志》“礼俗志四·宗教”，1935年刊本。
- ②民国《临清县志》“人物·显达十三”，1935年刊本。
- ③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6页。
- ④原谱由黑祖昆族兄黑延绪(现居天津)所珍藏。

参考文献：

- 光绪《山东通志》，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四年排印本。
- 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张树梅、王贵笙主编。
- 《山东临清黑氏宗谱》，由黑志伟提供。
-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王建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回族人物志》，白寿彝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王岱舆刘智评传》，孙振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伊斯兰教小辞典》，金宜久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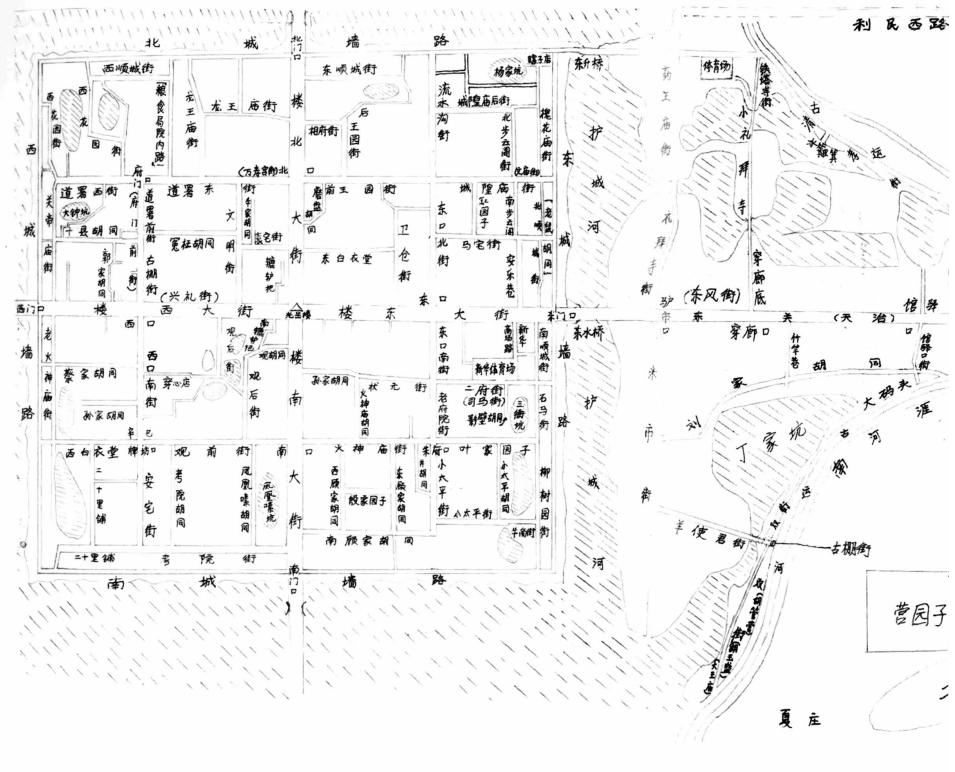
(作者系临清市新华街道办事处主任、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聊城古城



东 昌 历 史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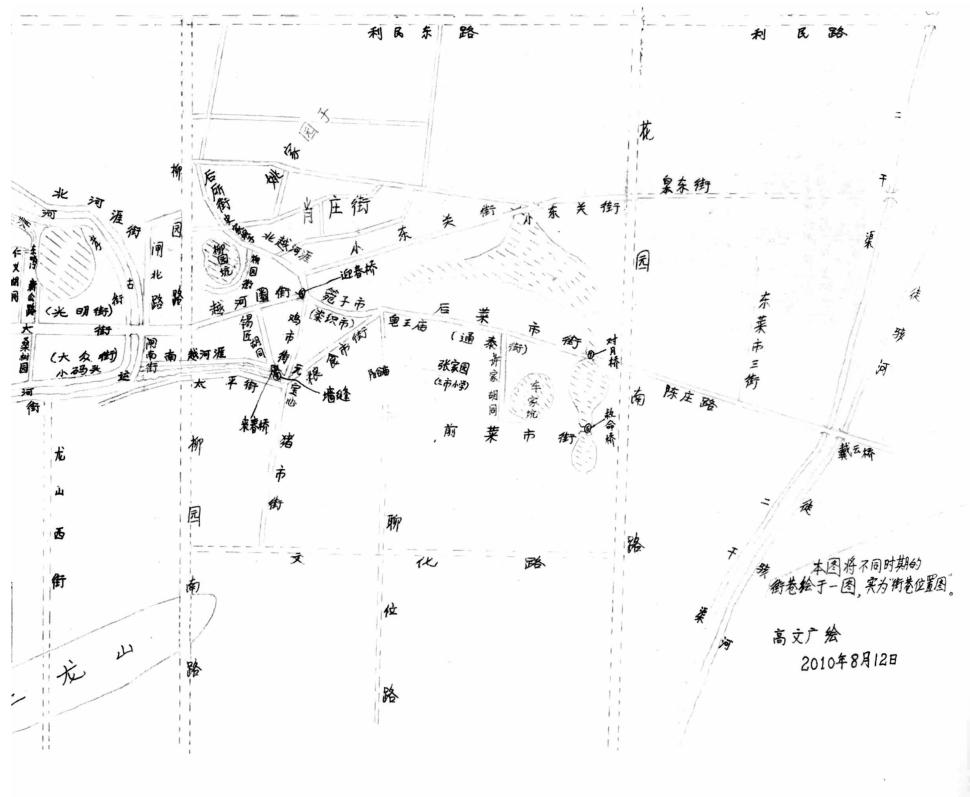




聊城
古城

街巷图

□高文广 绘



(绘者系聊城铁塔古玩文化市场书宝堂书店经理，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餐饮文化研究所所长)



光岳楼建造者——陈镛

□刘洪山 张和鹏

光岳楼，作为地方标志性建筑，作为历史文化的灵魂性载体，在聊城人心目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她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并被亲切而通俗地称作“古楼”。

然而，对于古楼的建造者，很多人并不知晓；知道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存有误解。正如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古吴顾瞻公题写的光岳楼壁碑上感叹的那样：“创造之月日，经始之姓氏，询之父老，茫然不知；阅之载记，阙焉不讲。”

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详查史料。通过这条途径可以得知，主持兴建这座楼的，是明初军事官员、平山卫指挥佥事陈镛。

明洪武五年（1372年），为加固聊城城防，由陈镛主持，将原聊城土城改建为砖城。洪武七年（1374年），为“严更漏，窥敌望远”，在他主持下，又在城中央修建了这座楼。

“平山卫”是什么机构？“指挥佥事”又是何官职？

要知晓这些，需了解明朝军队的“卫所制”。在明朝，军队的基层组织分为卫、所两级。大致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辖“千户所”，“千户所”辖“百户所”，“百户所”辖“总旗”、“小旗”。“卫”向上隶属于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又分隶于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卫”一级军事机构的官员，分指挥（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三等。

至于“平山卫”，据《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万历本《东昌府志》可知，洪武四年（1371年）置平山卫于东昌府，因“平山在府城中，平山卫以此得名”。在今天，光岳楼东路北卫仓街西侧，便是平山卫旧址。陈镛当年担任的就是这个卫的指挥佥事。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聊城县县长孙桐峰撰《重修光岳楼记》，误将陈镛称作“东昌卫指挥金事”，导致很多人至今仍在依样转述。实际上，东昌卫最早设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晚于平山卫59年，陈镛不可能是这个卫的指挥金事。

这座构筑宏伟，但开始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系用修城所余砖石木料所建，很长时间内就被称作“余木楼”。直到百余年之后，考动员外郎李贊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经过聊城，见此楼“高壮极目……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尚寘落无名称……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才与当时的东昌府太守金天锡商定，将其命名为“光岳楼”。

200多年后的万历本《东昌府志》，为陈镛作了传，称赞他“在镇十有二年，军民安堵，有古将良风”。同期职位高于他或相当于他的20多位同僚，唯他一人被列入《东昌府志·名宦志》。自明朝建立到府志成书，230多年间的三位名宦，陈镛算是其一，推想原因，当是由于他建城建楼之功。

陈镛是何方人士？怎样到任平山卫的？在平山卫12年后又去了哪里？能检索到的史料很少。查《明实录》，仅能断定的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升平山卫指挥金事陈镛为浙江都指挥金事”。再往后，陈镛怎样了呢？史料中出现的“陈镛”之名，都无法确认是他本人。浩渺沧桑的历史之海，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怀想。

再识陈镛

《东昌古楼谁人建》一文于8月21日在本报刊载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有读者还将聊城三中教师刘九龙的争议文章转给了本报。受他们的启发，我们决定对陈镛做进一步的辨识，以飨读者。

刘九龙老师的文章，价值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让我们感觉到有必要辨识一下明代史料中重名的几位“陈镛”；二是他提及的明代李廷相所撰《重修东昌府城记略》，让我们对陈镛有了更为生动的了解。

查阅《明史》和《明实录》等史籍，可以发现至少5位“陈镛”，其中有几位，容易与光岳楼建造者陈镛相混淆：

一是钱塘人陈镛，字叔振，曾任“祠祭司主事”，宣德二年参与交趾征战身亡。二是濠州（今凤阳）人陈镛，世袭临江侯，曾任“征南左副将军”。洪武二十三年因被认为与胡党通谋，爵位被除。细加辨别可以确认，



这两位都不是建光岳楼的陈镛。

至于《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提及的，洪武二十一年被赏的“指挥同知陈镛等十一人”、洪武二十六年被任命为“福建按察司副使”的陈镛，也都不能断定是建光岳楼的陈镛。此外还有一位在江苏吴江同里镇修建长庆桥者，也叫陈镛，但显然也不是建光岳楼的陈镛。

明代曾任“南京户部尚书”的李廷相曾撰《重修东昌府城记略》，称陈镛为“陈侯镛”，很容易让人误认为临江侯陈镛就是建光岳楼的陈镛。查阅史料，建光岳楼的陈镛并无爵位。那么，李廷相为什么还称其为“侯”呢？我们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敬称”。侯，本来是古代五等封爵之一，但后来，常用来称呼州郡长官，进而扩大到对一般士大夫的尊称。像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称其夫赵明诚为“赵侯德父”，就是因为赵明诚曾为莱州、淄州、建康、湖州太守。

三识陈镛

前不久，冠县读者赵长涛、陈景祥读到本报9月15日刊登的《再识陈镛》后，撰文商榷，认为《再识陈镛》一文中关于“袭封临江侯的陈镛与主持建造光岳楼者并非一人”的说法难以令他们信服。

光岳楼是聊城的象征，对主持建造者的确认，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本着尊重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态度，记者进行了更为深入地采访，被访者均依据可靠史料，认可《再识陈镛》中的观点。

主持兴建光岳楼者并非临江侯

赵、陈二位先生认为，光岳楼建造者陈镛是临江侯，主要依据有三：一是据《明史》卷一三一《列传第十九·陈德》载，“陈德，字至善，濠人……洪武三年封临江侯……子镛袭封。十六年为征南左副将军，讨平龙泉诸山寇。练兵汴梁。十九年与靖海侯吴祯城会州。二十年从冯胜征纳哈出，将至金山，与大军异道相失，败没。”二是明代官至户部尚书的李廷相，曾撰《重修东昌府城记略》，称陈镛为“陈侯镛”。三是冠县辛集乡洼陈村的《陈氏墓碑志文》。

其实，《明史·陈德列传》中关于临江侯陈镛的文字，恰恰是他并非光岳楼建造者的证据。聊城地方史研究者刘洪山先生，曾细读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他发现，《明实录》中的《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六六明确记载：“洪武十七年冬十月……升平山卫指挥佥事陈



镛为浙江都指挥佥事”。这段内容让人明白：陈镛不可能有“分身术”，明洪武年间至少有两位陈镛——袭封临江侯的陈镛，洪武十六年至二十年间，征战龙泉、汴梁、会州、纳哈出等地，直至战没；而主持兴建光岳楼的陈镛，洪武五年到任平山卫着手兴城建楼，洪武十七年升为浙江都指挥佥事。这，也正应了万历本《东昌府志》关于陈镛“在镇十有二年”的说法。在《再识陈镛》之前，本报8月21日所载《东昌古楼谁人建》，就提及建楼的陈镛洪武十七年升为浙江都指挥佥事之事，只是赵、陈二位先生未曾读到。

至于李廷相所撰《重修东昌府城记略》称建楼的陈镛为“陈侯镛”，《再识陈镛》中认为“侯”系一般士大夫尊称的判断，从李廷相原文中就能找出例证。这次重修东昌府城，主持者是知府叶天球。叶天球并无爵位，但李廷相在文中也多次称他为“叶侯”。

通读《陈氏墓碑志文》，其中找不到陈镛系临江侯的佐证。而且，光岳楼管理处主任、研究员魏聊指出，碑记中称陈镛是“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显得不可靠。因为，陈镛任指挥佥事的平山卫，设置于洪武四年（1371年），而东昌卫最早设置于宣德五年（1430年），已经是近60年以后的事情了。另外，据检索资料，在安徽省凤阳县，尚存临江侯陈德墓石刻，并确认其子陈镛“归葬先茔”，石刻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临江侯陈镛并非主持兴建光岳楼的陈镛。

以历史名人提高知名度要严肃

陈镛不仅主持兴建了光岳楼，而且还袭封侯爵。——这种提升光岳楼建造者“品级”、借以提高地方知名度的思维，是一种美好的心愿，但必须有可靠的史实，才能保证这一心愿的真正实现。采访过程中，被访者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魏聊主任说，光岳楼是聊城的象征，对于其建造者，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澄清就里，既不埋没建造者的功勋，也不附会、夸大，还其本来面目。这既是对祖先的尊重、敬重，也是每个研究者、关注者，甚至是每个聊城人都应严肃面对的课题。惟如此，才能真正优化聊城形象、远播聊城美名。

（作者刘洪山系原聊城糖酒供应站高级经济师。张和鹏，系聊城日报社网络部副主任，聊城新闻网视频总监、文艺中心主任，主任编辑。此文原载于2009年8月21日《聊城日报》）



聊城古城门门额全接触

□刘洪山 张和鹏

作为聊城古城保护与改造的一部分，启动不久的西城门、北城门复建工程，吸引了众多市民关注的目光。堪称“城门灵魂”的门额，古时候是怎样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跃入人们的脑际。

“明四门”门额

史料告诉我们：宋代聊城城墙为土质。明洪武五年（1372年），平山卫指挥佥事陈镛主持将土城改为砖城。明时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李廷相，在他撰写的《重修东昌府城记略》中，记录了这些史实以及“明四门”门额：“洪武壬子，守御指挥陈侯镛始甃以砖石，周七里有奇，崇尺三十有五，阔杀尺之十五。为门凡四：东春熙，西清远，南正德，北宣威。”

“春熙”之名，源自老子《道德经》：“熙来攘往，如登春台。”概括的是春风和煦，百姓熙攘，一派繁华的太平景象。“清远”，意为清明广远，清美幽远。“正德”语出《书经·虞书·大禹谟》中记载的禹对舜的嘱咐：“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颖达《五经义疏》对此有过解释：“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由此可知，“正德”强调的是地方官正己正人的责任和义务。“宣威”意为展示威力。较早见于南北朝时梁朝任昉的《王文宪集》序：“每荒服请罪，远夷慕义；宣威授指，实寄宏略。”意思是说：当偏远地方的人倾慕中原请罪归附，就向他们展示威力，传授大的理念和方略。明时，主要敌对势力在北方，所以将“宣威”用于北门，宣威扬武，以示威慑。

综合看“明四门”的门额可以想象，东昌古城左临运河，春风和煦，熙熙攘攘，一派繁荣；右边是一望无垠的田野、村庄，无限清明幽远。地



方官们崇尚修身正德，善政养民；凭藉城池宣威扬武，保护人民，感化敌人。这应该是对当年古城很恰切的描述。

“清四门”门额

到了后来，古城四门的门额做了改动，但后人习惯称改动门额后的城门为“清四门”。对于改动的时间，一种观点认为，是明万历至天启年间（1573—1627年）为避明武宗年号“正德”之讳所改。也有学者认为，清朝政权起源于北方，“明四门”北门的“宣威”不为其所容，清时改动较合情理。

“门四：东曰寅宾，南曰南薰，西曰纳日，北曰锁钥。”这是清宣统本《聊城县志·建置》对新门额的记载。

“南薰”语出《礼记·乐记》所引《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意思是，香馨温暖的南风，能够消解民众的愠怒。自宋时起，“南薰”就常被用作门名。据《宋史·地理志一》所载：东京“新城周迴五十里百六十五步。南三门：中曰南薰，东曰宣化，西曰安上。”“锁钥”，字义为锁、钥匙，喻指军防重地。像北京八达岭长城关城、嘉峪关关城西门的门额“北门锁钥”，均与此同义。当年的古城北门是水门，常年关闭，“锁钥”二字也符合那时的实际。东、西门的门额“寅宾”、“纳日”，出自《书经·虞书·尧典》中记叙尧禅让帝位于舜、议定百官情况时的那段文字：“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分命和仲，宅西口，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意思是，派羲仲住于东部滨海叫旸谷的地方，恭敬地迎接日出，安排耕作。派和仲住于西方叫昧谷的地方，恭敬地送别落日，指导收获。可见，“寅宾”、“纳日”用作东、西城门门额，很是妥当。

综合一下“清四门”的门额，大致含义是：迎着堪解民忧的和煦南风，背靠可保民安的坚固城池，东迎日出，西送日落，期望靠勤劳耕作换得丰硕收获。区区数言，概括出当年东昌单纯简朴的生活景象。



聊城县衙门回忆记

□于朝臣

我今年九十八岁了，虽然老而不死，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常言说：“公门里面好修行。”我过去，也就是青壮时，净吃衙门饭，闹了几十年。干这一行，里里外外，经常和打官司的打交道，如要一味昧良心坑害人，也很能发点财。要是秉公无私，不巴结有钱的，不诬陷良民，何尝不是积德行善呢？修行，不必当和尚，干衙门，处处可以积德和缺德。我倒没干别的，早些年，当了二年马快，以后就净侍候老爷（县官），也叫“长随”，俗称当“二爷”，我们术语（行话）称“秋字行”。当“二爷”都干些什么事呢？给老爷沏茶、打洗脸水，里外的杂活。有时候内宅的太太、小姐也支使你上街买东西。老爷外出，轿前轿后，紧紧跟随，挟着马扎子，提着水烟袋，这都是预备老爷随时用的。如果把我这一辈子当“二爷”的历史扯扯，那就长了，真是说不尽的辛酸，谈不完的奇闻。咱就别提那些个啦，书归正传，把我七十多年的聊城县旧县衙门情况啦一啦罢。话得说明，我自己没文化，今天谈的都是平日听师父们啦的。我记不很准，半拉磕块，有头没尾。写，我更写不了。是这么着，我念叨，叫小孙女写的，写一段念给我听，有的我还补充。小孙女叫绍海，十六了，念高中，在校里挺知道用功，语文考百分，常得老师们的夸奖。以下归正题。

民国以前，“东昌府”这个名称最响亮。那时，府的首县是聊城，府衙门就在县衙的东北，习惯地口头称为“后府”。现下的专署粮局所在地，就是当年的东昌知府衙门。清代的东昌府，下边都管哪些地方呢？在清初，县数还多，如观城、朝城、临清、武城、夏津等，都属东昌府管。以后又改变了，到最后，东昌府辖领下是一个州，高唐州；九个县，是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冠县、馆陶、恩县。聊城为附郭之首县，县官是正七品。



老县衙门的地址是在古楼西大街。这条街老名叫“兴礼街”，大概是以光岳楼西面的门洞名额“兴礼”二字而命名吧。那两个擘窠大字，字划朴拙苍劲，乍看好像小孩子写的那么既笨且愚，据说这是当初一位进士公手笔，叫什么“返童体”。县衙门从明、清一直到中华民国，并没更动。民国廿年，六区专署也设此地，扩建了不少房舍，作办公之用。现下部分房屋作了职工宿舍，又成了话剧团的下处了。据宣统二年印的《聊城县志》上说：“县治……正厅五间，后堂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大门三间，仪门三间，戒石亭一座，幕厅三间，三神祠公廨五所，东西司房各六间，吏舍一所，禁狱一所，堂西贮器皿房三间。洪武二年，县丞蒋子昭建。”你看看，堂堂县衙，房屋不到三十间，够简朴的了。

以后，县衙门重修过几次。明代天顺元年，知县毛骥重修；弘治九年尚书刘广衡重修，同年罗鸿彦又作《思补堂记》；万历十六年，知县韩子廉又添建“礼贤馆”；清代的乾隆嘉庆两朝对大堂、二堂都曾作了修缮；民国二十二年，孙桐峰也曾重修过，那时已经叫“县政府”了。

孙桐峰当聊城县长的时候，修了一次古楼，又修了修县政府，请顾绍年写的《重修聊城县政碑记》，刻石树于大堂前右侧，不知何时被毁。

清朝的县衙门里边所属的办公机构是按皇上那里的六部而命名，是六个“房”，分为兵、刑、吏、户、礼、库。这六个“房”，都有执掌公事的“师爷”，这“师爷”是秉承县官意旨、遵循法规而办理专职应办的事。如“兵房”是负责地方武备、城防、警卫及军事行动等事务；“刑房”有刑名师爷，专管代县官批阅诉讼案件，执行刑法，依律处理罪犯等事；“吏房”师爷称“稿案”，掌管拟稿，收发文件，出布告，管档案或者替县官撰写应酬文字、书画之类；“户房”是管理钱粮、财政、收支及户籍田赋等事。这房里的师爷称为“钱谷师爷”。

这些师爷们，不是上级政府委派的，是县官上任之前自己聘请来的。他们多是跟着县官同来同走。师爷也多半是浙江绍兴人，他们自成一个派系，省、府、县各级衙门的师爷多为绍兴同乡，他们掌管这些职务，应手得心，操持熟练。如果和县官相处投契，上下一气，办事就非常顺利。如果不是他们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受各方面的刁难。所以，从前当县官组织班子的时候，多利用这些人。师爷和县官为宾主关系，师爷称县官为“东翁”，县官称师爷为“老夫子”，上自省、府、州都是这样。他们也收徒弟，传授这些当师爷的本领，叫做“学幕”。

聊城县衙门里，多少年来，在这里混事的绍兴师爷，也有几位较有名



气的。大家都知道有一篇文章很漂亮的《秋水轩尺牍》吗？作者许思湄，字葭村，他就是个绍兴师爷，光绪年间，曾在聊城待过，由他荐引的朋友如单德栽、须方若等，都在聊城县衙门里当过师爷。他们在这里一混好几年，人头很熟，很发了点财。

在聊城县衙门待过多年的那位须师爷，却很有学问。他对地方上交游很广，认得的人不少，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多半熟识。他脾气挺随和，爱啦闲呱。以后，他把聊城街谈巷议的一些民间故事，一个个地穿成串儿，编了一本书，这书名叫《聊摄丛谈》。里边也跟聊斋似的，什么狐狸精变媳妇啦、长毛造反啦、杭大先生的轶事啦。他听到有趣的故事就写，别人知道了他好搜集这一套玩意，就自动地找他供给材料，书就是这样写成的。以后，由牌坊下的“文英堂”刻版出书。因为事很新鲜，挺厚的四本，连套只卖一吊钱，倒卖了不少。

还有一位师爷叫邹乐生，也是绍兴人，光绪七年，在县里混事，当一名老夫子，笔底下真有两下子，找他写呈子的白天晚上挤满坐满。他在城隍庙后一条胡同里赁了一处院，又娶了一个小太太，生活别提那个舒服啦。这位邹师爷也编了一部书，叫《想当然耳》，内容跟《聊摄丛谈》差不多，净啦些鬼啊狐啦的，人们都偏爱看。书是聚锦堂刻版印的。如今，这两部书早已绝踪了。在那时候，东昌府县两衙门的师爷，人数不少，待得年数久了也有在这里买房产落户的，也有拿出钱来做生意的，同乡们越来越多，曾创建了“武林会馆”，就是杭州、绍兴两地客商与师爷们的宴会相聚之处，地址在山陕会馆的南临。话越扯越远了，还是谈县衙门为正宗。

县的长官是“县知事”，又称“知县”。他掌一县之政令，这一县的赋役、诉讼、文教都归县官亲自办理，所以称为“亲民之官”，尊为一县的“父母官”。衙门中各“房”公事虽由师爷办理，但也有负责督导工作的官儿，是“县丞”、“主簿”，他们督管一切行政事务，职责划分各司其事，如钱、户籍、征税、巡捕、河防等事。县的属官还有“典史”、“巡检”、“驿丞”、“闸官”等。另外有“儒学”，有“教谕”、“训导”两位“学官”，执掌本县生员学习事务。

“三班”是捕班、快班、皂班。这三班的“衙役”都是县太爷的爪牙，他们专管缉盗、抓人、传案、站堂、行刑、当护从等事务。他们这些人，不能说完全没好人，但多数靠敲诈勒索为生财之道。例如，刑房专管保存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当原告呈状控诉被告后，被告人要想知道他控



告的是哪些言词，可到该房去查问，这叫“查原词”。如果不拿钱，是不给查的。查抄一份，那就不知要多少钱了。原告也是一样，递上告人的状子以后，究竟县太爷怎么批的，并不公布，必须去托人查查，这叫做“扒批”，也非钱不行。所以那时候民间传诵着一句歌谣：“八字大门朝南开，有冤无钱别进来。”只要进了县衙门，处处非钱不行，没钱别想办事。

民国成立后，县知事改为“县长”，县衙门称“县公署”，北伐后称“县政府”，过去的“三班”改称“政务警”，六房改为一、二、三、四、五科，以后以改科为局，是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以后添了县法院，县长就不管打官司的事了。

我从前虽混了多半辈子衙门，都是伺候人，低三下四，净看老爷的脸色行事，挨骂挨呵斥是常事。经过的诸多苦恼，也不可能一下子倾诉。老了，糊糊涂涂，记不清楚了，因为常爱听师爷们闲谈，记得一点儿，就说这些。至于跟着哪个官都发生过什么事，容再想想再说吧。

再补充两句。县衙门大门里，院子很大，两边有房子，是各房办事之处，正中有座大堂，是知县审理民刑诉讼的地方。公案上有签筒和惊堂木。公案和公案上的一切东西，是民间度、量、衡的标准。这些制度，全国一样，统一标准的。

(作者情况不详。该文原载于《聊城乡土资料》1986年9月号)



四大书庄之宝兴堂

□于新贵

聊城是文化古城。

到明朝中期，聊城文运大开，东林书院、阳平书院、龙湾书院、启文书院、光岳书院、摄西书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到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形成了“书院满城书满城”的文化现象。刻书和印书业也蓬勃发展，在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四大书庄的引领下，聊城出现了二十多家书庄。

如今，多少书院和书庄已成烟云散去，而由聊城书庄刻印的木板书籍，也只能偶尔在古玩市场或者图书馆、博物馆见到。不过，记者在10日上午接到市民李德光的电话，他称自己是宝兴堂书庄的后裔，手里保存着宝兴堂的遗物，并愿意将这些承载着聊城文化的遗物捐赠给博物馆。

建于清初 衰于民国

宝兴堂书庄位于古城区安乐巷，建于清朝康熙中期，占地近三亩。

据李德光说，宝兴堂由河北衡水人李太恩与其曾祖父李森昌合资兴建。整个书庄坐西朝东，为传统的“四合子房”，北跨院作为作坊、书库、纸库之用。作坊内有三十多名工人从事印书、装订工作。当时印刷的书籍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多为四书五经、医书、棋谱、画谱、小说等。仅小说就有《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西厢记》等，尤其是在清朝同治初年印制的绣像本《红楼梦》闻名国内，曾经被列进《全国书目》。

民国时期，宝兴堂逐渐衰落，1944年关闭。



当年书庄 陆续被毁掉

李德光的姐姐李淑云，今年 69 岁，在她的记忆里，解放初期的宝兴堂书庄院落保存得很完整，漆黑大门足有十几厘米厚，门前有一对威武高大的石狮。

除了这些记忆，最让李淑云难忘的是印制木版书的北跨院。北跨院的北房里有很多盛油墨的大缸，而在南房里则是满屋的木质书版和装订好的线装书籍。虽然书庄已经败落，但书版和书籍保存得很好。除了书版，在北跨院还保存着原来挂在大门上的巨大匾额，匾额上写着“宝兴堂”三个金色大字。

李淑云说，解放后，她的父亲李敬堂为了生计，不断背着那些残存下来的线装书到附近集市上销售。因为生活困难，家人不断把一些书版作为做饭的柴禾烧掉了，同时，残存的一些线装书也散落殆尽。一直保存在北跨院的宝兴堂书庄的匾额，也在文革时期被清出烧掉。

李德光说，曾祖父当年经常在运河上乘船将书籍销往苏州、杭州等地。令李德光遗憾的是，现在他手里竟然没有保存下宝兴堂印制的书籍。

书庄遗物 愿捐博物馆

李德光的父亲李敬堂在 2004 年去世时，交代给李德光几件珍藏了多年的“宝贝”。这些“宝贝”就是宝兴堂的遗物。李德光向记者展示的除了宝兴堂取钱折、宝兴堂借据，还有宝兴堂的一份契约。这三份遗物落款日期均是清朝光绪十年（1884 年），距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李德光说，他们几代人居住在宝兴堂原址，现在古城开发，这座老宅面临拆迁，所以，他想把宝兴堂书庄的遗物无偿捐赠给博物馆，应该把它陈列在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感受聊城书业文化的辉煌。

李德光还说，聊城曾经有二十多个书庄，宝兴堂是“四大书庄”之一。明清时代，聊城印制的木版线装书远销大江南北，可以说，聊城印制的书籍在明清时代促进了文化的大繁荣。但这些书庄都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李德光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能在宝兴堂原址重建宝兴堂书庄，也许对提升聊城文化品位和旅游有好处。

（作者系聊城晚报记者，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该文原载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聊城晚报》）



安氏三廉

□张和鹏 王彦华 崔巍

文武大义安跃拔

亮点：定居古城 题匾古楼

由于时光的磨灭，尽管安跃拔堪称安氏家族的第一个“亮点”，今天却只有为数不多的聊城人知道他了，但是，当你想要登临聊城的标志性建筑光岳楼，来到第一道门前，抬头望见门上匾额中依然清晰醒目、融敦厚刚劲与灵动为一体，“凤城仙阙”四个大字（见右图），进而看见其后“安跃拔题”的落款时，你会感觉到，这位在三百多年前带着一身征尘告老还乡的先辈，距离你是那样的近。据我市著名书法家崔鼓源先生考证，光岳楼二楼南侧的“宇宙文衡”匾额，其实也是安跃拔所书。崔先生分析：原匾额文革中被毁，其落款实为“安跃拔薰沐书”，后来复制时，照片中“安跃拔”三字模糊不清，“薰沐”依稀可见，“薰”与“董”字形相似，遂被误认为“董沐书”。



如果你再来到原聊城师范专科学校西侧的安宅街，想像一下这位诰授荣禄大夫的总兵官，在卸任后不只是颐养天年、修身养性，而且还修补西南城郭外道路、设立义学、周济族人，你又会领略到另一种感动。



荣耀：功勋卓著 遍施德政

光岳楼是名楼。若能留书于楼上，当属莫大荣誉。安跃拔为什么能享此殊荣？调查者们推想，这应该与其功勋卓著、遍施德政、文武双全、德高望重有关。

从安氏家谱可以知道，自其始祖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落户于今东昌府区于集镇林庙村，安跃拔已是第六世。康熙五年（1666年），安跃拔中了武举，这个普通人家出了一个能够跻身军界、政界之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安跃拔为何在辗转征战之时，又能在相关的地方施行德政。

据《康熙朝实录》、清宣统《续修聊城县志》、安氏家谱和安跃拔墓表碑记等史料记载，安跃拔因战功多次受到擢升，历任湖广督办右营游击将军、直隶保定参将、广东潮州总兵官等职，曾享有“加一级纪录四次”的重奖，官至从一品。被康熙誉为“字甲天下”的邓钟岳状元曾为他作传；刑部和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维新曾为他撰写墓志铭。其曾祖及以下，均被诰封为荣禄大夫和一品夫人，其妻也被诰赠为一品夫人。

在荣誉和升迁面前，安跃拔始终保持清醒，征战今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河北、北京、广东等地过程中，其义气和清廉多有体现：平定叛逆，他生擒敌首后，“复放归，令招徕余党，翌日果相率投诚”；安抚民变，他“止诛首恶”；桑柘、容美等少数民族首领互相侵杀，他“力解其难”；在广东，铁矿、淘沙、制盐等行业按不成文规矩应供上的“份钱”，他“一无所取”。归乡后，他定堂号为“遵训”，端正言行，“不接外事”，不扰地方。

家乡人出于崇敬，推举他为“乡饮酒礼”的大宾。在他辞世后，供奉他于“乡贤祠”。假如安公在天有灵，他也许会表露这样的心迹：民众的服膺，才是他真正的慰藉。

享誉巴蜀安洪德

引子：剑南春 青羊宫

像安跃拔一样，其长子安洪德，在如今的聊城也并非广为人知，但只要提起名酒“剑南春”，或者成都著名古迹“青羊宫”，并知道安洪德与它



们有着较深的渊源，家乡人又会禁不住肃然起敬。

查安氏家谱，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安洪德中举后，先在湖北孝感、应山担任知县。乾隆二年（1737年），他入川第一任所在地，就是出产“剑南春”的绵竹县。明末清初，战乱不断，“剑南春”备受威胁。安洪德到任这年，正值“剑南春”已恢复生产之时。

至于安洪德与“青羊宫”的关系，则能延续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这时，雅州知府安洪德已到告老还乡之年。路过成都时，当年被他力邀管理青羊宫的道教全真龙门派第十代道士张清夜，请他为青羊宫山门题写匾额（见右图）。笔力遒劲的匾额，成为青羊宫珍贵文物。

如今，斯人已去，但“剑南春”酒正香飘四方，“青羊宫”横匾仍高悬山门，尤其是安洪德在四川期间清正为官、造福地方的事迹和传说，仍让人们怀念不已。



盛誉：“千古第一官”

清廉刚正、体恤民生、惠泽百姓、重视教化等，是安洪德为官的突出特点。

到任绵竹县不久，他就改建了紫岩书院，次年兴建了诸葛双忠祠，乾隆五年（1740年）建起文昌书院。“管乐何堪比，萧曹未足侔。堂堂二表在，谟训媲伊周。”《诸葛忠武侯》，是他在绵竹期间所作的一首诗。此后，他循着贤臣明相们的足迹，走出了一条“惠政甚著”的道路。

乾隆七年（1742年），安洪德刚任绵州知州，就拆除了梓潼县七曲山的张献忠像，并树起“除毁贼像碑”。他这种雷厉之风，都被百姓融会到传说之中。据《直隶绵州志》记载，这一年龙安县发生了洪灾，安洪德前去视察，知县备下奢华酒宴，不料安洪德却坚持与二三随从在决口的堤坝



上支锅煮饭。知县疑其故作姿态，趁夜送上两万两白银。第二天却被安洪德以无名氏名义捐给灾民。“千古第一官”的美誉由此不胫而走。

清乾隆八年（1743年），安洪德调任成都府华阳县令。这期间，除修葺青羊宫外，“安顺桥”的故事又被百姓口耳相传。据说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傲视官府、欺压百姓的静居寺得到整治，安洪德用变卖的庙产、没收的赃款，重修了古桥“长虹桥”。由于顺应民心，百姓誉称此桥为“安顺桥”。

乾隆九年（1746年），流经华阳县的府河发了大水。为保证该县中兴场的安全，第三年，安洪德主持修筑了长约二里的防洪堤。百姓感其恩，称之为“安公堤”。这条堤，至今对保护华阳镇起着重要作用。

乾隆十七年（1752年），安洪德任宁远知府。在此前后，他先后修建了潜溪书院、鹤山书院、泸峰书院等，均“自出俸钱，不烦民力”，直至在雅州知府任上告老还乡。可能是相距遥远，清宣统《续修聊城县志》对安洪德的记载文字寥寥，但其中却洋溢着敬仰之情：“廉政有守，以老病归。卒之日，贫无以殓。”一位喜爱聊城地方史的先生说，当读到此处，用手摩挲着纸张上的这些文字，一时百感交集，眼泪快要下来了。

承袭祖风安庆澜

“千年无比”书法家 乃其当年“门下士”

在我国书法史上，张裕钊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对“曾门四弟子”之一、以书与文见长的这位内阁中书，康有为曾有“千年以来无与比”之誉。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裕钊参加湖北乡试时，曾得到过主考官安庆澜的大力“荐赏”，得以中举。时光流转，三十六年后，当安庆澜曾任知县的谷城父老怀念父母官，“请为墓刻之辞”时，找到的人恰好是张裕钊。张裕钊对自己“故君丙午分校所取门下士也”印象深刻，怀着崇敬之情撰写了《天门县知县安府君墓表》。

至诚为民竭精虑 深入人心留缅忆

安庆澜原名安锡龄，生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少读书攻苦自



励”，年龄稍大，就求学于师长，学业更有长进。二十岁考取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年）“举于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成进士”，次年代理湖北谷城知县，数月后获正式任命。

谷城地处偏僻，嘉庆年间受“教匪”骚扰，失于教化，盗风颇盛。当地求学的青年，一百余年来榜上无名。安庆澜到任后，“严察狱吏，以至诚喻其民”，从加强乡村治安入手，加强民防，盗匪一时销声匿迹。对监狱刑罚，他严加规范，不倡酷刑。稍有空闲的时候，就轻车简从，遍访穷乡僻壤，体察百姓疾苦。

为移风易俗，他在谷城建起了“节孝祠”，主持编纂了倡导风化的《通俗浅语》，教化民众。他大力发展和扶持教育，常把自己的俸禄、津贴捐给学校，招募当地有文采的青年到校学习。他自己也每月到学校督学，并亲自授课，指导学生学习，授业解惑，教以方法。同时，还筹集钱款“数千金”，设立基金，用利息资助当地应举之士。这些举措，吸引了众多学子，使当地人才辈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谷城学子黄定镛、周天衢相继中举，而此时安庆澜则担任乡试“分校官”，这种巧合，在谷城一时传为佳话。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在官吏考核中列居上等，调任孝感代理知县。当他离开谷城之时，有人赠送财物为他送行，他都婉加辞谢。无奈之下，谷城人士为他立下“德政碑”，纪念他的恩泽。离任之日，谷城人在路边、河岸吟唱诗歌为他饯行，场面催人泪下。后来，还有人以绘画形式反映他的政事，取琴鹤、帆影入画，以表现安庆澜的清雅、廉洁、高远。这就是传于楚地的《琴鹤帆影图》。

刚到孝感，他又“调补天门县”。此时恰逢孝感连年水灾，安庆澜没有赴任。他殚精竭虑，救灾扶困，终日劳碌，以致积劳成疾。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他到任孝感刚满一年之际，病逝任上。“孝感、谷城之民悲哀感涕”，像失去了最亲近的人。

安庆澜为人坚持操守、正直高洁、注重内在品德的修炼。“居官以廉俭自将，身歿之日，囊橐萧然”。因此，在他辞世后，尽管时光过去三十多年，谷城百姓仍称颂感怀、惦念不已。光绪八年（1882年），谷城人委托德高望重者为代表，经当地巡抚奏报朝廷，呈请将安庆澜作为清正为官之人，列入聊城县乡贤祠崇祀。



聊城古城居民生活觅踪

□刘洪山 高文广 张和鹏 李 惠

金城汤池成胜景——安全篇

如果把古城比喻成宝库，当你充满敬畏地打开她时，会发现其中璀璨夺目、可圈可点之处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目光首先触及的，就是古城的防御与安全——自宋淳化三年（992年）聊城迁于现址后，近千年时光流转之间，古城人如何获得安全？如何保证生存？如何御敌、防害、抗灾？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心血和智慧又闪耀出了怎样的光芒？

这些问题，很自然地吸引我们去最先关注聊城古城的城防。

“作为一处军事要地，聊城古城的突出优势，就是易守难攻。”2月19日，在聊城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文博研究员陈昆麟坐在他办公室的典籍堆中，这样告诉记者。

在陈先生的侃侃而谈中，聊城古城内城外郭、武备充分、四面环水的具体特点，一一生动地浮现出来：

古城城墙，在宋代是土城，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筑为砖城。在古城城墙之外，还有土筑的郭（外城）。城与郭相辅相成，既可御敌，又能防水。古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都在城门外口加筑了瓮城，既可防止敌人直接冲入，又便于围歼来犯之敌。城墙还筑有马面敌楼，用于观察敌情、夹击攻城之敌。城墙之外，还附有水门、吊桥等防御性设施。在内城与外郭之间，是环绕古城四周的护城河。

由于古城固若金汤，所以针对古城的战争罕见强攻。远的，像战国时（公元前249年）的“鲁仲连射书退燕兵”，就是采用了“攻心术”。当时的聊城古城虽不在今址，但城建格局十分相似。对此，《水经注》中有着专门的记载：“漯水又北，经聊城县故城西。城内有金城，周匝有水，南



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近的，在解放聊城时，也采取了“围而不打”的部署，以避免伤亡。

“作为聊城标志性建筑的光岳楼，本身就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更鼓楼。它占据制高点，能‘远眺料敌于严更漏’，具有较强的军事功能。”据陈昆麟介绍，光岳楼在防雷方面也堪称典范。由于这座楼主楼为全木结构，四面斗拱飞檐遮蔽风雨，便于绝缘，所以能有效避免雷电袭击。

话题转到防御自然灾害上，陈昆麟先生认为，作为城市，旱灾、蝗灾等农业灾害对它的影响比较间接，城市自然灾害的防范重点是水灾、雨灾。他介绍说，除了前面提及的城、郭并防，抵御水灾外，聊城古城墙的四角内，均开挖有面积不小的蓄水池，用于暴雨时排涝。

近千年间，为防御自然灾害，官民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不懈努力。记者查阅志书了解到，明和清，先后设闸官、管河专员，“添建堤坝、闸座，劈画精详”，在保证河道畅通的同时，也在古城外圈防御古城水患。在清代，还设立了官办的养济院，出现了民办的普济堂，收容孤贫老病无依者。

时代发展到今天，往昔的防御设施，都褪了浓浓的火药味，成为颇具文物价值或观光价值的胜境：光岳楼成为聊城人引以为荣的标志性建筑，是聊城观光客的必到之处；护城河变迁而来的东昌湖，更成为当今“江北水城”开发最根本的基础，以其浩渺广阔、清澈灵动、勃勃生机吸引着人们。沧海桑田，前人当年在防御方面付出的劳动和智慧，正在这样裨益着今人，泽被后世。

【背景资料】文献可考的4处聊城古城

聊古庙 最早的聊城城址，位于今城西北7.5公里处，西新河西岸。

王城 位于今城东徐田庄南。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迁此。

巢陵城 位于今城东南7.5公里大石槽村西。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迁此。

今城 名为“孝武渡西城”，宋淳化三年（992年）迁此至今。

曾济苍生有岐黄——医疗篇

8月5日下午四点左右，聊城市区落了一场雨，但这并没有阻止病人的脚步。

来到聊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学博士谷万里值班的诊室时，



他去参加院内会诊了，十几分钟就等了几位病号。回来后，病人还是络绎不绝，其中包括一些他的同事。“聊城医疗是有渊源的，像《伤寒论》第一注家成无己，就是聊城茌平人。据说他还曾在聊城行医。”谈起古城医事，谷万里首先提到了成无己。去年，在他的促动和茌平县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聊城市中医药学会在洪官屯乡成庄树起了“成无己故里”碑，并着手筹建成无己展览室。

就像中医科病号渐多、成无己被重新重视一样，近年，博深沉静的中国传统医学，在经历了一个断层之后，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谷万里说，虽然这个断层为期不短，但古老中医的血脉，终究还是以坚强的生命力延伸至今并焕发出勃勃生机。

当年古城的医疗，基本就是被称为“岐黄之术”的中医。“历史久、规模大、名医多”，是采访和查阅史料后，古城医疗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

宋金时期的成无己，是聊城医疗活动起源较早、起点较高的一个代表。《注解伤寒论》十卷、《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奠定了他在中华医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在医药机构方面，明代即开设有医学训科。这些，都成为聊城医事历史悠久的明证。

年逾古稀、熟悉地方史的刘洪山先生，向我描述了他少年记忆中的情形。他说，那个时期，还能寻见古城古时医事的一些踪影。由于运河的带动，古城相当于一个药材集散地，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仍存有不少大药堂。这些药堂，甚至在济南、济宁以及省外都设有分店。当年的药堂，大多都在店门两侧悬起象征信誉、宽尺余长过丈的“通天招牌”，引人注目，成为古城一道景致。其中，怀德堂、益寿堂、太元堂等，都是百年老店；怀德堂员工多达百人。规模较大的药堂，既销生药，又营制药，还有坐堂的医生。这些药堂卖药十分讲究，颇有口碑。

除了坐堂的医生，还有独立行医者。这些医生看病不收费，收入主要来自病人病愈后的答谢以及药堂的报酬。据《聊城县志》记载，到清代，叶兰、叶锡岭、葛洽、胡煜堂、张毓堂、刘汝霖、傅斯桥、叶嗣高、朱正谊、杨兴臣等近 60 名中医名盛于时。刘洪山先生介绍说，古城当年的华佗庙、吕祖庙也有“医疗功能”。在华佗庙、吕祖庙焚香求签后，病人就按签对号，取得价格低廉的处方。以心理、调养方式治病，也有一定功效。

从民国起，中医开始受到间断性的冲击，脚步从此放慢。而如今，中医的生机再次勃发。谷万里说，在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还有预防保健、医疗保障等诸多方面，中医的优势正在逐一显现。中国传统医学的足音，重又吸引人们凝神谛听，而聊城中医的脚步，也正行进在这条路上。

亦华亦质身上衣——服饰篇

人生四事衣为首。在东昌府，与服装相关的事情，也有许多可称道之处。

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这里桑蚕丝织业就很发达，“齐纨鲁缟”享誉四方，“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据《明太祖实录》和《明史》记载，到明代，在保留丝、麻传统的同时，太祖朱元璋大力推行植棉，东昌百姓由此始种棉花。而且，在山东，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据《东昌府志》及各州县志记载，明代东昌府所辖3州15县均有棉花生产，不仅种植广泛，而且不少州县植棉比率很高，甚至有超过粮食作物的趋势。丰富的棉花资源，对纺织、印染、服装，既奠定了基础，又产生了促进。自明代起，就形成了“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的景象，其中尤以“织布为大宗”。

聊城境内，由丝、麻、棉制造的纺织品，在历史上“亮点”频现：秦国的“阿缟”，西汉的“缣”，唐代的贡平绸、贡绢等，都名扬全国。“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的临清哈达，甚至远销国外。在近代，鲁西南民间织锦（今简称“鲁锦”）以及由江南传到江北的蓝印花布工艺，也以其茁壮的生命力“飞入寻常百姓家”。

漫长岁月中，东昌府人的衣着服饰虽然没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但其优厚基础却不容轻视。

对于过去的服饰，即便是老人，印象最远的也只能达到近代了。

清代女装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着明代的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变宽，再加上云肩（一种衣饰，围衣领一周，配在肩上），可以变换出许许多多的花样；到晚清时，城内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

民国初年，男装形成了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可戴礼帽，以示庄重。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山装开始在古城占有一席之地，也有一些男性沿用传统的祫裤，头戴“帽衬”（瓜皮帽），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自辛亥革命以后呈现多样化趋势，一身祫裤之



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城里妇女开始穿旗袍。

过去的服装，温暖了古城一代又一代人。在今人的目光里，那些服装无论朴素也好华贵也好，都因其浸透着先辈的心血和智慧，铭刻着岁月的珍贵印痕，而显现出独具的魅力。

本色菜点溯源——餐饮篇

聊城东关曾有一座庙上庙，下供关公，上供徐庶。因为，相传徐庶曾任聊城知县。当时，曹操任东郡太守，以巡视为名，想拉拢徐庶。徐庶被迎接待，让厨师将丸子炸成不规则块状。曹操很奇怪，徐庶趁机道：“丸子不圆，风味不改！”暗示自己表面迁就，心有操守。这段佳话，成就了东昌古城的一道名菜——徐公丸子（俗称“煎丸子”）。

相信每个知道了这道菜来历的人，都能感觉到它的韵致和厚重。品菜的同时，还能增长知识并接受一次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餐饮由此悄然上升至文化的境地。对东昌古城的“食文化”稍微做一点了解，就能感受到它的盎然趣味和吸引力，它的底蕴和魅力让人油然生出敬畏之情。

“在东昌古城，像徐公丸子这样出之有据、讲之有趣、观之悦目、食之惬意的正宗本土菜品有很多。这跟聊城餐饮的古老渊源和薪火相传是分不开的。”谈到古城餐饮，身兼三项餐饮业国家级评判资格的中式烹调高级技师高文平这样说。他的哥哥高文广，则在烹饪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通过跟他们的交谈，古城餐饮的发展脉络渐渐清晰起来。

鲁菜，是我国北方最早形成的菜系，而以聊城为核心的鲁西菜作为一个支派，在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追本溯源，会发现古城餐饮有着深深的根。在聊城境内出土的鼎、罐、盆、杯、鬲、尊等餐饮器具，表明这里的餐饮在数千年前就达到了一定水平。而被视为烹饪鼻祖、精通厨艺的商初名臣伊尹，则出生于莘县。这种深厚的氛围，加上聊城境内丰富的物产，为古城餐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聊城漕运发达、经济繁荣，江浙、山陕、京畿等外来元素的融入，使古城餐饮达到了空前兴盛的状态。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吴云涛先生，曾在聊城收集到一份清末手抄民间唱本《逛东昌》，古城正宗的本色菜点，多能从中觅到踪影：“鸡丝拉皮凉拌肉，糖酥鲤鱼吃烤羊。煎丸子别处不会做，鲜粉皮天下头一桩。麻花面筋真不错，东昌烧鸡格外香。吊炉烧饼油炸鬼，鸡丝馄饨胡辣汤。……开汤丸子热厚饼，八批馃子酥又香



……”这些菜点，与脂油饼、呱嗒、魏氏熏鸡等名吃，加上蛤蟆楼、风煮楼、三德园、三庆园等名店，一同构成了当年的餐饮胜景。

新中国成立后，餐饮业得到良性发展，出现了一批名厨和会英楼、同福春、十三姊妹、人民饭庄等名饭馆，空心琉璃丸子等菜品独树一帜，“席面丰盛完美、菜品装盘大气、口味浓香醇厚，突出酱香味、醋香味、椒香味、蒜香味，尤擅制作淡水湖鲜”的特点日益鲜明。

进入新时期，“江北水城”开发、古城保护与改造，让人们自然而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饮食文化。作为旅游的重要元素、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项目，东昌古城正宗本色菜点的继承与发展，让人充满着期待。

食不厌精忆小吃——小吃篇

8月27日，东昌古城一个晴朗凉爽的清晨，开始拆迁的楼北大街，高大葱郁的泡桐树下，北口周围依然人声鼎沸。多年以来，不少古城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的小吃店铺、摊点吃早餐，但他们不一定知道，在各色小吃中，历史悠久的“八批馃子”已历经上百年的沧桑。

当年，像这样有口皆碑的小吃，在古城有很多。聊城籍人士、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吴云涛先生，曾在收集到一份署名为光绪末年“武水醉丐”的手抄唱本《逛东昌》，其中，对古城小吃多有涉猎：

“前菜市里出焦枣，后菜市里果木行。……茶食饽饽东昌的好，上细果品东昌的强。芙蓉糕、雪花糕，大金棍蜜灌甜又香。口酥、栗酥、箭杆酥，蛋糕、寿糕、玉露霜。枣泥对丝桂花酱，椒盐豆沙有提糖。薄脆云片核桃粘，梅酥瓜钱带闽姜。……开汤丸子热厚饼，八批馃子酥又香。甜沫米粉糯米粥，炸糕麻花麦芽糖。豆包烧卖酥油饼，羊肉火烧牛肉汤。绿豆糊涂沿街卖，滚热的小豆腐野菜香。还有煎饼小葱蘸甜酱，管顿的包子常下乡。薄单饼卷咸鸭蛋，赶集打尖当干粮。干果仁、兰花豆，挎着篮子串酒坊。东门口的山芋瘫又烂，楼底下的酱肉就是香。……东昌府三美传得远，出门人提起想家乡：旧州洼白菜汤如奶，北坝的豆腐真不瓢，著名的还有西关水，甘美赛过扬子江……”

合辙押韵的民间俚曲，描绘出当年古城小吃的鼎盛风貌。倾心东昌饮食文化的高文广先生，曾通过一些熟悉地方史的前辈，对古城餐饮做过不少调查。他说，古城当年的小吃经营已具有相当规模，与餐饮业一起，被称作“勤行”。每年灶王爷八月初三生日，同行们都要到灶王庙聚会。通



过他的介绍，记者还了解到当年古城小吃的一些“经典品种”。

“张家厚饼、王家甜沫、丁家馄饨，被吴云涛先生称为古城小吃‘三好’。”高文广说，其中比较独特的是张家厚饼。这种饼外层实面，内层发面，有三寸厚、一寸厚两种。烤成的厚饼两面呈金黄色，周围宽边装饰图案，很像一件工艺品。饼虽大，但外酥焦，内白嫩，食之酥软相宜，香甜可口。至于八批馃子，是由油条演化而来。馃子分成八条，两端相连为椭圆型，颜色金黄，酥脆到落地碎不可拾。厚饼、八批馃子，如今很少有人能做了，而像脂油饼、开汤丸子、枣饼……还有一些点心、小吃的老字号，如今已大多失传。

著名作家阿城在他的随笔《思乡与蛋白酶》中说过，思乡“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常常成为游子私念家乡的“主要寄托”。因为，小吃是人类文化生活精致化的结果，蕴含着一个地方十分重要的文化特色。

高文广先生说：如今，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年堪为美味的小吃，在人们眼里，大多都成为很平常的食品了，但其中饱含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文化精神，不能丢弃。古城保护与改造，在带动旅游的同时，能带动传统小吃，进而将让一缕文脉、一种操守植入人们心田，是很多人的期盼。

天人合一古城居——居住篇

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

.....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当年的东昌古城，除了公衙、寺观、坛庙、书院、会馆等官用、商用建筑外，更多的是民居。虽说是“城里”，但在民居之中，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描绘的这种令人向往的田园居住状态，还是不难见到的。

按照贫富程度，当年的民居可以分为豪宅大院、三进院落、四合院、土坯草房等。

明清时期的聊城，文运大兴、文化昌盛、鸿儒巨宦鹊起，形成了“八家”世家大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邓、朱、傅、耿、杨诸家。由于年代久远，高墙深院，这些人家的居住情况少为人知。口耳相传至今的印



象，除了阔绰高大的门楼、“宅第连云”外，就是这些人家大都建有私家花园。

比较有代表性的“四合院”，门楼一般设在东南角，对着大门是影壁，左转进入院中。“四合院”分为正屋和厢房。正屋也称“堂屋”，大多坐北朝南，一般为三间，多是一家之长居住。正屋前两侧设东西厢房，两间或三间不等，晚辈居住。土坯草房虽然造价低廉，但由于是厚墙厚顶，冬暖夏凉，便于修补，不仅仅是贫穷人家修建，连一些崇尚简朴的富裕人家也会建造一部分。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等，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古城居民十分注重在院落内引入自然风光，房前屋后多种树木。即便面积不大的小户人家，也要种植几株枣树、石榴等，取多子多福之意，充分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交融。

从熟悉地方史的邓树堂、刘洪山、高文广等先生口中，我还了解到当年民居建筑的一些细节和术语。

四合院的大门，分为广亮大门、金柱大门、如意门、墙垣式门等。广亮大门和金柱大门为做官人家使用。如意门、墙垣式门为一般人家使用。大门的门板有很多样式，门枢插入“门枕”中，门枕石通常有箱形和抱鼓形两种。

影壁，是用于遮挡视线和突出大门的墙壁。在大门外正对大门的叫“外影壁”；在大门左右修建的八字墙叫“燕翅影壁”；最常见的是建于大门内的“内影壁”。

瓦房一般使用青砖、布瓦（因土布覆面而得名）。瓦房的承重部分多为框架结构，最常见的是“四梁八柱”。在此基础上，以“檩、椽、枋”架构出房顶框架。瓦房地面一般是砖铺。

土坯房地面一般是土地面。为防止盐碱腐蚀墙壁，会在墙基上垒几层砖，再往上垒土坯，这几层砖就称为“碱脚”。

综合被访者的说法可以感受到，传统民居对自然因素，如地理位置、日照气温、风向雨量，还有当地建材等，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同时，由经济实力决定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由礼制伦理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堪舆风水决定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宗教信仰决定的人与建筑格局之间的关系，都有充分的体现。当今遍布各地的楼宇，更注重私密、卫生、节能等，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漠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流；钢筋水泥的大范围使用，也弱化了地域特征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渐渐理解老辈



人的“四合院情结”，并进而从中受到启迪。

经由东昌千里行——交通篇

作为“运河古都”，谈到古城交通，首先应当提起的，自然是“水运”。

聊城水运兴起自元代。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开始开挖的会通河穿越市区，带动了水运，“凡南直隶、江西、福建、两广朝贡京师，皆由此道”。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又经疏浚治理，从此直到清代咸丰年间，漕运畅通。作为京都至江南水运必经之地，聊城河段船漕船、木帆船穿梭往来，载重八百石（近5吨）可畅顺通行，每年过往船只逾1200只，蔚为壮观，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康熙、乾隆南巡，也多次经运河驻足聊城，更使古城名扬四方。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

有河就有桥。据记载，元代开挖会通河时，在今闸口处建造“通济桥”，是古城所知最早的桥。闸口以南800米处，古运河西岸，则是崇武驿码头，俗称“大码头”。由此南望，舳舻相连，帆樯如林，被列为聊城八景之一，称为“崇武连樯”。

“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魏晋之际史学家谯周《古史考》对古代交通的记载说明，我国畜力车和道路出现是很早的。聊城的陆运，历史也很悠久。东昌府区交通局负责史志的亢保章主任，正在编修交通史。从他提供的《大事记》草稿中可以知道，远古尧舜时，道路被称作“康衢”；夏朝末年，伊尹辅佐商汤征战时，已使用牲畜和战车、运输车；春秋战国时期聊城道路已具相当水平；秦时颁布“车同轨”的法令，修建的“国道”——驰道也经过聊城。宋淳化三年（992年），聊城迁至现址，用于货运的大车和独轮车比较普遍，人出行乘轿之风渐盛。明代，聊城有7条驿道通往各地；明清时期，还出现了车厢包以铁叶的铁甲车、马车与轿子结合的产物——“轿车”。

年逾古稀、倾心地方史研究的刘洪山先生，对近代古城颇有了解。通过他的介绍，我们能想像出当时古城交通的大致风貌：行人出门，根据行人身份、家境贫富、路途远近等，一般选择轿子、轿车、大车、小推车或骑马、骑驴。货运主要靠大车、推车和畜力，短途货运有时也依靠被称作“脚行班”的人力担运。



步入现代，古城交通的发展步伐也在加快：

1921年，聊城始有客运汽车；

1928年，洋车（黄包车）传入境内；

1971年，城内始有公共客运；

1996年，经过聊城的京九铁路建成通车。

进入21世纪，私家车开始剧增。

从此，古城人得以更加便捷地走出聊城；古城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着八方宾朋。

遥听机杼感当年——织用篇

如今，在聊城古城的大街小巷，迎面而来的行人，服装可谓五彩缤纷、千姿百态。如果将历史的时针拨回民国之前，眼前或许是这样一幅景象：阳光下，人们围在古楼旁拉着家常，远远望去，清一色的粗布青衣，朴素得没有任何差别。

粗布青衣已踪迹难觅，所幸织就他们的一些器械尚有存留。在熟悉古城生活和聊城地方史的刘洪山先生记忆中，当年的古城，零星分布着一些专营纺织的作坊。古城居民多是为官经商者，稍微贫寒的人家，才需要自己织布。轧花、弹棉、纺线、织布、染布……纺织的这些主要工序，“催生”出种类丰富的纺织器具。

为棉花脱籽，当年普遍使用脚踏轧花机。轧花机上半部分由曲柄、木棍和铁棍组成，下半部分的三角架上装着踏板，脚踩踏板，使得木棍和铁棍互相倾轧，即可将棉籽滤去。

经过碾轧的棉花软硬不均、不够松软，于是需要“弹棉花”。弹棉花的工具主要是棉弓和木锤，用木锤拨动弓弦，弦的高速振动把紧实的棉花弹得蓬松，称为絮棉。絮棉若要用于织布，就要进入另一道工序——纺棉。

纺棉成线，要用到纺线车。纺线车通常有一个驱动轮和一个纱锭，由车架相连。摇动车轮，带动锭子，从棉条抽出的棉线缠绕在锭子上，被形象地称为“棉穗”。

在织布前，纺出的线，还需一番加工处理，主要“程序”有拐线、浆线、分线、经线、纤布、掏缯等。

织线为布，用的是脚踏织布机。左右脚交替蹬脚踏板，带动前后缯及



上下交线，双手左右递梭，左手交替搬动机筐。若想织出带有丰富花纹的布，需要使用“三匹缯”甚至“四匹缯”。手上的操作没什么变化，只是脚要“奔忙”在更多的踏板上。

当嘈杂的机器声盈满双耳，飞快的节奏催促着难以停留的脚步，抚摸着这些纺织器具，先辈们在艰难条件下对美的坚韧追求让人感动，手工织造过程中的那份沉静与耐心更让人感慨万端。而听着在当今渐高的“节能环保”之声，看着有人重又怀恋起“手工老粗布”，发现往昔岁月被人们曾经遗忘的东西穿越时空重显价值，人们会想到：如果说这些器物对当今有什么意义，其中应该包括静下心来之后，由此触动的深思。

(该文原载于2009至2010年《聊城日报》)



闲谈正月里的玩

□吴云涛

如今，过春节，还兴拜年。除了拜年，也就是吃喝酬酢，看看电视，以作消遣解闷之法。以日下我聊城来说，没什么地方可以玩去。影院剧院不开业，文娱场所也无，闲遛马路有何意思？不免想起从前东昌府的一些风俗。关于正月里的“玩”，叙述一下，已成历史陈迹，且作前尘回忆而已。

正月里，第一个玩的地方，是“逛东门口”。逛东门口这一趟子，包括逛城墙、上古楼，转回来，上会馆看戏去，足让你玩得过瘾。东门口，是在东城拗头门的南边，顺城墙往南，一大段地方，有里多地长。这里从大年初一这天就人烟闹市，摊贩如林，玩艺杂耍，纷纷登场。有讲评书的、说大鼓的、说坠子的、拉洋片的，不是一起两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个热闹劲啊无法形容。人是挤拥不透，一片吆喝声、喧闹声、锣鼓管弦声，好比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好个繁华火爆的市场啊！“逛东门口”，是正月里城关和农村人们的一个生活娱乐享受，过年了么，谁不尽情地欢乐两天，去玩玩呀？

东门口这个会场，多是拉圈子或撩场的江湖玩艺，卖吃头的有的是，但不占重要部分。你想，大正月里，家家户户都有“过年货”，谁还想在外边吃饭？所以，东门口卖吃的东西全是“要物”（吃着玩，不当饭），像凉粉、茶汤、山梨粘、水萝卜和糖果、荸荠之类，没有包子、烧饼、馒头当饭吃的东西。

从前，大闺女、小媳妇们是不能随便出门的，认为少年妇女抛头露面不成体统，人家笑话。可是正月里逛东门口，却成了妇女解放的好日子，公婆也欣然答应儿媳妇等的要求，于是姊妹、妯娌相约做伴去逛逛玩玩，大开眼界。



妇女多是缠足的，走路不惯，而且一溜大街也相当长，都是坐“小花车”前往。这小花车，即是独轮小红车，一个人由后面推，两边可坐四个人，有布垫子，并下垂花布围帘，因而名为“小花车”。那时“东洋车”还没兴过来，妇女出门走亲戚、下乡，多是坐这种花车或骑驴去。

逛东门口，有的索性趁此机会上上古楼。古楼上到紧紧顶上、最高的第四层上，扶栏四下眺望，可看到全城的千家万户，瓦舍鳞比；四外护城河，水光荡漾，云树渺茫；城中央十字划分四条大街，商业繁茂，车马行人络绎不绝，可是看得人很小了。下得楼来还是逛东门口吧，摇山梨粘的，腔调那么诙谐动听而又音韵和谐，逗人发笑；拉洋片的，也是从外地来的，大溜木制带框框的架子，一张张的洋片，从架子这头，往里推送，一张挨一张推动，那一头，另一个人接出再从另一层框框推回，如此边唱边推，声调合辙押韵，别有另一种风味。

这种洋片，是用长约九寸、方六寸的木框镶入放大的相片，不外是风景、戏剧人物或军队战争等。观众坐在一拉溜小板凳上，从两个小圆洞往里看，看到的是放大的景物，认为新奇好玩。有的故意加入“春宫”相片，赤裸裸猥亵镜头，引人好奇贪看，但不敢公开。

套圈儿，这个“套圈儿”，却是兴得年代不很久，约在民国二十年前后，才看到有这玩艺出现，也或是从别处蔓延于此地的。乍兴，觉得新奇，但是个赌博性质的活动。

圈儿，是用细竹篾扎的和碗口大小的圆圈，外边用藤线缠绕，它体质很轻，且含弹性，拿到手里颤忽忽而有韧劲，抛出去它又蹦又跳，很难使它一下子稳定。干这行业的人，在空敞地段，扎个大圈子，圈子外容纳观众，也是顾客，圈内就摆一些赌胜获得物，如香皂、香烟、镜子、脸盆、茶具等等。这些物品，都离外栏有相当距离，谁要套圈，就给谁十个藤圈，一回抛一个。你站在栏杆外，望望认定套哪一种东西，就向它抛，很难套住。即使套到上头，也会乱跳乱蹦，结果落空。但也有套准的，这其中似乎有相当技巧在。如果你圈圈必赢，那么这圈主人就连连客气几句，请你吸烟，不让你再套了。

套圈儿，从东门口兴起，以后每逢各处春会、庙会，总有这行生意出现。三十年代以后被禁止，因其为赌博游戏也。

逛城墙，这也是逛东门口玩耍中必要玩的一项事情。从东门上城的马道斜坡登上城墙，纵目远眺，四圈景色尽收眼底——城楼建筑，重檐斗拱，外形双层，有如险要关隘，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往南、往北望去，



这一条青色巨龙，护卫城堡内外，千家万户，绿树参差，点缀得秀丽多姿。护城河的水，已是化冻了，清波粼粼，小舟往来，遥望浩瀚辽阔，爽人胸怀。从城墙上漫步行来，城上垛口处往下看看，又朝城里各处瞧瞧，目不暇接，游人如云，喧笑跳跃，极其热闹。

城上还有从前遗留的铁炮，这是百年前军事防御的兵器，灌上药点燃，向外轰击，可以对攻城的敌人以重创。时代进化了，这种武器落伍了，也就废弃于城头，多年无人过问。人们按其体型巨细，呼为“大千斤”、“二千斤”。

东昌府的城墙，是大明洪武年间由原来土城改建为砖石砌筑，它的规划设计及功能，以及建筑布局，具有高度的科学评价；城墙与城楼以其雄阔巍峨的形象与建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理应加以保护和利用，遗憾的是，在未及进行缜密研究的情况下，竟被彻底拆除，这是错误的。这里不谈这个了。

逛城墙，除了看看城外的景物，欣赏欣赏城头上的风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之外，如果你不嫌累，可以随意溜达，走一遭罢。东城门上头，在几株苞松笼罩下，有一座二郎庙。进去看看，那三只眼的二郎神，面如敷粉，唇若涂朱，相貌英俊，威风凛凛。他脚下趴着一只狗，却是半瞑半睁眼，很驯善地蜷伏地下，并不吓人。狗也是泥塑的。猛一看去，浑身毵毵细毛，真跟活狗一样。据传说，二郎爷喂的这只‘咬仙犬’，还时不时地去古楼底下、肉架子下边对摩肉吃。一天，被卖肉的人猛地砸它一刀背，狗嗷嗷地跑了，当然，并不知它是‘神犬’。后来，有人告诉卖肉的，二郎神前的咬仙犬右腿快折了，是你那天打的吧？卖肉的吓毛了，急忙去东城头上，给二郎爷叩头上供，并请来塑神的师父，把狗的腿装塑好。其实，这全是迷信，人家哄咙他，他信以为真了。

逛城墙，如果从东城再逛到西城，太远了也太累了，但是，城墙上走走，似乎越走越有看不完的风景，无数的房舍、潺潺的河流、像蚂蚁似的人群，看也看不完呀。

从东城墙下去，饿了吗？到“瓮圈”去吃点东西。那里有一家“新民全灌汤包”倒不错；要不，闹两块又瘫又烂的山药，烫嘴的热，比蜜还甜，才花两个大子呢。（东城门到“拗头门”中间的一段叫“瓮圈”，也有几十家商店）

在河沿上船吧。小船坐三至四人，划到护城河中心，碧波涟漪，它全解冻了。河中荇藻莹翠，游鳞往来，坐在船上，心旷神怡，别有风味。船



划到旧米市街的南头，从这里下船去山陕会馆不远了。只花一个大子，坐坐船，觉得很惬意，很开眼界。

山陕会馆，从正月初一就唱戏。那里也是好大的会场，庙里庙外，一个挨一个的摊子，卖吃头的，卖花炮的，卖小孩玩真的，真多真花哨。卖茶水的棚里，更是热闹，人声哄笑，男男女女，也是挤拥不透。

逛东门口，如果还上古楼，上城墙，再坐船到山陕会馆看戏，差不多一天下去了。当然，中间要在外边吃顿饭的。会馆外有的是零食，吃几个煎包，喝碗米粉，花不了几个钱。那时，电影还没兴到这里，但也有外地来的，临时赁房子放映的无声电影，幕小，设备简陋，却不少吸引人去看，以为这是新鲜玩艺。

(本文选自《聊城旧闻》)

美德故事

编者按：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感人的美德故事对世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其中，就有一些源于我们聊城。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故事的过程，就是熏陶、改造自己的过程。缘于此，着手整理了这一系列资料。虽不求系统，但求论之有据、说有出处，使大家不再停留在传说故事这个层面上，进而真正相信，并努力去学习，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因考虑到本书内容结构等问题，《吴季子张秋挂剑徐君墓》、《孟子冠县阐释“大丈夫”》、《张养浩“四知”倡廉》、《鲁仲连排难解纷》已重新编辑收录在其他部分，本部分不再重复收录。本部分文章均为吴文立整理，不再一一署名。



闪子鹿乳奉亲



古代“二十四孝”中有闪子“鹿乳奉亲”的故事。少为人知的是，闪子是聊城莘县人。莘县城南有闪里村，传为闪子旧时居处；城南二里处古有闪王墓。

据载，闪子为周时孝子，姓氏无考。据传，闪子父母年迈，俱患眼疾，思食鹿乳。闪子乃衣鹿皮入鹿群中取鹿乳以供亲，猎者误以为鹿，欲射之，闪子见状，大声疾呼，具情以告，得免。歿后封为王，称闪王。

闪子的故事在汉刘向《孝子》中也有记载：

父母年老，并皆丧明。

闪子晨夕侍养无阙，常着鹿皮之衣，与鹿为伴，担瓶取乳。在鹿群中，时遇国王出城游猎，乃见间下有鹿群行逐，王张弓射之。误中闪子，失声号叫云：“一箭煞三人。”王闻之有人叫声，下马而问。闪子答言：“父母年老，又俱丧明，侍养无人，必应饿死。”语了身亡。诗曰：“闪子行尊孝老亲，不恨君王射此身。父母年老失两目，谁知一箭煞三人？”

莘城南关古有闪王庙，城南2里处古有闪王墓。旧时褒封甚重，题咏甚多。民国时犹存。下面的照片是民国22年(1933年)时留下的。



闪王庙

闪皇庙：在县治东南。明成化年知县淡素重修，周围地二亩。天启二年，知县王燮元重修。崇祯五年，知县孙愈贤重修。

《莘县乡土志》载：

闪王墓：在城南四里许，尹家营西。

詠鹿乳奉親	
五言八韻	
威豐王子進士濟東秦武陽道雲南昆明人	蕭培元
射鹿無人境誰知鹿是人秉心推大孝翠乳奉雙親	
角戟形非假皮衣宵更真漚漚求沉獮灌濯助精神	
鹿眼相窺誤齧酥襲取頻林隨千隊逐堂進一壺春	
遠勝盤供脯幾危箭在身庭幃甘旨足閃子駕天倫	
莘縣志	
題閃王	
教諭李璞	
訓導王鉞	
致仕知縣李清	

祠古傾欹歷歲多閃王遺跡半消磨碑殘刻蝕經兵火
壁朽墻傾長薜蘿風景依稀留舊迹人煙叢雜自經過
當年勳業無由考佇立其如感慨何

經過見古祠下馬詢故老問之何代神云是閃王廟功
崇錫爵隆世遠傳名窮碑刻值兵燹茫然竟難曉

關口祠堂幾百秋清香允矣謁光浮功成前代褒封重
跡著當時德範優綠樹陰中啼好鳥青松影裏喚名鳩
滄桑更變湏臾事忍看斜陽斷碣留

光緒《莘縣志》(張朝玮修) 載：



闪里村：出南门池东即是。周孝子闪王旧里。

闪王墓：在城南四里许，尹家营西，与南关东头闪王庙南北正相对。

据《源远流长——莘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第223页：

闪子，周代莘人。相传当时莘地是一片荒野，收成很薄。闪子与母相依为命，生活艰难。闪母有病，粗食难咽。闪子便披鹿皮，伪装成小鹿取鹿奶供养母亲。有一次他正在鹿群取奶，被猎人误认为小鹿，中箭身亡，葬于殒命处（今莘县王铺乡官庄村东北）。因其至孝，甚受后人尊重，被封为“闪王”。为纪念，特为他修建坟墓，为“闪王墓”；将其家所在地（莘县城东南1里处）命名为“闪里村”，旁边之巷（旧莘城南关厢东拐）命名为“闪里巷”；并在闪里巷东头路北（今县水利局楼前）建闪王庙。元代，闪王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闪里村、闪里巷、闪王庙已不存在。1957年4月，莘县人民委员会公布闪王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闪王墓1966年被毁。

同书第201—202页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少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被挖、被砸、被盗。如……位于十八里乡夏庄村北的周代闪王墓……仲子庙等均遭破坏。

该书第223页称，墓在“今莘县王铺乡官庄村东北”，第201—202页称“位于十八里乡夏庄村北”。相比较言，后者更为准确。

莘县政协《文史资料》专辑《莘县地名》一书有记载：

闪里街

旧莘县城东南1里处有个闪里村，南关厢东拐有个闪里巷，闪里巷东头路北（即今水利局楼南）有座闪王庙。此庙始建年代不详，《续修莘县志》的记载是：“闪王庙在南门外闪里巷东头，明成化年间知县淡索重修，周围二亩。天启二年，崇祯五年知县孙愈贤重修正殿三间、门一间。”并说“闪王墓在城南四里许，尹营西，与南关东头闪王庙南北相对。”据县城一带人传说，周代莘地是一片荒野，收成很薄。有闪王与其母二人相依为命，日子颇为艰难。闪母有病，粗食难咽。闪王素孝，便身披鹿皮，伪装成幼鹿，混到鹿群中去吸取鹿奶，回家供养母亲。有一次，他正在鹿群中取奶，不幸被一猎人误当作鹿射中身亡，葬于其殒



命处。后人为了纪念他，特为他修建了坟墓，将其家所在地命名为闪里村，旁边之巷命名为闪里巷，并建庙供奉，所建之庙便名为闪王庙。至元代，闪王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后随着时代变迁，闪王墓、闪里村、闪里巷、闪王庙均已无存。

(编者按：查《二十四孝》一书，确有“鹿乳奉亲”一事。原文是：“周荆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荆子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荆子具以情告，乃免。”下面还有一诗赞曰：“亲老思鹿乳，身挂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此处所述与前文的传说大致相同，仅有三处稍有出入：其一，《二十四孝》中孝子之名叫荆子，传说中却叫闪王，荆音善，与闪字谐音，估计可能是传说者只知其音，不知其字，长期误传误写所致。《辞源》“二十四孝”条目之下写的是“郯子”，郯子是春秋时郯国之君，孔子之师，史书中并未说其有孝行，可能是“荆子”之误。其二，传说中说闪王被射死，《二十四孝》中却说荆子告之得免，两说中生死不同，孝行却并无差异。其三，传说中说闪王是莘人，《二十四孝》中却并没有说明荆子的籍贯。《莘县志》中说“闪王庙有庙巍然，而不知其何神。”因此，闪王与荆子是否为同一人，尚待查考。)

另据资料：有专家研究发现，印度佛经中也有此故事。受此影响，宋金墓描绘的榜题又有写作郯子、蹠子的，多表现儒、释融合的现象，且多将其作为春秋鲁国人，为孔子的弟子。专家认为，这是将佛教故事汉化的结果，通过中国化的人物表现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其实，两国都有类似故事，也不一定就是相互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正是由于孝是人类共同的准则，才有了中国、印度都有此现象的存在。

在莘县，闪子的古迹虽已日渐模糊，但闪子本身所体现出的“孝”道精神，仍是当今非常缺乏的。因此，适当修复旧迹供人凭吊学习，仍然十分必要。



鲁义姑舍子救侄



“二十四孝”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孝道文化的典型人物，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而早在宋金时期，源于聊城的鲁义姑“舍子救侄”的故事就被列入其中。

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二十四孝”石刻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并发现于此时的古墓中（见左图）：画面左侧一妇人右臂抱一小儿，左手指着前面的一站立小儿，身后又一小儿左手牵妇人衣襟；右侧有一军卒左手提棍，右手指向妇人，似在盘问。

追根溯源，鲁义姑的故事在前汉刘向所著《列女传》之《节义》中早有记载：

鲁义姑者，鲁野之妇人也。齐攻鲁至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而行，军且及之，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于山，儿随而啼，妇人遂行不顾。齐将问儿曰：“走者尔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谁也？”曰：“不知也。”齐将乃追之，军士引弓将射之，曰：“止，不止，吾将射尔。”妇人乃还。齐将问所抱者谁也，所弃者谁也。对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齐将曰：“子之于母，其亲爱也，痛甚于心，今释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妇人曰：“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夫背公义



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则鲁君不吾畜，大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夫如是，则胁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齐君曰：“鲁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泽之妇人耳，犹知持节行义，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请还。齐君许之。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号曰义姑姊。公正诚信，果于行义。夫义，其大哉！虽在匹妇，国犹赖之，况以礼义治国乎！《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此之谓也。

颂曰：

齐君攻鲁，义姑有节。
见军走山，弃子抱侄。
齐将问之，贤其推理。
一妇为义，齐兵遂止。

据民间传说，相传有一年，齐国举兵侵犯鲁国。入侵的齐兵逼近鹅子屯（今茌平县韩屯镇罗屯村），村里的百姓纷纷逃避。在村西的空地上，有一个年轻的村妇跑在最后，被齐兵截住。只见这位妇人右胳膊抱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左手拉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跑得气喘吁吁。齐兵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这个村妇：“别人都是抱小的领大的，你为什么抱着大孩领着小孩呢？”村妇说：“这个大孩子是我侄子，她父母都死了。小孩是我儿子。如今大难临头，我宁可舍掉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丢掉侄儿。”齐兵听后感叹道：“人家这里真是礼义之邦，一个村妇都能舍儿保侄，如此仁义，我们为什么还要征伐兄弟国呢？”“于是纷纷把兵器投入空地的水井里，磕掉鞋上的土，一哄而散回齐国了。

如今，罗屯村西的那个土堆，据说是齐兵的鞋土堆成的。后人为纪念这位深明大义、退敌兵保家乡的村妇，就为她修了祠堂，塑了泥像，起名鲁义姑祠，祠在茌平县韩屯镇大碾李村正北的罗屯村。据传，阴历二月初六是鲁义姑的生日。每到农历二月初五至初七，在韩屯镇，四里八村的乡亲们，甚至不少来自德州、聊城的人们都来到鲁义姑祠，举办香火大会，鸣炮叩头，请香还愿，以志纪念，好不热闹。义姑祠方圆十里之内，年年风调雨顺，没有风雹等自然灾害。人们说，那是鲁义姑在荫庇后人呢？

后来该祠堂在文革中被毁，但是周围的人并没有因此停止对鲁义姑的纪念活动，每年阴历的二月初五到初七仍然有大批的人到此遗址祭拜。



1996年，当地信仰鲁义姑祠的人又自发集资，重新修建了该祠堂。

由于被人们普遍尊崇，在鲁西民间，鲁义姑被尊称为“鲁义神姑”、“鲁姑奶奶”，是民众信仰的救苦救难、慈善爱民、法力无边的女神。明崇祯年间，博平知县傅允诚有《鲁义姑祠题壁》：

义姑神庙野云封，一拜荒塞礼数恭。
全侄千秋性烈性，回兵此地识遗踪。
碑横莫辨前贤篆，台古空余隔代钟。
独有明社如一日，长因伏腊走村农。

清道光十一年《博平县志》（杨祖宪修，乌竹芳纂）载有鲁义姑祠介绍，并有两邑人的纪念诗文（见图）：



鲁义姑祠

獨有明社如一日長因伏腊走村農	魯義姑祠題壁	義姑祠 監學政 邑人國子 李克紹	舊閣峙平川遺祠表昔賢敦倫公義重却敵國家全敗 砌依楷木頽垣冷夕烟芳踪存漸澁憑弔幾流連 此相傳為當年回兵地也
----------------	--------	---------------------------	--

鲁义姑故事自汉代收入《烈女传》，到宋金时期列入“二十四孝”，再到后来列入旧时的《德育课本》（又名《八德须知全集》，民国蔡振绅辑）“女德”中的“二十四义”，影响日益深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从汉代始出后，历代统治者无一不是将鲁义姑作为一个道德教化的重要形象进行宣传，这可以从近年相关内容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充分证明，宋、辽、金、元等时代墓葬孝子壁画资料均有此题材，其标志即是被列为传统“二十四孝”人物之一。同时，除茌平外，全国还有若干地方有关于鲁义姑的传说和遗迹，而且随着中原文化的传播，在西域也找到其影响。另发现，关汉卿的《蝴蝶梦》曾有云：“我若学嫉妬的桑新妇，不羞见那鲁义姑。”这



里的“不羞见”其实是“羞于见”的意思。元曲中的人物语言，基本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连家里供奉的鲁义姑也羞于拜见了。鲁义姑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在一座远古时代的泥石流冲击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当他们死去的最后一刻还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母性的伟大表现。但是对于大义来说，中国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面对大义，很多人抛弃了私爱。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义，这就是道义在女性身上的表现。毋庸置疑，鲁义姑已经成为中国女性在道义上的化身，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冯异谦退不居功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有特色的将领，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绰号，比如“飞将军”、“常胜将军”、“威武将军”、……可是有一位却被叫做“大树将军”。他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大树将军”，这个美誉，就源于临清市八岔路镇辛集村的五花槐。

《馆陶县乡土志》载：

五花槐，在城东北三十五里新兴集村，地滨大河，路临要津，有古槐三株，花放五



色，相传植自前汉文帝时，阴翳夹道，树大十围。及光武中兴，曾舍于下，论功行赏，冯异屏立树下。及唐，尉迟恭勒马观之而叹。后宋太祖河东之战，系马于树，正值万蕊芬芳，太祖因感慨曰，此必得五沃之宜，不然何其色殊若是也。于是后人保护不啻召棠。至国朝咸同之交，土匪跳梁戕其一，虽失鼎足之形，尚存对峙之势。



由此可知，五花槐原有三棵，植自汉文帝时，至今2100多年。三树成鼎足之势，“及光武中兴，曾舍于下，论功行赏，冯异屏立树下”。

《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

（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升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中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当年跟随刘秀的开国名将有二十八位，号称“云台二十八将”。征战间隙，诸将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话题无非是自述战功，胡吹乱侃。每当众将争功论能之时，冯异总是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大树下面。于是，士兵们便给他起了个“大树将军”的雅号，后来，“大树将军”也由仅指冯异引申为称赞所有不居功自傲的将领。



五花槐

五花槐

—宮 銅 級 鄉 上 志 —

在城東北三十五里新興集村地濱大河路臨要津有古槐三株花放五色相傳植自前漢文帝時陰翳夾道樹大十圍及光武中興曾舍於下論功行賞馮異屏立樹下至唐尉遲恭勒馬觀之而嘆後宋太祖河東之戰繫馬於樹正值萬蕊芬芳太祖因慨然曰此必得五沃之宜不然何其色殊若是也於是後人保護不啻召棠至國朝咸同之交土匪跳梁戕其一雖失鼎足之形尙存對峙之勢

当年跟随刘秀的开国名将有二十八位，号称“云台二十八将”。征战间隙，诸将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话题无非是自述战功，胡吹乱侃。每当众将争功论能之时，冯异总是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大树下面。于是，士兵们便给他起了个“大树将军”的雅号，后来，“大树将军”也由仅指冯异引申为称赞所有不居功自傲的将领。

历史上的五花槐曾引起唐代尉迟恭和宋太祖赵匡胤的惊叹，于是后人加以保护，“不啻召棠”。可惜的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因土匪砍伐只剩其二。

“城东北三十五里”，应是自当时的县治所在地即现在的北馆陶镇驻地东北35里的



地方，大约在彭祖墓周围不远处（彭祖墓在城东北30里处）。日前，经过实地探访发现，历史上的五花槐现仍在临清市八岔路镇辛集村。《馆陶县乡土志》载：“五花槐，在城东北三十五里新兴集村，地滨大河，路临要津。”据介绍，这里原是黄河故道，是一个重要码头。但随着水势消退，今天的辛集周围已经看不出什么痕迹。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历经两千余年、最初成鼎足之势的三棵槐树只剩下两棵，原有的老槐树已于十多年前干枯，其根部冒出了小槐树芽，现在的槐树是十多年前老槐树的后代。但无论槐树如何变迁，“大树将军”冯异不居功的谦让美德，永远值得我们礼敬和学习。这也是我们今天寻找五花槐的真正意义所在。



田真兄弟和气兴家

在旧时的《德育课本》（又名《八德须知全集》，民国蔡振绅辑）中有“田真叹荆”的故事：

隋田真、田庆、田广兄弟三人，议分财产，资皆均平。堂前有紫荆树，茂甚，议分为三，其树即枯。真叹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兄弟复同居，愈相友爱，紫荆复荣茂如故。

这个故事源于旧朝城县的苗头村，即今聊城市莘县（原朝城县全部划归莘县，朝城现为莘县一镇）大王寨乡苗头村。

据光绪《朝城县乡土志》载：

隋朝时候，有一家人姓田的，他家里同胞弟兄三个：田真、田庆、田广。弟兄三个人一直在一起居住。三个媳妇想分家了，家里的钱财产业，都已经议定平均分派，但是堂前素来有一棵紫荆花树，长得非常茂盛，因此议定把这棵紫荆花树也均匀分做三份。哪里晓得这棵紫荆树，还没有等他们来分，第二天就枯死了。大哥田真见了，很吃惊，叹口气说道：“树木原来是同株





隋
田真與弟慶廣同居。諸婦欲分異家，有紫荆樹一株。
甚茂。兄弟議破分爲三。一夕，樹枯。真驚謂弟曰：木本
同株。是人不如樹也。兄弟感而更合。諸婦聞之亦無
間言。明日，荆復榮。

连根的，一知道将要分砍了，所以顷刻憔悴。照这样看起来，那么我们人还不如这株树木呢！”因此悲伤得了不得。兄弟们都深受感动，决定仍旧同住不分。三个媳妇听了，也都不再多言。从此，大家更加友爱了，那棵紫荆树竟依旧照从前一样的荣茂起来。

经过此事，紫荆花不死成了家和的象征，世人则喻其为“兄弟花”。田氏族人就将宗祠称“紫荆堂”，以教育宗族子孙后代永远亲睦团结，不辱紫荆，弘扬先祖美德，务使紫荆更繁更茂，遍地花开，永世昌盛。杨巨源先生在《莘县史鉴》中记载得很详细，可以参考。

光绪《朝城县乡土志》载：

大王寨有集市，有蒙养小学，堂前观上有老君庙，苗头有田氏祠（祀隋田真及弟庆、广，有石碣曰“紫荆故里”）。

据莘县地名办资料办公室公布的资料：

苗头村，属聊城市莘县大王寨乡。明初，田氏建一家庙，在周围村庄中此庙最大，人称“庙头”，后演变成“苗头”。位于乡政府驻地西北7.5公里处，西田庄至武家河公路西五百米，有田、吕两姓氏。聚落呈长方形，东西长八百米，南北宽六百米，主街东西向，村有木器加工、果园、代销点、卫生室、小学等。

可见，古今记载是一致的。

据康熙《朝城县志》载：

田氏祠：在城西北七十里，祀田公真及弟庆、广。

紫荆里：在城西北七十里，即田氏故居。觐光门外有碣曰紫荆故里。

觐光门即朝城县北门，城西北七十里，即今天大王寨乡苗头村。

田氏兄弟复活紫荆的故事为人传颂，朝城县的东邻阳谷也有遗迹纪念此事。明万历间，阳谷县知县李荫于阳谷县城老南门内建“紫荆祠”，又称紫荆堂，并将“紫荆余韵”列入古阳谷八景。对此，阳谷县旧志也多有记载。



三兄弟哭活紫荆的故事普及于天下，还得益于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他在《醒世恒言》一书的开篇，就写了《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其崇尚之情，不言自明。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并没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地名，也没说田氏三兄弟的具体名字。后来，《今古奇观》将此篇收入。

这一故事最早记载于南北朝时的《新齐谐》，又有记载说是发生在陕西的事。为此，康熙《朝城县志》主纂者明确指出：

紫荆之名，幼熟闻之，但又有载入陕志者。庚寅入都，紓道过祠，闻见备悉。因纪以诗：

旧干暂枯又复荣，聊辉花萼继唐京；
荒村犹有祠基在，那许异邦暗窃名。

因这一故事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紫里春风”列入朝城县“续八景”。清初旧志中另载有《荆里春风》诗一首：

自从华萼播风诗，千载友于未易追。
何意田君能慕义，顿令枯卉再抽枝。
春回故里余萍藻，风表荒原起梦思。
雨地盛名兹足摅，闾阎愿与记前师。

《德育课本》将此列入八德之一的“悌”来让大家学习。悌，意为敬爱哥哥，引申为顺从长上。《弟子规》开篇即说“出则孝，入则悌”，即此意也。二者的区别是：“孝”的对象是长辈父母，而“悌”的对象则是同辈兄弟。“孝”、“悌”是人伦的基本规范，扩而广之，涵盖一切做人准则。正因如此，《德育课本》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纲，选取历史故事让人学习，用心可谓良苦。

其实，三兄弟哭活紫荆的故事所传递的信息，除“悌”外，还启发我们：真诚之心，无不感人心怀，化及万物。纵使是一枝一叶、一草一木，也能受到感动。同样，恶贯满盈、穷凶极恶之人，在举手投足之间，所散发出来的肃杀之气，也会影响周遭的一切，让花木为之枯萎凋零，令人们为之畏怯恐惧。因而，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我们怎能不戒惧谨慎呢？

最后，以一首旧诗结束此文：

紫荆树下说三田，人合人离花不然。
同气连枝原不解，家中莫听妇人言。



张公艺以忍治家



民国初年，湖州蔡振绅先生所编辑的《德育课本》风行于世，在《德育课本》中“悌”篇列有“二十四悌”故事，其中就有“公艺百忍”。

张公艺，山东寿张县（今寿张为镇，属阳谷县）人，生于北齐承光二年（578年）。张公艺一生正德修身，重礼重义，忍让齐家，自北齐至隋朝九代未曾分家，阖家九百余，家道和睦仁善，被世人誉称“九世同居”。

唐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去泰山封禅，路经寿张县，听说张公艺一家九世同居，每朝都对其表彰，因此慕名造访张公艺家。唐

高宗问张公艺为何能九世同居。当时已经八十八岁的张公艺答道：“老夫自幼接受家训，慈爱宽仁，无殊能，仅诚意待人，一‘忍’字而已。”随即请纸笔，书写了一百个“忍”字呈给皇上，并讲述了“忍”的具体内容：“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姑媳不忍闹分居，婆媳不忍失孝心……”

历史上有若干个张公艺的故事。据说，当时张公艺还对高宗说：“我家不光人义气，我家的狗也与别家不同。”他又领着高宗参观了喂狗的情



形。全家一百只狗，有一只狗不到，这九十九只都等着不吃食，直等到齐了才吃，高宗也很惊奇。后来，有句俗语“张公艺的狗——缺一个也不吃饭”便源于此。据说，唐王想试一试张公艺这个“当家”的本领，就送给他两个梨，看他怎样处理，张公艺就让家人用石臼把梨捣碎放在水缸里，叫全家人来喝。

唐高宗听后连连称好，赐给他缣帛以示表彰，当即封张公艺为“醉乡侯”，封张公艺的长子张希达为司仪大夫，并敕修百忍义门。唐高宗亲书“百忍义门”四个大字。

此事记载于《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张公艺高寿九十九岁，于唐仪凤元年（676年）去世。后来，张家后裔在阳谷县寿张镇东街（也有说张氏为今河南省台前县人），修建了一座祠堂，叫“百忍堂”，正中供奉着张公艺，墙上还描绘着这些感人的故事。张氏的后人也以“百忍”作堂号，以相互勉励。

光绪《寿张县志》载：

影唐：相传因唐高宗幸张公艺居得名，去城十里。

唐张公艺墓：在县南十里，明正德六年，参政史公立石志之。

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东安

王永乐、隋大使梁子恭慰抚表其门。

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本末，书“忍”字百余以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今祀于乡贤祠。

光绪《寿张县志》还收录了6个资料：

1.《唐先贤张公祠堂记》 李仰

此文记载了建祠堂的情况：

时间：明代万历年间，1614年。

资金：捐俸。

大小：三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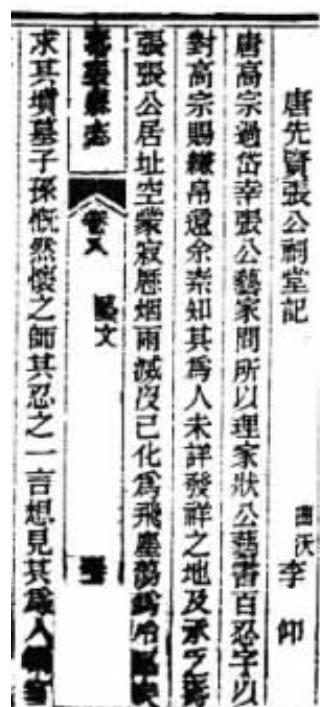
2.《唐先贤张公像赞》 李仰

3.《祭唐贤张公文》 李仰

4.《书张公碑阴》 李仰

5.《新建唐先贤张公祠记》 黄体仁

《书张公碑阴》记载了位置：旧寿张离县东北20多里，与张故里烟树相望。





唐先賢張公像贊

李仰

噫嘻張公豈其矯激蓋性生也與家世厯履遠不可考以爲止此忍之一言止矣既治壽張復見達玉之處其魂氣無不之也飄飄乎若羽化登仙也霏霏乎若風雲變幻也瑩瑩乎若皓月之照長空迢迢乎若煙水之互相吞吐也恍恍乎若楚鴻網絡惚惚乎若星河明滅也其精神往來至於如此余乃今知之余之知公者幾何公之自知者飛揚於滄海桑田之間也噫

祭唐賢張公文

李仰

吁嗟孤死正首邱越島巢南枝無知者且不忘其桑梓沉幽而楚秦顯而越吟者是爲豪傑之挺生者哉壽良張公藝九世同居唐天子過其閭書百忍以對駕旌表其門闈數百載

新建唐先賢張公祠記

黃體仁

張公名公藝唐壽陽人也至唐龍朔間及九世聚族而居無析產亦無間言北齊隋唐交旌其門高宗登岱宗幸其家問所以久居之故公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賜縑帛而還夫周之有懿德也糾合宗族爲賦棠棣尚有急難死喪間應之感如棠棣風微角弓響熾誰能依依久居不見謹薄乎誠古今

6. 武全文撰写的《百忍歌》（见本文后“附一”）。

总之，“百忍”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日益商业化的今天，留给人们启发是深刻的。为此，后来有人写了一副对联：

一勤天下无难事，

百忍堂中有太和。

以此劝勉大家与家人相处要懂得以和为贵，凡事退一步为对方留余地，才能家和万事兴，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

是啊，一个大家庭能有九代团聚，和睦相处，尽享人间天伦之乐，历来受到人们称羡，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我国古代社会，聚族而居，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容易引起纠纷，非百般忍耐，不能相安。张公艺大家庭的成员之间，能从忍耐到相安，再到融洽，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不应该简单、片面地去理解这个“忍”字，如果这样，还只是大家庭表面上的相安。要真正达到大家庭和睦融洽，其中必定蕴涵着伦理道德、文化素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更多的应体现在长辈和晚辈之间、同辈之间克服自我的谦让上，以及大家庭每个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爱上。时至今天，仍不失为极具教育意义的素材。可以想象，由家庭推及社会，即从每个家庭的和睦到一个民族的团结，再到世界各民族的大融合，这世界将是何等的美好！

附一：



百 忍 歌

百忍歌，歌百忍；
忍是大人之气量，忍是君子之根本；
能忍夏不热，能忍冬不冷；
能忍贫亦乐，能忍寿亦永；
贵不忍则倾，富不忍则损；
不忍小事变大事，不忍善事终成恨；
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失爱敬；
朋友不忍失义气，夫妇不忍多争竞；
刘伶败了名，只为酒不忍；
陈灵灭了国，只为色不忍；
石崇破了家，只为财不忍；
项羽送了命，只为气不忍；
如今犯罪人，都是不知忍；
古来创业人，谁个不是忍。
百忍歌，歌百忍；
仁者忍人所难忍，智者忍人所不忍。
思前想后忍之方，装聋作哑忍之准；
忍字可以走天下，忍字可以结邻近；
忍得淡泊可养神，忍得饥寒可立品；
忍得勤苦有余积，忍得荒淫无疾病；
忍得骨肉存人伦，忍得口腹全物命；
忍得语言免是非，忍得争斗消仇憾；
忍得人骂不回口，他的恶口自安靖；
忍得人打不回手，他的毒手自没劲；
须知忍让真君子，莫说忍让是愚蠢；
忍时人只笑痴呆，忍过人自知修省；
就是人笑也要忍，莫听人言便不忍；
世间愚人笑的忍，上天神明重的忍；



我若不是固要忍，人家不是更要忍；
事来之时最要忍，事过之后又要忍；
人生不怕百个忍，人生只怕一不忍；
不忍百福皆雪消，一忍万祸皆灰烬。

附二： 史书评价

《旧唐书·张公艺传》（五代后晋·张昭远、贾维等撰修）：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勒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

《资治通鉴·唐纪一七》（宋·司马光撰），《史纲评要·唐纪》（明·李贽撰）：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上。上善之，赐以缣帛。

《忍经》（元·吴亮）：

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亲临幸其家，问本末，书忍字以对。天子流涕，遂赐缣帛。牛山木评注：“张公艺寿张人，唐初名士，以治家有方著称。”

《清虚子》（明代）：

能其忍者，唯唐时张公一人而已。公自幼及老，事无论大小，人无论贤愚，莫不处之以从容，过之以乐易。在人见之为险阻者，公视之，皆坦夷也；在人见之为艰难者，公视之，若平易也。

《读通鉴论》（明末清初·王夫之）：

张公艺以百忍字献高宗。论者谓其无当于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恶知忍之为道乎！《书》曰：必有忍，乃克有济。忍者，至刚至用，以自强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观物情之变，忍可以挫奸邪之机，忍可以持刑赏之公，忍可以蓄威德之固。公艺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闻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孙仆妾尊背憎以激人于不可忍，目盈于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于



天伦，而能伤九世以齐堂乎。

《山东通志·孝友传·人物志》：

张公艺鄆州寿张人，九世同居。北齐东安王永乐，隋大使梁子恭皆旌表其门。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问公艺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艺乃大书忍字百余以进。高宗感其意，为流涕，赐缣帛。

《纲鉴易知录》(清·吴乘权)：

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幸其宅，问所以能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上。上善之，赐以缣帛。



王旦荐贤不图私恩

时下，为他人作了点功德，解决了点问题，就到处夸耀、“要挟”他人的事非常普遍。与此相反，原籍莘县的北宋宰相王旦荐人无数，可从来不让让人知道，其忠事忠君的高风，令人赞叹不已。

荐贤为国 不留私名

北宋宰相王旦，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其中在朝辅佐宋真宗赵恒二十年，任宰相十一年之久，近六年多是独自为相，当时国家一切大事，都在他考虑之中，特别是人才的录用和官员的升迁，更是他需要特别掌握的重要内容。

在宋代，官员的任命迁转，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推荐，这助长了官僚们奔走于权门的风气，而王旦则很反感来走他的后门。《宋史·王旦传》载：

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月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其人复来，不见也。

王旦用人和举贤有一个特点，平时很注意知人，但又不让当事人知道。对于平时流露才华或一向知名的人，王旦也不忙于推荐，而是在平时注意考察其言行，进行必要的谈话，了解其对朝政利弊的看法，或让其写成文字呈上，并从中选出优秀者。在做好摸底准备的基础上，到了需要提拔任命官员的时候，就秘密提出名单交给皇上，由皇帝决定是否录用，而不是以小恩小惠拉帮结派。朝中其他官员不知这种情况，争着推荐人，但最后入选的都是王旦所推荐的对象。



有个叫张师德的人，本来王旦很欣赏，曾多次同真宗说起。但他两次去王旦家，王旦都拒而不见。这使张师德很恐慌，以为别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于是又转托向敏中（另一位宰相）去问。王旦说：“张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耳。若复奔竞，使无阶而进者当如何也？”（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由此看来，王旦颇为留意奖掖后进，特别是汲引那些无权无势的读书人。

举荐朝中同事，王旦更是甘做“无名英雄”，因此亦引起不少人的误解和怨言，但他仍是一直如此。计其一生，王旦生前推荐大臣十余人，后来只有两个没有当宰相，说明他认识人、了解人是很有眼力的。但这种选人荐人的情况，对外绝对保密，排除各种干扰，保持了人事工作的纯洁性。王旦死后，史官修撰《真宗实录》时，检阅内廷档案中保存的奏章底稿，才发现朝中的官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旦推荐提拔的，大家才知道自己错怪了王公。这事不像时下许多人，托付的事不管办与不办，一律说已经向领导汇报了，或在办理中，一味以私恩。

在荐人唯贤的同时，王旦对自己的弟弟、儿子、女婿等亲属，因自己的工作关系，需要避嫌，不让他们在朝中担任要职。这种“避嫌”，从制度上避免了“任人唯亲”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恶劣现象。这从思想道德上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传统，直到今天也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寇准求情 碰到钉子

由于王旦反感走他的后门，寇准就碰过钉子。《宋史·王旦传》载：

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关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

王旦任相期间，由于王旦的推荐，寇准曾一度出任枢密使。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些事，也颇可见王旦的肚量。“中书有事关送密院，事碍诏格。寇公在枢府，特以闻。上以责公(王旦)。公拜谢引咎，堂吏皆遭责罚。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旧诏。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与密院。’吏出自白寇公。寇大惭。翌日见公曰：‘同年，甚得许大度量！’公不答。”（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留下记载的，还有类似的



事情：

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印，寇公须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宋·赵善僚编《自警编》卷一）

有次，寇准从枢密使位置上外放为武胜节度使，按照宋朝制度，外放高官可以挂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同于宰相）的虚衔赴任，寇准未能免俗，曾私下托人向王旦请求给他挂个宰相虚衔。王旦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的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但当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应当给他个什么虚衔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已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与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见《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条”）后来，王旦病危之时，还不顾真宗异议，坚持推荐寇准为下任宰相最佳人选。

全力退奸 大度依然

不过，王旦并非好好先生，对那些有才无德或奸佞之徒，即便皇帝想任用，王旦也是不遗余力地斥退。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真宗几次想要任命被当时人称为“五鬼”之一的王钦若为宰相，都被王旦所阻止。他对真宗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在这里，王旦搬出了祖宗法和公议这两大杀手锏，使得真宗不得不作罢。直到后来，在王旦去世之前，王钦若才当上了宰相。他愤愤不平地对人说：“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

虽然如此，在同他素所厌恶的人相处时，王旦也能保持大家风度。《仕学规范》（宋·张磁撰）卷十一载：

真宗出《喜雨诗》示二府，聚看于上前。王文正公袖归，因喻同列曰：“上诗有一字误写，莫进入改却。”王冀公（王钦若）曰：“此亦无害。”钦若退而阴有陈奏。翌日，上怒谓公曰：



“昨日朕诗有误写字，卿等皆见，何不奏来？”公再拜称谢曰：“昨日得诗，未暇再阅，有失奏陈，不胜惶惧。”诸公皆再拜，独马知节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钦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辩，真宰相器也。上顾公笑而抚喻之。

大概这样的事很多，所以《宋史·王旦传》对王旦的胸怀总括言之：“旦任事久，人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辩。”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中赞扬了与杨亿交往的三个著名人物，其中就有王旦：“其王文正公居宰府仅二十年，未尝见爱恶之迹，天下谓之大雅。”（见《范文正公集》卷七）

“三槐王”第一人归葬莘县

王旦祖籍莘县一直无争议。唐代时，姬姓王氏后裔王练出任莘县尉，携家迁居莘县（《初纂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尉，遂徒莘。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此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有记载）。王练的后代中有王言者，王言生子王彻，是五代后唐进士，曾任左拾遗，赠侍中。王彻之子祐，《宋史》有传，说他“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十六岁时，一封书信受到时任中书令的大文人桑维翰赞赏，从此“名闻京师”。后周时期，王祐后任过魏县（属河北）、南乐（今属河南）知县，怀才不遇，抱负无由得展。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王祐以监察御史身份任兗州（今属山东）知州，5年后改任知制诰。其后，又任过潞州（今山西长治）知州和大名府（今属河北）知府，后来因替符彦卿仗义执言被贬为地方官。直至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才以六十四岁的年龄出任兵部侍郎，但任职一个多月即病死。王祐才华横溢，英名远播，文才人品皆在同僚之上，因而在朝中声誉颇高，大家都认为是当宰相的材料；但其仕途却是才能难展，坎坷连连，以至壮志未酬，郁郁而终。他心有不甘，又见其子王旦聪敏过人，前程可喜，便于逝世前不久亲手在自家院中植槐树三株，十分自信地预言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王祐的三个儿子果然个个聪颖，先后踏入仕途；二子王旦脱颖而出，一步步登上相位，使王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因此，王旦称得上是三槐王氏的最著名人物。

王祐有两位夫人：任氏和边氏。王旦系边氏夫人所生。边氏母家在祥符县新里乡大边村（今属开封新里乡）。王旦病故后，子孙将其遗体暂厝于其外祖家大边村，遵王旦遗嘱，葬仪从简，甚至连墓碑也未立。直至 38



年后的至和二年（1055年），时任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的王旦之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言及欲为其父立碑之事，赵祯慨然应允，并亲书“全德元老之碑”六字，嘱王素刻于碑额；又下诏命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王旦撰写碑文。碑文中说：“观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谓至哉。是以君明臣贤，德显名尊，生而俱享其荣，歿而长配于庙，可谓有始有卒。”于是，王素受钦命为其父立碑，并按照三公葬格建了墓道，配置了石人石马。

旧时的大边村现在是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厂址，1957年建厂征地时，此地尚有部分石人石马，当是王旦墓遗物无疑。陵墓建设竣工后，王素又在开封县城东门外建王氏宗祠，因有王祐手植三槐之事，故宗祠院内亦植槐树三株，并将宗祠命名为“三槐堂”，三槐王氏之称由此渐闻于世。可见，第一个三槐堂建于开封。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王素病逝。鉴于辽兵屡犯宋都，京城一带战事不断，加之黄河不断泛滥，祖坟连连面临被淹之厄，时任宗正丞的王巩在葬父的同时，将祖父王旦的遗骨迁至故里莘县套庙王村重新安葬，石碑、翁仲、石兽、墓表的设置皆与开封之墓相同。同时建宗祠三槐堂，供奉列祖列宗牌位。可见，第二个“三槐堂”由王旦之孙王巩建于莘县套庙王村。明正德《莘县志》载：“三槐堂，在县治东北二里旧群贤堡。”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知湖州（今属浙江），王巩亲往拜访，请这位忘年交为自家的宗祠题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明正德《莘县志》作《三槐堂序》）以记之。此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等文集，轰动一时，三槐王氏之名由此愈加被众人熟知。

三槐王氏自王旦之后，可谓人才济济，名人辈出。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吉、王震、王伦、王楠在《宋史》中均有传记，可见其影响之大。正因为三槐王氏族中多贤人，故处于莘县的三槐王氏发祥地王庄一度被称为“群贤堡”，至清代中叶，因村中出现了一座庙中有庙的套庙，当地人皆称其村为“套庙”。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位，仁者必有後。三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賊之壽孔頽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皆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

三槐堂序



王”，群贤堡之称逐渐被人遗忘。近年，经政府批准，套庙王村已重新改名“群贤堡”村。

三槐堂历经曲折 至今犹存“三宝”

据莘县旧志记载，王旦祖茔在莘县城东北二里之群贤堡村东，占地十亩，“旧有神道碑数通及石人、石兽、望柱等，至明初尚存”。

永乐年间改修会通河闸，将陵中之石刻件拉去镇邪，王陵之上物遂丢失殆尽。

成化十七年，莘县知县贾克中重修王旦墓。

弘治四年，知县顾岩修补坟后土堤甚高。十三年，知县孟隆重立王文正公墓碣一通。

从王巩在套庙王建王旦墓，至明弘治年间重修王旦墓，历时约四百年。

明正德《莘县志》中所列“莘县十景”，“郊外名坟”是其一，指的就是王旦墓。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套庙王之三槐堂圮毁，知县遂将原社学的房屋加以修缮，定名“三槐精舍”。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知县蒋克家在城内鼓楼东路南（今工商银行）重建三槐堂，内供三槐王氏列祖列宗牌位，厢房系学子读书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槐堂被拆，“三槐堂”匾额被王氏后人辗转保存下来，现荐莘城镇王化村。三槐堂碑石被压入工商银行楼基，三槐堂外景照片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研究“三槐堂”达18年之久的莘县政协原副主席杨巨源说，正是三





槐堂“忠信仁厚”的家风和“清廉、严谨”的官风，形成了千百年来“三槐文化”的精髓。据了解，目前，“三槐堂”祖先留给莘县三件宝：三槐堂匾、三槐堂石碑和一代名相王旦之墓。

三槐堂匾现存莘县王化村三槐王氏后裔王立申

家中，是旧时莘县城内三槐堂的唯一见证。三槐堂牌匾黑底金字，笔力遒劲，行家分析认为已非苏轼原书（也有传是欧阳修或郑板桥所写，但无落款）。据王立申回忆，莘县城内的三槐堂坐南朝北，东邻火神庙，西至鼓楼口，南接考棚，北靠茶叶坑。院内有三棵槐树，西边两棵，东面一棵，还有神道碑数通。堂内有神台、神桌，供奉着王祜、王旦等10余人的木牌位，是王氏的宗祠。

三槐堂碑石被压入工商银行楼基后，一直没有重见天日。

王旦墓仍在，每年有王氏海内外后人来此祭奠。

继“郊外名坟”列入莘县“十景”外，后又将“祐堂槐影”列入莘县



三槐堂外景

八景。明正德《莘县志》载有众多赞颂诗（见左图）。

王旦荐贤的故事，千古传颂，并被编入旧时的《德育课本》中。在今天，他的精神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王門代代產多賢	中都楊鵠	張淮	孫宋	趙缺	左師頤
三槐庭古無遺跡縱有三槐亦養然物化人亡陰德在					

枯堂槐影大根芽生意多歸精善家對日婆娑呈綠色
當坤蹠密印黃華子枝條連雲仍遠揚葉露蕙陰覆加
都道流芳原有本枯堂槐影大根芽

枯堂槐影大根芽生意多歸精善家對日婆娑呈綠色
當坤蹠密印黃華子枝條連雲仍遠揚葉露蕙陰覆加
都道流芳原有本枯堂槐影大根芽

綠草紅花遠盡臺人中風月倍殊常三槐哉指經双手
一脉芬芳諒三郎雲譲枝頭清影密日晴階下午陰涼
無情最恨春來鳥啄得黃花滿地香

綠草紅花遠盡臺人中風月倍殊常三槐哉指經双手
一脉芬芳諒三郎雲譲枝頭清影密日晴階下午陰涼
無情最恨春來鳥啄得黃花滿地香

綠草紅花遠盡臺人中風月倍殊常三槐哉指經双手
一脉芬芳諒三郎雲譲枝頭清影密日晴階下午陰涼
無情最恨春來鳥啄得黃花滿地香

喬木由來屬大家東皇有意厚生芽根枝洞兆三公象
孫子綿延一脉華日燉清陰迷鶯雀風搖綠影動龍蛇
多情只爲閑金葉縱古歸來日已斜

喬木由來屬大家東皇有意厚生芽根枝洞兆三公象
孫子綿延一脉華日燉清陰迷鶯雀風搖綠影動龍蛇
多情只爲閑金葉縱古歸來日已斜

槐堂景絕過蓬萊槐樹青青又呈秋風動枝頭清影亂
雨餘葉底翠雲堆太陽西墜剛收去明月東升又送來
春半憑誰來拉我一觴一詠謾徘徊

槐堂景絕過蓬萊槐樹青青又呈秋風動枝頭清影亂
雨餘葉底翠雲堆太陽西墜剛收去明月東升又送來
春半憑誰來拉我一觴一詠謾徘徊



笪一顺车去留犊



“石牛流芳”石刻

阳谷县城中心广场东南角，有一座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老石桥，名叫博济桥，是过去北通东昌、南达寿张、东去张秋的必经之路。因桥南西数第二块栏板上雕有一幅“石牛拉石车”的画面，当地的老百姓称它为“石牛拉石车桥”。“石牛拉石车”石刻正式名称为“石牛流芳”，这里面还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光绪《阳谷县志》载有《石牛流芳》诗一首，作者在序中说：

邑有县丞笪（dá）公，居官清廉，莅任之时，惟一牝牛驾车而来。及解任日，牝生一犊，公谕令仆人留犊于邑，仍驾一牝牛去。后人思其德，因刻其像于博济桥上，至今犹存。

已驾牛车子母分，犊鸣悲切不堪闻。

石桥遗迹今犹在，耆老指谈如见君。

县丞笪公叫笪一顺，江西德兴人，明万历年间来阳谷任县丞，驾一牛车来到阳谷。在任数年，清廉俭朴，政有惠德。卸任之日，牛生下一犊，



博濟橋 在東門外其閘扇之半乃壽張抵東昌南
北通衢歲久堙下每雨後注水或至沒頂致令東
西張秋之路梗塞不通其閘之居民隔若兩泮然
明萬曆二十五年知縣傅道重命義民董憲章架
石橋三空旁設欄杆以翼之勸其碣曰博濟改故
道于東偏之高阜焉今東關亦望鄉邑天爵會更建橋空

亦留在阳谷不复带去。他说：小牛犊是在阳谷生的，吃的是阳谷的草料，应该是阳谷的财产，我怎么能据为私有呢？两袖清风，一车简素，感人至深，使阳谷人不能忘怀。

博济桥载于康熙五十五年《阳谷县志》（见左侧书影）。

博济桥由桥基、桥身两部分组成。下有石砌拱券式桥洞三个，上有两排浮雕石栏，每块石栏板上均雕刻有山水、人物及鸟兽图案，如“八仙过海”、“寿星下棋”、“柴王推车”、“天马行空”、“铁杵磨针”、“农夫开山”等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而在桥南侧西数第二块栏板上，雕有“石牛流芳图”。

画面中，笪公驾车而去，老农牵犊而回，驾车人、牵犊人、母牛、小牛犊均回头相望，难舍难分。

“石牛流芳”石雕是珍贵的，整个博济桥也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但是，笔者认为，它的珍贵不仅是工艺精巧、形态逼真。石桥的雕刻，刀法苍劲有力，古拙素朴，浮雕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人物造型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它感人的内容，透出了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此石刻成为阳谷一处标志性的建筑、倡导清正廉洁的一座丰碑。因为“刻其像于博济桥上”，寄托了人民对清官的赞誉和思念。笪公驾车远去，小牛犊留下了，一条缰绳栓在了阳谷人的心上。由明代，经清代、民国，直至现在，其间花开花落，月圆月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车去留犊”这个真实的故事，代代流传民间。看过之后，人们不禁为笪公清正廉洁的精神所感动。“车去留犊”的故事堪称廉洁自律、执政为民的经典之举。

400 多年来的风雨沧桑，博济桥仍保存基本完好，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它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阳谷县旧城改造，东关西部规划为广场，桥保留在广场东南角，遂在桥旁树立标志牌。2004 年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县政府将广场命名为博济桥广场。后来，阳谷县城区划分为三个办事处，所在地因此桥命名为博济桥办事处。

康熙五十五年《阳谷县志》对笪一顺的记载很少，也没有写明具体时间，仅在历任县丞介绍处记录有这样一个资料（见下页图）。



据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的张长城先生介绍：

最近发现了一块断碑，共190个字，其中依稀可辨的有“疆场威声播邻国”、“汉室犹存，灵彻今古”等。落款是“县丞笪一顺、教谕马羲祥、主簿……督工善人寿官董宪章同立。王大秋(刻石)”。可见，这块断碑是笪一顺等主持，由董宪章捐资所立，是阳谷关帝庙的碑，关帝庙也有可能是董老先生捐建的。另据了解，阳谷县南关董村董氏家族还保留有县丞笪一顺为老乡贤董宪章撰写的碑文。

康熙五十五年《阳谷县志》载：

傅道重，直隶沧州人，万历二十二年以举人任，有修学功，见艺文韩学信《修学记》。

此志中韩学信《重修庙学记》撰于“明万历二十五年”，文中说“是役也，邑丞孙君杜、主簿杨君国聘……”说明当时的县丞还不是笪一顺而是“孙杜”。孙是万历二十二年任县丞，而博济桥也建于万历二十五年，此时笪一顺很可能已经离开阳谷，为感其高风，于桥上雕刻了“石牛流芳”。

同时，对照上面县丞任职表可发现，杨鹤征任职是万历十八年，笪在杨之后，任职时间似应是杨之后、孙之前。换句话说，孙有可能就是笪的前任。又参考他们都与董宪章熟悉交往的情况判断，笪任职似应为万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间。由此推论，笪一顺应比知县傅道重早来阳谷三四年，但均与乡贤董宪章熟悉。

从历史上看來，笪一顺来阳谷任县丞时，明朝的腐败已是十分普遍，一个突出的事实是：神宗万历皇帝为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欲望，派出大批亲信宦官到民间搜刮民脂民膏。宦官贪赃渔利，地方官员也竞相鱼肉百姓。就在这种背景下，笪公赶着一头牝牛，驾着一辆牛车，从江西来阳谷，任满后又从阳谷回江西。可想而知，一路上千里迢迢，沐雨栉风，笪一顺要走多少日子，路上会遇到多少骑马坐轿的达官贵人呀！但他傲视无数官宦轻蔑的目光，自身泰然处之，昂然而去。

笪一顺车去留犊，留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石牛流芳”，虽不是他的本意，却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孫杜直隸肅寧人萬曆二十二年以設貢任
王繼勤陝西西寧人萬曆二十六年以歲貢任
楊鶴徵河南桐柏人萬曆二十八年以選貢任
笪一順江西德興人以知印任
王詰山西平順人萬曆二十七年以選貢任
莊緒光江南金壇人萬曆二十八年以知印任
已上俱據舊志以後失正廳題各記無可考
因朝劉鑑江南婺源人順治二年任

县丞任职表



武训乞讨兴学

918 年前，大文豪苏轼以“匹夫而为百世师”来称赞“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842 年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再次重複这句话，不过，他称赞的是一个目不识丁、连正式名字也没有的乞丐武训。



此匾是 1986 年 6 月由刘用舟（曾任原临清武训小学初级部主任）、李耀堂（曾任临清市工商联主席）、王宝礼、王宝仁、王宝群（三人为继承武训遗志矢志办学的原武训学校校长王丕显之孙）赠送。题匾者为杜向春。

一个乞丐，缘何能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比肩呢？

据《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载：

武训（1838—1896 年），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市东昌府区西北）柳林镇武家庄人，无名，因排行第七而被人称为武七。武七羡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去私塾偷听读书声时遭到塾师的呵斥。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九岁时，武七跟着母亲到处要饭。十五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十七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



武训行乞图



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诨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家做工三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癫，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而是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那一年，武七二十一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饱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

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诨号。他无动于衷：

义学症，没火性，
见了人，把礼敬，
赏了钱，活了命，
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他行乞时，把要来的钱都积存起来，要来的干粮，自己只吃碎烂的，好的完整的拿去卖了，变成现钱积存下来，作为义学的基金；甚至捡菜根、芋尾来吃，以节省他要来的菜和饭。他说：

吃得好，不算好，
修个义学才算好。
食菜根，食菜根，
我吃饱，不求人，
省下饭，修个义学院。
吃芋尾，吃芋尾，
不用火，不用水，
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为了积攒钱，武七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一带行乞，并做过各种



各样的农活、杂要、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武七积来的钱又被姐夫骗去后，他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士绅，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顾家人亲友，但若乡亲真有困难，他从不吝啬金钱。如三十八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七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在他五十岁觉得有力量办学的时候，他跪请进士杨树芳先生——一位急公好义的绅士来替他筹划兴办义学的事。杨树芳非常惊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来劝武七成家。武七说：

不娶妻，不生子，
修个义学才无私。

杨树芳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并向当地的绅耆募集不足资金。武七搬砖、买木料、亲自做工，在杨树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时间，崇贤义塾于1888年春天开学。从二十一岁立志，到武七五十七岁时亲眼看见义学开学，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武七亲自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七十几个学生分经学、蒙学两班。武七跪请杨树芳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但他并不放松，跪请睡懒觉的教师教课，跪求学生不要调皮旷课。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义塾创办之初，他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教师，请学董和热心赞助的绅士们作陪，但他自己并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窑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



人士的尊重与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杨树芳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春煦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拜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见他疯疯癫癫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武七说：

我不疯，我不病，

一心只害义学症。

一面跟巡抚谈话，一面还不断地捻着线头。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200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这个无名的同胞赐名“训”。从此，这个名叫武训的穷苦人教化、训导了几代中国人。

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但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

己未，予积资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

朝廷还授予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在他五十三岁那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为景慕武训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捐出来，想为穷孩子们办第二所义塾。武训听说后，主动找到了他，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奉献出来，一起创办了馆陶杨二庄义塾。武训还感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捐给他200两银子。加上自己的旧存，武训在临清创办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

在第三所义学创立的那年，武训已经五十八岁了。他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清史稿》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



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在武训辞世的五十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世界，首先感动了他的同胞们：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记。

1920年左右，临清西路指挥兼专员赵仁泉，在临清进德分会中间修建了一座纪念堂。

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武训汉白玉雕像。

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人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武训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承泽把灾民迁移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段承泽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

武训乞讨办“义学”的故事传入英租界。英总督感到了一阵阵从未有过的恐惧和震撼。他重新审视了一番中国地图，仰视着这只昂首挺胸的“雄鸡”，喃喃自语道：“他使我看到了一个不死的民族！我们永远不可能战胜它！”是的，只要有这样的义人存在，中华文化就不会亡，中华就不



会亡，宇宙乾坤就不会有绝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武训被埋进了历史。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他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胡乔木在1985年如此说过：

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改革开放以来，临清市在武训生前兴义学的御史巷义学（今临清实验小学）内建起一座武训纪念馆。

其实，这个乞丐绝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

在武训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但谈论武训，最令人难解的是他那三天的昏睡，我们，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那昏睡的意义。也许那是天启，那是中外历史上无数圣哲、使徒们觉悟前的“高峰体验”。但与众不同的是，武训找到的却是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人们多以为他是农民阶级的代

邊留修義學不用愁餘則事事有歌語意類此蓋自恨以愚見欺	武訓山東堂邑武家莊人幼孤依兄母居成童傭力於艾寨莊某
家性篤摯土人戲呼爲豆沫言其糊塗也服役數年主人欺其愚	昧所傭值冤憤無憇遂惆悵若迷時清季人人辯髮獨雄作聳徒
惟額角留片髮如桃式又左右難留不常棄其家日行村墟間口	喃喃如歌如訴詞俚韻叶聽之皆修義學事如蓬髮云左邊剃右
九十一	武訓傳 陳恩普州人



武義人敵縷記

李伯驥人

乙巳春余主講柳林鎮之武訓義塾周視庭宇見有敵縷一堆灰
埋塵封雀啄鼠囁有年矣詢之始知爲義人故物余曰嘻士君子
學成名立年湮代遠卽片紙隻字之遺留人皆什襲珍藏其實貴
逾於珊瑚拱璧非重其物重其人也義人手無尺布斗粟之資慨
然以創義學爲己任行乞鄉里見有棄縷俯而拾之聯綴成團售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一百

之繩人結而爲繩堅韌異常人爭購之以此獲利積累既久巨資

表，他多次说过为穷苦孩子办学的话，也说过不要忘记穷人的话，但是，在他的三十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缘、阶层、阶级的意识，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阶层本位做事。这种立足于个人本位就是一种可示范的镜子，照见自我的独立不依。“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状态所归属的底层并不真的懂得他，那个阶层的人们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层士绅多从他那面镜子中读懂了人生的可能意义。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他“兴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

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这个文盲像历史上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一样，顿悟成佛，那一道强光如醍醐灌顶，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负起人间大道。慧能是要开宗立派，为无数同胞寻找救济解脱之道。武训却仍旧以身见证，他像大阿罗汉、使徒、圣愚、义人、侠客，自身清明，却回向尘世，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的人生。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他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径。

这个在人性上有着革命觉悟的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筵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武训在历史上留下了甚深的烙印，本地县志也多有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堂邑县志》重镌本载有《武训先生事略》（文中有“賚志以



歿，是年为清光绪二十二年夏四月戊子日”，可证此文为武训去世后新增)；

《民国临清县志》载有《武义人敞缕记》和《武训传》(见前页照片)。

“匹夫而为百世师”，对武训来说，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附一：

武训兴学

(台湾岛南一版《国语课本》第九课)

莫叹苦，莫愁贫。有志竟成语非假，铁杵磨成绣花针。古今多少奇男子，谁似山东堂邑姓武人！武先生，单名叫做训。兄弟都早死，父母又不存。饥寒交迫难度日，沿门托钵受苦辛。武先生，做乞丐，有深心。他见邑人知识浅，少年失学是原因。长恨自己力薄家又贫，哪有金钱办学校，教育清寒子弟们！

武先生，一边去乞食，一边自沉吟：将来若要办学校，先得积蓄基本金。从此乞食更努力，遭人侮辱尽容忍。每日只费钱两枚，买个馒头囫囵吞。忍辛耐苦二三载，果然积下六千文。堂邑有个富家翁，丰衣足食冠四邻。武先生，走到富翁家，跪在门前不起身。富翁当他是疯子，门外哀求如不闻。武先生，跪了六日并六夜，富翁才来问原因。武先生，貌温顺，语诚恳：“小人有钱六千文，想托贵人谋子金。贵人心肠善，定肯助孤贫。”富翁口答应，心自惊，乞丐竟然能储蓄，节俭精神莫与伦。

富翁既允准，武训喜万分。只要积满一千文，立刻送进富翁门。十多年，一转瞬。本金生利息，利息做本金，总数达到几万文。

武先生，创学校，不稍停。租借古庙几间屋，粉刷门墙气象新。学生招集贫家子，教师聘请宿学人。有人见他是乞丐，存心推托不愿任。武先生，跪在地上不起身，使他不得不应允。开学日，更殷勤。备酒菜，宴嘉宾。教师坐首席，陪伴有乡绅。有人见他是乞丐，坐著不食也不饮。武先生，又双膝落地不起身，使他不能不沾唇。逢朔望，进校门。遇见教师能尽责，拱手屈膝谢殷勤。遇见学生不好学，跪地劝诫泪涔涔，教师学生都感愧，讲习不得不认真。武先生，年到五十九，仍然乞食储钱文。创设学校有三所，教育子弟千余人。有的就工商，有的勤耕耘。他们衣食都无



虑，只有先生还辛苦。路上相见心不忍，齐来迎养报深恩。武先生，不答应，并对大家说：“但愿养我志，何须养我身！”

附二：

清史稿·武训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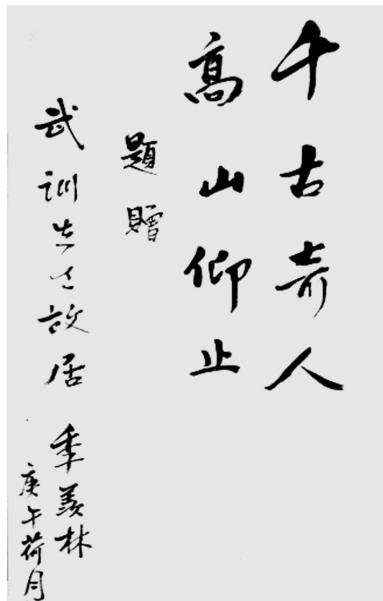
(列传二百八十六 孝义三)

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于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资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年，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蓝缕蔽骭，昼乞而夜织。或劝其娶，七谢之。又数年，设义塾柳林庄，筑塾费钱四千余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塾为二级，曰蒙学，曰经学。开塾日，七先拜塾师，次遍拜诸生，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常往来塾中，值师昼寝，默跪榻前，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师生相戒勉。于学有不谨者，七闻之，泣且劝。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尝至馆陶，僧了证设塾鸦庄，资不足，出钱数百缗助其成。复积金千余，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县有嫠张陈氏，家贫，刲肉以奉姑，训予田十亩助其养。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娶，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歿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县人感其义，镌像于石，归田四十亩，以其从子奉祀。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疏请旌，祀孝义祠。

附三：

1991年夏季羡林为

武训故居题词





范筑先敌后抗战

抗战初期，在国家危急的大是大非面前，有一位国民党人毅然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誓死不渡黄河，坚持抗战到底，在中国的鲁西北勇敢地树立起了一面抗日旗帜，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高度评价与赞扬。

他就是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聊城县县长范筑先。

范筑先（1882—1938年），原名金标，字竹仙，1881年12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今属于河北省）南彦寺村。1904年因遇灾荒，离开家乡投奔军队。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陆军连、营、团、旅长等职务，后任西北军冯玉祥部第十三军少将参议。1931年后，历任韩复榘部第三路军少将参议、山东沂水县县长和临沂县县长。1936年11月到聊城，就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聊城县县长。1938年11月14日，在保卫聊城的战斗中壮烈殉国。五十八岁的他，被国共两党同称为“抗日老人”。



范筑先将军戎装照



“我一生愿做这样一个傻子” ——治军理政，清廉为民

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范筑先对军阀混战就极为厌恶痛恨。他认为中国人自己打自己，既有损自己的国力和形象，也给外敌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离开军队回到家乡隐居起来，并更名为“竹仙”，表示要保持竹子一样的气节。在隐居期间，他仍然勤奋读书，立志效仿古代的仁人志士，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道路。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们高举“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大旗，所向披靡，极大地震撼了全国人民，也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冯玉祥将军也在绥西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挥戈南下，东出陕西潼关，进抵中原地区，准备和北洋军阀开展斗争，进行国民革命。

面对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形势，范筑先非常振奋，在冯玉祥将军手下的其同乡第十三军军长张维玺的邀请下，他毅然复出，投入国民革命军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统一中国的战斗行列。他更名为筑先（取筑路先锋之意），表示其革命的决心。由于他具有多年军旅统兵的经验，因此，在战斗中，他指挥有方，颇有建树，被冯玉祥将军委任为高级参议。

但是，出乎范筑先想像，中国之后的政治局势变幻无常，内战仍然不止。1930年，又爆发了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军队上百万，范筑先也随部队参与了这场混战，这场战争导致30多万人死伤。目睹这些情形，范筑先非常痛心，决心不再在军队内担任职务，拒绝去陕西的邀请，立志在地方上做一些工作，为民众谋利益，便到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部下担任参议。1933年初，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沂水县县长，后又担任第三路军指挥部军法处处长。

1933年10月，范筑先被调任为临沂县长。在县长任上，他微服私访，革除旧弊，带领县政府官员参加体育锻炼，



范筑先将军照



打击贪污腐化的官员，并常走访民间，了解人民疾苦。他还严禁赌博、吸毒，并提倡剪辫子、放足，鼓励妇女参加工作。他还鼓励农织，每逢灾荒之年，组织救济。范筑先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造福了当地老百姓，也给当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正气，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护。

范筑先生活极其简朴，但对有关民生大事多慷慨投资或集资兴办。他在任临沂县长期间，曾架桥修路，修整市容，兴办医院，扶植教育事业，为民众做了不少好事。由于他不贪财，因此被一些旧官僚们嘲笑为“傻子”。范筑先则自豪地说：“我一生愿做这样一个傻子。”

1936年7月，范筑先奉令调离临沂县，全城民众夹道欢送，赠送范筑先县长一碗清水、一块镜子、一块豆腐、两根小葱，以表彰范筑先主持县政时明镜高悬、一清二白的风尚。由于欢送的人太多，范筑先用了半天时间才走出县城。

“谁爱国爱民，我就赞成谁”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范筑先曾在旧军政界任职达30多年，但他一直坚持了一个传统士绅的人格修养，洁身自好、体恤百姓，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操。他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军不抵抗的策略，赞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常说：“谁爱国爱民，我就赞成谁；谁损害国家和民众，我就对谁抗争。我不怕承担责任。”

1936年冬，范筑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任聊城县长。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彭雪枫以探望同学的名义到聊城，与范筑先几次接触，使范筑先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合作的主张，这使范筑先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他邀请共产党员到聊城协助抗战。范筑先还委任共产党员姚第鸿为专署秘书。10月，中共山东省委通过余心清，从第三集团军政培训班中挑选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12名少校干事和240名上尉服务员到聊城。接着，又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到聊城，以省委代表的身份统一领导鲁西北党的工作和统战工作。这些都得到范筑先的许可。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范筑先在聊城创办了几所抗日干部培训学校，邀请共产党员做教员。他还发动群众组织抗战群众团体，如妇女



救国会、战地服务团、青年救国会、儿童救国会等组织。他还先后主持出版了《山东人》、《抗战日报》、《先锋月刊》、《战地新闻》、《战地文化》、《战线》等刊物，把鲁西北抗日局面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

1937年10月5日，日军占领德州、临清等县。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大为惊慌，为保存实力，他令属下第三集团军及各地军政要员，仓皇南撤，致使津浦线北端门户顿开，大好河山沦入敌手，铁蹄践踏，民不聊生。范筑先接到韩复榘的撤退命令后，率第六区军政人员于10月16日晚撤出聊城，带领军民退到黄河北岸的齐河渡口后停下来。12月22日，日军进攻黄河渡口，北线局势严峻，韩复榘既不投降也不抵抗，又率领下属弃地逃跑。此时的范筑先看见人民流离失所，走到黄河边又返回来了，他不忍心。何况，如此众多的百姓、辎重如何一越天堑？此时，范筑先又接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劝告，催促撤退的电话。

“誓死不渡黄河南” ——通电全国，抗战到底

面对中华文明发源之水和追随他的黎民百姓，范筑先决定不再后退，他对部下说：大敌当前，我们守土有责。不抵抗就撤走，何颜以对全国父老？我决心留在黄河以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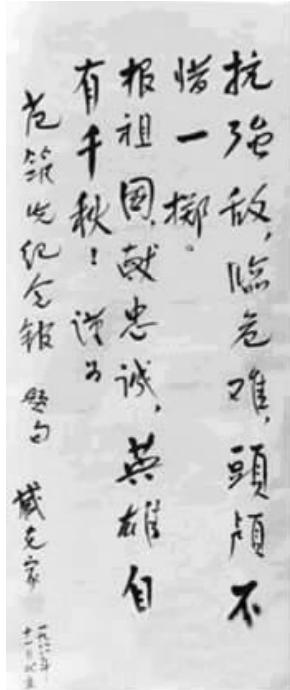
次日，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全文发表了范筑先“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陆海空军大元帅蒋 钧鉴：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

全国各报社、各通讯社、各机关、各学校、各人民团体钧鉴：

既自倭奴入寇，陷我东北。铁蹄所致，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蹈水火。午夜彷徨，恤血椎心。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记，鞠躬尽瘁，亦所不辞。所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颈南望，不胜翘企。

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
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叩 品（19日）



臧克家为范筑先
纪念馆题词

这封义薄云天的电文，简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它极大地鼓舞了鲁西北甚至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热情。在统率几十万大军的韩复榘不战而逃的时候，范筑先以区区一个地方专员，没有正规军队，只依靠地方武装和民众的支持，居然与日军周旋了一年多，身经大小战斗 80 余次，歼灭敌人 5000 人以上，捍卫县城 36 座，最后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成为民族英雄！

皓电发出之后，范筑先曾派人分赴武汉、西安，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八路军总部求援，不想遭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冷遇，却得到八路军驻武汉、西安办事处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选派数十名干部及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到鲁西北工作。同时，八路军总部还派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部挺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策应、支持范筑先坚持鲁西北抗战。1938 年 6 月，范筑先赴河北威县，与八路军 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会面。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致函范筑先，高度评价他的爱国壮举和贡献。范筑先深受鼓舞，不禁感慨地说：“当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惟有听共产党的话。我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从此，在抗日的路线上，范筑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范筑先采纳中共鲁西特委的建议，并在共产党的协助下，迅速在鲁西北地区恢复建立了 27 个县政府，其中 13 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要坚持鲁西北抗战，就必须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中共鲁西特委一方面协助范筑先收编遍布鲁西北的各种游杂武装，并派出政工人员对其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创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作为支持范筑先坚持鲁西北抗战的骨干力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使范筑先统辖的部队，由一个保安营、不足 1000 人，迅速发展到 35 个支队、3 路民军，共约 6 万人。这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合起来的部队，虽然成分复杂、装备低劣，但在范筑先的统率之下能团结战斗，共赴国难。



指挥征战，收复失地 ——开辟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

抗战一爆发，范筑先就把胡子留起来，言“不打跑鬼子就不剃胡子”。他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对敌，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从1937年起，各部队在范筑先指挥下，先后组织了梁水镇战斗、激战界牌、血战南镇、收复范县、濮县、黄庄截击战、济南战斗等。经过一年的作战，到1938年夏天，鲁西北境内基本上肃清了日伪军，政令通达30余县，军事势力范围更广，开辟了一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击和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11月22日，驻临清的日军高桥联队派出一支30余人的骑兵队，到聊城侦察骚扰，遭我守城部队打击后向北逃窜。这时，范筑先正在清平收编武装，闻报后，立即亲率警卫队、政训队，奔赴聊城以北的梁水镇截击敌军，毙敌队长以下数人，缴获战马4匹。这是鲁西北抗击日军的第一仗，虽是小仗，但在当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纷纷南退的情况下，给气焰嚣张的日军迎头一击，极大地鼓舞了鲁西北抗日军民。

日军联队长高桥恼羞成怒，亲率步、炮、骑兵300余人，于27日由临清南犯聊城，企图报复。范筑先不畏强敌，亲率警卫队、政训队、第三营迎敌而上，在堂邑柳林镇与敌激战四五小时，将敌击退，毙伤敌80余人。临清之敌两次败北，日军再不敢轻易出动。这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我军声威大振、士气高昂。范筑先率部凯旋，聊城市民鸣锣放鞭炮夹道欢迎。

12月16日，日军600余人由高唐南犯，侵占南镇，企图从滑口渡黄河，进袭泰安，钳击济南。范筑先立即命令博平、茌平民团在南镇阻击日军，他本人亲率数百人驰援。经白刃格斗，杀伤敌100余人，敌大败而退，粉碎了敌人渡河南下的计划。

1938年3月初，进占平汉路北段的日军土肥原师团，为抢占黄河渡口，以便渡河南下，切断徐州中国守军向西的退路，派大乌联军队长率1000人进占濮县，残杀无辜百姓近1000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濮县惨案”。19日，又派出日伪军300余人进占范县，大肆烧杀抢掠。范筑先悲愤交加，于21日率部奋勇杀敌，一举收复范县，然后率部追杀逃敌。郓城日伪军乘范筑先部主力离城之机，于24日再度侵占范县城。范筑先闻



报，不顾连夜征战辛劳，率部立即返回，激战一日，终于第二次收复范县。

3月下旬，日军土肥原师团由濮县董口、彭楼渡过黄河后，留下一个联队的兵力守护濮县至濮阳的交通线和黄河渡口。范筑先遂调集6000兵力，对濮县之敌展开长达70余日的围攻战。5月9日，范筑先率直属部队200余人到濮县城东北七里营巡察，突然遭受日军300人的袭击。范筑先临危不惧，指挥部队利用土围子沉着应战，并令附近3个支队火速赶来增援，里应外合，打得敌人丢下50多具尸体，仓皇而逃。6月8日，范筑先等指挥部队，在濮县西南15里的石墓头再次伏击日军汽车队，毙敌20余人，击毁汽车数辆，缴获军用物资一批。濮县日军遭我连续打击，其补充运输线又被我切断，被迫于6月13日全部撤回大名，范筑先率部随即收复濮县。

8月中旬，为策应保卫大武汉，范筑先调14个支队，动员上万民工，发起济南战役。先头部队第十支队等一直逼近到济南市西北部张庄飞机厂和纬十一路，烧毁敌飞机数架，毙敌一部。铁路破坏分队在十支队机枪营掩护下，颠覆日军军车一列，日军伤亡100余人。另外两个支队和民工，破坏德州至济南段铁路，使敌交通一度陷入瘫痪。这次战役一时造成很大的声势，但在敌人反扑时，遭受了一些损失，范筑先次子、青年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和参谋长何方等27名队员壮烈牺牲。范筑先劝慰夫人：“民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伊何憾也？吾何悲也？”复令次女为队长，继续率众杀敌。并将长子、长女、三女送入革命队伍，参加抗日。范树民牺牲后，全国各地和鲁西北各界人士纷纷来电来函慰问。范筑先在回复后方山东旅渝同乡代表杨光辰的慰唁称：

自中日战起，弟早打破家庭观念，齐河之役，民儿授命，不敢谓求仁得仁，差幸死得其所，伊何可憾？弟又何悲？惟长江形势，日趋紧张，此弟所万分惦念也。夫公岂无父子之情，盖爱国心重，早置身家于度外。

“中国万岁！杀敌到底！” ——在日寇包围中自戕殉国

1938年11月中旬，日军从济南、德州、禹城分3路进攻鲁西北，中心目标是聊城。13日，日军第一一四师团秋山旅团千叶联队从东阿渡过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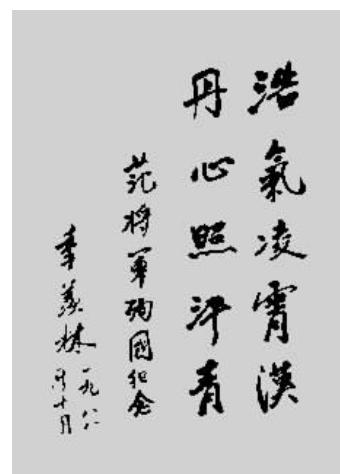


河进攻聊城，其先头部队平田大队，约有步炮骑兵300余人，汽车、坦克10余辆，并有两架飞机配合。另外两路敌人：一路从禹城经高唐向聊城进犯；一路从大名金滩镇过卫河扑向聊城。

13日上午，范筑先匆忙从茌平前线回到聊城，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迎击日军的作战方案，宣布了坚壁清野、内外夹击、消灭敌人的方针，将聊城各机关、学校转移到农村，并鸣锣动员百姓出城，留一部守军负责城防。范筑先则带主力移到城外和日军游击，待日军攻城时，在城外调集部队夹击敌人。

14日，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布置完战斗任务，正准备撤退出城时，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派的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春突然乘车从临清赶到聊城，要和范筑先商谈整编部队的问题，范筑先被他缠住迟迟不得脱身，等下午4时，李树春才离去。此时，本已撤出城外的范筑先部下张郁光、姚第鸿等不见范出城，又返回城内催范筑先赶紧撤离。这时在城东关布防的第一路民军，于日军围城前突然弃地而逃。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也以追赶逃军为名，从北门带着游击营的一个连溜出城外。后世史家认为，范筑先当年陷入重围，乃民政厅长李树春与参谋长王金祥二人串通而为。他们对范筑先联合共产党颇有微词，因而故意拖延，将其置于险境。范筑先准备备马出城时，发现三个城门已经被堵塞，只有西门的一条小路通往城外，又被日军用机枪封住路口。这时，日军的火力已经封锁了出路，使范筑先失去了出城指挥作战的时机。范筑先无法出城，便和张郁光、姚第鸿率领少数部队守城作战，以待外援。不久，范筑先得知西门已经被日军攻破，西大街已经展开了巷战。范筑先的随从人员劝他从北城冲出去，以后再做收复城池的准备，可是，范筑先走到城的东北角又折了回来，大声喊道：“我不能亲眼看着这聊城落到敌人的手中。这千百个弟兄，都为民族流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我范筑先能悄悄地溜出去吗？我将有何颜再见鲁西北二十几县的父老兄弟。”说完，他又回到了城墙上，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日军数次进攻。

黄昏后，城东关失守。日军在猛烈炮火配合下由东门、南门等3个方向爬城。



季美林题词



范筑先、姚第鸿急率传令队赶到东门。尽管此时主力部队和弹药已疏散到乡间，城内只留下一些武器粗劣的游击队伍，但在范筑先等人的指挥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仍打退日军对南门和东门的几次进攻。这时各县电话尚未切断，范筑先用电话令各县部队火速来援。但是，各路援军暂时无法到达。

15日，攻城日军增至7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日军向东门守军发起猛攻，并用大炮发射催泪性毒弹，掩护日军攻城。范筑先和姚第鸿亲率传令队急赴东门督战，打退日军的几次攻击。激战中，范筑先左臂被炮弹炸伤，陆子衡等30余人壮烈牺牲。上午9时，东城门被日军炮火击毁，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蜂拥入城。范筑先由城上转至城中心光岳楼，仍组织部队同日军继续激战，毙敌100余人，不久，守城人员孤立无援，已经弹尽粮绝。

在日军飞机扫射时，范筑先又被打断腿骨。在聊城万寿观东北巷中的范筑先见守城部队身陷重围，守军已牺牲殆尽，但援军仍未到，而自己已被冲上来的日军围住，而此时他手枪的子弹只剩最后一颗，于是他向卫队战士说：“你们各自逃命吧！”便高喊“中国万岁！杀敌到底！”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自戕，壮烈殉国。他的卫队队员受范筑先伟大人格的感召，也相继自杀殉职。随后守城部队陷入混乱状态，下午5时左右，聊城完全被日军占领。在守卫聊城的战斗中，范筑先与城防副司令郑佐衡，游击营长林金堂，和属下中共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七百人壮烈殉国，范筑先苦心经营的鲁西北抗日重地聊城被日军占领。

“三友见精神，一门尽忠义” ——举国哀悼，浩气长存

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在重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为这位将军亲书挽联，并且颁发褒扬令，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在延安，中共中央召开范筑先追悼会。朱德、彭德怀、吴玉章、董必武送了挽联。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

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

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

董必武、吴玉章为他书写挽联：



三友见精神，松体遒，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高气苍，
直到岁寒全晚节；

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为民，子女都称勇武，顽廉懦立，
共纾国难绍遗风。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还发表时评，称这位将军为“民族老英雄”。

洛阳、鲁西北冠县等地也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1940年，聊城县曾更名为筑先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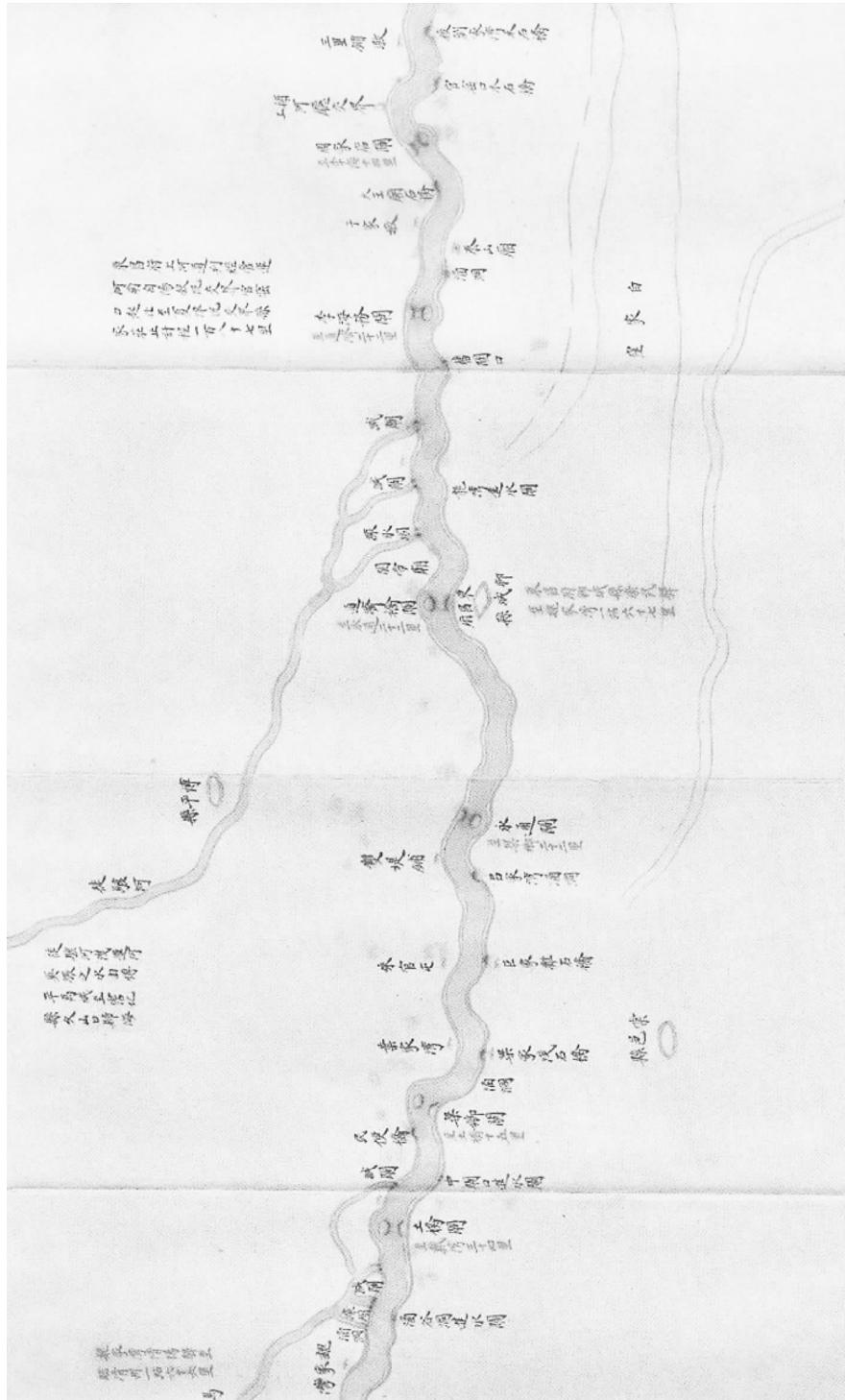
1941年，范筑先旧部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范筑先等将士，建立范公祠，位于聊城县（现东昌府区）西北20公里梁水镇原观音寺旧址。范公祠坐北面南，大门为青砖拱门，上嵌“范公祠”石匾。门内立纪念塔，由砖石砌成，六棱4层，高15米，直径12.6米。塔身砖刻“抗敌救国”4字。塔后正殿面阔3间，中祀范筑先全身戎装塑像，东西两间祀张郁光、姚第鸿等烈士。殿前有石碑两座，一为“范筑先传略”碑，一为“创修范公祠纪念塔碑记”。殿前另有东西廊房各3间，壁上嵌石碑多方，上刻抗战烈士名录。殿后有“武圣祠”3间，室内祀关羽、岳飞和范筑先半身塑像。“文化大革命”中，范公祠遭严重破坏，正殿被拆除，仅存大门和纪念塔。

新中国成立后，范筑先遗骨被葬于邯郸烈士陵园，其子范树民、其妻吴志博生前与他一道抗日，死后亦共同安葬于烈士陵园。

1988年，范筑先将军殉难五十周年之际，聊城地区行署和聊城市（今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在光岳楼北侧建立了范筑先将军纪念馆。邓小平为纪念碑题词：“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

范筑先纪念馆位于光岳楼北大街南首路东，南北长59.7米，东西宽34米，占地面积2040平方米。院内植松柏冬青。迎面立有一通高2.3米、宽0.9米、厚0.3米的石碑，正面刻有1947年解放聊城前夕八路军某部政治机关所颁布的三项命令，其中第一项即“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庭院中心立有邓小平所题“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黑色大理石石碑，碑阴刻有范筑先传略。大厅正门悬挂一方由梁漱溟题写的“范筑先烈士纪念馆”木刻横匾。厅内正中安放着白玉石雕成的范筑先半身像，四周陈列着范筑先遗物和有关资料，壁上挂着范筑先事迹展览图板。大厅两侧附厅收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人士为悼念范筑先所写的悼词和挽联。该馆已成为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运河文化



清代京杭运聊城段(局部)(节自《清代京杭运河全图》)



聊城运河古闸古码头考

□李望尘等

一、古码头

张秋码头

位于阳谷县张秋镇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西岸。元代运河开通之后，张秋是一重要商埠码头。周围众多县都在此设立水次仓，所征漕粮要先聚集张秋，然后装船北运。另外，元、明两代，这里一直是二级运河管理机构的驻地。如元朝的都水分监、明朝的工部都水分司等都驻张秋，特别是明朝诸多治黄保运的朝廷重臣，都曾驻于张秋，因此这里官员来往频繁。码头设立时间早，建筑规模大。运河停运后，码头虽已废弃，但残存码头仍有60多米，皆用30厘米厚的长方石砌筑，依然显示出当年的宏伟。

七级码头

位于阳谷七级镇西街北大桥南70米，始建于元代。在七级下闸南5米处有遗址尚存，但渡口已被拆除，台阶埋于地下。七级北大桥桥面、雁翅、桥墩均由古石刻构筑而成。桥分两涵，宽16米，深5米，雁翅长7.5米。桥头有一卧式镇水兽，为古渡口原物。

聊城大小码头

大码头位于聊城市区运河西岸。码头长37.12米，宽14.1米，呈“巨”字形。大码头为官用码头，明、清时期这里有“崇武连樯”之称，为聊城八景之一。小码头位于大码头东约300米运河北岸，长13.62米，宽10.57米，平面呈“凹”字形。原为富商私用码头，台阶最上层青石上仍有系船缆绳用的圆形穿孔。

临清三元阁、启秀楼码头

三元阁码头位于临清卫河东岸会通街。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



(1542年)，是会通河与漳卫河交汇处设立的商业码头，原码头用条石砌筑，台高4米，占地60平方米，现仅存基址。启秀楼码头位于今城区古楼街运河北岸，始筑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原码头为条石砌筑，占地24平方米。

二、古闸

荆门上下闸

荆门上闸位于阳谷县张秋镇北上闸村，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正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九日工毕。闸由青石砌垒成，设双闸板。闸涵南北长10米，东西宽13米，闸坝槽宽15厘米，闸板已不存在，闸栏尚有镇水兽石刻存在。

荆门下闸位于张秋镇下闸村西，始建于元大德三年(1299年)六月初一，至十月二十五日工毕，后经多次维修。闸涵南北长12米，东西宽8米，闸板槽宽25厘米，闸坝雁翅长10米，青石砌成。闸头有石狮子4尊，现仅存1尊。

阿城上下闸

阿城上闸位于阳谷县阿城镇阿西村，始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正月二十五日，十月一日工毕。该闸现存闸涵长8米，宽7米，雁翅长10米，青石垒砌而成。闸板闸面已不存在，现存闸面为20世纪80年代重修水泥桥面。

阿城下闸位于阿城镇刘楼村西，始建于元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五日，十月二十八日工毕。现存闸涵长10米，宽7米，雁翅长30米，闸槽宽15厘米。雁翅部分已损坏，闸板已不存在。

七级上下闸

七级上闸位于阳谷县七级镇上闸村西北，始建于元元贞二年(1296年)正月二十日，十月五日工毕。因河道废弃，闸部分被拆除，水下残存闸根。

下闸位于七级镇西街，始建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五月初一，十月六日工毕。此闸残破严重，所剩残部改动较大，现存闸长16米，宽5米，雁翅长7.5米。桥头有一卧式镇水兽，已非元代初建之形制。

周店闸

位于东昌府区凤凰办事处周店村，原名周家店闸，始建于元大德四年



(1300年)正月二十一日，八月二十日工毕。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都曾进行过维修。特别是民国时期这次维修，基本上改变了元代闸的面貌。重修的闸包括南闸、北闸和越河涵洞三部分。南北闸相距66.2米，两闸均长11.7米，宽13米，闸板槽宽0.3米。越河涵洞东西跨度为28.5米，南北宽7.5米。附近有记事碑三通。

李海务闸

位于东昌府区李海务村，始建于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二月初二，五月二十日工毕。新中国成立后，因运河截弯取直，施工时将原闸部分拆除，大部分闸体被埋于地下。

龙湾减水闸

位于东昌府区柳园。始建于明景泰年间徐有贞治黄保运之时。徐有贞撰文的《敕修河道之碑》中说：“复作放水之闸于东昌之龙湾、魏湾凡八，为水之度。其盈丈，则放而泄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明、清两朝皆保留并用这组水利设施。从清乾隆版《山东通志》所绘运河图看，其最北边为控制水位的滚水坝，南侧建有一空桥、二空桥、三空桥、四空桥。二、三空桥下皆有减水闸。运河水多，则开闸放水。水位正常之后，则关闭减水闸板，以保证运河通航的正常水位。

通济闸

位于聊城东关闸口。始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疏通会通河之时。为调节水源、缓解崇武驿大码头漕运之拥挤而建，在闸南又新开越河，绕过通济闸，俗称越河圈。越河上新建石桥12座，用以连接菜市、猪市等专业市场，并形成一大盛景。现通济闸已被拆除，有一清代“重修通济闸碑记”碑保存完好，存于聊城市博物馆。

永通闸

即辛闸，位于东昌府区辛闸村西，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现存闸根，残闸高4米。因漕运功能丧失，水位下降，失去水闸功能，现已被改建为桥。

梁乡闸

位于东昌府区梁水镇梁闸村，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闸南北长约20米，高约5米，均为石砌。现存闸根和近代桥。

土桥闸

位于梁水镇土闸村，始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现名“土闸”，东西长15米，闸高约5.7米。明代邱浚曾撰《建土桥闸记》一文，对该闸有



详细记述。2010年秋，山东省、聊城市文物部门对此闸进行了发掘。此闸整体结构完好，牢固如初，是研究运河闸的珍贵资料。

戴湾闸

位于临清市戴湾乡戴闸村，始建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南北长7.5米，东西宽7米，闸板厚0.25米，闸壁砌石以燕尾槽相连，且燕尾槽上有“戴湾闸”字样，河水面下20厘米尚有闸板存在。闸北村委会院内另埋有记事碑，闸南曾建有大王庙。

临清头闸、中闸、隘闸、砖闸、板闸

头闸：位于临清市北，元至元三十年（1231年）正月兴工，十月工毕。头闸长33米、阔27米，两闸身各长13米，两雁翅各长10米、高2米，闸孔阔2.5米。

中闸：位于头闸东南部，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七月兴工，大德二年（1298年）三月工毕，长广与头闸同。

隘闸：在中闸南约1.5公里处。元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兴工，九月工毕。闸孔阔3米，长广同头闸。

砖闸：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德八年（1513年）重建，原闸两孔，因以砖堰之，名曰砖闸。

板闸：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始建，正德八年（1513年）重修。原闸两孔，因以板障之，故曰板闸。明代刘梦阳曾撰《南板、新开二闸记》可作参考。

（本文选自《京杭运河·齐鲁风情》（聊城卷），主编侯继唐、李芳林，执行主编李望尘）



隋运河永济渠寻踪

□戴敬仁

今天在聊城，我们只要一提起大运河，自然就会想到穿境而过的会通河（京杭大运河过聊城的一段），殊不知这里还有一条隋代开凿的永济渠，它就是位于冠县和河北馆陶县交界部的卫运河。卫运河是由漳河、卫河在冠县秤钩湾汇合而成的一条河，在聊城内长 74.5 公里，其上游卫河发源于河南省辉县苏门山百门泉，在聊城境内长 9.2 公里。

隋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凿了规模巨大、纵贯南北、沟通中国五大水系、长达 2700 公里的南北大运河，其中，永济渠是最长的一部分。永济渠分两段，一段从沁水入黄河口到今天津市，一段从今天津市到北京市南部涿州，全长 950 多公里。此后 1400 多年，永济渠经历了多次演变，隋唐称永济渠，宋称御河，元明清称卫河，近代称卫运河。它是当今冀鲁豫和京津地区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一条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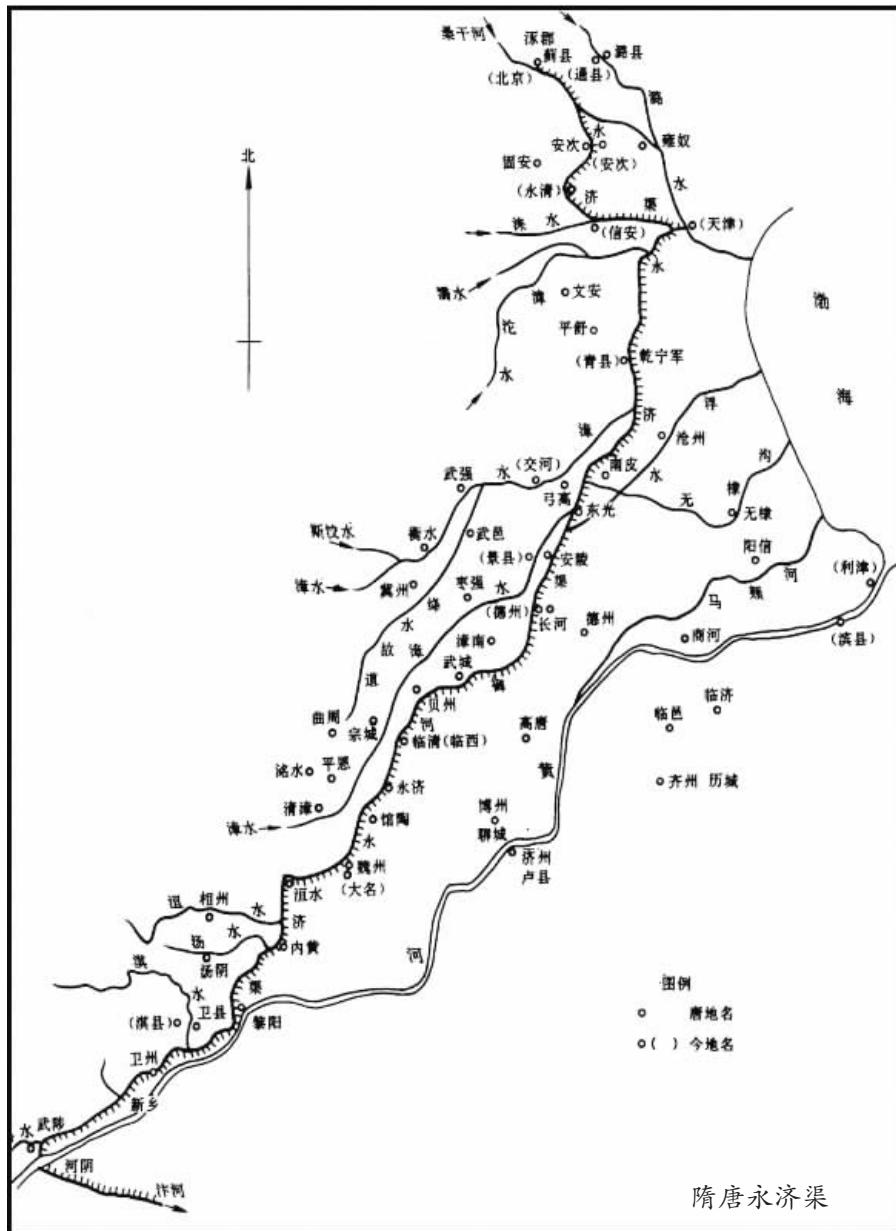
千年运河通千里

据史料记载，隋大业四年（608 年）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区西南隅）。”隋代开永济渠，南引沁水通黄河，北通涿郡。当时，沁水在今河南省武陟县城东南流入黄河，用沁水支流从武陟县小原村东北，由嘉获县红荆嘴经卫辉入清水（今卫河上游）。开永济渠的关键工程是在沁水左岸开渠，引沁水东北流会清水至今浚县西入白沟，这是永济渠的南段，是当时新开凿的渠道；中段自浚县西接白沟（略同今卫河）至天津，这是白沟的改道，并向南延伸，南段比白沟稍向东移，在今卫运河之西，今德州以下



与南运河大致相合，至今天津市西再向西转北；北段自天津武清县的白河至永定河分支至涿郡。

其实，隋炀帝开凿永济渠是在古代河渠的基础上进行的。据《元和郡县志》卷十六《河北道一·相州》：“内黄县……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北去县二百步。”白渠即是白沟，白沟是曹魏





旧渠。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北征袁绍时“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曹魏修治后白沟水量增加，连同与它接连的清河，成为河北水运干线，使曹魏“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永济渠以曹魏旧渠为基础，将渠道拓展成为大渠，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这是永济渠的中段。从今天津市至古涿郡为永济渠的北段，系改造古潞河、桑干水两条自然河道的下游而成。隋朝时，隋炀帝在白沟的基础上开凿了永济渠，它和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共同组成了闻名于世的隋代大运河。

永济渠的大致走向是，自今河南武陟县向北，经新乡、卫辉、滑县、内黄，到河北魏县、大名、馆陶和山东冠县交界部，再经河北临西、清河，到山东的武城、德州，再到河北吴桥、东光、南皮、沧县，抵达天津武清，再经河北的廊坊，最后到达涿州。

永济城畔话永济

在今天聊城境内，卫运河流经冠县和临清两个县市。唐宋时期永济渠的流经路线，在聊城境内有永济县（今冠县北馆陶镇）和临清县（今河北临西县）。原馆陶县治本在今天的冠县东古城，但和永济渠相距十几里地，因此隋大业2年（606年）馆陶县城北迁40华里，治所在今北馆陶镇的馆陶古县城，地处永济渠漕运码头，在唐宋时期因紧靠永济渠曾改称永济县。关于永济渠和永济县的来历，《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贝州》记载：“永济县，本汉贝丘县地，临清县之南偏，大历七年，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西临永济渠，故以为名。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按汉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渎，隋氏修之，因名永济。”《禹贡锥指》卷十三下载：“永济渠，即古之清河，《汉志》之国水，《水经》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头遏其水为白沟，一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今称卫河者也。”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隋唐永济渠》一文中，经详考认为：永济渠自“卫县以东，北至独流口约五百公里（就直线言）之流程，实亦与郦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具见永济渠之工程实多循汉魏北朝之旧河道也。”

由此可见，地处山东和河北交界处的永济渠源于汉代黄河北流形成的屯氏河和屯氏别河。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决于馆陶，北流



分出屯氏河。汉永光五年（公元前 39 年）在馆陶再北流分出屯氏别河。据唐《元和郡县志》载，屯氏河在馆陶县西二里。《战国策》记载的齐、赵两国之间的古清河也在馆陶经过。屯氏河自馆陶北来，走古清河故道，大致为今天的卫运河河道。屯氏别河自馆陶分支北来，三国时，曹操在汉屯氏河的基础上，开凿了“白沟”，遏淇水入白沟，东魏都城自洛阳迁都邺城，就曾利用黄河、白沟通运，邺都可由运河直通河北平原北端，屯氏河的部分故道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水运干道，基本形成了今天航运的态势。而隋炀帝时开永济渠，一部分就是利用屯氏河故道修浚而成。

永济会通母子河

隋代大运河建于隋，是以洛阳、长安两都城为中心的，向东南、东北形成了一个大大的“之”字形，自隋至唐宋，作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中国军事、交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唐初，每年从大运河运送以当时的计量单位粮食不过 20 万石，而到唐明皇开元 29 年，最高达到 700 万石；到了宋代，运输量从 300 万石增加到 700 万石，宋仁宗时，一年竟达 800 余万石。宋代王安石称大运河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元朝建立之后，首都定在大都（今北京）。1194 年，黄河在今河南武阳决口，灌封丘南下，夺泗水，从今淮阴夺淮入海。为了南粮北运、以供京师，漕运路线只能由江淮溯黄河向西北至封丘，转陆运 90 公里至河南省淇县的淇门，由淇门入御河（亦称卫河）北运，经过山东的临清，由卫河（隋开永济渠）经过天津到通县，再陆运至大都。这条线路有两大缺点：一是由淮河转涡水，再入黄河逆水而上至中滦，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路程要增加好几倍；二是水、陆交替运输，反复装卸，费时、费工，效率低下，粮食散撒、腐烂时常发生。这条运输路线不仅绕道过远，且要水陆转运。

因此，元朝于 1282 年动工挖济州河，自今济宁引洸、汶、泗水为源，向北开河 75 公里接济水。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在 1289 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 125 公里，接通卫河。1291—1293 年，元朝从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 20 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至此，今天的大运河的路线走向完全形成，从北京直抵杭州的京



杭大运河，全长 1700 余公里，比隋炀帝绕洛阳再经卫河到北京的大运河缩短 900 多公里。

会通河的开凿，带来了两岸的繁荣，也促使众多商业城市的出现。临清县城原不在今址，而在其南 5 公里处的曹仁镇。元代开会通河后，在会通河与御河相交处形成一个新镇，名曰会通镇，明洪武二年（1369 年），县城迁至此。临清运河钞关是明清两代中央政府设于运河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始设于 1429 年，1435 年升为户部榷税分司，由户部直控督理关税，下设五处分关。万历年间征收税银八万三千多两，多于京师崇文门税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修建，无论曹魏、隋唐、还是元明清，每个阶段都深深地烙下了那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需要的印记。隋大运河的修建，确定了中国大运河的框架，带来了两岸经济繁荣和昌盛。会通河是永济渠的持续和发展，否则会通河带来的繁荣不可能那么长久和巨大。没有永济渠，就没有会通河，也就没有后来京杭大运河几百年的辉煌发展史。

船桅如林航运忙

隋唐以来，永济渠的治理均旨在发展漕运，直到清光绪年间，从卫河水运可直达天津海河。明清两代，“凡漕粮入津、芦盐入汴，率由此道”。卫河上下，船桅如林，航运繁忙。北京城内所需物资，除江南海运或运河漕运之外，多由黄河漕运转淇门入卫河抵京。卫河对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永济渠最主要的作用还是漕运，当时每年漕船达到 2 万多艘，连同水师和商船达到 3 万多艘。魏州运河两岸楼房百余间，专门用于存储江淮运来的货物。在隋代，大运河已发挥作用，到唐、宋两代尤为突出。唐武则天时，由江淮运来的大米达到 100 多万斛，运河旁邯郸、邢州、洺州的赋粮从陆运来到这里装船运往洛阳。《辞海》1999 年版载：“中国封建时代，往往称皇室御用河道为‘御河’……宋元时代所谓‘御河’，专指今河南、河北境内的卫河，即隋所开永济渠的一部分。”宋朝、金朝占据河北，修通了卫河，改善了漕运，彰德、洺州、磁州等地的馈饷，自每年 8 月开始，直至运河结冰为止，每 10 船为一纲，每天验货发船，大运河漕运达到高峰。



元朝，中国开凿京杭大运河，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通海运，开创了漕运的新纪元。但是随着会通河的开通，漕运东移，卫运河漕运日趋衰落。大德四年（1300年）为解决卫河水源不足，开引漳河之水。

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移都北京，卫运河再次迎来漕运的春天，沿河州县雇车把贡粮运抵码头，由递运所负责直运北京。卫运河畔，粮仓林立，现在，在馆陶卫运河边上有一个村名字还叫徐万仓。古城之中漕运的水次粮仓就可储粮万石。万历十二年（1584年），主管粮运的赋粮监兑所迁到了馆陶县治北。

清初，把漕运、河务、三藩列为国家三大要事。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整个漳河水流入卫河；咸丰9年（1859年），在馆陶县西街设厘卡，派专人掌管漕运，此后还先后在馆陶设水马站、递运所，负责水运事务。清代馆陶县从南向北，在卫河沿岸共置南馆陶、黄花台、滩上等16个铺舍。明清时期馆陶县境内共有马头渡、清泉渡、窝头儿渡等10处渡口。自馆陶城至码头的街道商铺、饭店等林立，卫运河码头，商船、漕船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每年夏末秋初，卫河水涨数尺，船行如梭，欸乃相接，站在河堤观看，实为一胜迹。卫河秋涨，成为馆陶县八大胜景之一。

桨声帆影故事多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上游修建水库等原因导致卫运河断流而断航，畅通千年的古运河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不过任何事情辉煌过后，总会留下其光辉的身影，仿佛向人们诉说自己的过去。

隋大业七年（611年）2月，踌躇满志的隋炀帝自江都乘龙舟沿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涿郡，全程4000多里，仅用了50多天，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大。隋炀帝发兵高丽时，除亲自乘龙舟通过永济渠外，还曾“发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当时江淮以南的役夫和船只以及漕运、兵甲、武器、兵士等都是通过永济渠运往涿郡的。船只相距近千里，往返运输数十万人次，其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唐代农民起义军领袖刘黑闼逃匿乡里，后被推为首领，为窦建德报仇，起兵反唐。武德五年(622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年号为天造，定都于洺州，重建了农民政权。刘黑闼陷相州，又率众北上，攻打魏



州，被太子李建成追至馆陶（今冠县北馆陶镇），连夜抢建永济桥，桥还未建好，追兵赶到，惨败于运河岸边。

明建文二年（1400年）冬，燕王朱棣在馆陶渡河率兵攻打到东昌，明朝将领盛庸领兵拒敌。盛庸背城列阵，交战一开始，燕王朱棣亲自率军攻打盛庸军左翼，未能得逞，复攻打正面。盛庸下令开阵纵燕王朱棣入，随后即令军队将燕王朱棣及其军队重重包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大战，从上午一直杀到晚上，直杀得尸体遍地、血流成河。危急时刻，他的部将朱能等赶到增援，才将在重围之中的燕王朱棣救出。冲出重围后，走到一石拱桥上时，已经是人困马乏，朱棣命令大将张玉在桥头拒敌。盛庸的追兵赶到，他只好趁着夜色躲避在石拱桥下，换上士兵衣服，此时桥上大将张玉被斩。直到追兵返回城后，朱棣才跃上战马逃回馆陶。次年再次屯兵馆陶，攻占大名。直到后来长驱直入，攻占南京，夺取政权。

便利的水上交通，使馆陶县成为物流和商贸中心，成为南北运输的主要通道，一年四季帆樯林立，舟楫来往，大批的煤炭、木材、粮食及各种生活用品在此通过。周边县还在馆陶境内的卫河两岸建立远离本土的“飞地”，其所有贡粮、货物都是先运到那里再装船运走。馆陶县东厂、西厂村旧名“水次厂”，是邱县的“飞地”。在馆陶县仅窑厂就有几十座，南馆陶厂归属东昌府所属县及平山卫，马栏厂就有广平府所属六个县的窑厂十四座，拳儿厂有广平府肥乡成安窑厂八座，在此地日夜烧制城砖和墙砖。这些窑厂都由住在临清的工部分司监督管理，所产城砖殿瓦打上临清标志，在这里装船，运至北京，修建皇宫和寝陵。馆陶县窝头渡、马头渡等漕运码头物品堆积如山、非常兴盛，至今该地留有“先有馆陶砖，后有北京城”的民谚。

“卫水河源远，秋来涨似春。帆樯高过树，波浪不惊人。处处无伟岸，时时有巨鳞。谁言斯土僻，出郭即通津。”馆陶县枕陶山襟卫水，这是清代馆陶一位知县对她的清笔素描。永济渠以其清醇的乳汁孕育了沿线的历史文明，永济渠航道的繁荣和昌盛，酿造了古运河文化。而在唐代



馆陶贡砖



时，馆陶曾称毛州，直到今天，在这一带，人们常说“走过京（北京），串过卫（天津），赶过三年毛州（馆陶）会”，就是形容一个人闯荡过江湖，有见识。大运河实实在在地给这里的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京杭运河穿黄及其相关问题考

□陈清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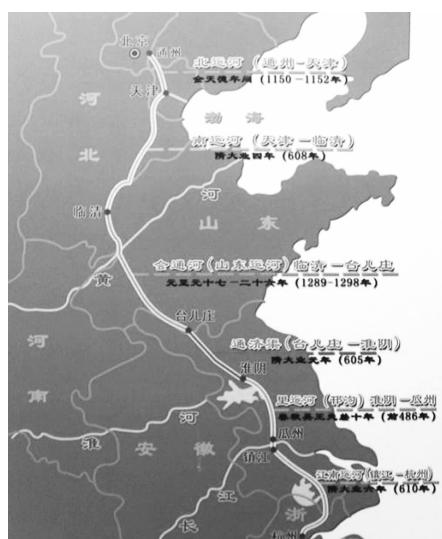
京杭运河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横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南北贯通的大河。它克服了地势的悬差，成功地穿越五大江河，并通航上千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运河是如何穿越黄河等五大江河？又是如何克服水位悬差给行船带来的困难？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不妨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京杭运河的地形特征及各段水流流向

京杭运河地处我国黄、淮、海冲积平原东部边缘地带及长江三角洲的里下河地区、太湖流域两大碟形洼地之内。沿运河地势具有三起三伏的特点，起伏之差一般在 20—40 米之间。

北京至天津段，距离虽短，却高差悬殊，本段系京杭运河的第一降落段。通惠河河底平均高度约 30 米，（该高度指高出废黄零点高度），通县河底高约 20 米，天津市海河河底高度则为 -3 米，北京至天津段河床高差可达 33 余米。

天津往南地面逐渐隆起，到黄河现道止，为第一隆起段。临清河底高 25 米，从天津到临清，河床高度相差 28 米。大运河穿过黄河现道之处，是京杭运河最高地点，可视为京杭运河在黄淮之间的分水岭，



京杭大运河形成梗概示意图



穿黄处河底高38米。从天津市至穿黄处，京杭运河河床高度相差41米。运河过黄河到南旺以南，地面高度又逐渐降落，直到长江为止，为京杭运河第二降落段。

济宁河底高31米，淮阴河底高4米，在穿过长江处，河底高度为-15米。长江以南，运河河床又逐渐隆起，到丹阳北部为最高点，这是第二隆起段，是江南运河的分水岭。丹北分水岭海拔高程30—40米，相对高程仅20米左右，河底高程约8米左右，至无锡崇德河底高程下降为-7米，这是第三降落段。

从崇德到杭州，河床又略见隆起，但河底高程均在-1—-5米之间，这是第三隆起段。

由于京杭运河各段地面高度不同，因此各段航道水流的方向也不相同。综上所述，可概括为（见左图）：

当大运河全线通航时，从北京到通洲、临清到淮阴、镇江到常州三段，利用河闸通航，维持比较困难，其余各段则属普通河流性质。因为和大运河有关的若干天然河道，部分洪水有时需要经过大运河宣泄，故运河常有溃决的危险。其中北京到天津（受白河和潮河影响）、天津到临清（受卫河影响）、淮阴到瓜州（受淮河影响）三段，过去堤防

溃决的频率常较他段为高。

二、京杭运河与黄、淮诸河的关系

1. 运河与江、淮、海、卫等河流的关系。

京杭运河由于地理情况复杂多变，因而其与诸大河流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多样。从以上运河各段水流流向及地势高度可以看出，京杭运河与钱塘江、长江、海河等河流水位趋于平坦，水流较为绵缓，水量丰沛，其交汇相对自然，彼此穿越相对较为容易。淮河、卫河与运河关系较前者而言，因地理原因，水位具有一定差距，加上主汛期与枯水期变化明显，水位差变化较大，运河与其交汇之处，须设置必要的设施，诸如堰坝、闸涵等，方可行舟。然而，由于黄河水量少，含沙量高，对运河水量补给困难，且





地势高度居五河之首，因而对运河危害最大。所以解决好黄运关系是历代政府与治水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2. 运河与黄河的关系

历史上，黄河在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影响等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决口、改道频繁。据历史文献记载，在1946年以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

根据黄河改道流经影响范围，可将黄河变迁改道划分为四个时期、三个流区。北流期：先秦至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下游主流主要流经河北省偏西、偏北地区，在天津附近流入渤海；东流期：自东汉永平十三年至北宋庆历八年，下游干流主要偏东，从今山东省北部入海；南流期：自南宋建炎二年至清咸丰五年，下游干流主要偏南，从今江苏北部夺淮水故道入黄海；回东期：自咸丰五年到现在，下游干流偏东，从山东大清河故道入海，即黄河现道。

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视京杭运河为其维系政权稳定的经济动脉。为了克服黄河河道变迁和冲决泛滥对运河的影响，封建王朝先后采取了引黄济运、遏黄保运、避黄保运等措施，协调黄运关系的发展，其中避黄保运的措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如果说，引黄济运、遏黄保运是以借黄河运为其指导思想的单一的治黄保运措施。前者反映的是黄运不分的依赖关系，后者则是治运治黄独立关系。从黄河特征及黄运关系治理效果上看，前者是被动的治标措施，后者则是主动的治本特色。总结、分析历史上黄运关系发展过程及治理措施是否得当，对指导我们今天治黄、治运无疑具有许多积极的意义。

（1）黄水扰运

黄河水大则决运堤，水落则沙淤运道，因此治运必先治黄。然黄不易治，于是运河亦难保。明代治水，明确以保漕为首要，治黄次之。明前期黄河决口河南，曾有两次均是先堵运口后堵黄口。一为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决口新乡一带，东北流于运河张秋以南沙湾，决运堤，携运水东行入海，淤上下运道。二为弘治二年（1492年），河又决开封一带，北流冲断张秋运河。五年又决金龙口及黄陵冈。七年始堵张秋运口，八年始堵黄陵冈黄口。两次均向南有分支，治河者利其南决，所以保漕。

黄河南决较多，明人不甚堵治，多主分疏。弘治堵口后，于北岸筑数百里大堤，名太行堤，以防黄河北决。从此以后，黄河决口再未冲击运河，南决却对运河影响不大，唯有东决仍会影响运河，导致鱼台县以南运



道不通。

（2）避黄改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工部尚书朱衡开鱼台南阳镇至徐州留城140余里新河，移运河于诸湖之东较高地点，以诸湖为水柜，使黄水泛滥时入湖停蓄。新河下接旧河，50里至茶城，共长195里，称南阳新河或夏镇新河。

此后，仍存黄水涨溢干扰运河之患，特别是运黄之交汇口，黄水倒灌淤堵。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为免除上述河患，李化龙大力开挖泇运河，从夏镇至宿迁直河口接黄河，长260里，运道不再经徐州，避开300里黄河险滩。

泇河运道完成后，邳县直河口以北的运河与黄河分离，但直河口以南至清口200多里的运道仍需要借黄行运。此外，泇河入黄前的直河受骆马湖洪枯水位变化的影响，漕运受阻的情形仍有发生。为了解决黄、运、骆马湖三者之间的水量平衡，康熙十九年（1680年），总河靳辅又开皂河40里，接泇河，初步解决了黄、湖、运的矛盾。后于康熙二十五年御批而掘的中运河，再次将运道东移，使京杭运河运道至此全部脱离黄河，仅在黄淮交汇口——清口与黄河相交。



国家博物馆藏清无名氏绘《北征督运图册》中督理漕粮的画面

（3）引黄济运

黄河主流自元大德元年至明洪武元年在濉水以北变动时期的黄运关系主要是借黄行运。因为当时黄河自徐州至清口夺泗入淮主道没有改变，故此段运道水源问题不大。其次是防止黄河向北冲淤改道对运道的影响。虽然洪武元年徐达在塌场口、耐牢坡引黄，因其目的是军事上西征运兵通黄需要，并非运河



水源出了问题，故此不能算作引黄济运工程。真正的引黄济运工程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主道南迁由颍水入淮之后，由于徐州至清口运道水源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运道大有废弃的危险。例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前，由于黄河主流南移，徐州至清口运道艰涩，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矛盾，曾把载粮三百石以上的漕船由淮安入淮，经沙河至陈州颖歧口，换载二百石以上的浅船，运到黄河岸口，再换大船经黄河运至八柳树等处，经陆路转运至卫河，由卫河水运至京师。直至永乐九年（1411年），宋礼重开会通河、疏浚封丘金龙口至鱼台塌场口的引黄济运工程为止，清口至徐州、临清一线的运道才得以恢复。此后，景泰中徐有贞治黄运功成，又开广济渠数百里，直通新乡以南黄河引水，工程浩大。但引黄利常不胜弊，需浚沙淤，明后期已大为减少。

清代中期以后，引黄济运工程又渐增多。乾隆以后，微山湖为泇运河主要水柜，湖水来源常恃湖西坡水及运河余水，不足则引黄。另一水路为自河南南岸减水坝，减水入淮及洪泽湖助清敌黄、济运。清代嘉庆、道光间，又有黄淮运交汇处之清口引黄济运之举，隔断黄淮。咸丰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河之北汶水不能至，又别开水源，欲维持河运残局。然阿城、临清间运道全恃伏秋黄水涨溢为源，曾达数十年之久。

（4）借黄行运

用黄河为运道，虽可远通青海、甘肃，历宁夏、内蒙至陝晋（春秋时秦晋间曾自渭水历黄河入汾水），但运量受限制。从汉至唐，豫陕间虽有三门峡之险，亦未尝断往来，艰辛备尝。南北朝用兵曾自泗水济舟师，自四渎口入黄，西入豫陕视为用兵非常之举。京杭运河泗水段下游，金代已为黄河所夺，虽时有迁改，行运亦达数百年。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山东段开挖会通河，至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通中运河期间400多年，运河在淮阴至徐州段与黄河并行，漕船自淮阴入黄河，至徐州段借黄河行运，这段黄河运道中有徐州、吕梁二处激流险滩，船行非常困难。开通泇河至开通中运河期间，运河在淮阴至邳州直河口段与黄河并行，运河漕船在淮阴附近的清口入黄河，在邳州东60里处的直河口入泇河，避开了黄河320里和其中的徐州、吕梁二洪，运河航道有所改善。

清代开通皂河、中运河之后，运河、黄河、淮河交汇于清口一处，漕船只是在清口数里借黄河行运，一出清口即直接穿过黄河入中运河，基本上摆脱了借黄河行运的历史。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



在张秋以南将运河拦腰截断，黄河穿运口由苏北清口移至张秋以南，运河水源随黄河东流入海，张秋至临清段200里运河水源断绝，再加上运河淤积和河堤损坏严重，运河运输能力骤减。漕船渡黄时，须改道由安山镇附近入盐河（坡河），到盐河与黄河交汇处，再逆水而西至八里庙通北运口，这一段要比以前多绕行100多里。到光绪元年（1874年），运河穿黄河大溜分为两段，一股南注十里堡，一股北经八里庙，当时漕船往往由河南南溜下行，至交汇处转入北溜，然后逆水至八里庙通北运口，这一段仍要绕行50多里。光绪七年（1880年），因北运口淤积严重，不宜行舟，遂改新运口于陶城铺，开新河至阿城闸入运河，此后的运道不再经张秋，一直到漕运废止的1901年。

三、黄运交汇及治理措施

历史上黄运交汇之处如果不计黄河多次冲决运河的决口，先后共有三处。其一是泇河开凿前位于徐州以北的镇口；其二是泇河开凿后入黄通运的董口（位于骆马湖西五里，距宿迁20里）；其三是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夺泗水入淮的黄淮交汇处——清口，也是泇河、中运河开凿后唯一存在黄运关系的交汇处。其中清口的交汇及治理措施最为复杂、持续时间最长，镇口次之，董口存在时间较短，情同镇口，不予多述。此仅将镇口、清口二处黄运交汇特点及治理措施简介如下。

1. 镇口

徐州以北、茶城以南的镇口不仅是黄运交汇的所在地，也是运河借黄河行运的北端起点。明隆庆六年朱衡说：“惟茶城至临清，则闸诸泉为河，与黄相近。清河至茶城则黄河即运河也。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防黄河即所以保运河……”足见茶城镇口位置的重要。

镇口虽建有船闸，但受黄河变迁、决口侵淤的影响较大。正常情况下，黄河主道自徐州入泗入淮，洪水季节黄强泗弱，镇口淤积严重；秋季运盛之时，黄河水量不足，运道浅涩。如何改变镇口黄运交汇处的矛盾？对此，在万恭之前毫无办法，只是简单的人工清淤和挑浚。

隆庆三年（1569年）至万历元年（1573年），茶城镇口屡淤，严重影响漕运。隆庆六年正月，万恭上任总河，面对茶城镇口黄运交汇淤塞形势，他采纳了虞城生员“以河治河”的建议，在茶城镇口黄运交汇处的左岸（东岸）筑导流坝（大堤）半里左右，使黄河水径直南下，不致倒灌泗水；同时紧束泗水猛力冲黄。导流坝筑成后，镇口黄运交汇处的东岸渐冲



渐涤，西岸则渐淤渐厚，而水并驰南，达到了“淤浅不治而自治”的以河开河效果，初步解决了镇口黄运交汇矛盾。

2. 清口

清口，古代亦称“泗口”，是泗水入淮的交汇河口。自黄河南流夺泗入淮后，至1855年铜瓦厢改道东流，清口一直是黄淮交汇的场所。在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河以前，黄河无完整堤防束缚，改道变迁频繁，清口处的黄运交汇矛盾并不重要。自潘季驯“筑堤束水”之后，黄河河道趋于稳定，但黄河泥沙不断淤积，抬高了淮河下游水位，洪泽湖由此也不断扩张。由于黄河水位顶托，清口淮河出水日渐不畅，洪泽湖东西堤防时常溃决。黄淮交汇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漕运畅通。为此，自明后期到清代，清口被视为治黄、治运的重中之重，其治理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潘季驯、靳辅相继倡导的“蓄清刷黄”工程；其二是杨一魁倡导的分黄导淮工程。

四、京杭运河穿黄、淮等河工程

京杭运河穿越五大江河，由于汛枯等不同时期不同水位的影响，其各交汇之处均不是单纯自然河流的简单相交。历代治河专家经过反复论证、实验，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保证了运河长达近2000余年的畅通。

1. 运河穿“两江两河”工程

运河穿“两江两河”是指运河穿越钱塘江、长江、淮河、海河等四大江河。因四河发源地不同，其主汛期、枯水期、海拔高度也不尽相同。然而，由于四河与运河交汇处其地势均较平坦，海拔几近相同，加上钱塘江、长江、淮河流域水量充沛，水含沙量较小，汛枯期水差变化不是很大，因而其交汇工程相对而言也较为简易。

(1) 堰坝

堰坝又名堰、坝、埭。拦河筑坝可以代闸。堰坝之名始见于三国孙吴筑破冈渎，自丹阳的云阳通建业，上下十余埭。后江南北筑堰埭不少。小船过坝用人力拖拽，大船则两岸设绞关，用人力或畜力推转盘坝。六朝至唐宋，常用牛十余头推绞关，称为牛埭。（见下页图）元及明初，北京有著名的阜通七坝及淮安五坝。冬春水小过船多盘坝，耗水甚少。四河汛期，坝可防水过多流入运河，冲毁堤岸；枯水期，则坝可防止运河之水随四水流走，有力地保证了运河水量及堤岸安全。

(2) 闸

闸则系建于运河与四河交汇处运河河头的另一种引船过黄的水利设



牛力过坝图

施。以结构分有单闸、复闸、澳闸；以作用分有跨河闸（节制闸）、积水闸（进水闸）、减水闸（分水闸）、平水闸等；以物料分，有石闸、木闸、草土闸等。四水与运河交汇处之闸多见于单闸，少有复闸和澳闸，其基本作用仍为控制四河与运河之水位差悬殊彼此侵扰，以利于通漕。

2. 运河穿黄工程

运河穿越黄河的困难，主要表现在运黄水位差别大、黄河冲淤运口及黄水倒灌运河等方面。古代解决运黄水位高低差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增加运河弯道和在运口附近建设大量工程设施来完成。如采取的避黄行运、倒塘行运等方法，即是延长运河、降低水差、减少淤沙等穿黄行运的有效措施。

（1）咸丰五年前黄运交汇处的穿黄保运工程

咸丰五年黄河于河南兰阳（即现之兰考县）铜瓦厢决口之前，黄河亦变迁多次，重要的黄运交汇点，多设在避黄河险滩、水位落差较小处，以平缓水势，减小行舟困难。

①闸坝工程

闸坝在运口的使用，情同上述运河穿四江河工程，目的是控制水位差，减小黄水对运道的淤积和运堤的危害。有时还闸坝共用，或坝在前，闸在后；或闸在前，坝在后，以确保漕运安全。

②“倒塘灌运”工程

“倒塘灌运”工程重点用在黄运交汇处的清口。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止于咸丰五年（1855年）。所谓倒塘灌运即是在运河汇黄河口门处建



御黄坝，在临近淮河口门处建临清堰，在御黄坝与临清堰之间形成塘河。塘河宽大，可容数百只、上千只漕船。在黄河水位较高时，南来船只开临清堰入塘，再闭临清堰。此时车水入塘河，待塘内水位与黄河水位相平时，开御黄坝出船。用土坝来代替船闸的功能。塘河每进出一次大约需要 8 天时间。

（2）咸丰五年后黄运穿汇处的穿黄保运工程

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入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冲毁运河堤坝多处后于张秋同运河相交，导致“运渠高垫，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日漕底”。“于是河运废弛，十有余年”。同治年间，政府疏浚运道，在黄运交汇处运口兴建三闸，船过闸门时，实行“启一闭二”之法，以免黄水倒灌。而且闸门通航时间也限制在九月至来年六月上旬黄河小水季节。当黄河涨水时，关闸打坝，严防浊水入侵。此时航船只能盘坝通行，若为重船则将之卸载，利用绞盘拖空船过坝复装货物后继续航行。然而由于黄



人力绞盘过坝图

河治理力度不断加大，黄水均被束缚在黄道内，导致了河道淤积迅速。未几年，黄河河道高出运道丈余，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河和悬河。随着运河水源枯竭、津浦铁路建成、战乱的迭起、公路事业的发展，京杭大运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部分河段废弃，现仅有济宁以南河段仍在发挥着其航运功能。

（作者系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专家委员。本文原载《齐鲁文史》2008年第4期）



悠远的运河号子

□赵中田 朱国庆 冯修成

一条手巾织得新，
上织新年迎新春。
乾隆乘船北京去，
文武百官随后跟。
两条手巾织得长，
运粮河上运粮忙。
江北的焦枣往南运，
江南的大米过长江。
.....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阳谷县张秋镇的李龙珠老人传授给笔者的一段运河行船号子。

元朝初年，会通河开通以后，鲁西成了漕运的繁华河段，每日过往船只一二百艘。由于大运河主要借助南方客水行舟，便决定了漕运“北上顺水，南下逆行”。因此，漕船北上可顺水行舟，也可扬帆行舟；而漕船南下却要逆水行舟。在没有风力可借助的情况下，南下的漕船只有靠人力拉纤行舟，因此，运河号子便产生了。

据笔者调查，运河号子又叫运河船工号子，是船工们在劳动中创造并相互传承的一种号子。运河号子同夯歌、打桩号等一样，都是协调人们的劳动、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曾踏遍鲁西运河沿岸，采访了二十多位当年的老艄公，终于收集、抢救到了运河上河号、下河号、拉帆号、撑篙号、挖棹子号、拉纤号、绞缆号、行船号等八大类十余个运河号子。

下河号又叫起锚号，开船前撤去跳板，收起铁锚，把船推往河中心所



喊的号子。此号无曲无调、铿锵有力——

千斤，
万金，
小船，
动身。
下江南一本万利，
回家乡财源滚滚。

当然，在艄公领号时，船工们还要跺着脚大声应号。

拉帆号，因船工们忌讳“帆”字所以又叫拉篷号，它是船工们拉篷时所喊的号子。此号也无曲调，缓慢而有张力——

上伸手，
下蹲腰，
拉得起，
撑得高，
上拉三尺顶着梢，
北风起来往南跑，
跑到江南发财了；
南风起来往北跑，
江北的银子装不了。

拉纤号是漕船逆水行舟时船工们所喊的号子。此号缓慢、稳健而悠长——

前腿弓，
后腿蹬，
栽下身子别放松，
拉到河湾喘口气，
树梢移动要转风
.....

艄公在引领此号时可使用民间歌谣，也可以使用民间小调，以增加快乐气氛。

此外，绞缩号、摇橹号、撑篙号、行船号等也都有不同的号子和曲调。

运河号子穿越七百多年的历史长河，在我们鲁西能够传承到今日，自有它的价值所在，那就是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愿运河号子不中断



在我们这个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并将它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人也能听到悠悠的运河号子声。

(作者赵中田系阳谷县张秋镇农民，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本文原载 2008 年 12 月 29 日《聊城日报》)



聊城运河航运回忆 (1956—1963)

□刘庆功 路子强

堤高，水清，每天上百只船往来穿梭，经常有许多好奇的人们爬上堤坝，观看河里纤声帆影交织而成的盛景。这是于淑科老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运河聊城段航运状况的概括描述。

现年已经 70 岁高龄但精神依然矍铄的于淑科老人，是运河聊城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8 年航运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说起半个世纪以前的那段历史，老人显得十分兴奋。出生在梁山并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光的他，最终却在聊城工作了一辈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聊城人，这不能不说聊城运河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

事实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运河聊城段兴起的 8 年航运史，就是由从梁山县来的于淑科他们发端的。说起那段历史，还真算得上是一种偶然。

1956 年，因河北省发生水灾，熟习水性并拥有船只的梁山县 260 余人被省交通厅调往河北救灾，这其中就有于淑科的父亲和哥哥。当年只有 15 岁的于淑科也跟随父兄踏上征程，但那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自这一次离开家乡之后，其中的一半人都将要在聊城度过他们的人生旅程。

河北救灾之后，这 260 余人与 100 只船沿运河原路返回。当他们路过聊城的时候，受到了聊城政府的欢迎。聊城政府很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为聊城的运河航运作贡献。因为当时聊城虽有畅通的运河，但船只与能够驾船行驶的人十分缺乏，货物运输十分不便。于是，就在 1956 年这一年，由梁山县来的这 260 人与 100 只船组成的聊城航运站成立了，开始了 8 年运河聊城段的航运历程。

“当时运河水清岸高，十分顺畅。”于淑科老人介绍说。他们的航运段是从聊城到临清和阿城，“什么都运，主要是粮食和煤炭。”除了冬季结冰期，一年之中从 3 月份到 11 月份共 270 天通航。



起初，他们都是用自己从梁山县带来的船在运河里跑货运，那些都是他们的私家船，吨位较小。后来，也就是1958年，聊城建起了造船厂，能够造出吨位达115吨的船。从那时起，航运站的船只就靠政府调配。

当时，这些在运河上行驶的货船的动力一是靠风力，顺风的时候扬帆前进，而到逆风时则只能靠人力，就是拉纤。于淑科说，他所在的那只货船吨位是115吨，再加上一个40吨的拖船，共能承载155吨。每条船上都配有八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在船尾掌舵，叫舵工，还有一个在船头用竹篙掌握方向，叫头工，其余的六人在逆风时就在运河一边的岸上拉纤。

运河交通很有秩序，就如现在的车道，去时靠一边，来时靠另一边。这样就保证了船之间不会相互堵路和碰撞。“运河水面上，一边是迎风鼓起的一张张帆，一边是纤夫们响亮的喊号声，上百只船往来穿梭，十分壮观，常常吸引人们爬上堤坝向河里观望。”

于淑科记得，他们的船跑临清最多，两段之间是172里，单趟需要十几个小时，来回差不多就是一整天。船上可以做饭，他们吃住都在船上。途中有许多码头，在不同的地方都可能装卸货物，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停船靠岸购置东西……那个时候，这些在运河里跑货运的人们应算是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当年实行的是按劳分配，整个收入与航运站四六分成，个人占四成。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100多元，这在当年已经很可观了，一个人当船工，养活一家老小没什么问题。

聊城运河的货物运输因为从梁山来的这260人与100只船得以繁荣。这些在运河上从事货运的人也都渐渐习惯了在聊城的这种生活。然而，1960年，这260人中的一半人却又回到了梁山，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还真算得上一段饶有兴趣的故事。

原来，这260人本来是省交通厅派往河北去救灾的，救完灾本应该再回梁山去，然而却被“求贤若渴”的聊城人给“截留”了，梁山航运局屡次要求这些人回去，可聊城方面没有同意，理由是梁山航运局家大业大，员工上万人，不缺少航运方面的人员，而聊城急需要航运人员，希望梁山方面能帮一把。最后，双方因为这事跑到省交通厅“打官司”。交通厅经过综合考虑，最终采取折中的办法，让260人中的一半人回到了梁山。从此之后，留下来的130人就加入了聊城籍。后来运河停航后，他们都被分配到各单位，于淑科的父亲、哥哥被分到聊城搬运队，他被分到了柳园办事处。



作为灌溉之用，渐渐地，运河昔日的“水清岸高”就不复存在了。河道淤积，河床渐高，加上陆路运输的兴起，1956年—1963年，这一段运河漕运的历史就结束了。

（作者刘庆功系聊城日报社网络部副主任、聊城新闻网新闻总监、新闻中心主任，美术学硕士，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土闸悠悠五百年

□路子强

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土闸村的古运河河道，在没雨的季节总是干涸的，墨绿色的小草长满河床和河坡。运河把土闸村分做东西两部分，村庄很古老，鸟窝坐落在高大的榆树和白杨树上。在一处运河的狭窄处，河两侧裸露出几块大石头，这就是土闸。土闸本是 1700 余公里京杭大运河上的一道普通水闸，始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 年），至今有整整 540 年的历史了。由于运河聊城至临清段在六十年代初停航，土闸也在当时逐渐淤积，前尘往事就封存在历史中了。

时光运转，日升日落。2010 年年底，随着山东省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铁锹撬起第一块石头，土闸悠悠 500 年的记忆被打开了，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中国京杭大运河完整揭露的第一座船闸！这一称号，使本来平凡的土闸，瞬间享誉全国。她那恢弘的气魄，历经 500 多年连木桩也未腐烂的科学设计，出土的近万件瓷器、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无不使发掘者、观者、研究者赞叹：这实际就是一座运河博物馆！

540 年前，即明成化七年，山东运河段东昌府北 50 里处需要建个水闸，以利于南方的物资



土闸发掘现场



北运和人员往来。于是一群人打地基、树木桩、拉准绳、凿石块、在石块上挖凹槽、两个石块用铁扣锔上，一座由闸口、迎水、燕翅、分水、燕尾、裹头、东西闸墩及南北侧底部保护石墙和木桩组成的大闸就造好了。此闸东西最长处 56 米、深达 8 米、最窄处 6 米，闸桥合一，沟通左右，行人路过时就在上面搭一块木板，必要的时候拿掉，以利通航。以其简单，取名土闸。

土闸建成后，需要人员管理，于是就在此处设立管理处，在南侧向东，再向北，设半径为 150 米的越河，并建减水闸。

土闸大多数时候是关闭的，等待需要过闸的船只聚到一二十只，就“吱呀呀”转动绞盘，“隆隆隆”提升闸门，开闸放船。开闸放船的同时，开启减水闸，使水的落差不致太大，船只可以平缓过闸。于是乎，划桨声、撑篙声、拉纤声、船身碰闸声、人员提醒注意安全的叫喊声、高官斥责仆人声、小姐换丫鬟声、儿呼母声……声声入耳。

此处由于设有土闸管理机构，也便是一个码头，货物在此集散，南方的物资上岸，本地的物资下船。由于人员较多，也出现了一些小型商业。卖饭的伙计，肩头白羊肚手巾一搭，手脚利索地排上一个方桌，外加四条条凳，肚子饿的人就可以要几个小菜，喝两盅小酒，吃完长出一口气，顺便打个嗝儿：舒服！继续赶路。

有明而清，几十个皇帝轮流坐庄，执掌朝政，而土闸却一成不变地看着悠悠河水北流。

这里需要交代的是，运河上是存在拉纤的，纤声帆影也每每是一道道风景。顺风就张帆，逆风就拉纤。拉纤都在前行方向的右边，每个人肩头搭一块木板，以减轻压强。早期的运河河堤比较高，两岸的人家往往是先看到桅杆，才听到由远而近的拉纤号子：

一条手巾织得新，
上织新年迎新春。
乾隆乘船北京去，
文武百官随后跟。
两条手巾织得长，
运粮河上运粮忙。
江北的焦枣往南运，
江南的大米过长江。
.....



这纤声帆影，直到60年代还有，不少曾经在这运河上跑船的老人尚在世。他们也会偶尔再到运河边，用或辛酸、或高兴的回忆打点自己的晚年。

运河的水绝大多数时候是从南往北流的，不过，也有发生“倒扬水”的时候。中国的运河，最早在隋朝初成体系，那时由江南先向西到达洛阳，再折而向北，经卫运河到临清，再到北京。元朝时候，裁弯取直，运河不经过洛阳了，直接由南而北，过境山东腹地，横穿聊城大地，经临清到北京。于是老运河的管理机构直接东移，用在了明清运河上。但原来的卫运河依然在，若是发大水期间，卫运河河水暴涨，河水就会通过临清，由北而南逆流到明清运河里。老百姓称这种现象为“倒扬水”。“倒扬水”期间，土闸北侧的水就要高于南侧了。

不过，土闸也有发怒的时候。每逢大水，河水暴涨，船只就会有危险，由于速度快，翻船的事故就会频发。又由于船闸最窄处只有6米，船只过闸都要小心翼翼，碰坏船身造成侧翻的事也时有发生。船一翻，里面的物品就要陈于河底了。加上有时候两岸的吃饭小摊，也把损坏的碗碟顺手扔到河里，所以土闸发掘出不少瓷器，主要有明清时期的青花瓷、青瓷、白瓷、青白瓷、蓝釉瓷器、粉彩、釉上彩等。器型有碗、盘、壶、杯、盒、人物塑像等。瓷器底款繁多，有年号款、陶人款、吉语款、符号款等。年款有永乐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宣德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大清雍正年制、大清嘉庆年制、咸丰年制、大清道光年制等。还发现少量宋元时期的瓷片，有碗、盘、罐等。土闸出土数量巨大、窑口不一、底款繁多的瓷器，为明清时期陶瓷的研究提供了一批丰富多彩的实物标本。

出土铁器有数百件，有生活用具、船上用具、造船或加固船板器具、闸相关设施附件等，主要有铁锔釦、木桩铁套、戈状钩刺、铁箍、环、钩、网坠、刀、锯、锚、锔钉等。铜器上千件，主要有铜钱、烟锅、耳勺等。石器有网坠、石球、镇水兽及少量的玉器。建筑构件有砖、瓦、龙状吻等。

虔诚，是内在心态和外在形式的结合，无关迷信；信仰，不只是抽象的执着，也需要有具体的形态。在东侧闸墩之上，曾经有一座至少建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大王庙，内曾有大佛两尊，终日接受香火，法相庄严。土闸的一切，都在他的监视之下。如今物去人非，却丰富了人们的想像力。

历史是无言的，历史是丰富的。土闸悠悠五百年，展示的不仅是出土物，更是一部运河社会史。



运河文化

民俗文化



聊城民间剪纸艺术初探

□金凤杰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聊城市的民间剪纸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造纸术进行了革新与普及以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剪纸。据考证，当时较大的造纸基地就在位于阳谷县城北18公里的石佛镇鲁庄。鲁庄造纸，历史悠久，千百年来，世代相传，供奉蔡伦为祖师。村中碾压纸浆用的大碾碓在石头上磨下两尺深的印痕，造纸用的古井遗迹都会给您诉说鲁庄造纸所经历的历史。

随着造纸术的普及，聊城的剪纸艺术也迅速发展起来，世代传承，不断创新。聊城市城区有一座北宋时期的十三层铁塔，从铁塔基座的石刻来看，忍冬纹、云纹、龙纹、大鹏金翅鸟的雕刻手法与古代剪纸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剪纸只是应民情风俗的需要而存在，其材料又不易保存，所以，很少有真正代表不同历史时期面貌的作品传世。但我们可以从历代的典籍记载和文人的字里行间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唐·杜甫《彭衙行》；“缕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李商隐《人日》。民间剪纸广泛应用到元宵灯会，大概是宋代。《武林旧事》记载，当时著名的灯品有：镂刻金箔鱼形灯，用皮影手法制的羊皮灯，用五色纸和菩提树叶作成的走马灯（影灯）。纸灯中最引



金凤杰剪纸作品



人注意的是妇女剪纸扎成的花灯。

聊城剪纸，作品不入史籍，作者不见碑传，然而这朵瑰丽的民间艺术之花，历经风霜而经久不衰，以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扎根于民间艺术土壤之中，盛开在古运河两岸，谱写着民族艺术史上无声的乐章。聊城剪纸个性强烈，因为它是自我欣赏的艺术。在农家，剪纸用来美化自己的环境，想怎么剪就怎么剪，不受任何人的限制，不受商品价值和政治的摆布。在创作中，和民歌中的信天游一样，强调“随心走”和“穷乐呵”，在随意的乐呵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需要的精神文化。所以聊城剪纸感情真挚，寓意深长。距聊城市一百多里的阳谷县，流传着一首关于剪纸的民谣：“找媳妇，要巧的，会插会绣会铰的”。聊城剪纸一般不起草稿，用锋利的大剪刀在纸上大体比划一下，就胸有成竹、大刀阔斧地剪出外部轮廓，然后随意在内部加以装饰。这些作品外观上形象夸张，线条概括，装饰多样，内涵上不仅保存了极丰富的原始图腾文化和古老民俗，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全新的艺术领域，而且较完整地保存了民间传统哲学、美学和造型体系。她不仅具有稚拙美，而且像一首质朴动听的民歌，清新、活泼、明快、粗犷，富于装饰性和创造性，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聊城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形式。上千年来，剪纸艺术家们用她们与大地一样辽阔的心态，创作出更为真实、携带着更具多生命与自然信息的艺术，将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祷巧妙融于剪纸之中，达到思想与剪刀合而为一的最高境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剪纸艺术家放下了手中的剪刀涌入经济的大潮，真正的聊城民间剪纸艺术正濒临灭绝。随着老艺术家的逐渐逝世，一些珍贵的民间绝技也失传了，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

2005年，聊城市剪纸艺术家协会成立，我担任会长，目前会员达到300多人。在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抢救剪纸文物千余件，救助贫困艺人近百人，并在



金凤杰剪纸作品



金凤杰剪纸作品

剪纸学术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8年，我的剪纸作品被文化部选为中国剪纸代表作品，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2010年7月，我携剪纸作品参展世界博览会。2009

年我申报的泼彩剪纸获发明专利，专利号为ZL200910013938.6。

“聊城剪纸，巧夺天工。”聊城剪纸以独特的魅力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像穿越聊城市区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沟通着传统与现代，散发着爽心怡神的清香，她告诉人们，传统文化必将是现代文明发展的肥泥沃土。

（作者系山东聊城建设学校讲师，聊城市剪纸艺术家协会副会长，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



张秋木版年画的前世今生

□张 颖 苏 路 高凤珍

作为至今仍在经营张秋木版年画的唯一传人，年近六旬的段存昌最钟爱的，就是那盘陪伴他多年的画案了。

走进段存昌位于阳谷县张秋镇桑营村的家，老人轻轻推开年画制作间的木板门，只见一盘十平米左右的画案上，摆满了画板、颜料盒、纸张以及刚刚印制出的年画。除农忙时外，段存昌和妻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盘画案前度过的。

一、一条大运河成就了张秋木版年画

什么是木版年画？《说文通训定声》曰：“判木为片，名之为版。”《辞海》曰：“将绘画复制于木、竹等版上，或由木刻拓制之画，皆称版画。”木版年画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门神的技术，到宋代逐步演变成印年画，内容也逐渐丰富，到明清两代年画有了很大发展。

据段存昌介绍，当年张秋古镇是地处京杭大运河黄河北岸的第一大码头，水陆两路交通均非常方便，是经济、文化汇集之所。最早的年画店是元朝时由山西晋南人开设的，技术也是他们传过来的。到清代，张秋镇规模较大的三家年画店——源茂永、鲁兴聚和刘振升画店，均由山西客商开设。后来，其中的“刘振升画店”迁至东昌府区清孝街，从而促成了东昌年画的发展。此外，当时的堂邑、莘县、邓县、郓城、菏泽等地也都是年画的重要产地。到清朝末年，聊城的“五福祥”、堂邑的“同泰”、莘县的“通顺”等20多家大规模的年画店长年生产不辍，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运河船队载着各地的商贩纷纷前来，从鲁西平原到山东各地，从晋、陕、冀、豫到东北三省，都有张秋年画的销售市场。

张秋年画的制作技法是套色木版印刷，工序有四个步骤，即绘稿——



刻版——印刷——手绘。张秋木版年画只有“草版”，即只印不画，全部用木版套印，但一般不超过五遍，颜色有红、黄、灰、青、黑五种基本色，整个画面五彩缤纷，装饰性强。人物面部不着色，使其形象更加突出醒目。

据段存昌介绍，张秋年画并没有自己的画工和刻工，刻版艺人都是从堂邑西三奶奶庙村雇来的。另外，在徐一发村和许堤口村也有不少刻版艺人，但他们不印刷、不发行，而是运到寿张县张秋镇印刷和发行。

二、木版印书：年画的副品和“同胞姐妹”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聊城木版印书业，为木版年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的年画店除了批量印制各种年画，还印制不少“书夹子”（又称“书本子”、“布轴子”等，均系用年画版印刷的。外面以土布为封面，正面封面与年画一样大小，但底面修长，可以折包过来，并且与正面有纽扣相系），甚至戏本，如当时流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剧本，都是用年画方法印制的，一般为一函四本或五本，外边包以土布蓝皮。

从现有资料看，当时年画和“书夹子”的创作题材十分丰富，并非仅仅局限于神像题材，而是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又以戏剧故事为大宗，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白蛇传》、《红楼梦》、《杨家将》、《西厢记》等。

三、后继无人，市场萎缩，传统技艺渐失传

张秋木版年画在聊城民间流传了数百年，期间经历了明清时代的辉煌，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破坏，直到今天，在我市广大农村还能看到它的身影：线条粗犷的门神、形象丰满的灶王等，它们为农村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然而，在日益精湛的现代印刷术面前，由于品种单一、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气息的作品，传统的木版年画业渐渐显得力不从心，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说起张秋年画的败落就不能不提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浪潮下，很多珍贵的文化遭到了破坏，木版年画也未能幸免。为了避祸，不少人无奈地将祖辈流传下来的年画木版烧掉，现存的一些木版都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藏起来的。之后，木版年画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自段存昌的祖父从张秋学到年画技术以来，段家经营年画已有三代，段存昌的孩子们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外出打工，而不愿与画版、颜料为伍。作为经营张秋年画的唯一传人，段存昌印制的年画线条简洁流畅，人



物造型古朴祥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然而，眼下他手上也只有一盘画案、六个画版，只能印制一些天地灶王、财神、门神、老皇历，每年可印制10万余份。

张秋木版年画的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项宝贵的民间艺术何去何从，仍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作者张颖系聊城日报记者，特别报道组组长、新闻中心副主任)

附：

澄泥印

澄泥印是陶瓷印的一个分支，最早出现在宋代，未见有传世者，亦未有制作澄泥印之人，制作方法失传。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民间绝活研究所研究员田吉坤，在多年从事篆刻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曾经失传的澄泥印制作方法。从河水胶泥的提取、过滤、晾晒，到烧制中火候的把握、颜色的变化方面，已形成成熟稳定的流程。



据田吉坤介绍，烧制好的澄泥印硬度与最好的印材青田石、寿山石相仿，刻起来得心应手。目前他制作的澄泥印已有几百封，可以烧制出鳝鱼黄、檀木紫、虾贝青，以及类似黑陶的黑色等。田吉坤为名贵的澄泥印再度传世做出了很大贡献。



吕才与尺八

□吴文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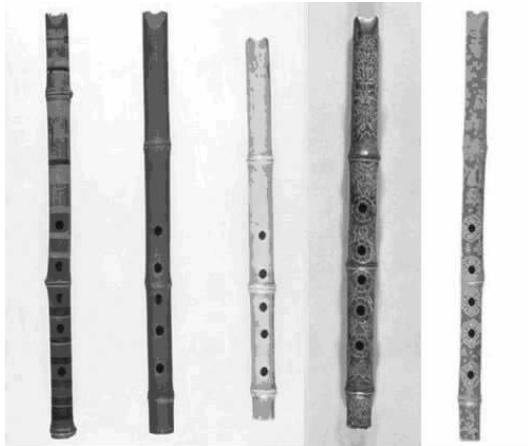
吕才（600—665年），今高唐县清平镇吕村人，故里其墓仍在。吕才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家经典，又多才多艺：懂军事，著有《教飞骑战阵图》；知历史，纂有《随记》；通天文，修改的历法沿用至今，并著《刻漏经》一卷；晓地理，绘制了《方域图》，撰写了《唐地理经》和《灵山秀水经》；爱文学，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奠基人；善医药，参与对《本草经集注》的增改，形成《唐新本草》；精研算命之术，有吕才合婚法传世；曾与著名的玄奘大师公开论战。他还尤长于乐律，是著名的音乐家，创造了《秦王破阵乐》等唐宫廷三大乐舞，奉命编修古琴曲《白雪》。而不被人注意的是，他创作的乐器“尺八”，至今被日本人视为至宝，供置在藏宝馆。

尺八是我国古代一件重要的吹奏乐器。如今提起尺八，知道的人已为数不多，熟悉它的人就更少。《中国音乐辞典》有如下说明：

尺八，古代吹奏乐器。唐代已出现，相传吕才善制此器。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吕才于贞观3年之前就已制作出一套（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吕才因此被尊为“尺八之祖”。

一、吕才能“为尺八十二枚。长短不同，无不谐韵”



唐代尺八(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



何谓“尺八”？尺八就是长度为一尺八寸的竖笛。

《旧唐书·吕才传》载文：

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征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征曰：“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

从魏征“（吕）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的话可知，吕才当时就制作了十二支长度不同的尺八。既然十二支笛管的长度各不相同，何以又叫“尺八”？

原来十二支尺八管中的黄钟管之长度为一尺八寸，吕才就以黄钟笛管的长度来代指十二支笛管的名称，并不是所有的尺八都是长一尺八寸。

尺八在魏晋之前称笛，魏晋时为长笛，唐时始称尺八。西晋以后，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的唐帝国建立以后，当然也就有了“正雅乐”的要求。吕才当时设计并制作了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虽然不是受命于执政者，但吕才所为正雅乐之目的则是毫无疑问的。

唐尺八，又称为唐口箫。外切式吹口，音孔一般为六孔与八孔，并可根据需要选择凤眼的有无。指法与洞箫同，并且跟洞箫一样用调区分不同长度，常用的唐尺八有G调、F调、E调。对于习惯六孔与八孔指法的朋友，只需要熟悉尺八的外切式吹口，就可非常方便的吹奏乐曲了。

二、尺八源于吕才对长笛的改进

吕才设计的尺八和晋代的荀勗（晋颖阴人，荀爽曾孙。博学多才，掌管乐事，又修正律吕，曾研制笛律12支，以校正音律）设计的泰始笛一样，一套都是十二支，都是对魏晋长笛的改进。

关于荀勗制定笛律，是因为当时所制“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韵，多不谐合”的缘故。荀勗认定“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于律吕”，故而便“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使笛的七声“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论荀勗的设想如何好，制作如何合情合理，但是泰始笛没有付诸实际应用也是事实，更别说流传开来了。

若把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与荀勗所设计的泰始笛作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与差别：

——这承继关系就是，笛体中声都是所应之律的倍数。泰始笛的笛体



中声是角音，故而笛长是四倍或八倍角律；尺八就黄钟一支来说，其长度为一尺八寸，就是黄钟律长之倍，其声就是黄钟正律，于此足可见其一斑。

——其差别则为，尺八比泰始笛短，也不似泰始笛坚持笛体中声为角，以崇尚古制。何以见得呢？就以尺八之名来说，前文已经说过，就黄钟这支而言，其笛体中声为黄钟，那就是宫声，顺应了乐手的演奏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点则是，尺八的长比魏晋长笛以及荀勗的泰始笛都短。

说吕才设计的尺八比魏晋长笛以及泰始笛短，是有依据的。《宋书》记载，与荀勗同时的协律中郎将列和曾说：

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征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

《宋书》的注文说：

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征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

这里应当指出，五尺余的大吕笛不可吹，注文则指出大吕笛为二尺六寸有余的同时，也交代了四尺二寸笛乃是蕤宾。查荀勗十二支泰始笛中，最长的是蕤宾笛，其长度为三尺九寸九分五，而不是四尺二寸。这就足以说明，荀勗设计泰始笛的时候，除了音孔位置与魏晋长笛有异而外，其长度还是没有多少改变的，只是为了符合十二律吕，长度略有缩减罢了。

在十二支泰始笛中，最短的一支是仲吕笛，其长度为二尺一寸三分三厘有余。而吕才设计的尺八，其黄钟笛的长度就是一尺八寸，即使黄钟是十二支尺八中最短的一支，也足以证明十二支尺八比十二支魏晋长笛或泰始笛要短，何况我们如今还没有根据说黄钟是十二支尺八中最短的一支呢？

笛的长度缩短，无疑使演奏更为方便，从而增强了尺八的表现力。

三、宋代尺八不同于唐代尺八

尺八发展到宋代，形成五孔尺八。沈括《梦溪笔谈》载：

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

宋代以后，随着汉文化的断层，来自民间的箫、笛等乐器逐渐取代了用于宫廷雅乐的尺八的地位，以致在我国已不见这种古代的乐器了。现在



中国流传的竖制竹吹管乐器有箫、南音洞箫（南箫）、广东洞箫等。其与尺八主要区别为箫和广东洞箫等为内挖U型吹口，常封顶盖；南音洞箫（南箫）为内挖V型吹口，不封顶盖。而尺八的吹口是半月型外切吹口。箫与南箫，吹口都与尺八有明显的区别。尺八与箫的开孔也不同，以一尺八寸管尺八为例，其筒音为D，各孔音高为F、G、A、C、D。另外尺八与箫在内径、音色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

四、尺八东传日本保存至今

早在唐代时，尺八经由当时日本的遣唐僧东传日本。

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还保存着我国唐代传去的八支尺八。其中一只竹制刻雕尺八，长43.7厘米，管上端开口，管身前面五孔，后面一孔。每一按音孔边缘有圆形花纹，制作十分精美，通体雕花纹和仕女像。第一孔上刻有二女，一者俯而摘花，一者立其后作张袖状。后面一孔下有一女立而手执扇，另一女坐弹琵琶，其余部分均饰以花鸟纹。此外还有玉尺八、牙尺八、雕石尺八和桦卷尺八等。

日本法隆寺秘藏的那支据说为圣德太子吹奏过的“笛”，同正仓院所藏8支尺八，取材及制作工艺完全相同，应是同一器物，只是时代不同，名称不同而已。

总体来看，日本的尺八，虽然早在唐代就传入，但现在保留的，基本上是宋代传去的，其技巧复杂，音色独特而有古味。从整个演变历程看，唐代尺八至宋代演变为宋尺八，其后宋尺八又演变成南音尺八和今日的洞箫，宋尺八传到日本后又演变为今日的日本尺八。唐初吕才制作尺八，乃是对魏晋长笛的改进，今日正仓院藏存的8支唐代尺八，并不符合吕才的设计要求。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日本尺八的流行，以及日本尺八界到中国的寻根，外切口五孔的日本现代尺八逐渐回传中国。

鲁西是吕才的故乡，他死后葬于现高唐县清平镇吕庄村东。墓前有石羊、石猪等石雕，分列神道的两边。作为“尺八之祖”的故乡人，我们期盼着尺八的美妙声音能早日响彻在这片土地上。



运河谜谣 (十一首)

□赵中田

运 河

家西一条线
金刀银刀剁不断
变粗了能行船
变细了能浇田

沙土裤子

腿是一条腿
人是两条腿
不是裙子
穿上正准

注释：沙土裤子为旧时民间婴儿穿的一种裤子，内充沙土，故名。

绞 脍

一紧一松做好活
大闺女见过没经过
新媳妇嫌疼不愿说

注释：绞脸即开脸，闺女出嫁前要用双线把脸部汗毛绞去。



孝 棍

一个短棍尺半长
一身白毛乱嚷嚷
戴白帽的拿着它
哭哭啼啼好几场

注释：短棍上粘有多圈牙花白纸，为孝子哭丧时所用。

木 秤

出门做生意
拉耳朵问年纪
八两是半斤
谁重和谁轻
它给分得清

注释：老秤十六两为一斤

墨斗·墨线

去时嘎嘎叫
回来笑哈哈
甭管早和晚
不黑不回家

注释：放线和收线时，墨斗中的摇棍都会发出声音。

双杆风箱

一间屋子两架梁
里头坐着毛家娘
毛家爹一伸腿
气得毛家娘呱哒嘴



注释：风箱是旧时烧火做饭时的一种鼓风工具。

棉车子·纺线

南边来个雁
腰里别着把根箭
走路转圈昂昂响
停下下个大白蛋

线略子

门里门外挂纱灯
外边有物里头空
四条小腿不会走
光会打滚闹腾腾

石磙轧场

东场里
西场里
两个小孩哭娘哩

注释：石磙轧场时，两磙脐与磙眼摩擦发出“吱吱哇哇”的叫声。

顶 针

胖肉棍
麻铜鼻
攘进去
办好事



苦山村宗族与乡村社会 “自治性”研究

□吴 欣

明清时期，东阿县苦山村落中的不同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建设，通过宗族凝聚纽带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并进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相对稳固的社区村落结构。在时空的脉络中，这种结构又通过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等要素，以及建立在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及制度，维护着村落的自治性特质。这种特性的运行方式是合作与共赢，而非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公平。

传统社会中，“宗族不仅是一个亲属组织，更是一个社区组织”¹。“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的先秦文化资源，在宋代及其以后被看作是构建民间秩序的重要手段，宗族在社区中的意义因而被确立并不断强化。那么不同宗族在同一村落社区的共同生活中如何实现和谐共处，并进而形成村落自身的“自治性”？这是本文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自治性”是对逻辑学中自治概念的借用，指系统结构本身的自足状态和自我调适功能。但自治性又不意味着超稳定结构和守成不变。本文通过对明清宗族组织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认为村落的稳定在于其社会结构具有极强的自治性，而形成这种自治性的原因则是血缘宗族及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及其制度。

本文选取山东省东阿县苦山村为研究对象。该村有三个不同宗族，至今保留有谱牒、祠堂、墓地等物质资料，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虽其祭仪、祭田等仪式和经济活动已不复存在，但家谱及一部村志的保留仍使得人们关于宗族和村落的记忆，尤其是对历史曾经有所建树的族人村人的追忆，成为村落文化普遍传播的叙述话语。



一、落籍苦山：不同宗族的祖源

苦（羊）山，位于山东省东阿县南部，“峦峰层叠有苦盖形也”，因此名曰苦山；“以苦名又以羊名者何？以上有卧羊峰也”²。“去山不里许，居民繁衍，更筑数十舍，自为聚落”³，依山而居形成的聚落亦名苦山村，“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⁴。从行政规划来看，明清两代，苦山隶属于东阿县。明万历朝于慎行编《兗州府志》记苦山属东阿县六乡二十四社之尚德乡路疃社⁵；康熙朝《张秋镇志》也记载：“东北为东阿之路疃社，其聚居曰苦山集，去镇三十里，风气颇佳，多士族，厥田肥饶”⁶。村人李濠自称此村落“山水汇而灵气呈，其间多绣文纬武之儒、异才绝智之士，自是有忠孝焉，有仙释焉。事业文章之大，他乡莫能先焉”，并在顺治十八年著就的《苦山志·序》中赞曰：“乃地籍一隅，足擅郡邑之貌，备寰舆之采者，吾苦羊是也。”⁷

在此如此聚落之中，生活着一刘二李（为了便于区分，我们按其居住的方位和现在的行政规划，分别将其称为东苦山刘氏、西苦山李氏和前苦山李氏）三个宗族。关于三族的来历，家谱中各有记载。刘氏家谱创修于明弘治元年，家谱中关于“吾刘氏之得姓，虽远祖于陶唐氏，而近宗于汉沛公，皆漫无可考。迄自宋元屡遭兵燹，忧乱更迭；逮元季不德，僭伪肆起，干戈扰嚷，臣民窜徙，频年未息；至我国初，仅安集耳”⁸的笼统记述说明了其“原居民”的身份。同时家谱对“东阿生继刘氏者，肇自陶唐炎汉，为名家国族，谱牒详尽，想无脱逃。逮自中叶兵燹屡厄，子孙散处”⁹的追忆，说明了其“正统”的祖源与身份。

家谱所记，刘氏一世祖生活于宋元之间，并无显赫之功，“宋元寂寂无闻”，“鼻祖家境尚贫，二世祖郁府君、三世祖思明府君赋性忠朴，惟乐耕耘，事勤俭，故饶裕。值四世祖琏府君始有功名，为明宣德三年岁贡，历官山西临晋县儒学教谕。其后，诗书传家，录科考、登仕宦者接踵而至，代不乏人”¹⁰。据族谱《世表》记：一世柒公之下为二世郁，三世为思明、致中、三公。三世开始分支，思明一支有子三，琏为长子，始入科举，为临晋县教谕。刘琏有五子，分别为观、宽、信、敏、亨。其中刘亨为弘治元年昌黎县县丞；其下刘继为弘治十三年蓟州学训。而真正使刘家成为望族之家者为五、六二世之同门三进士，他们分别是五世刘约和他的两个儿子刘田、刘隅¹¹，父子三人科举成功，同朝为官。至此，刘氏宗



族的声望显赫，成为当地之望族。其后，刘氏“入成均游泮宫者代有其人”¹²，他们或为地方小吏，或以解惑授业为生。正因为如此，万历朝大学士于慎行（刘田外孙）在给刘隅所作《墓表》中说：“吾邑文献以刘氏为冠冕”¹³。在一个聚落之中，如此连续的文脉积累，为刘氏赢得大族之名显见矣。

前苦山登州李氏族是苦山另一个宗族。由族谱所载“先世籍隶登州，冠冕海岱，不传五而中落矣，明初迁苦山以家焉”¹⁴来看，其族于明初由登州移民而来。关于移居原因，族谱并未言明，但在《明实录》中却有这样的史事：洪武二十五年，“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¹⁵；洪武二十八年，山东布政使司杨镛又上疏曰：“青（州）、兗（州）、济南、登（州）、萊（州）五府，民稠地狭，东昌则地广人稀，虽尝迁闲民以实之，而地之荒闲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及小民无田耕种者，皆令分丁就东昌开垦闲田，庶国无游民，地无旷土，而民食可足矣。”¹⁶杨镛的奏请很快被批复，并于同年七月得以实施，东五府共有1051户、4666口移于东昌府¹⁷。对此葛剑雄也有研究认为：东五府的这两次移民，在东昌全境都有分布¹⁸。由此来看，其与李氏家谱所记“不传五而中落矣”的内容吻合，登州李氏的家道衰落正应和了洪武移民的要求。

西苦山李氏亦是移民家族。据家谱记载：“祖常公，自陈夏，自号知已。元（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氏，式元泰定丁卯科举人，因乱不仕，自顺帝甲辰年迁居东阿县苦山庄家焉”¹⁹；“余族世居陇西，迁居山西亦难详自何时。迨元末兵起，鼻祖知已公自山西洪洞县复迁于山东东阿苦山庄家焉。”²⁰关于家谱中的这段记述，因为史无所载，我们很难确定这一“移民”属于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所为。

从家谱记述来看，李氏家族始祖李知已被描述为虽已科举但因乱不仕之人，落籍苦山后其子孙均以务农为生，至五世李仁为嘉靖二年进癸未科进士，李氏子孙始再获功名。李仁，字元夫，号吾西，嘉靖二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族谱对“陇西”、“洪洞”以及始祖科举身份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历史真实？还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想像甚至虚构？或许这些并不重要，事实上，正如学者所言，“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²¹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李氏的历史追忆既包括了族人陇西、洪洞、科举这些历史事件的认同，也是一种



记忆在现实中的延续。在这一脉络之中，李氏宗族能够寻找到其社会价值与进行宗族建设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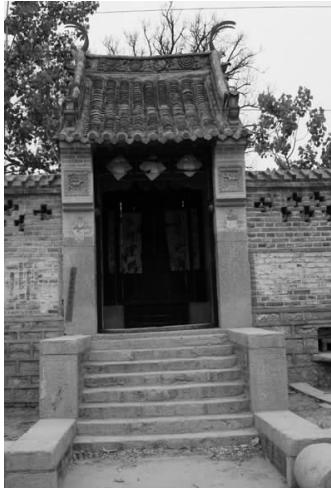
由此可见，苦山三族中，刘氏可算作土著，具有地望之优势，明代中期族中多名族人为官，奠定了其仕宦宗族的地位；二李作为移民宗族，虽无地缘优势，但其落籍无疑会改变苦山原有的村落结构，并且在时间的延续中通过宗族建设获取了在村落中的地位。

二、宗族建设：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

在村落乡村社会中观察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可以看到互动一般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国家社会层面，人们基于共同的政治认同而形成一定归属感和群体认同；第二个层面是宗族之间，宗族间的互动首先是建立在“排他”基础上的，其间各宗族身份和自身的文化特征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排他又意味着自身建设的强化。

三族中，作为土著的刘氏宗族最早拥有了对土地、文化等资源的占有优势，并且其他移民宗族的落籍又进一步增强了其进行宗族建设的动力，因为“对祖先认同的建构是随着人口结构重建而发生的地方社会重构的关键之一”²²，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家谱、祠堂、墓祭等收族方式的运用和变迁是其关键，也可以说，族群建设是在时空性、知识性和策略性场域中进行的。

刘氏家谱创修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其后历经六次续修。刘氏宗谱的编纂始于功名获得之时。四世刘琏在出仕之后，即开始为宗谱的修纂做准备，如弘治二年修成的家谱世系所记：“先考琏府君于宣德初年尝念宗派之不一，慨谱无闻与其前，惧系默传于其后，欲作吾宗之谱”，但“未几先考厌世，谱竟不得修也……”，其子刘亨“自壮年即欲修谱，以绍成先志，而襄阙事，奈何奔驰仕路久而未获。乃于弘治之初，政致之暇间与乡邦二三硕德之曰：‘宗谱之作惟据见闻之真信……’”²³可见，刘氏宗谱成于族人入仕之初。弘治十五年，六世刘继在续修家谱时说：“世人不修谱因袭弊来远矣，生每愧，夫儒者莫倡其始？”在这里，刘继明确将修谱看作儒者的担当和责任。这种担当表现在宗谱的编纂体例上：“参用欧苏谱法以为世系，既又为图录、为世考、为谱传、为宗范、为祠墓志，皆缘情而起例，因名而演义，详著于篇，以成一家之迹。至于诰敕诗文皆附录于后，凡昔人谱法之未备者，今皆备之”²⁴。这一方面是对宋儒家族建



苦山村刘氏家庙

设的吸收和借鉴，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时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对该谱有这样的评价：“兹谱也，可谓无遗法矣。”²⁵刘氏对宋儒家族建设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实践，这既是其对国家“独特意识形态”²⁶渗透的接受，更是利用文化资源提高家族地位的手段。

刘氏家庙修建于弘治十五年，该家庙现在经过翻新依然保留在东苦山的中央位置。家谱记：祭时“俎豆森严，衣冠整齐，尊卑长幼，秩然有序。……言毕，祖孙各欢颜而退”²⁷。在此种庄严的仪式之中，群体的约束力被加强，个人行为被规范。尽管刘氏宗祠

在创修之初仅有正堂，无“配房、大门仪文度数之伟观”²⁸，但作为宗族的象征，它既凝聚了本族之力，又显示出有别于他族的地位。

除此之外，刘氏的墓地、祭田在明中期至清初也不断扩大，家庙碑记曰：

祖莹在山之西北里许，原地若干亩，嗣是而湛君、天霖君暨祖武、鸿格诸君频捐地若干亩，总林地四十余亩。气象阔大，规模闳敞。所以妥安先灵者至矣。然使有林地以妥安先灵，无祭田以奉先祀，而牺牲粢盛之经费不知所出。将何以展追远之孝思乎？吾六世祖参政公创修义社，敬宗睦族洵盛事也。逮七世叔祖中丞公率众置祭田百余亩……²⁹。

该碑表明，在明代，刘氏的收族方式比较完备，宗族势力强大。

相比之下，西苦山李氏和前苦山李氏家谱修纂与家庙建设在明代相对薄弱，只以墓祭作为敬宗收族的方式³⁰。谈及原因，时人李濂就认为这是其移民家族与地望的结合尚需时日，即所谓“有幸聚庐处者，止是一村落小户……何有谱牒迹矣”³¹。但整体看来，三族的强弱之别，还因自于刘氏家族科举入仕者众以及相应的经济力量的壮大。笔者据三族家谱所统计，有明一代，三族科举人数分别为62、14、9。地缘优势与科举入仕所获得的正统文化性根基，奠定了刘氏在苦山聚落之中的主导地位。

时至清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总体趋势为三族势力逐渐趋同。这缘于国家变革与宗族自身势力消长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明清易帜，该区域



遭受重创。“经明清改革之时兵火仳离，家室不能保聚”，刘氏家族遂出现了“……中不无疑而未确断、而未续之处，竟有使后人览之茫然不知其为何人祖父者”³²的情况，刘氏宗族受到打击。但与明代相比，入清后，清政府又大力倡导宗族建设，顺治朝的《圣谕六言》、康熙朝的《上谕十六条》、雍正朝的《圣谕广训》都延续着敬宗睦族的思想。在此背景之下，清初二李宗族创修了家谱，“登各支之林墓，查其碑文之记载，考其所配置姓氏，延访之而始得其详。”³³从二者家谱所记“按节拜献于祖茔之墓前”、“入庙寝而拜献第见纷纷列作之助”以及“族中祭田八亩”等记述来看，二李收族方式已由明代的墓祭转变为家谱、家庙、墓祭、祭田合一的形式，这是其宗族组织逐渐壮大、经济实力增强的表现。

其二，入清后，刘氏科举入世的族人虽未间断，但已无明朝之显宦，比之明代“擢高科、登显贵、入成均、游胶庠者踵武详解代不乏人”的辉煌，清代则面临着“今科第不甚显荣，而衣冠秀雅、局度有方严者亦难枚数”³⁴的尴尬。二李宗族此时入仕之人逐渐增多，虽多是地方社会的士绅，但与刘氏之间的差别渐趋缩小，达至平衡。

在明清长时段的社会变迁之中，苦山村落结构相对稳定，但其间宗族间的地位和关系却发生了一定变化，由一族的相对突出到三族的逐渐趋同。在这个过程中，村落的有序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作为外力，社会变革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三个家族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从本质上讲，三者的相互认同，应该是一种长时期的结构力量的结果。

三、文化建设：苦山三族的空间延展

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宗族必然存在着它的边界，但这种边界不是仅仅或者必须依靠占有排外性的地域来维持，也不是通过定义他们自身的特征来维持内部团结，而是通过排斥陌生人来维护。所以边界的存在并不表明他们各自文化特征不发生转变，或者说不同宗族在共同的生活中，可能形成一致的价值认同和伦理规范。

苦山三族在强化对内建设的同时，也通过其外部的文化实践活动构建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望族”的地位即是被“孝行”、“乐善好施”、“施学”等行为所积累、建构起来的，并且在这种文化实践活动中，逐渐培养了苦山村落的文化模式。

首先，以科举为目的的知识传授是三族最为有效的文化培养手段。刘



氏创建义学的活动早在明代就已经开始。明弘治年间，刘氏六世祖刘观先在苦山设立义学，收纳本族及外族学子³⁵。刘观之子刘约等后人进一步将这种乐善之举发扬至极致，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创立了闻名乡里的东流书院。其后的嘉靖元年，刘约子举人刘隅及李仁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复买地筑渠架梁引池，聚生徒课业。嘉靖十一年，刘隅罢官听勘还乡，遂又增至讲堂四楹，并建正祠和藏书楼，并复置田产百亩为书院学田。其所修建全部为自费，“未曾丝发烦吏胥……隅不胜以名胜自私，乃命从子庠生刘一学偕诸生诣台省上书，乞将书院归之。有司录在学校”³⁶。刘隅父子创建书院并非族中私学，附近之学龄者亦可入学。书院的建立无疑是这一区域中极富影响力的事情，在培养功名举子的同时，也培育了区域之内的“儒学”之风。

功名之学借助了国家权威的影响，而对信仰的尊崇与敬献则使三族在精神领域达到一致。明清两代苦山村落之中有石佛寺、三圣祠、关帝庙（又称圣帝庙）、玄帝庙、观音堂、龙王庙、土地祠等多个信仰祇地，是地方社会的信仰中心。关于其地多神祇的原因，明人苏则曾在其撰“重修石佛寺”记中说：“初建国之二十四年，爰敕所自，清理佛教，汰其衍懿宗风者，俾供服役。凡招提所建，相毗或数区归并于一为丛林。惟时我东阿石佛寺与焉。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雅崇礼教。每值岁时伏腊，洎圣寿之辰，必会众拜其内。”³⁷多缙绅鼎族应该是苦山成为信仰中心的原因，但三族在信仰空间中的作用又非此一点，其中通过施舍等物质手段加强信仰建设，则是他们更为重要的价值体现。如苦山李氏道光二年碑记曰：“苦山西偏旧有三官庙一座，亦不详创自何时。自八世祖虚白公复为重修且创立山门施庙西地基。许庄西良田二十九亩。公乐行善事，无邀誉之心。”³⁸再如当地“建醮碑”所记：“修醮施法历朝崇之。设醮禳灾以补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之不足，而乡间闾里集众建醮，□□斋礼忏除以禳疫祈福者，其以此与？然非有诚心好善之士鼓舞提倡，历久不倦，则一乡之善念或息，四方之善事不永。必不能邀天眷，荷人之目焉。李君秉政好善乐施，创建醮社……”³⁹其中所言李秉正即是李氏族人。刘氏族人也于乾隆四十年再修关帝庙，“各捐资财以倡于先，募化善信以助其后，鸠工庀财，不数月而告竣。”⁴⁰

三族对信仰空间的经营和地方性神祇的尊崇，不只是简单的信仰与被信仰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神与人之间精神世界的交流与碰撞，它同时又是俗世本身自我认识、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给



予神的物质酬答以及通过施舍与神所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即是一种秩序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说，“世间的秩序似乎是神圣秩序复制的主体，宗教是用象征的语言书写下来的社会生活，是观念和行为的隐喻体系。”⁴¹

除此教育、信仰等空间序列中的文化建设外，其他诸如物质上的乐善好施同样也积累了家族的名望，并实现了对区域风气的带动。如刘氏之刘观，其常于灾年捐助贫民，“天顺丁丑齐饥，米商射利，价腾踊，先生亦船粟往粜，下其估，遍饲群丐”；又“戊子又饥，有诏官出粟赈贷者，先生出粟应诏。”因此“乡人迹其实，号曰乐善先生”⁴²；入清，二李家族获得科举功名者逐渐增多，其在地方社会中的活动也渐而活跃。西苦山李氏之李有年于乾隆十年黄河水泛滥之时，赈济村民，因其间宅基高而宽敞，很多村民寄居其家，并用其柴草筑起草门，“草门楼”遂成为其家堂号⁴³。其他诸如刘文“乐善好施，家门常设义饭”，李氏李澐“冒死解救村人”等被刻于碑记于谱的故事，将孝行、忍让、仁义等儒家核心内涵，建构成值得颂扬、模仿的文化资源与行为规范。

在这样的过程中，三族逐渐积累了家族威望，同时又渐而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认同。李濠所说“苦山地迩京畿，化承邹鲁”的文化传承虽略显笼统，但“士人崇礼让，小民业更桑，经大夫率敦行，积学精炼亢爽”的人文风气，却是苦山三族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

四、记忆与民俗：三族的地缘认同

理性的从“结构——功能”角度看，同一聚落之中，不同宗族的团结往往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当然其利益整合的前提除却价值认同等伦理规范外，不同宗族在相同空间中共同的社会生活（民俗与记忆），也是建立村落自治性的基础。正如李濠在《苦山志》中曰：“上行下效曰风，积染成习曰俗，故土俗污隆，虽曰天运，岂非人事？”其中的“人事”即是苦山人一系列适应环境变迁的发明与创造，并且这种发明正是基于对以往历史和记忆的构建与理解？

在具有传承与创造双重意义的社会生活中，苦山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地源”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被不断强化。《苦山志》中记述了“苦山”对苦山人的庇护：“顺治二年，荆隆口决，大河（黄河）北徙。十月初一，水至苦山，阔四十里，中洋深十丈，经虎窟苦羊之间，东阿庄村田禾漂没殆尽。苦山街水深八尺，田舍具没，土庶环山



结庐赖以全躯。”又载：“明刘六刘七叛，统党万骑，掳掠里中，气焰嚣张，士民仓上。山小而夷，可策马一跃而陟其巅，贼盘旋多时莫能上，俨若有阻之者。贼以鞭指山上士女曰：‘尔山有福神护之，吾不攻尔。’遂去。是以苦之赫其灵也。”⁴⁴

除此“山”之佑护，更有“地”之神奇，笔者在苦山所作田野考察中，听到不同的村人讲述的相同故事：“清乾隆年间的三月初十傍晚，突然朔风大起，夜间天气甚寒，当时麦子已经抽穗，皆被冻。第二天太阳一出，又被焦枯。因四月二十三日芒种在即，于是有人操镰割之，有人连根拔起，但大部分人没有动。不数日，根底又冒出新芽，时亢旱不能耕种播种，姑且听之未毁。不料不多日，麦苗竟然重新生长，历四十日而熟，一亩收获八九斗至三四斗。于是人们说：“天地生好。”显然，在时间的脉络之中，这样的描述将不同祖神的排斥与相同地神的认同、将“你”“我”的界限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关系。历史记忆之中的苦山是苦山人共同的“根脉”。

观念中的“你中有我”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通过宗族之间个体的流动——联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由三族家谱来看，其都记录了男性族人妻子姓氏、父辈背景和来源地，对出嫁女的出嫁家族及去处也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刘氏族谱，对明代以来的所有亲缘关系都记述得较为清晰详细。其间，三族之间的姻亲联系在明中后期较为频繁，如嘉靖年间，西苦山李仁始取刘约之女为妻，刘氏族女适李仁之孙，前苦山李濠之女嫁入刘门等等。二李之间的婚姻关系家谱中也有详细记述。显然，婚姻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宗族之间的互动，“从说媒到回门的一整套联姻程序，村民建立了两个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并在日常往来中对姻亲关系进行相关的维护，而一系列的仪式包括分家、生育、丧葬，改变了姻亲关系的结构，使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结构得到重组或强化。”⁴⁵虽然这种旨在强调结构关系的婚姻关系看似属于纯然的关系范畴，但流动的关系不断通过各样的仪式与风俗被强化。

共同的历史记忆，加强了人们社区文化的认同感；有效的共同生活和约定习俗，强化了不同宗族的地缘认同。在由婚姻建立的结构关系之外，苦山还有一些跨宗族的村落整体性组织，如自卫组织红枪会，金融借贷组织妈妈社、老林社、老亡社，信仰组织醮社等等……这样的共存与合作，将苦山村落合作共赢的自治性延续于社会发展的脉络之中。



五、余 论

村落文化体系中，不同宗族使用各不相同的标志和记号相互区别，以此划开彼此的界限，维护着自身的边界，同时又因共同的地缘、行政归属与生活方式而使得相互之间的摩擦不会威胁到村落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跨越宗族之上的村落整体性组织和村落共同体。

从一般状态来看，社区自治性具有一定的“自发性”⁴⁶，是在“社会共同意见的基础之上形成的”⁴⁷，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社会意识中存在着占支配地位的核心思想⁴⁸。事实上，在苦山三族的发展脉络中，我们也始终能见到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核心原则，这个原则的文化核心要素是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和象征符号——这是任何一种能够生存几代的文化群体必然具有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可将其视为社会制造出来的人工产品，积极的干预和计划可以使其形成并定型，如士大夫对地方信仰的“经营”以及神话的不断被“累积”？第二种是把文化认同视为一代又一代共享记忆和经验的沉淀。“鲁之北界，左卫右齐，其俗淳雅和易……亦有周孔遗风”文化地域空间之中，承载了“尚多好学，性质直怀义”⁴⁹的特性和“冠婚丧葬音问常通……而岁时府腊欢常道故，雍雍睦睦，灿然有文以相接，骤然有恩以爱……”的民俗规约，正是它们共同撑起了苦山人记忆中的“地籍一隅，足擅郡邑之貌，备寰舆之采者，吾苦羊是也”。

傅斯年在分析鲁西乡村社会时认为：“村与村的生活各自独立。联村的乡、团等等，简直就是有名无实，除当土匪骚扰时用以自保外，只有应付官差的一条用处……”⁵⁰这虽旨在说明鲁西村落组织的排外性，民众的内向性心理以及政府管理的困难，但其另一方面也解释了鲁西村落社区的自治特性。这种特性是传统社会与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村庄的自治性仍然通过文化网络不断对国家权力进行着解释和重写，宗族意识和村庄认同也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加以应变，由对内强化转化为对外构建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整合家族利益，而且这些意识又通过修复祠堂、家谱，增加旅游文化的含量等手段表现出来。传统文化和现代结构并没有完全断裂，村庄的自治性在苦山村落中依然有着强烈的脉动。



注释：

1. 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第 106 页。
2. 3. 4. 7. 44. 李濠：《苦羊山志》序、卷二、卷八、自叙、卷十二，民国五年的手抄影印本。
5. 于慎行：万历朝《兗州府志》卷二“建置志”，齐鲁书社 1984 年影印本。
6. 康熙朝《张秋志》卷一“方域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29，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 页。
8. 23. 弘治二年刘氏家谱《传刘氏家乘世系》。
9. 弘治十五年续修刘氏家谱《东阿刘氏宗谱后序》。
10. 1998 年《重修东阿苦山刘氏五支家乘序》。
11. 刘约，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二甲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主事、河南参政等职。正德二年，因裁员离职，不久复职，复任河南参政。致仕归乡后，在东流泉构筑精舍，教授子姓以修世业。所创东流书院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书院之一。刘田，为刘约子，弘治十八年乙丑科进士，初授北直隶真定府元氏县知县。正德五年升为户部主事，员外郎，正德十二年督办漕运，38 岁卒于任上。刘隅，刘约子，刘田弟，嘉靖二年（1532 年）癸未科进士，拜授福建道监察御史，嘉靖七年为南直隶学政，后历任四川按察司佥事、南京刑部郎中、南京宗人府经历、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等职。致仕后，继续承办东流书院。
12. 34. 宣统二年《续修东阿刘氏家乘跋》。
13. 笔者抄录于苦山“通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使范东刘公墓表”。
14. 31. 顺治十八年《李氏族谱》。
15. 16. 17. 《明太祖实录》卷 216，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62 年影印本，第 3185、3451、3480 页。
18.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9 页。
19. 1956 年续修《李氏家谱》卷首。
20. 33. 43. 道光二十三年李氏《续修族谱序》。
21.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22.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学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4



页。

24. 25. 弘治元年，李东阳为刘氏家谱所作《东阿刘氏家乘序》。
26. 科大卫、刘志伟撰文认为，地方社会与国家的整合是从下至上的认同过程，百姓模仿士大夫修谱建祠。详见《宗族与地方社会认同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7. 宣统二年《刘氏宗祠拜谱记》。
28. 29. 笔者抄录于刘氏家庙《刘氏祖莹祭田宗祠地墓宗志》。
30. 二李家谱中都有关于墓祭的情况，顺治十八年创修的前苦山李氏家谱就是以墓祭图谱为线索进行编纂的。道光朝《东阿县志》中也有记载曰：“阿俗尊祖敬宗祭礼并行，除夕祭于家庙，无家庙者祭于庭……寒食、中元、十月朔日祭于坟前，富者丰仪以献，贫者亦负楮镪行礼，此野祭也。”
32. 乾隆三十五年续修刘氏家谱《序刘氏家乘疏言》。
35. 42. 罗玘《乐善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204页。
36. 苏祐：《东流书院记》，见道光朝《东阿县志》卷十九“艺文志五”。
37. 苏则曾：《重修石佛寺碑记》，见道光朝《东阿县志》卷二十“艺文志六”。
38. 笔者抄录李氏族人家中碑刻（未命名）。
39. 笔者抄录于苦山《建醮碑记（民国二十一年）》。
40. 笔者抄录于苦山《再修关帝庙碑记（道光九年）》。
41. 罗伯特·F·墨非：《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0页。
45. 刁统菊等：《宗族村落中姻亲关系的建立、维护与重组》，《民俗研究》，2008年第9期。
46. 有西方学者认为：“社会秩序是指那些自发形成的社会制度统一体。”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
47. 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48. 社会秩序和内聚力是建筑在社会共同意见，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



持有的价值观、信仰和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但社会中存在着“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它能有效的影响法律和政府的管理。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利茨提出支配社会制度主要方面的精英人物的合意构成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核心”和“外围”结构。参见科特威尔著：《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49. 乾隆《兗州府志》卷五“风土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50. 傅斯年：《山东一部分的农民大纪略》，《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作者系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浅谈临清清真八大碗

□刘英顺

说到“清真八大碗”，在临清可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是临清回民喜庆聚会时的必选用菜。“清真八大碗”是如何形成的？它由哪些菜组成？有什么特点？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结合多年来积累的民间访册，现抛砖引玉，斗胆试论。

大家都知道临清是千年古县、运河名城，勤劳智慧的临清人创造了丰富灿烂的运河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独具特色，而临清饮食文化中的代表又当首推“清真八大碗”。“清真八大碗”是一道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清真复式饭菜，它的形成源自抱碗菜，而抱碗菜的形成又与回回兵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回回军屯临清又与大运河有着必然的联系。军屯就是驻扎在某军事要地的屯田军队。当年，元明王朝在临清军屯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漕运、保护粮仓。据《临清州志》记载，“西域回回徙居临清”主要来源有“军籍户、侨宦、游商”，其中军籍户主要来自元代军屯（1289年）和明代军屯（1369年）。据《临清县志》记载“元代延佑三年以海口屯军隶临清万户府”。据《明史·兵志》记载，“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大明王朝为了保护临清漕运大码头，在临清设临清卫，其驻军级别等同于天津卫、威海卫。

元代，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被征调到中原。这些人大部分被编成“探马赤军”（或称“西域回回兵”），参加平金、征宋、统一中国的战争。按元朝对“探马赤军”的规定：“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大运河沿岸是这些信仰伊斯兰教军士屯聚牧养的重要之地。据《元史·世祖本纪》载：“河洛，山东居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而“河洛、山东”涵盖了临清境内的永济渠和会通河地



域。据临清庄乡族谱记载，部分穆斯林姓氏即为“西域回回兵”的后人。

明初，以徐达和常遇春为统帅的明军南征北战。至正二十八年，这支明军“循河北上，师次临清”。徐达、常遇春系回族，其部将亦多回族。临清作为明军的征战要地，派有大批回族军士留守。据碑刻记载，临清老礼拜寺，就是由徐达、常遇春等回教门始建。期间，常遇春、徐达、胡大海率军沿运河征战临清一带，并在临清派回族将军和士兵驻守，因此，现在临清还有很多村庄仍保持着编民屯垦的称呼，比如洪官营、陈官营、赵官营、老官营等。当时，军屯官兵被称为“军籍户”，明代的军籍是世袭的，卫所兵有定籍，兵农合一，屯守兼备，不但保证了兵源，也满足了军队的供给。随着战事的减少、社会的稳定，军屯的回回兵逐渐占籍临清，由兵农转为农民。

不论是元代回回兵，还是明代的回回军籍户，他们均祖居西域，饮食习惯多以牛羊肉为主。兵备战争期间，回回兵为了适应时间紧迫、行动迅速、方便快捷等军事用餐的特点，将穆斯林善于加工肉食的技艺运用到了战争中。回回兵预先将牛、羊肉等食物，通过炖、炸、蒸等方法，加工成熟制品，以备行军打仗之需。每到军队开饭时，火头兵架锅烧汤，将预先准备好的熟肉、炸里脊、蒸闷子等熟制品，用热汤水一浇，便成了一碗可口的饭菜。这样不仅有利于行军携带，也有利于士兵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吃到适合本民族生活习惯的饭菜。而且，这样的饭菜可解决千百人同时用餐的问题。又《民间访册》记：回回兵用饭时，每人面前放一大碗饭菜，他们以队为单位席地围聚而坐，念诵“太斯米”，“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孩子啊，以安拉的名义开始，吃你面前的食物”（《穆斯林圣训集》），抱碗而餐。抱碗菜首先在回回兵军队中初现雏形。后来，抱碗菜的加工、制作、用餐等方式在回民军籍户中流行开来，并逐渐融进了中原百姓生活习惯，由席地围坐，发展成了四方围桌的用餐民俗形式。当年，虽说桌面上放八大碗，有可能是每人一大碗炖肉，也可能是每人一大碗炖鸡，而且是每个人只吃自己面前的大碗菜。后来又逐渐演变为八人八大碗同桌共餐的形式，但八大碗之中的菜品可单列、可各异、亦可重复。

经过数百年间历代穆斯林厨师的不断创新、完善，结合临清穆斯林群众的生活习惯，在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临清“清真八大碗”。寻根溯源，临清“清真八大碗”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它是临清穆斯林教门勤劳、智慧的结晶。

说到临清“清真八大碗”有什么特点，除了色、香、味俱佳外，我认



为还有三点，那就是一肉二汤三滋补：

一肉。原料以牛、羊肉为主。牛羊肉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其味佳美。伊斯兰教倡导食用牛羊等佳美食物，禁戒“奇形怪状、污秽不洁、性情凶恶、行为怪异等之肉”（《古兰经》），“归信的人们啊！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食物”。所谓佳美食物，马坚阿訇解释说，牛羊肉就是佳美食物，其有良好的外观形象、鲜香的嗅觉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二汤。清真八大碗属于汤菜，它很注重汤的运用，其汤有原汤、清汤、白汤。巧格、松花、闷子佐以白汤；清汆丸子佐以清汤；烧肉、炖肉佐以原汤。清真八大碗中的汤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它们的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现代添加剂（味精、鸡精、香精、色素、酸钠、嫩肉剂等）进行调味、调色，这可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返璞归真。

三滋补。清真八大碗不仅都是佳美的食物，而且还都具有滋补强身的功用。元代回回太医忽思慧《饮膳正要》说，“羊、牛肉，温补不燥，培元固本，易筋壮骨”，经常食用可以“开胃健力，散寒助阳，益肾补虚”。据回回典籍《天方典礼》记载，“饮食，所以养性情也”，“惟驼、牛、羊独具纯德，补益诚多，可以供食”。2008年首届中国十大寿星排行榜中，穆斯林老人占7位。所以说，清真饮食不仅是一种文化，而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健康长寿之方。

任何一种美食，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见解与评价，然而，我认为品评一种美食，首先应该是吃文化，然后是吃技艺，最后才是吃味道。一种食品，如果没有文化做支撑，那它只能是一种果腹的食物，绝对称之为不上美食。而“清真八大碗”可以说是美食中之美食。我们在品尝和欣赏“清真八大碗”的同时，可以从中感受到临清穆斯林文化底蕴的深厚和饮食文化的灿烂，还可从中参悟到穆斯林做人的准则，那就是大碗中透着质朴，清香中透着率真，简单中透着智慧。可以说，临清“清真八大碗”是运河文化与穆斯林文化在临清大地上和谐交融的典范，是临清运河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申报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章节。我们有责任去发掘、保护、弘扬，力争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运河古城临清有一美食名菜“清真八大碗”。



附：

临清“清真八大碗”的特点

- 一、烧肉：酸香透烂，肥而不腻。
- 二、炖羊肉：软烂醇香，汤汁醇厚。
- 三、巧阁或闷子：香嫩松软，汤汁爽口。
- 四、松花羊肉：味醇透烂，汤汁鲜香。
- 五、清汆丸子：汤汁清香，滑嫩劲道。
- 六、黄焖鸡：肉烂清香，色泽金黄。
- 七、里脊：色泽红亮，香透滑嫩。
- 八、肉杂拌：清香爽口，味道各异。

(作者系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会计师，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聊城八角鼓

□于 敏

八角鼓是山东聊城的一种地方曲艺。清代中叶，北京八角鼓沿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流传到聊城、临清一带，受到了当地城乡居民的喜爱。聊城八角鼓融合了当地的方言，吸收了“岭调”、“靠山调”、“马头调”等民间小曲以及河南鼓子戏中的一些曲牌，形成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曲艺种类，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之说。2006年，聊城八角鼓被列入山东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此，对聊城八角鼓的整理、挖掘以及现代传播的可行性被提到日程上来。

聊城八角鼓的自然传播

聊城八角鼓的传播主要是口传心授的自然传播，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广播、电视的普及以及电脑互联网的盛行，为聊城八角鼓的传播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虽然这样，处于边缘地带的聊城八角鼓并没有在广播、电视、网络上频繁的出现。

从我所调查的情况看，聊城八角鼓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是在2006年聊城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演出，它以淳朴、优美的唱腔吸引了广大观众，同时也引起了聊城市领导及相关文化部门的注意。另外，在2006年度山东省广电协会主办的广播电视作品评奖中，由聊城市东昌府区电视台选送的短纪录片《聊城八角鼓》获电视社教短纪录片三等奖。聊城八角鼓在电视上的传播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遗憾的是没有在此基础上做持续性的宣传，聊城八角鼓在电视上的传播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踪影了。相对于电视，网络上有关聊城八角鼓的资料还是比较可观的，但大多只限于文字资料介绍。像“聊城文化部落”、“聊城四中吧”、“聊城文化局”等都能看到关于聊城八角鼓的简单描述，聊城八角鼓的视频资料在网上根本



看不到。也就是说，虽然处在传播媒介多元化的时期，但是，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些传播媒介，相应地也延缓了聊城八角鼓的传播，聊城八角鼓的优美唱腔旋律仍然处于在极少数人中间传播的状态，这是比较令人遗憾的地方。因此，本文只对聊城八角鼓的自然传播方式作相应的介绍。

聊城八角鼓的自然传播主要通过以下几种传播渠道：

1. 师徒间的口头传播

这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传播。这种“面对面、近距离”的传播特性，是早期大多数民间艺术传播的主要形式。

师徒传承的口头传播方式能体现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心理反应，能更好地及时调整传播状态，使传播者和受传者相互之间产生心绪的共鸣，受传者更能积极乐观地参与到这种传播活动中来，有利于传受双方的相互理解。因此，师徒口头传播成了聊城八角鼓传播活动中最积极的传播渠道。

2. 与京杭大运河相关的运河传播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是我国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运河的便利和来来往往的大量流动人口，为八角鼓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中叶，北京八角鼓沿运河流传到聊城，受到聊城当地城乡居民的喜爱。后逐渐改用聊城方言演唱，并吸收了“岭调”、“靠山调”、“马头调”等民间小曲以及河南鼓子曲中的一些曲牌，逐渐衍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曲艺形式——聊城八角鼓。

3. 艺人流动行艺的有意识传播

南北各地的艺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为了生存，经常外出流动行艺，在客观上推动了曲艺的双向传播。他们所到之处都能与当地的语言、音乐、民俗、生活情趣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独特的曲艺形式。八角鼓在流传的过程中，艺人的演唱与聊城方言及音乐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聊城八角鼓唱腔。

4. 田间地头的娱乐传播

田间地头的娱乐传播与八角鼓便于携带、场地适应性强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农民在下地干活的时候、劳作休息期间为了解除疲乏，围在一起演唱八角鼓。因此，聊城八角鼓的演出场地比较自由、灵活。

5. 文本传播

文本传播是最基本、最常见并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播方式。文本借助印刷工具可迅速大量印制生产，并且便于携带，读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阅读，随意把握阅读进度，不必受时间的限制。

总之，聊城八角鼓的自然传播，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进行口头创作、传播的，最能充分发挥个体的个性，这也是传统曲艺比较流行的传播方式。

聊城八角鼓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播现状

聊城八角鼓这门古老的曲艺艺术在当代多元化市场中，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在现代传播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辉煌一时的聊城八角鼓曲艺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演唱者、观众日趋老龄化以及八角鼓演唱后继乏人的问题，严重影响着八角鼓的传承和发展。聊城八角鼓正面临着日渐衰落、即将失传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在电视、网络等强势媒体中很难见到八角鼓的演出。

虽然如此，仍有人为重振聊城八角鼓做着艰苦的努力。像聊城市东昌府区北城办事处冯庄村的人们，他们在退休教师古云龙的发起下，自动成立了八角鼓演唱队，邀请了八角鼓老艺人李以章做他们的唱腔师傅，三弦师傅侯玉月为其伴奏，村民黄晓梅、步爱盈、桑小银、侯香荣、李春香、步爱静、窦淑贞、刘秀荣、梁桂红等八角鼓爱好者的加入，使聊城八角鼓的演唱队伍增加了新鲜的血液。赵宝林、赵连华父子倾囊相助，为八角鼓爱好者免费制作 CD 唱盘，分发给每一个八角鼓的小组成员以便于学唱。村支书李孟祥腾出原来办公的地方作为八角鼓演唱的排练场地。总之，所有爱好聊城八角鼓的人们为八角鼓的传播做着艰难的尝试。如今在原来研究基础上深入研究聊城八角鼓，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而细致地挖掘、整理工作变得十分紧迫。特别是录音、录像等原声（生）态资料的保存更是迫在眉睫。

在国家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今天，聊城市委、市政府也加强了对特有的、濒临灭绝的珍贵无形文化资源的抢救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特别是对濒临失传的聊城八角鼓，聊城市文化局将其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列，并于 2006 年入选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聊城市文化局要求东昌府区文化局为此建档立案，给予重点扶持和培植，并提出要“强力挖掘八角鼓”的口号。这对保护和发展聊城八角鼓、持续传播聊城八角鼓，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聊城八角鼓传播前景的思考

如何保护、传承、发展聊城八角鼓？如何引导聊城八角鼓曲艺走出现困境？如何解决制约聊城八角鼓传播的主要因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多研究、多思考、多下工夫。

1. 制定政策法规，更新思想观念

社会的关注、政府的支持是做好文化保护传承的最有力的保障。思想观念的更新也很重要，它要求我们结合当下的社会现状，打破种种束缚，努力对聊城八角鼓曲艺进行变革、创新，丰富和发展聊城八角鼓曲艺传播的认识，使聊城八角鼓曲艺逐渐走出文化危机，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文化格局。

2. 保护老艺人，培养接班人

目前能演唱聊城八角鼓的尚有几位老艺人，他们对聊城八角鼓的唱腔、表演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功底，但这些八角鼓演唱者的年龄日趋老化，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忧。因此，应加大对他们的保护力度，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将其唱腔、演奏进行录音、录像，并且深入研究他们的表演艺术。同时，还应该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

3. 紧跟新形势，创作新曲目

创编者要及时关注社会中的热点，善于抓住让观众在感情上容易产生共鸣的典型事迹，对其进行加工，创编成激荡观众内心世界的新曲目。像《青天白云》（刘恩水词、朱长龄曲）就是根据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白云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的。另外，古云龙新创编的《逛聊城》《敬老院里幸福多》等曲目也深受观众喜爱。

4. 改善生存条件，创造人文环境

当前，聊城八角鼓的生存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利用人为因素创造更好的、适宜生存的人文环境。为更好地保护聊城八角鼓，创造适宜生存的环境，特提出以下建议作为参考：

(1) 政府出资扶持

在笔者的实地考察过程中，聊城八角鼓的演出还未完全消失，在民间一些酷爱八角鼓曲艺的民众中艰难生存着。他们自己组建简陋的小型乐队为其伴奏，召集民众在劳作之余加班排练曲目。聊城八角鼓的生存状况着实令人堪忧，相关政府、文化部门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为聊城八角鼓的演



唱提供场地，扩大聊城八角鼓的影响力。

(2) 利用现代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当今强势媒体的登陆，迅速快捷、覆盖面广是其最大特点，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利用当地的纸质媒体开辟聊城八角鼓专栏、八角鼓老艺人的专访等。利用这种大众化的宣传提高聊城八角鼓的知名度。另外，随着科技文化手段的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当今的现代传媒。

(3) 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效应

民族文化传承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要根基，努力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效应，展现真实可信的人文风貌，在形式、内容上实现时代发展和科学创造，努力体现聊城八角鼓独特的曲艺特性和群众性。

(4) 开展聊城八角鼓演唱进校园活动

在当地的各大中小院校中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方针，让音乐专业的大学生进行实地采风，学唱八角鼓唱腔，让聊城八角鼓走进大学课堂。同时，在当地小学教育中也适当安排八角鼓表演，编写本土乡村教材，使孩子们对聊城八角鼓曲艺有更多的了解。

总之，聊城八角鼓与其他的民族民间艺术一样，有它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有它低潮的时期，但它的文化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却是永恒的。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给民族民间音乐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契机，激发了各地文化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的积极性。在高科技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不仅不能忽视和抛弃这些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且还要保护与研究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使它作为一个艺术品种、一个音乐文物传给后世，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年 4 月版。
- 2.曾遂今：《音乐创造的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黄钟》2003 年第 3 期。
- 3.李士钊编辑、逯本荣口述、王助山整理：《八角鼓——山东聊城的一种曲艺》，油印资料第四十一号，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1954 年印。

（作者系乐馨国学馆馆长，音乐学硕士，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传播学会会员，中华慈善总会国学教育工程推广师，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临清武术

□魏庆新

武术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堪称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伴随着我们的先民与大自然、社会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经过历代的不断提炼、创新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包含多种锻炼方式，具有强身健体、自卫御敌、娱乐表演等多种功能的民族体育项目，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临清历史厚重，人杰地灵。临清人性格豪放，仗义疏财，历来就有习武健身的优良传统。民风尚武是民间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仅清代，临清就有武进士 37 位、武举人 117 位。马兆瑞为清丁未科一甲一名武状元。吕恒安武进士出身，清嘉庆殿试第四名，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就任台湾总兵。

临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名城重镇、南北通衢的交通要道，它特殊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都为临清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条件。临清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一直处于战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军旅武术还是民间武术，都深深影响着临清，使临清乃至周边地区孕育和发展了多个拳种流派。唐末宋初，源出于临清龙潭寺的潭腿，充分利用腿长力大的特点，内外兼修，开创了北腿之先。清道光年间，临清瑶坡人张东槐巧妙使用多种肘法、拳法创编了刚柔并重的肘捶，并远播冀鲁豫广大地区。节奏清晰、姿态优美的查拳发源于毗邻的冠县。而舒展简洁、动作轻柔缓慢的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武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都是河北省永年人。快慢相间、结构严谨的佛汉拳，其创始人贾云露祖籍河南省长垣，佛汉拳兴起于大名。永年、大名距临清都不足百公里。清代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为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反抗外来侵略，借助传



习武术，发展组织，形成武装力量。乾隆年间王伦起义、清末宋景诗起义和义和拳的兴起，使临清广大城乡遍及练武的拳场。义和拳利用习武组织群众，其组织的同时又是一种习拳练武的结社，会众都是娴习某种拳棒刀枪弓矢等武术的。他们秘密传教、公开练拳。清《军机处录付奏折》中载：山东临清有梅花拳教、义和拳教、大红拳教、二郎拳教、五祖拳教等，仅梅花拳刘四就有徒弟三千余人。这些教首及头目通过开场授徒，访友比武等方式，传习了红拳、八卦拳、六趟拳、阳阴拳、义和拳、梅花拳、神拳、太子拳、二郎拳、金龙照拳、五祖拳等，以及枪、刀、棒、剑、绳标、鞭法诸技，使明以来蓬勃发展的各种拳法及器械进一步向复杂化、多样化发展。吕寨乡常庄，清朝时武举高老胜曾于村中设六个班，传武习艺，汪江、高洼、老官寨、高孟庄都有高氏门徒。陕、甘、宁三省镖头常祥云（老官寨前寨人）初习武于高氏，武艺精湛，后成为武林高手，名扬四方。

临清又以响马名扬天下。响马是古代对绿林侠盗的一种特殊称谓，古代从事掠劫的侠盗在对货主发动攻击之前，往往先射出一枝装有哨子的响箭，表示将要打劫，故而称为响马。山东响马素以武艺高强、出手迅猛和来去无踪而著称，并以临清一带最为集中，明清史籍常说：临清为响马渊薮。临清本地的响马更是声名显赫，根业已久。《寄园寄所寄》卷上记载顺治时的临清有云：山东滕家庄三兄弟为响马魁，远近州邑常被戕。南人入都，此为畏途。当时，滕姓、崔姓、王姓几大聚族区域，都有专干响马行业的大户。临清响马个个身怀绝技，攻击力极强，打劫手段也格外高明。临清响马与外地响马不同的是，他们有严密的组织，穷人及小商不劫，并常与官府作对，因此，也为中华武术史留下了许多传闻逸事，可见当时武风之盛。

民间拳师和拳手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抗斗争，拳会与各种教门的结合，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不同风格的武艺便荟萃在一起，促进了民间武术的交流与传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武术运动的群众性和多样化，使武术运动更加丰富多彩，且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武术家。清末，武术名家、威震上海滩的马永贞就是临清人。《清稗类钞·技勇类·拳有大架子小架子二派》载：“光绪朝，马永贞以大力著名于沪。一日有卖艺力士约武伶十余人与决斗，皆避易而退。马少时为松江正营教师。马之拳为大架子。马曾在河南、上海等地卖艺、传拳。1879年春，遭与其有争的马贩子顾忠溪等勾结斧头党等暗算身亡。”女武术家马素贞乃马永贞之胞妹，较



其兄武艺尚高一筹，不仅足下功夫有根底，其拳术亦入化境，且知礼让。知其兄欲漫游天下，曾极力劝阻不果。后闻其兄被害，奋然携家传匕首，只身赴上海，手刃兄仇而归。清末民初武术家马升平，武艺精湛，擅杆子鞭，亦称“钓鱼鞭”，外号“西洋鞭马武”，因参加义和团运动，避居济南，并在济南回民拳房授徒传艺，为济南杆子鞭、鱼翅拐传人。

1932年3月，临清国术馆成立，地址在大寺行宫庙(行宫庙位于大寺街中，清时建，为碧霞元君巡行驻驾之所，在其中社火极多)。1933年国术馆复设进民众体育场（进德会，现在大众公园），谌祖安、孙占德、魏金章先后担任馆长，当时临清城区及乡村的基层国术馆竟达42个。临清国术馆推广新武术，并在学校开设武术课，将武术纳入教育之中。葛子宾、黑文石曾在省国术训练班学习，并分别在临清11中、回民中学任教。1933年，馆长魏金章先生曾代表临清赴济南参加了省武术国考获得银盾奖。拳师周松山1913年为陆军部武技教练所学员，从王芗斋习意拳，后在北京教拳。

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武术事业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关心重视。武术作为简便易行、强身健体的传统体育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每当清晨傍晚，在林荫河畔、广场庭院，练武者比比皆是，异彩纷呈。“喝了运河水，就会踢踢腿”，在临清已不是虚言。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又将通臂拳引入域内，更加丰富了拳种类别。仅城区就有少林、太极、大架、潭腿、查拳、肘捶、佛汉、通臂、大成等众多拳种流派，习练者逾万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术运动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临清市承办省地级武术比赛20余次，并多次组队代表聊城参加全省武术比赛，青少年运动员在省以上比赛中获得各类奖牌百余枚。武英级优秀运动员于宏举、张彪、董朝晖等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前三名，现在分别在甘肃省武术队、聊城市体校跆拳道队、武术队担任教练员。近年来，临清市武术协会、太极拳协会、大成拳协会，临清潭腿研究会，散打搏击协会，临清肘捶研究会、临清肘捶协会，多个武术馆、武术学校、业余体校武术班相继成立，武术站点不断增多。每年元宵节，各乡镇武术队进城表演已成为临清市体育活动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临清市老年体协夕阳红艺术团的演出中，武术表演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节目。2009年和2010年，临清潭腿和临清肘捶分别被列为山东省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卫视《武林风》栏目也于2010年8月走进临清，对临清武术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武术运动的热爱空前提高，临清参加武术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学龄前的幼儿，舞刀弄剑者如雨后春笋，蓬勃兴旺。武术运动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使临清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术之乡。

（作者系临清市武术协会主席、国家武术一级裁判，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古迹寻踪



运河古都聊城

(电视片解说词)

□祝伟康

古迹寻踪

按：此文系《运河古都聊城》电视片之解说词。为庆祝聊城新闻网视频开通，专门制作此电视片。此片公映后，引发了市民对聊城历史文化的探索，故录入此文，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这里是聊城，运河沿岸的一座古老都会。

聊城，自文字诞生以来的六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直作为都会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繁荣与传承。可以说，聊城这片土地就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上个世纪70年代，在阳谷景阳冈地区的考古过程中，考古专家通过发掘出的文物，对比史书的记载，发现这里应该是大禹的都城。

考古专家张学海先生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大禹的都城——穷桑！提起穷桑，那可是上古时期最大的都会了。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黄帝在穷桑登帝位，少昊也在穷桑登帝位，还有高阳氏颛顼，还有舜帝。作为几代帝王的登基之处，穷桑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文明最重要的一座都会了。

在研究聊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惊喜的发现，黄帝的故里应该就在我市聊城。

作为当时的国都，穷桑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这里留下了我们人文始祖、上古先贤的足迹，让我们去景仰，去追思。根据聊城县志记载，高阳氏颛顼、蚩尤、造字的仓颉、圣明的尧帝、还有长寿的彭祖，都长眠在聊城的土地下。

春秋无义战，那时，狄人攻打邢国。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听取了建议，打出存亡继绝的旗号，率军击败狄人，帮助邢国复国。但邢国的国都已经被战火摧毁，齐桓公就建议将富庶的夷仪作为新的邢国国都。这次帮



助邢国在夷仪复国，也是齐桓公最令人称道的霸业之一。定都于夷仪的邢国在这里休养生息、营建新城。而这座邢国的新国都——夷仪，就在今天聊城城区的西南。

一千二百多年后，聊城又迎来了作为国都的新的历史时期。隋朝时，炀帝开凿大运河。隋朝的大运河经过今天聊城市西北部的临清。运河的开凿，给聊城的西北部带来了飞速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一点也不为过。

以至于隋朝末年，宇文化及从洛阳率军叛乱，就窜逃到了聊城的冠县，在那里至今留存着当年的化及台。后来宇文化及据守聊城，建立了许国，聊城就是许国的国都。但隋末战火过后的聊城，发展缓慢，仿佛历史在这里停住了脚步。

一直到元朝开凿会通河，这条贯通了聊城南北的运输要道才给聊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这次发展，给聊城带来了近千年的富庶繁华！如果说当年隋朝卫运河只是推动了聊城境内一些小城镇的产生，那么元朝开通的会通河则是推动聊城发展为运河沿岸——乃至全国的最大都会之一。当年聊城境内的一座小小码头，就能云集成千上万艘货船，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流散。而一座临清钞关，它的税额占到全国钞关税收的四分之一。当年运河上的漕粮更是有四分之三要暂存在临清。

当年聊城盛产棉花，有“棉都”的美誉，每年来往运河之上运棉船只可以说不计其数。难怪明朝重修东昌府的时候，祖籍东阿的大学士于慎行面对千帆云集的场面会发出这样的赞叹：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这也许是对当时繁华聊城最公允的评价了！

聊城，这座古老的都会因运河而极盛一时，我们今天称它为“运河古都”再合适不过了。

但清朝末年以后，黄河改道，阻断了运河的河道。内河运输被迫转变为海上运输，聊城逐渐地衰落了下来，在历史的重负中长期踟蹰不前。曾几何时，聊城以贫困闻名，成为山东经济快速发展之船沉重的“船尾”。

但历史不会再次停住脚步，聊城重新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聊城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我们发展聊城的物流业，修建了大型的集散市场，货物吞吐量远超当年的任何一座码头；我们发展聊城的交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促进了聊城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正在修建一条贯通聊城的德商高速公路，这条公路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京杭运河。在城区，沉睡了近百年的古城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热火朝天的施工场地足以

告诉人们，将来的古城一定美轮美奂。现在，聊城正在朝着新型大都会的方向昂首前行！

(作者系聊城日报记者、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



古
迹
寻
踪



人文天下第一山——谷山

□张长城



宋·米芾书“第一山”碑

当我们游览泰山名胜、品味泰山文化之时，总感觉泰山脚下岱庙里的“第一山”碑说的就是泰山，其实不是。这是“谷（穀）山”第一山碑。上个世纪50年代谷城（平阴县东阿镇）的寺庙毁掉后，“第一山”碑被人们运到泰安岱庙，从此在这里得到了保护，同时也为泰山增添了光彩。

本文从这通“第一山”碑谈起，给大家详尽讲述一下鲜为人知的中华人文脉络之源，但这必须得从阳谷说起。

在阳谷县古文史传说、文化遗址中，有不少让人看不明白的地方，疑问重重。县志等史料对某些古文化的记载也存在莫衷一是的现象，不能自圆其说。比如，今阳谷境全部是平原，却有“谷山”、“黄山”等地名，志载还煞有介事地曰：“阳谷有三山不见山。”过去城东门里有个慈氏寺，院中还赫然矗立着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题写的“第一山”碑，更让人感觉云苦雾罩；阳谷建城才千年，城边却有两三千年前的“阳谷会盟台”；西门外有个“西汉庄”村，村中有一小桥，传说是仙人黄石公授天书给张良处等等。这些古文史疑问，没有人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即便有学者质疑某一种文化现象，也只是冠以“附会”一词搪塞之，没能深入研究历史真相和古人为什么附会。就这样，千百年来阳谷人对这些古文化将信将疑，说不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谜团越来越难以解开。



近年来，本人对阳谷古文化进行了调查研究，寻根问源，探索发现了阳谷“谷文化”的深远，也分析了难以解开的世代阳谷人的文化情结。就史志意义来讲，也算有不少新发现，找到了一把打开历史“文化锈锁”的钥匙，这就是科学解读民族文化情结和实事求是研究古文化的态度。

谷名的由来

谷，传说上古时代的人文初祖伏羲，教民种五谷之地谓“谷地”。这样算来，谷名的实际历史远比有文字记载的时间要长很多。

没有比“谷文化”再早的人文传说，可以说，民以食为天，谷惠人文与“天”齐！

谷字，简化字河谷、五谷为同一个字，而旧时的繁体字是分开的，五谷之谷写作“穀”，阳谷是五谷之穀。很多学者在研究“阳谷”的同时，都认为“谷”和“穀”是独立的两字两义，不曾考虑两字同宗同源的问题，以致于研究远古“谷文化”始终背着一个缺憾。

《尔雅·释丘》曰：“谷者微（激）”；《释文》又曰：“微，本又作眉，通渭，河台地称眉田”。由此可知，河边台地“眉田”就是“谷地”，谷地作物就曰“五谷”，我认为谷和穀同宗。这种解释应该是准确的，但因年代太久远，已没有史料可核对。今天的词典对谷字的解释为：1.五谷，农作物；2.有坡度的低洼地称谷，延伸为河谷、峡谷等。

《尔雅·释丘》中“穀”又为“穀丘”。古文曰：“丘者，聚也。”就是说人聚居的地方叫“谷丘”。谷丘在哪里？“谷者微”，就是“微乡”。微乡在哪里？《山东通志》载：鲁庄公筑郿城，郿本微，在梁山西北。分析到这里，不光找到了谷之源，还查出了谷与微同源的史据。微通谷，水边的意思。最早记载是商纣王庶兄“启”封地于微（激），后称“微子”，微之城在梁山西北一带（或许是台前县上岭），志载“微乡”。商纣亡国后，周公旦封微子于宋（商丘一带），即为周代宋国始祖。微子封宋后，谷丘文化也随之南迁，原谷丘（微乡）所领区域亦归于宋国。后来原谷丘（微乡）又归属鲁国，鲁庄公于此筑郿城（郿，眉岸之城）。

山东微山县沿袭了“微文化”，境内有“微（激）子墓”。



谷名与伏羲的关系

伏羲，又称宓羲、庖牺、包牺、牺皇、皇羲、太昊等，华夏上古三皇之一，是最早传说中的智者和族群领袖，也是各大姓氏“祖谱文化”推崇的人文宗祖，有史家称之为“人文初祖”。相传伏羲教民种五谷、结鱼网，渔猎畜牧，制造八卦，编著《易经》等等。至于伏羲所处年代，史家众说纷纭，神话传说更是扑朔迷离。有学者认为，黄帝所处时代是“龙山文化”时代，也称“远古时代”，距今约3950—4350年间；伏羲所处时代是“大汶口文化”时代，称之为“上古时代”，距今约4300—6000年时期。

也有可能“太昊伏羲”为世袭尊号，我认为有一代“智者伏羲”生活在“大汶口文化”后期，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也比较赞同“伏羲故里东方说”，这也是从阳谷、寿张旧志传说记载中得到的答案。寿张旧志记载，东平湖东岸古时有个须句(gou)国，为伏羲苗裔风姓国，春秋时期被邾国灭，后并入鲁国。阳谷旧志记载：“阳谷北境有宓城，太昊伏羲之城也”，据我推理，“阳谷”应该指的是“古阳谷”或“谷城”。根据近年来考古界的探索和我的推理，宓城，应该是茌平县南部教场铺一带古遗址群中的一处。阳谷旧志还说：“阳谷，伏羲教民种五谷之地，后迁曲阜教民种五谷；谷以稷为长，故其官名稷。曲阜南门亦名稷门，稷门之东多稷名，稷门以西多谷名。”后段话也流露出：不排除是由以曲阜为文化中心时代的“文化移接”现象。

伏羲教民种五谷之地并非专指今阳谷地。上古时代的先民即便是学会了耕种稼穡，那也仅限于河边“谷地”，基本上是傍河聚居，单薄的生产能力依赖着“有限”的自然资源。鲁西平原是黄河冲积地，河流、湖泽水系繁多，是最适合古代人类生存繁衍的“谷地”。这里是中华人文的高产区，最早的“伏羲时代”文明就在这里孕育。伏羲教民种五谷之地就是这个区域，文化相关联的古“谷”名地就是“伏羲文化”的载体。古黄河无堤防，自由流淌，泛滥无常，丘聚人文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被迫无奈“举国”迁移。伏羲部族以及后来的黄帝部族（本人观点黄帝故里是桃丘），都是由东向西迁徙。人文初祖伏羲、人文始祖黄帝的迁徙原因惊人地相似，他们真正的故里(出生地)被黄河、岁月所湮没，我们现在了解到这方面的史料，一是先人遗留足迹；二是文化情结所致；三是史学家笔



下的定格。

谷名地，谷山是一个不易变的文化网点，谷丘的地址却有争议。《春秋》记载的谷丘为宋邑（宋国），有“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的记载；《左传》中又称谷丘为“句渎（gou dou）”，说址在菏泽北部，也有菏泽南部说，而我认为最早的谷丘就是春秋时代的“郿城”，商代的“微乡”（台前县尚岭是疑似谷丘遗址）。这个谷丘，应该就是伏羲时代的谷丘。夏时，大禹划天下为九州（九畴），古也作九丘，鲁西当时丘地名很多，是史前遗留毋庸置疑，与伏羲时代文化连接也当属正确。

黄河迁徙之不稳定性以及湖泽水域的地理改变，也造成人文变迁、“丘聚”治所改变。“谷丘菏泽南部说”就是一例，它是宋国因迁移都城“谷丘”而迁移“谷文化”的结果，所以，菏泽南部谷名地不少，像谷水、谷阳、谷熟等等，都是宋国传承了谷文化信息带来的谷地名，这是谷文化的其中一脉。

古谷国

关于中国谷文化的发源地，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在黄河下游的鲁西，谷丘、谷山文化圈区域就是最早的原始古谷国。

湖北省谷城县有古“谷国”又是咋回事呢？与鲁西谷国、谷山、阳谷等谷文化有关系吗？根据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现，两边相隔几千里却有着很密切的文化关系。

湖北省谷城县名的成立是源于“谷国”文化，在今谷城县西北有“谷山”，并有“谷国”古城遗址，也就是西周谷伯绥的封地，县因此而得名。谷伯绥嬴姓，名绥。《春秋·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桓公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这个时间是公元前705年，春秋（前770—前476年）早期，谷国、邓国被楚国所灭，之前两国君主前往鲁国，但没有详细记载来鲁的目的，有可能是来寻求帮助的。史志上这么一点介绍，只是证明了谷国快要结束，没有记载谷国是何时成立的。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谷国就是山东的谷国贵族迁移到西南地区来的，在那里延续或被灭；二是春秋时期天子又封嬴姓人为伯国于西南“谷国”地，而成为又一次有谷文化符号的谷国之君。如春秋时期的“中山国”故地，汉代刘胜被封王于此，继续沿用中山国名。

再举例：小邾国地处齐、鲁、宋、楚等大国之间，到春秋时代的中后



期，各大诸侯国要挟小国连年结盟征战，小邾国终因国势衰微被灭亡。楚宣王在位时（前369——前340年）灭邾、小邾，掠走了“二邾”的遗民，南迁邾城，故址在今湖北黄冈西北十里（见何光岳《楚源流史》）。此后，这里的遗民便成了世居南方的支族。小邾曾一度复国，不久又被鲁国所灭亡。谷国也如同邾国一样的命运，有可能谷国迁移的时间更早。

王先福先生《追寻邓国历史文化》一文，介绍邓国的历史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或许邓国和谷国有着一样的命运、盛衰过程。据记载，谷，古地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汶河以南、运河以北地区，清兗州府境。《左传·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盟于邓。”从这里看出，远古“邓”之源头在今山东地，分析“邓”与“穀”是邻国，是被一起南迁湖北方向的，又一起被楚国所灭，才有了“桓公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鲁）”的历史事件记载，“两国首脑”试探看能不能斡旋一下回原籍来定居，结果失败，从此，邓国、谷国从历史长河中湮灭。这又是一脉中国“谷文化”。

明代《阳谷县志》序载：“谷邑为方圆百里即古诸侯国也。”旧志中说的既是先秦诸侯国，也是更早时期独立的“谷国”。姓氏书谓：“谷”为姬姓国，齐灭之，址就是谷城（小谷），在今平阴县东阿镇，城北有谷山。古谷国史料不多，但从原始谷名发源地分析，最初的谷名地就是古谷国，而谷城和谷丘（二者有必然的关联）就是最早的古谷国区域，两者相距不太远。或许是因为“谷地”常遭河袭之故而把都邑迁建在了山上。邑，古之小国；小国被吞并后，邑隶属诸侯大国，相当于今天县之级别。从“谷为姬姓国”上推论，姬姓是黄帝后裔，当属黄帝部族东迁与东夷部族融合后所拥有的地盘。或许姬姓入“谷国”后也是沿用了谷国之名，而先前的谷国族人迁向了西南地区。南邻伏羲苗裔须句国应为“东夷”本地原始部族。

历史上谷国“为方圆百里之国”是可信的，以谷山为中心，北部应该到教场铺，西、南部是平原、河流及湖泽，应该是三分丘陵高地和七分水系良田的富庶的“谷地”，远古荒蛮也不会有明确的疆界。南部接壤“须句国”建有界亭，因在谷国南陲、于谷山之阳（南），志曰阳谷亭，后形成聚落，是为阳谷之始（也有说阳谷亭就是谷邑的）。到秦汉时，亭是乡以下的行政机构，十里设一亭，十亭为一乡。今阳谷人依然喜欢亭，常能看到单位或私家大院以造亭彰显风雅，里面就蕴含着深远的文化情结。

阳谷名见于古籍以《左传》最早。“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



人、黄人会于阳谷，谋伐楚也。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僖公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文公十六年，使季父子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等三次事件，说明阳谷当时是齐国西境重地、南北交通要塞。

谷山崇拜

谷山名源于谷城（国），谷城北五里处有座山，史称谷山。谷地人崇拜谷山，首先是对“人文初祖”伏羲的敬仰之文化情结，是对古谷国以及文明先祖的崇拜。另外，这里还是人们缅怀为大汉朝建立做出特殊贡献的“仙人”黄石公的纪念地。还由于儒、佛、道文化的传承和光大，谷城山被笼罩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成为方圆百里人们向往的圣地，声名远播。

黄石公，原名魏徽，是秦朝重臣，因不满秦政而隐居黄山北麓黄华洞中，人称黄石公，写有《内记敌法》、《三略》三卷、《兵法》一卷、《兵书》三卷及《素书》等。他把《太公兵法》等传授于有志青年张良，曰：“读此可为王者师。”“后十三年见我于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这就是张良遇黄石公得天书的故事梗概。后来张良熟读《太公兵法》，辅佐刘邦打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成为大汉帝国的显赫功臣。刘邦同样敬仰黄石公，视其为大汉朝的恩师，决定陪张良去谷城山拜见黄石公。此时黄石公已驾鹤而去，张良在谷山下非常悲痛，当看到谷山上黄色石头的时候便想到了恩师的嘱咐，认为黄石即是仙师的转化，遂为之立庙祀之，即黄石公祠。从此谷山又被称为黄山，纪念黄石公。谷城东门外有个少岱山，也有称它为谷城山的。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谷山十分景仰和崇拜，特为此地书写了“第一山”碑，此举也不排除朝廷旨意。一是寓意伏羲“谷文化”天下第一；二是指为大汉朝一统天下立下头功的黄石公、张良。在宗教方面来讲，可能还另有诠释。总的说“第一山”不是山第一，而是中华民族文明之光的起点，是民族文化情结的凝聚点。

由于谷文化厚重的缘故，中国大地上有多处使用谷山和谷城的地名文化符号。



阳谷置县、迁移与谷文化移接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于阳谷亭设阳谷县（本文认为），属济州（《太平环宇记》载）。至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济州河水陷没”，共158年。

阳谷县城迁址，城址设在今景阳冈西叠路头、张八村附近。至宋开宝六年（973年）“又河水冲破县城”；于太平兴国四年南移至上巡镇（城坡），旧城废，志称“水没城”阳谷，属郓州，共驻225年。

县志记载“水没城”阳谷有四个事件：1.唐元和十三年（818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割据郓、青、兗、莱等十二州反唐，令都知兵马使刘悟率军万余人驻阳谷，拒敌官军。2.十四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部与刘悟战于阳谷，刘悟败降。3.后周显德元年（954年），黄河在杨柳渡（今东阿杨柳镇）决口，经张秋南泛郓州、濮州等地。后周宰相李谷奉命治水，筑堤西起“阳谷”，东至张秋，人称“李谷堤”。4.宋开宝六年（973年），黄河水淹没“阳谷”县城。

阳谷治迁上巡镇驻27年，于1006年（宋景德三年）迁孟店，即今阳谷。阳谷城再迁时，古人对新城进行了精心设计。

县城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躲避河患。为了达到防洪灾的效果，除了选址于高地之外，还把“谷文化”糅合到新址，处处显现着“崇高”的文化理念和对古“谷文化”崇拜的文化气息。首先是在新城内耗资挖掘出大蓄水湖——紫坑洼，把泥土堆积到城中心，塑造了“谷山”。县志所设在“谷山”西南，这也宣示着“阳谷县治所”始终就在“山之离坤”，清末及以前各代的县衙均在这里（今狮子楼西南方向文庙西）。又在县城东北方向安乐镇“建造黄山”，在安乐镇北部设一宓城村（今属聊城市东昌府区）。

精心设计的这张“图纸”，就是：阳谷亭——谷山（谷城）——黄山（也称谷山）——宓城（茌平教场铺古遗址群）这张“谷文化圈地图”，方向一致，距离微缩，实质上就是一套谷国时代及后续文化的翻版。

除此之外，还在城南门西部堆起了“会盟台”；在西门外设“西汉庄”，建造了“黄石公期遇张良”的小桥；复制了“第一山”碑，立在慈氏寺；在东门外仿少岱山碧霞行宫建造了“泰山奶奶庙”，以及仿永济桥建造了博济桥等等。这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自宋代至明代均在进行，这



些文化移接现象没有记载原因，也没有合情的传说，就连《古地名大词典》介绍谷山一词，也只是说，在“山东阳谷县治东北，小阜也，县因以得名”。

通过对阳谷古文化的析疑，古人因治所迁移而进行的文化移接现象是正常的，都是浓浓的民族文化情结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文化也慢慢变成“真的”了，但这却混淆了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破译远古诸多文化谜团将越来越容易，像有争议的“黄帝故里”、“伏羲故里”等等，终会浮出水面，这对发现和研究中国远古史有积极的意义。诸如“阳谷北境有宓城，伏羲之城也”，合理分析县志记载的古老传说，就是“随阳谷治所迁移而文化也移接”的，还原历史，那茌平县教场铺一带的古遗址，就肯定有一处是“宓城”，这对“伏羲文化”研究将是一个有价值的并且很震惊的消息。

阳谷，从亘古伏羲那里走来，谷山，天下“第一山”，展现的“谷文化”是华夏文明的起点，也是光芒四射的汉文化的一盏明灯。深厚的文化随着阳谷治所的迁移而被世代阳谷人传承下来，从重新塑造的一系列“谷文化景点”上不难看出，古人浓浓的文化情结尽显其中，且深情、自豪。

这就是阳谷，拥有灿烂的、齐天文化内涵的阳谷，文化情结解不开的阳谷，非常值得研读的阳谷。

崇尚东方

中华文化崇尚东方，这跟文明起源是分不开的。太昊伏羲就是华夏东方“木德祗祖”，其部落因黄河灾患而西迁，所以呈现出伏羲文化遗址到处都有的现象。尽管时间久远了，但在中国人崇尚文明星星点点的记忆里，还是可以解读出先祖曾经的文明脚印；在民族感情的密码里，还是能析疑出古人对东方的怀恋和崇尚之因，是的，不仅仅只是因为日出东方对太阳的崇拜。

不仅是人文初祖伏羲的原聚落在东方，人文始祖黄帝的故里也是东方，这就是“寿丘”。黄帝故里“寿丘”本是桃丘，寿、桃同源（桃丘在今台前县东端徐堌堆），分析是在以曲阜为文化中心时代，寿丘文化被移接到了曲阜的（参见《黄帝故里是“桃丘”》）。

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曲阜也在东方，孔子被世人尊为“万世师表”、“大成至圣”；“谷以稷为长，故其官名稷，曲阜南门亦名稷门，稷门之东



多稷名”；民俗传统宾主礼仪中，坐北朝南东为主即左为上首；东为大，东为上，东为主，很多很多，都是东方文明之源带来的文化延展。不仅是中国，日本同样崇尚东方，也同样不仅仅是因为对太阳的崇拜。日本文化源于华夏，“日本”、“东京”、“天皇”等文化符号的使用，就是把华夏文化对“东方”的崇尚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华夏文化的“东方”没那么遥远。

旸谷，尧帝命羲仲居于东方嵎夷，观察日出，劝导农作，确定四季。《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我认为旸谷（即汤谷）应该是指的黄河泛滥时期的“谷地”，所说嵎夷就是指谷山附近这一带丘陵山区。这里曾是齐相管仲的食邑，他字号夷吾，谷城有夷吾井。

“阳谷”是从东部一步步来到今天，“寿张”的文化之源也来自东部。史料“西南诸夷汉样柯地”说的也是“东夷”，是文化源头，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中国人不仅崇尚东方，还崇尚东方之山。谷山寓意是上古人文之源头，它就是太昊伏羲文化的纪念碑。然而，在人文历史的进程中，小小的谷山却逐渐被高耸巍峨的泰山所替代，进而泰山成为了诸山所宗——岱宗，为五岳之首，导致了谷山人文标示的黯淡。春秋时始称“泰山”，意为国泰民安之山。《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曾登岱宗；《书·舜典》说舜帝巡狩到岱宗。秦皇汉武等各朝不少帝王都曾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祈求国泰民安，历史就这样把对人文之源谷山的崇尚慢慢转移到了泰山，因为泰山是东方最高的山（谷山也属泰山山脉）。古人的崇高理念得到了晋级，崇高情结的文化认同由谷山转移到泰山，把泰山当成了与天地连接的阶梯。尽管如此，此时的泰山还没享有“第一山”的殊荣，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才有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复初为泰山题写了“第一山”碑。从此，“第一山”文化向泰山严重倾斜，近代再有“谷山第一山碑”融入泰山，古老人文谷文化天下第一的内涵，同时被“东方第一山”泰山吸入了。

“泰”字有一讲是古“酒尊”名，古时凡是酒器使用的字，字义几乎都与五谷有关。如“黍”字，本为五谷之黍米，因为黍米酿酒也就把“黍”字赋予了一种酒器的文化含义。民以“食”为天，国“泰”才民安，泰字本义也应该是“穀”，只是文化上“泰”出于“穀”而高于穀。古神话传说中的“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说明“泰皇”也是教民种五谷的人皇，即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伏羲。由谷山到泰山，从城之小“国”到泱泱大国，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崇高和崇尚东方的文化情结发



生了质的飞跃，更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这就是第一山，人文天下第一山。

附：

《阳谷文史集刊》第443页部分文字

慈氏寺正殿后的“第一山”碑，是宋代书法家米芾所书。米芾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写的“第一山”碑很有名堂，“第”字魁星点元；“一”是卧蚕吐丝；“山”是三仙出洞，字体之优美很为后人推崇。传说这个“第一山”碑是米芾在阳谷当县令时写的（编者按：此说不确），原有碑亭，亭倒改为碑楼。此珍贵文物，文化大革命中被拉倒并想砸碎。正骨科八十多岁的赵传忠医生急去拦阻，遭到辱骂扭打，并因此而活活气死。此碑下落不明。

（作者系阳谷县供销社职工，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济世寿人古阿井

□谷万里



古阿井

我的故乡山东省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是著名的中医道地药材阿胶的发源地。多年前，我就曾数次去寻找那口著名的古阿井，至今想起这神秘的古井，仍然历历在目。

古阿井，亦称阿胶井，因历史上生产正宗阿

胶而得名。它位于距离阳谷县城东 20 公里的阿城镇，古运河西岸，东阿故城遗址的中央，是古运河民族文化旅游线上的重要景点。

走近古阿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井正北的六角碑亭。碑亭是灰色的石亭，由六根多棱石柱支起石顶。石顶为仿木亭结构，六角对称。整个碑亭结构严谨，造型古朴，典雅精美。亭正面额题“济世寿人”四字，两旁石柱镌刻楹联“圣代即今多雨露，仙乡留此好泉源”。井亭后面左右石柱镌刻楹联“力可回澜重建泉源来井底，心存济世长流膏泽在人间”。亭内有一石碑，高约 5 尺，宽 2 尺余，上镌“古阿井”三字，篆刻完美，古朴自然。

据旧志记载，三国魏太和三年（229 年）陈王曹植受封于东阿后，就曾奉旨重修阿井，并创建了六角亭。唐贞观元年（627 年）鄂国公尉迟恭曾为钦使重修阿井。明天顺七年（1463 年）建亭井上。明万历及清康熙年间均有重修。现存的六角石亭为清光绪五年（1879 年）重建。

古阿井的历史非常悠久，多种典籍都有关于古阿井的记载。清孙星衍



《岱南阁集》云：“阿井辟自上古”；宋《太平御览》云：“黄帝作井”；汉《淮南子》云：“伯益作井”；先秦史书《世本》云：“伯夷作井。”据此推算，阿井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孙星衍感其年代久远，叹曰：“海内古迹，莫先于此。”名贵药品阿胶，最早记载于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真胶产于古齐国之阿地，又以阿井水煮之最佳”，“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载：“阿城北门内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并考证“其水乃济水伏注”。

相传此井为泉，有九孔，泉内住有蛟龙。神奇的传说和井的神奇给井注入了许多神秘色彩，历代文人墨客纷纷做诗吟赋大加赞美。明代吴铠作《阿井胶泉》诗，对阿井赞叹曰：

灵源疑出蛟龙窟，淑气原从天地贻。
九土所钟惟上品，千年制胶岂凡材。
炼砂煮石经济事，丹井药炉亦可哀。

清代赵培徵在《咏阿胶井》中写道：

阿井传来不记年，清流澈底一寒泉。
溶溶玉液三宵露，点点丹砂九空渊。
淑气问钟疑凤髓，灵源妙化想龙涎。
仙胶炼就称良剂，寿世回生几万千。

现代著名画家刘海粟等也曾慕名来古阿井观瞻，并留下墨迹。

古阿井的井水经地下岩层砂砾过滤净化，溶入矿物质，水色绿而质重，清冽甘美，富含钙、镁、钾、钠、锶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管子》云：“其泉洁白，其人坚劲，寡有疥瘡，终无醒。”《本草纲目》记载：“阿井泉，其味甘平、无毒，主治下隔、疏痰、止吐。”用古阿井水煮胶，易除杂质，且能增加疗效。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隔、疏痰、止吐。”因此，当地所产阿胶，为历史上正宗阿胶，素有“贡胶”、“真胶”之美誉。

古阿井虽历经数千载至今，井泉之水仍然清澈甘冽如昔，它见证了中药道地药材阿胶的起源和沧桑，是重要的中医药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努力保护好古阿井，使之成为见证中医药历史、宣传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古城古钟，牵出明朝一些事儿

□张和鹏

前不久，明朝天顺七年铸造的一口洪钟，在聊城古城保护与改造过程中出土。联系到光岳楼上刻立最早的那块《重修东昌楼记》碑，人们能知晓明朝一些富有故事性、且与聊城有些关联的故事。甚至包括一代名将于谦、北京大名鼎鼎的历史遗存南池子、我国著名传统工艺品景泰蓝等，也都能在这些故事中找到“坐标”。

明朝天顺年间的皇帝，是英宗朱祁镇。这个英宗跟别的皇帝不一样，他先后两次做过皇帝。“天顺”，是他第二次做皇帝时的年号，而第一次做皇帝时的年号是“正统”。

明朝初年，北方平定。到了正统年间，由于前几任皇帝放松守备，分散的元朝势力又被瓦剌部首领也先整顿起来，并渐生吞并中原之心。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借故大举南侵，甘州、大同相继失守。七月，在专权宦官王振等蛊惑下，英宗留下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八月十五日被俘，王振也被杀死。

也先俘获英宗后，挟持英宗步步逼近明廷，是投降、逃跑，还是奋起抗击？最后，兵部侍郎于谦力主迎战的建议获胜。临危受命的于谦，组织了一场不屈不挠的“京城保卫战”。考虑到国家危难时期不可无主，九月，于谦求皇太后尊被俘的英宗为太上皇，立郕王为帝，是为代宗，年号景泰。堪称中国传统工艺集大成者的“景泰蓝”，就鼎盛于景泰年间，因初创时只有蓝色，故名“景泰蓝”。

十月，也先攻抵北京城下，于谦列军城外，背城死战，杀死包括也先之弟在内的瓦剌军万余人，使京城转危为安。后来，也先挟持英宗索地迫和，但始终没达到目的，只好在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归还英宗。英宗回京后，被“安置”在紫禁城外的南宫，即今天故宫东侧的“南池子”。



为巩固皇位，代宗对英宗进行了严密的防范。可是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病重，武清侯石亨等密谋政变，拥立英宗升奉天殿，改元“天顺”。代宗被废，仍为郕王，“归居”西宫。在石亨等撺掇下，抵抗瓦剌有功的于谦等人被杀。这件事，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英宗复辟”。

在于谦全力抗敌期间，有一个“聊城人”随侍左右。他就是平山卫指挥同知刘鉴。明初赫赫有名的“镇国将军”刘通，就是他的祖父。英宗被俘那年（1449年），刘鉴正奉命守御京城。当于谦为抗敌任用才干时，刘鉴被升为都指挥佥事，冲锋陷阵屡建功勋，先后被升任署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同知、都督。而英宗复辟后，刘鉴自然也受到株连。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逝，太子朱见深继位，年号成化。他接受大臣建议，为于谦以及受株连者平反，刘鉴之子刘瑀由此袭封平山卫指挥同知，刘鉴的二弟刘山被赐为“散官”。所谓散官，是一种有官无职的荣誉性封号，且享受俸禄。

如今，登上光岳楼，在一层南面，东数第二幢，现存刻立最早的有关光岳楼的石碑上，刻有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首次重修光岳楼的碑记。碑阴有修楼者题名，领衔的就是“后府都督弟、恩赐八十散官刘山”。这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刘鉴的敬重。

我市地方史研究者刘洪山，是刘鉴的十五代孙，对这些历史掌故素有研究。洪钟出土时，他去看了。他说，目睹文物，思及先人，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会通镇小考

□戴敬仁

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开挖。元王朝建都北京，急需一条南北直通的航线，把政治中心与经济富饶的江南联系起来。于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 年)开通济宁到东平的河段，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开通东平到临清达卫运河的河段，两段全长 250 公里。河建成后，赐名“会通河”。

起初，会通河的范围较小，仅指临清——须城（东平）间的一段运道，后来，范围扩大，明朝将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镇）以北的一段运河，都称会通河。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开通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从北京直抵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长 1700 余公里，比隋炀帝绕洛阳再经卫河到北京的大运河缩短 900 多公里。从此，临清便成为南北水运的枢纽。

在今天的临清，沿会通河向东南，历史上有个会通镇，有时称作会通乡，会通之名源于会通河。

据 1934 年版《临清县志》载，清末，会通镇位于城区第一，仍为城区四十五个镇之一。其实在元代，这个会通镇不属临清，而属堂邑县。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于大德年间任堂邑县知县，他在《堂邑县警宵楼记》中说：

大德己巳春，余由堂掾出尹是邑，剔蠹莠，阅半载，民乃帖然。他日，劭农会通镇，长老遮马言：兹镇介二漕渠，曰临清，曰会通，实朔南喉咽处，民盈四千有奇，违邑治百里远，豪猾宵聚，不逞随发随逸，弗惩将炽。

此时，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接通。这里的“临清”指临清的卫运河，“会通”指运河之会通河聊城段。



这句话说明，堂邑的会通镇东西两边都有漕运，交通便利。一直到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临清县才徙治临清闸。景泰元年（1450年）又于临清闸东北三里建城为治（即今县城）。

据光绪十八年（1892年）版《堂邑县志》载：明洪武七年（1374年），割堂邑县会通乡二里属临清，直到此时会通镇才属临清管辖。在《临清县志》中也说，临清之民明初来自堂邑县、即墨和潞州等地。



《曹植碑》书法艺术欣赏

□陈同龙 李兴来

《曹植碑》，又名《曹子建碑》、《陈思王曹子建庙碑》、《曹植墓神道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刊立。碑高2.57米，宽1.03米，厚0.21米。碑顶呈半圆形，碑额浅雕盘龙，碑文22行，共931字，现存874字。碑在今山东东阿鱼山祠内。

曹植，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曹植一生，饱受贬谪打压、颠沛流离之苦。据《曹植碑》载，曹植“十一年里频频徙都，汲汲无欢，遂发愤而薨”。因曹植在封地陈郡去世，谥曰“思”，故世称“陈王”或“陈思王”。曹植擅诗赋，有《赠白马王彪》、《洛神赋》等作品传世，与曹操、曹丕合称“三曹”。谢灵运对他极为推崇，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曹植去世后，因“年代复远，兆莹崩沦”，



曹植碑(局部)



曹植碑



北齐皇建二年，其十一世孙曹永洛，经奏请孝昭皇帝批准，兴复灵庙，雕刻真容，并刻碑立石，以纪其事，所立碑铭即现存之《曹植墓神道碑》。此碑早年湮没在大清河(今黄河)中，清初出土后，还置墓前，并建碑楼加以保护，现为国家重点文物。

北齐隋唐之际的碑刻墓志作品，有一种明显的复古倾向，即出现了楷书间杂篆隶俗体，甚至臆造字体、增损改写字形的现象，《曹植碑》也未能摆脱时代风气的熏染。诚如杨守敬所说，《曹植碑》“用笔本之齐人，体兼篆隶，则沿北魏旧习。然其笔法实精，真有篆隶遗意”。其笔画形态充满了篆情隶意，特别是横画、撇捺都有明显波磔，有的偏旁部首采用篆隶写法，如“愠”、“彰”、“若”、“以”等，有的甚至直接采用篆隶俗体，如“字”、“年”、“容”、“登”等。

《曹植碑》书法，传承《文殊般若经碑》、《河清三年造像》一脉，结体外密内疏，中和方正，捺画雁尾，线条丰润，具有古朴圆融、庄和静穆、浑朴雄劲之美。但较之《文殊般若经碑》和《河清三年造像》，《曹植碑》更多地使用了方折笔法，用笔更加爽利，藏锋处微露锋芒，露锋处亦显含蓄，洞达跳宕，意趣横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快刀斩阵，雄快峻劲者，莫若《曹子建碑》矣”。

《曹植碑》对后世书法影响颇大，有的学者称之为“上承南北书风，下启唐代风范”。沙孟海先生把《曹植碑》作为颜真卿书风的先河，认为对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臧克家先生诗云：“生平未展志凌云，诗国陈思王位尊。墓道幽明通今古，眼前故物念斯人。”作为承前启后、开创一代书风的《曹植碑》，对后世书家学者研究曹植生平事迹，研究北朝、隋唐书法发展史，无疑有着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

（作者陈同龙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李兴来，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太平洋产险聊城中心支公司办公室主任）



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

□聊城地区文化局

为配合阳谷县景阳冈旅游区开发工程，在聊城地区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文物勘探队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及其他所占用土地，进行了全面文物勘探。在勘探过程中，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并在原开发的沟渠中拣选了大量的龙山、岳石、商周时期的陶片，是研究城墙时代的实物资料。

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位于阳谷县城东35华里的张秋西北隅，这里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大平原，南距黄河仅六华里。据群众说，过去这里有九冈十八堌堆，连绵起伏，地形复杂。解放后，因撤冈造田和挖土拉砂，其他冈子早已夷为平地，只剩下两个高台地，而这两个高台地，恰好处在古城的中心地带，群众在北边高台地上平整后建起武松庙，以纪念打虎英雄武松。1973年文物普查时，在现在的地面上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大量遗物，因此被定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较小，不到十万平方米，现在发现的龙山文化古城址，正好围在原保护范围的四周。城墙顶部距地表0.5—2米不等。现已探明，龙山文化古城址位于景阳冈旅游开发区的东南部。城址为东北西南方向，北偏东50°，呈圆角长方形，四角均外弧，南墙外弧尤大，北墙略直。初步



发掘现场



测得北墙长 1146 米，东墙长 225 米，南墙长约 1200 米，西墙长 320 米，城中间宽 350 多米。总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

古城墙围绕隆起的东北西南方向的长形沙冈随自然地势修筑。因城墙在沙冈四周，所以形成了城中心部位高于城墙的环境风貌。城的中心部位暴露着丰富的商周、岳石、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遗迹。我们在城的中心部位的高台地上，发现了人工夯筑痕迹。这一高台地南北残长 571 米，东西 175 米，台高 3—5 米。夯土分层，厚薄不均，层厚在 4—10 厘米之间。夯层清晰，夯质坚实。从两个台基的层位对应关系看，以前这两个高台地很可能是连在一起的（现正在做进一步勘探：是一处大型建筑或祭祀台基）。后因黄河多次的泛滥淤积，城墙内外的低洼处以及城墙均被填平并埋于地下，唯人工夯筑于高冈之上的台基留于地表之上。

古城墙的东北角被现代沟渠打破，形成了一个横断面。从断面上可看出，自龙山文化时期筑城之后，曾连续使用多年。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位于整个墙体的中心部位。后期，都曾在城墙的内外皮进行加宽、加固、加高或修补。整个墙体宽度达 18 米多，可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个时代。初步考证分八期，第一至七期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第一期已知残存高度 4.6 米（下有水，没打到底），上部残宽近 2.8 米，分段修筑。墙外皮齐整，夯质坚硬，层次清楚，层厚在 2—3 厘米之间，基本一致，夯窝清晰可辨。径在 4—7 厘米之间，为木棍乱夯。第二期是加高第一期的部分，宽度与一期同，高 0.9 米，因位于墙的顶部，风化严重，质地软，层次不清。第三期是在第一期城墙的内、外加宽，已知宽度 11 米左右，大量采用了沙质土，夯质较差，层厚 4—5 厘米。第四期是对第三期的加高和修补，利用了早期城墙的夯土，夯质较硬，近外皮夯质更好，层次清楚。每一层面加沙层，以免粘连夯具。层厚 5—6 厘米。第五至七期位于城墙内皮，是对城墙的加宽和修补。第八期属于岳石文化时期，呈

斜坡状，位于城墙的外皮，面积不很大，显然是对龙山文化城墙的修补。该期夯质坚硬，层厚 4—6 厘米。

近年来，城址内出土了许多龙山、岳石、商周各时期的遗物。主



出土遗物



要为陶器，亦有骨、石、蚌器。陶器中有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又可分为细泥和粗泥质陶；夹砂陶又可分为夹细砂和粗砂两类。细泥质陶中常见红、褐色鬶和磨光黑陶杯、盆、器、盖等。还有部分蛋壳陶。凡细泥质陶器，均制作精细、质地坚硬、陶色纯正。粗泥质陶常见灰陶瓮、兽面足形鼎、大型器盖等。这类器物，器形较大且胎厚。夹砂陶是陶器的大宗，夹砂细陶常见灰陶瓮、甗罐，器型更大。夹粗砂陶有瓮、罐、罐形鼎等。石器中常见斧、铲、镢等，磨制精细光亮。斧双面开刃，呈梯形。器中多见镢、针等。蚌器多为半月形双孔刀。还发现了一长方形的小石板，长5厘米，宽3厘米，厚0.5厘米。石板有沿长度走向的沟槽，可能是磨制细小骨针的砾石。

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中出土的陶器纹饰丰富，素面占次要位置。凹凸弦纹、盲鼻、篮纹、方格纹、绳纹、篦纹、棱纹、禾纹、附加堆纹是常见纹饰，尤以篮纹、方格纹为最。

陶器标本中，瓦、罐、盆、甗器盖最多。一是泥质磨光黑陶瓮，直口、圆沿、重唇、广肩、厚胎。口径30厘米、腹径49厘米。二是夹砂灰陶瓮，高直口、广折肩，陶色不纯，口径32厘米、腹径51厘米。盆多见细泥质磨光折腹盆和侈口平底圈足盆两类。折腹盆宽折沿，浅腹，口径27厘米。圈足盆大小两种，侈口、卷沿、弧腹、平底，近底部有圆孔。小盆口径31厘米、底径24厘米。大盆口径35厘米、底径29厘米，腹径1.2厘米。这类应是过滤器皿，似与酿造业有关。甗有两类，一是袋足、高实尖足，裆饰篦纹。另一种裆饰麦粒状绳纹。

在城内偏北部，曾发现一径3.2米的大灰坑，出土了丰富的龙山文化晚期陶器。坑内有一完整的牛骨，呈俯卧式。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祭祀坑，说明龙山文化时期，这里的经济相当发达，人们已经饲养牛，重要祭祀活动已经用牛。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是目前已知这一时期最大的一座城址。它比城子崖龙山城址大三分之一多。城子崖龙山城应属东夷人活动区域，而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却是中原地带人们的活动区域。该文化面貌既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又有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对研究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城内中央部位有较大的夯土台基，这是至今所发现的其他龙山文化古城址中所没有的。不管是建筑台基还是祭祀台基，都说明当时这里可能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此城很可能就是当时最主要、最有势力的部落的居住地。这将对研究华夏民族的起源、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继龙山文化之后，沿用时代相当长。第三期城墙虽然还有待于层位关系的证实，但就目前所掌握的地层情况和实物资料看，极有可能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假如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成立，它将是目前发现的第二个岳石文化城，且面积超过第一个岳石文化城，其学术价值将更为重要。

总之，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及其后期城址的发现，弥补了鲁西、豫北、冀东广大区域内无龙山古城的空白，它将对研究炎黄时期的历史以及夏文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原载于《阳谷揽胜》一书，主编董长侠系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



聊城所见碑刻目录

□张文兴

作者按：这篇文章标题为《聊城所见碑刻目录》，记录下来的古碑只是聊城碑刻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多古碑也只是简单看看，未作拓片或者记录之类的东西。我身在外地，实在是时间有限。我所见过的古碑里面不乏珍品，比如魏钿墓碑，是清代大书法家刘统勋题写的，还有广文杨照庭先生德教碑是寿张名儒崔隼撰文。另外在陶城铺关帝庙内有疑是聊城先贤朱延禧撰文的碑刻。然而在这个经济第一的社会，又有多少民众关心过这些古碑呢？清亡之后，对于古碑的破坏就没有停止过，比如民国时修建北杨集烈士碑亭，据说是拆掉今日无税碑楼建的；解放后也毁掉不少，比如王官庙的不少碑刻被拉走，修了四新河涵洞；文化大革命中破坏得就更厉害了，比如傅家坟，整个墓地只有一通古碑是完整的，邓钟岳家族墓地则是片瓦不存。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政府也更注重保护历史文物了，不少古迹容光焕发，但是这些散落乡间旮旯的古碑依旧缺乏保护。古碑是不朽的史书，记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是研究我们聊城历史的绝好资料！所以我呼吁大家一起来关注古碑、保护古碑！

碑刻调查中得到了搜狐“顺其自然”博主毛先生、东昌府区于集文化站站长苗金贵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 1.公正廉明碑（民国初）——开发区军王屯
- 2.明故东昌府知事傅善墓碑（明万历傅光宅立）——开发区张屠村
- 3.韩氏族谱碑（民国）——开发区许营韩庄
- 4.诰封资政大夫孙灼南诰封夫人张太夫人刘太夫人合葬墓碑（民国二年）——于集镇孙堂村
- 5.例授武略骑尉侍珍孙公（孙鎔）德配例封安人秦氏合葬墓碑（清同



治十年) ——于集镇孙堂村

6.诰授昭武都尉广含孙公德配诰封恭人梁氏施氏合葬墓碑 (清道光十一年) ——于集镇孙堂村 (该村古碑众多,很多未被录入)

7.姜氏始祖碑 (清乾隆十年) ——凤凰办事处倪官屯村

8.表扬节孝碑 (清光绪,含民国记事碑一通) ——凤凰办事处王庄村

9.谭氏宗祠碑记 (清光绪三年,含清末记事碑一通,清代官员墓碑两通) ——凤凰办事处谭庄村

10.乡饮介宾魏公墓碑 (清末) ——凤凰办事处谭庄村

11.乡饮介宾韩公墓碑 (清末) ——凤凰办事处韩庄村

12.太学生墓碑 (清末) ——朱老庄茄子李东

13.懿行宛在碑 (民国初) ——朱老庄刘集村北

14.清末处士墓碑(古碑背面叙述的女主人生前曾被朝廷旌表节孝,另有处士碑数通) ——朱老庄茄子李南

15.修职佐郎连公墓碑 (清末) ——于集镇连海村

16.乡饮耆宾连公墓碑 (清末) ——于集镇连海村

17.捐资碑 (民国,共四通) ——于集镇王庙村文庙

18.重修王官寺诸寺碑记 (明万历) ——于集镇王庙村文庙

19.太学生白公墓碑 (清末,含处士墓碑两通) ——于集镇白庄村

20.乡饮介宾哈公墓 (清宣统) ——于集镇哈庄村

21.太学生陈公墓 (清末) ——于集镇牛王村

22.诰赠奉政大夫户部山西清吏司傅公墓 (清初,含傅以渐墓碑、圣旨碑、傅姓族人墓碑残块) ——东昌府傅家坟

23.捐资碑 (字迹模糊,年代不可考。另外,村西河三里农田老井上亦有一捐资碑残块) ——凤凰办事处周店村

24.清故处士墓碑 (民国) ——朱老庄马黄村

25.修职郎董公墓碑 (民国,用作井上石板。还有古碑两通,碑体翻转不见字迹) ——于集镇太平村

26.石瓮屯有古碑一通,翻倒不见字迹。

27.凤凰工业园张疙瘩村西聊位路口有古碑一通,翻倒不见字迹

28.“周家店船闸”和“月河涵洞”石匾 (民国二十五年张鸿烈题) ——凤凰办事处周店村

29.北杨集烈士碑 ——开发区东城办事处北杨集烈士碑亭

30.杀敌救国碑 (民国,记录范筑先事迹) ——梁水镇范公祠巷子内



- 31.范公筑先传略碑（民国）——聊城范筑先纪念馆内
- 32.东昌贤郡守杨公残碑（年代无考）——大码头基石内
- 33.何知县碑（清康熙）——于集镇西杜村南
- 34.总督碑（清康熙）——于集镇林庙安家林
- 35.鹤鸟齐美贞节碑——于集镇王庄
- 36.重修三官庙碑记（明万历）——于集镇蔺皋
- 37.重修娘娘庙碑——于集镇裴寨
- 38.清凉寺碑（元）——沙店集
- 39.重修碧霞元君祠碑记（清乾隆年间）——七级河东完小墙角
- 40.大明一统碑（明崇祯年间，字迹模糊）——七级河东完小墙角
- 41.崇祯节孝碑——七级北大桥桥墩
- 42.残碑（包括墓碑、碑帽、记事碑等）——北大桥桥基和运河两岸
- 43.记事碑（民国，记载某妇人节孝事宜）——七级下闸村
- 44.刘氏始祖墓碑（清雍正）——七级镇刘湾村
- 45.重修关帝庙碑记（清道光）——七级镇刘湾村
- 46.登仕郎墓碑（民国）——七级镇郎湾村卫生室前地面
- 47.太学生郎公墓碑（明代）——七级镇郎湾村西池塘边
- 48.旌表节孝碑（民国）——阿城镇东阿故城北城墙北面荒地
- 49.重修普济桥碑记（民国）——阿城镇普济桥
- 50.重修南门桥碑记（清道光，碑半截埋入泥土）——阿城镇南门附近
- 51.成化街碑（明代）——阿城镇成化街街口
- 52.重修清真寺碑记（清光绪，断碑）——阿城镇清真寺
- 53.广文杨照庭先生德教碑（清宣统，碑文为寿张名儒崔隼题写，形制特殊）——阿城镇海会寺街东头
- 54.松筠柏操碑（清光绪）——阿城镇海会寺街东
- 55.残碑（似乎有一通完整，内容不可考）——阿城镇海会寺内
- 56.登仕佐郎墓碑（清光绪）——阿城镇赵庄村北
- 57.文林郎墓碑（清宣统）——阿城镇赵庄村西
- 58.重修关帝庙碑记（明万历，疑为朱延禧撰文，还有清碑一通）——陶城铺关帝庙
- 59.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云南顺宁府云州知州魏钿墓碑（清乾隆，古碑形制特殊，为书法家刘统勋题写）——陶城铺魏氏墓地
- 60.例赠武畧将军，例赠文林郎职位魏展奇墓碑（清雍正，形制特殊，



魏钿之父) ——陶城铺魏氏墓地

61.寿官墓碑，庠生墓碑，介宾墓碑等(清代，古碑众多) ——陶城铺魏氏墓地

62.墓碑(疑为清代，古碑翻倒不可考) ——张秋袁庄村东

63.张令璜墓圣旨碑(清雍正) ——张秋王营村西

64.周天爵墓碑(清咸丰) ——张秋孟海村

65.重修戏楼碑记(清道光) ——张秋镇城隍庙

66.乡饮介宾墓碑(民国) ——张秋窦营村

67.处士墓碑(清末、民国，董营村西，有数通) ——张秋窦营村

68.先考仁翁墓碑(明嘉靖) ——孟海村东

69.明故先考陈公墓碑(明代，另有残碑数通) ——孟海村东

70.习池陈公墓表碑(明代) ——孟海村东

71.捐资碑(疑为清末，数通) ——砌于张秋水门桥上

72.武松庙碑(年代无考，亦有一宋碑位于山神庙内，未亲见) ——张秋景阳冈景区

73.三通直碑(年代无考) ——张秋五里营村

74.山东黄河上中游交界碑(民国) ——张秋东堤险工处

75.重修大河神祠碑(明景泰，徐有贞撰文，含明清碑刻数通) ——台前八里庙，因古时属于张秋故录入本文

76.例授武略骑尉周公德范碑(清光绪) ——金堤河入黄河处南堤，属于台前吴坝，古时属于张秋故录入本文

77.节孝兼完碑(清光绪，大学士觉罗为题) ——闫楼镇石虎庄

78.古碑(碑翻倒，内容年代不可考) ——石佛西孙村西池塘边

79.清故处士碑(民国) ——定水镇西

80.惠我穷黎碑(民国) ——定水镇坡里天主教堂外

81.传教士墓碑(清末民国，数通，中德两种文字题写碑文，且有外国传教士墓碑一通) ——定水镇坡里天主教堂内

82.节比松筠碑(清光绪) ——郭屯乡葛集村北

83.文林郎杨公墓碑(清宣统) ——郭屯乡杨庄村

84.古阿井碑(清末，另有三通唐、明、清复制碑) ——古阿井阿胶厂

85.古碑(翻倒，年代内容不考) ——古阿井阿胶厂南行200米路西

86.马家祠碑(清代，两通，只在门缝中看到，应为修建马家祠的内容) ——张秋马家祠



- 87.重修仰山书院碑——博平仰山书院
- 88.化雨流甘碑（民国，碑阳韩复榘题，碑阴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春撰并书，傅瑞瑗立碑）——杨屯乡棉厂路南
- 89.傅公连珠暨德配刘孺人碑（民国，冯玉祥题，碑阴墓志铭为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撰文，时任博平县县长刘云亭书丹，傅瑞瑗立）
- 90.重修泰山碧霞元君行宫碑记——博平西关
- 91.光岳楼碑（光岳楼有碑十多通，有清康乾二帝御笔等名人碑刻）——光岳楼
- 92.山陕会馆碑（有记事碑、捐资碑数通，另有收集的古碑数通）——山陕会馆
- 93.重修娄建桥碑记（乾隆）——刘集镇皋上村
- 94.重修兴国寺碑记——高唐梁村塔下
- 95.鹅子屯碑（清同治三年）——茌平鲁义姑祠
- 96.鲁义姑祠碑（清同治四年）——茌平鲁义姑祠

（作者系东昌府区兽药销售员，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

文献萃览



聊城现存文献概述

□吕品

现存的聊城文献约有 160 种之多，然恐尚不止这些（可能达 160—220 种），涉及经史子集，亦不乏精善之本。然深为憾者，这些古籍文献多已不在聊城本地，而是散见于各地公藏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尤多，其他图书馆亦有，甚至有流落海外不见于内地者，可叹可恨。作为聊城人，应积极收集整理，以显聊城毓秀钟灵、诗书之盛。

元明以前，时代久远，稽考不便，尚有遗存，多为辑录。

最早的现存著述是晋代高唐华峤的《后汉书》，久佚，今有辑本，已经出版。

唐宋元时期渐多。唐聊城梁载言《十道志》十六卷，佚，辑本两卷。从此书可考见唐初区划沿革，近两年又从朝鲜藏《杜牧集》中辑出新的条目。

唐清平吕才著述甚多，惜其不存。聊城《孙逖文集》，有几种不同版本，《全唐文》、《全唐诗》中辑其文章。

宋清平孙奭，经学大家，著述丰富。著有《孟子音义》二卷，是研究孟子的重要著作。

元高唐阎复《静轩集》五十卷，今辑存六卷。

明清时期文风大振，文集著述甚多：

明有茌平状元朱之蕃著《使朝鲜稿》一卷、《纪胜诗》一卷、《落花诗》一卷，然《纪胜诗》、《落花诗》藏于日本。

清平探花张天瑞著《云坪集》四卷，藏于南京图书馆。

聊城许成名《龙石集》二卷、傅光宅《傅伯俊诗草》七卷，皆善本。原本藏于台湾。

冠县钱楷《万玉亭集》残存一册，藏于私人手中。这些书不可多见，



其文献价值不必多言。

临清谢榛，“后七子”之一，著有《四溟山人诗集》、《四溟诗话》。其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内阁大学士东阿于慎行，通晓经史，著述丰富。《读史漫录》十四卷、《穀山笔尘》、《穀城山人诗集》二十卷、《穀城山馆文集》五十四卷，文史价值很高。其弟于慎思，善属文，著有《庞眉生集》十六卷。

张秋殷云霄，著有《石川集》，有多种版本，藏台湾。

明中后期王学大盛，聊城穆孔晖、茌平张後觉、孟秋、赵维新，再至张凤翔，清王曰高，皆秉承王学，然现今很少人关注，他们的著作更为鲜见。穆孔晖著《大学千虑》一卷。张後觉《张弘山集》四卷、孟秋《孟我疆集》七卷、赵维新《感述录续录》，后人合刻为《茌邑三先生合刻》。《孟我疆集》为善本，鲜见，而最好最全者为明万历间刻本七卷，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

藏于日本的还有明堂邑许维新《许周翰先生稿钞》十七卷。此书国内无藏，仅此孤本。书中有《郡邑谈》一编，可补明时聊城历史。还有清堂邑张凤翔《礼经集注》十七卷，藏于日本，国内罕见。

易学方面，聊城逯中立《周易杂记》三卷，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提要》评其“去取颇为精审，大旨以义理为主，不失纯正”。又有临清李本固《古易汇编》十七卷。

清开国状元傅以渐著述亦多，然毁于家火，今存有《易经通注》（奉旨与别人合撰）、《贞固斋易义》、《贞固斋书义》，后两书皆善本，从中可考见傅以渐的学术思想。

状元邓钟岳著有《寒香阁集》、《知非录》，其子邓谦持著有《午厓初稿》。

茌平给事中王曰高著有《槐轩集》十卷、《槐轩小草》。其常与诗坛宿将王士禛相唱和。

家传族谱文献。各地名门大姓皆有家谱，数量众多。仅名门望族就有不少。聊城傅以渐《傅氏族谱》，邓钟岳《邓氏家谱》等等。家传年谱类书籍也不少，如《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观城王蕴公年谱》、《高唐曹晓亭年谱》，皆可补正史不足。

关乎聊城的文献，地方志计有明万历《东昌府志》、明嘉靖《高唐志》、嘉靖及万历《冠县志》皆善本，其他如民国《阳谷县志》为抄本，民国《高唐县志》稿本，为研究民国其地历史有重要价值。还有两种优秀



的乡镇志《张秋志》、《苦羊山志》。《苦羊山志》少有著录，且长久以抄本传世，固可珍贵。张秋，运河名镇，明时即有史志修纂，名《安平志》，清初重修，乾隆时增修。此书可考见张秋当地人文历史，亦是研究运河的重要文献。

记叙王伦起义的史料有《欽定剿匪临清纪略》等书。

清宫档案中关于聊城者。聊城史学家傅斯年，非常重视史料，发起整理清宫档案，汇编成《明清史料丛刊》。在浩繁的档案中有关聊城的不少，这些都是研究聊城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当为汇集一编。

《聊摄丛谈》六卷，清须方岳撰。其书仿《聊斋》体例，记述听闻的聊城故事，是研究晚清聊城民俗风情之书。亦可资掌故谈。

上述聊城名人著述中，有的已收入《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丛书，但仍有许多没有收集或没有引起重视，应是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了。

（作者系东昌府区堂邑人，现为淮北师范大学学生、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



浅谈海源阁著作八种

□徐 泳

《山东文献集成》是山东省政府特批立项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由山东省原省长韩寓群主编，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处负责编纂。该丛书共影印山东先贤遗著 1000 余种，以未刊稿本、抄本以及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刻本为主，分四辑出版，每辑 50 册。截至今年 3 月底，已完成全部 200 册的编纂工作。该丛书收录有关聊城杨氏海源阁的文献八种，其中第一辑收录杨以增奏疏二十一册以及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三代诗文集，第二辑、第四辑收录了海源阁著作四种。兹分别简介如下：

1. 《杨端勤公奏疏》三十六卷（存二十一卷），杨以增撰，杨绍和辑，红格清稿本

该书原稿存山东省图书馆。据第一册目录，全书共三十六卷，收录摺、片八百六十二篇。今所存者卷 1-5、9-10、12-19、22-23、25、29、33、35，总计二十一卷，卷各一册，共有摺、片四百四十篇。目录后有同治辛未年杨绍和识语云：“先端勤公自道光戊戌由湖北安襄郧荆道署理臬篆，例得具摺陈谢。迨丙午权陕西巡抚，明年真除，以及移督南河，任封圻者截十载，奏章不下数百件。乙卯，先公捐馆舍，原摺悉经缴进。绍和谨就当时所钞副本，分年辑录，而所奉谕旨尚多未详。同治乙丑，绍和官翰林，入直史馆，嗣诏修《方略》，复与簪毫，乃于馆中所储遍加稽补，始克成编，都为三十六卷。其间仍有未备者，则馆中旧籍亦不无阙佚也。此册原拟求政当代通儒，赐之裁定，故每卷题款如是行式，并依官文例写之，绍和不敢有所删易也。已巳以清淮士民之请，仰蒙天眷，先臣得邀易名之典，因重缮总目，列之卷首云。”书中所录杨以增奏疏，起于道光二十三年甘肃按察使任，止于咸丰五年江南河道总督任，不特为研究杨以增



行实之重要参考，也是道咸之际珍贵史料。

2.《退思庐文存》一卷，杨以增撰，民国九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本

此本收录以增文《牧令书辑要叙》、《灵祺经叙》、《蔡中郎集叙》、《隶篇叙》、《石笥山房文集叙》、《九水山房文存叙》、《柏枧山房文集叙》、《退思堂诗钞后序》、《重修傅氏族谱序》、《礼理篇书后》、《三续千字文跋》、《重修光岳楼记》、《傅公映宸传》、《蕉声馆集叙》、《襄阳节署古井铭并序》共十五篇，后附梅曾亮撰《端勤公家传》、许乃普撰《端勤公墓志铭》。末有杨承训跋云：“先曾祖端勤公起家县令，跻身通显，文章经济，彪炳当时。生平学问渊博，尤邃于汉郑氏之学。性嗜书，琳琅万轴，辟海源阁以庋之。顾为文无专稿，其见于书刻序跋者，复寥寥数十篇而止。余小子守残抱缺，盡焉作业之，爰就所及见者，汇钞成帙，以为手泽之存，犹惧其久而散佚也，谨将前钞遗文十有三篇，并续蒐辑二篇，附以《家传》、《墓志》，共付剞劂。”按《楹书隅录》“宋本陶靖节先生诗”条有同治癸亥杨绍和识云：“先公为诗，宗王、孟而探源彭泽、陶公诸作，莫不讽诵焉。宦游垂四十载，虽文书填委，军报倥偬之际，退食少暇，未尝废吟咏，至老犹孜孜不倦。”是知以增亦好诗。盖至承训刻此书时，诗已散佚无存也。

3.《仪晋观堂诗钞》一卷，杨绍和撰，民国九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本

收诗五十六题一百四十五首。前有张英麟序云：“同治乙丑，余获交聊城彦合同年，不知其能诗也。同入词馆，每遇馆课诗赋，彦合名次辄列前茅，同谱皆惊异之。因馆差得保举升学士，指顾可登极品，乃不数年竟遇微疴，遽归道山，闻者莫不伤之。又隔三十年，而其哲嗣凤阿中翰继逝。凤阿之子敬夫为余孙婿，姿稟沉潜，学亦邃密，所造正未可量。一日，出其令祖彦合公《仪晋观堂诗》，浼余作序，将寿诸梓，以永其传。余思诗之善视乎才，才之充由于学。彦合出身名门，随侍数省，其诗之气韵天成，得力于江山之助者已多；而书卷纷纶，又能贯穿而得其要领，是其功力之所到，有非寻常所能拟议者。虽所存只有此数，而再三雒诵，犹想见刻意揣摩，不囿于世胄豪华之习，而同官倡和，他山之攻错尤多，故能出风入雅，绝无剽窃沿袭之迹，而唐人之遗规如将见之，是不亦可贵矣乎！敬夫年力方富，而能绳其祖武，俾先人之清芬赖以不坠，亦可谓能世其家矣。”今观集中《感怀旧游十首》，追述随侍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甘肃、陕西、江南、清淮之闻见，颇存以增事绩。读《岁暮怀人诗》，可概见父子二人交游故事。至于《咏雪》、《看花曲》诸什，即景



抒怀，亦不失风人之旨。《拟唐杨巨源春日奉献圣寿无疆词十首》，有题注曰“丁卯三月大课第一”，由此一端，可见张序所称誉者，洵非虚语也。

4. 《归瀛斋诗词钞》一卷，杨保彝撰，民国九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刻本

收诗三十五题六十三首、词四阙。前有民国八年（己未）张元钧序，后有丙辰（民国五年）靳维熙跋、庚申（民国九年）历城李福銮跋。张序略云：“曩岁随侍在都，以年家世谊，与聊城杨凤阿兄时相过从，每聆其言论，滔滔如悬河，谈及古书名画及金石文玩，尤能原原本本，殚见洽闻，洞悉其源流，而独未闻其能诗。……君之嗣子承训为余次女婿，今夏由东昌寄君之遗编属为校讎，且为之序。披读一过，大抵皆官京时作。就中《复叶眉士》绝句十首，述庚子岁联军入都事，抚今视昔，无限感慨。读至《梨园供奉》一截，尤不禁欷歔欲绝也。君家有别墅在陶南，牡丹最盛，编中屡见吟咏，是知君归隐之志，当退食自公之时，其志已决。”靳跋则云：“凤阿长兄与余为总角友，以先世有年世姻谊而交最笃者也。当同治庚午、辛未年间，相与树帜文坛，联镳诗社，君天才卓越，独出冠时，乡先辈咸以远到期之。顾时方习举业，古近体诗不常作，作则出语惊人，必屈其侪偶，余愧弗如也。……岁乙卯，君家西宾虚席，延余以承其乏，授课之暇，哲嗣敬夫出诗词遗稿嘱为厘订。率皆晚岁都中所作，笔力控纵，寄托遥深，视前时盖又变一格矣。”集中感怀、赠答之作居多，往往触事起兴，清真隽永，吐属天然。《陶南别野偶成》云：“但有花为伴，何嫌士也寒。今才还故里，昔悔客长安。旧物书千卷，清辉月一丸。古人堪尚友，风雨共盘桓。”此等以书为友、与花为伴、林下优游之情，绝非由镌削揉戾而成，殆其性情之所钟然也。

5. 《宋存书室宋元秘书目》四卷，杨绍和撰，清稿本

原稿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半页八行，红格，四周双边。版心上方印有“金石书画目”五字，下方印有“海源阁”三字。鱼尾下记页数。卷端题“宋存书室宋元秘书目”，下方钤有“彦合珍玩”篆文朱方印。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自史部以下书名均改题“宋存书室目录”。四部之书又分别依宋本、元本、明本、校本、钞本次序排比。各种版本下先著录《楹书隅录初编》之书，再接以《楹书隅录续编》之书，及《初编》、《续编》以外之书。每书著录书名、卷数、册数、函数。书名上均冠以宋本、元本（或翻元本）、明本（或明翻）、校本（或校宋钞本、校旧钞本、校元本、校明钞本）、钞本（或旧钞本、精钞本、影宋钞本、硃钞本）等版本名称。四部之下于宋本、元明本、校本、钞本（史部以下做“精钞本”）



各有统计数字，如“经部共宋本二十三种”、“经部共校本十一种”，列表如下：

版本类别	宋本	元明本	校本	精钞本	合计
经部	23	24	11	16	74
史部	25	14	25	12	76
子部	18	14	51	13	96
集部	37	43	46	25	151
总计	103	95	133	66	397

6.《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稿本

原稿六册（经部、史部各一册，子部、集部各分上下册），山东省图书馆藏。每册封面及正文内均钤有“东昌府印”、“聊城县印”满汉朱文印。原书不著撰者，考《楹书隅录》绍和自序云：“癸亥、甲子间，绍和里居，撰《海源阁书目》成，复取宋元各本，记其行式、印章、评跋，管窥所及，间附数语。”可知此书成于《楹书隅录》之前。然绍和卒于光绪元年，书中著录光绪元年以后刻本不在少数，则当为其子保彝增补者。此书分类大体依《四库全书总目》而略有变通，如经部于易类前设经总类，集部词曲类细分为词集之属、词选之属、词话之属、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等三级类目，亦属特有卓识。共著录图书三千四百余部，明清本居多，类皆精刊精印；然亦有宋元本，如宋本《本草衍义》、宋本《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元本《重刻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元本《筠溪牧潜集》等。至于著录项目则较为简易，仅有书名、卷数、册数，除宋本、元本、钞本、聚珍本、汲古阁本等于书名上冠以版本名称外，多数清刻本均未注版本。

7.《楹书隅录》五卷《续编》四卷，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清光绪二十年聊城杨氏海源阁刻宣统三年海王邨谭宅补刻本

此系海源阁所藏宋元秘本题跋目录，详记各本行式、印章、评跋，并间加按语，于晚清四大家藏书目录中最享盛名。《隅录》系同治二年至三年绍和家居时所纂，成书于同治八年，宋元善本多已入录。《续编》乃同治十年绍和在京命保彝钞寄各书题跋编成，著录各书以钞校本为主。因尚有宋元秘本未及著录，绍和原拟撰为《三编》，惜未偿宿愿。《楹书隅录》



及《续编》共著录宋元钞校本 267 种。因战火未平，原稿迄未梓行。迨光绪十九年，始由保彝详加校订，付诸剞劂，至光绪二十年而蒇事。惟光绪家刻本流传至罕，其后版片亦散落市肆，残缺不完，及董康收购旧版，已缺失三之一。经董氏补刊百九十余版，复成完书。

《楹书隅录》著录范围与《宋元秘书目》同，然数量较少。因其为解题式善本书录，熔辑录体、叙录体于一炉，既存前贤题跋，复抒一己之见，且记有行款、印记，以资读者参镜，其有功于版本学、校勘学甚巨。唯鉴定、校勘偶有失误，时贤多有寔正，是则尺璧不免于微瑕，读是书者，分别观之可也。

8. 《海源阁普通本书目》不分卷，山东省图书馆编，稿本

此本盖系山东省图书馆接收海源阁旧藏后复加整理时誊写之目。封皮写有统计数字“书目两册共书 22168 本”。全书按四部分类，各书著录除书名、著者、版本外，多标有毛纸、白纸、竹纸等，与他书迥异。书名上有铅笔勾选痕迹并写有阿拉伯数字，当系清点图书时核对之标记。又有以铅笔补记之条目，虽潦草不易辨识，然于厘清山东省图书馆保藏之状况，或不无裨益也。

以上所举，虽非海源阁杨氏著述之全部，然要籍已尽在其中。即以书目而论，既有专收善本之目，亦有普通本书目，诸本合而观之，海源阁旧藏概貌，可尽收眼底。又海源阁各种书目素为学界看重，盖因其频遭劫掠，流散四方，在清末民初藏书楼中最为繁复。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阁书零星散出，即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申报》、《北平晨报》以及地方报纸连续跟踪报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亲往聊城调查，并屡与杨氏协商，欲将阁书整体收归公藏而未果，然购自书肆者亦颇可观。傅增湘、周叔弢诸公不惜耗巨资网罗散佚，所收珍本后皆捐献北图。海源阁普通本古籍，经济南贤达通力周旋，终能归藏山东省图书馆，可谓山东文化之幸事。唯流落民间之善本无由考索，有为日人购去者，有辗转流于欧美者，有战后归藏台湾者，至于为匪患所毁者，则尤难以稽查。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为此殚精竭虑，多方覈查，先是撰《山东藏书家史略》，探究海源阁藏书之聚散，复主撰《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于书目著录各书条分缕析，标注存佚，可谓海源阁之功臣。今亦有不少学人探寻海源阁藏书下落，颇有收获。然笔者以为，单凭个人学术研究，难能持久，亦难以彻底查清；唯有设立专门机构，专力于此，并依书目按图索骥，出资制作复本，渐复海源阁藏书之旧观，方为长久之计。又由杨氏著作，推及地方先贤著作之

存佚，亦有待深入研究，广为发掘，无论公藏私藏，俾无散亡之虞，其珍本孤帙，均可化身千百，何其幸也！



(作者系山东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特应本书编委会之邀而作此文)



临河歌

周·孔子

孔子适赵，临鸣犊河不济，叹而作歌曰：

秋水衍兮风扬波，
舟楫颠倒兮更相加。
归来归来胡为斯！

注：鸣犊河，在今高唐县境内。公元前492年，孔子应赵简子之召，由卫将入晋。至鸣犊河，闻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乃临河而作此歌，感叹“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于是回辕归东，返回鲁国的陬里，并作《陬操》琴曲以哀之。为纪念此事，此渡口改名为“鸣犊”，并立“孔子回辕处”石碑以记其事。今石碑尚存于茌平县博平镇。

本文选自清嘉庆十三年刻《东昌府志》卷四十七“艺文”。





王彦章画像记

宋·欧阳修

太师王公，讳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也。事梁，为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死国，葬于郑州之管城。晋天福二年，始赠太师。

公在梁以智勇闻。梁、晋之争数百战，其为勇将多矣，而晋人独畏彦章。自乾化后，常与晋战，屡困庄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赵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不见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尽失河北，事势已去，诸将多怀顾望。独公奋然自必，不少屈懈，志虽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公本武人，不知书，其语质平，生尝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然而然。予于五代书，窃有善恶之志，至于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求于滑人，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其记德胜之战尤详。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经于帝前；公因用笏画山川，为御史弹而见废。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节。此皆旧史无之。又云：公在滑以谗自归于京师，而史云召之。是时，梁兵尽属段凝，京师羸兵不满数千；公得保銮五百人，之郓州，以力寡，败于中都。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

公之攻德胜也，初受命于帝前，期以三日破敌；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时，庄宗在魏，闻公复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驰马来救，已不及矣。庄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败军杀将，连四五年，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予尝独持用奇取胜之议，而叹边将屡失其机。时人闻予说者，或笑以为狂，



或忽若不闻，虽予亦感不能自信。及读公家传，至于德胜之捷乃知古之名将，必出于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伟男子之所为，非拘牵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

后二年，予复来通判州事。岁之正月，过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枪，当时号“王铁枪”。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犹以名其寺，童儿牧竖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一枪之勇，同时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画已百余年矣，完之复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区区如此者，盖其希慕之至焉耳。读其书，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画既完，因书予所得者于后，而归其人，使藏之。

注：王彦章，今阳谷县人，五代梁国大将，忠义信勇，时人极称赞之。欧阳修写此文于王彦章的画像上，文笔优美，流传至今。

本文选自《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九。



三槐堂铭

宋·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



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三槐堂”王氏源于莘县，现为全国最大的王氏家族之一。此文为苏轼在湖州任上时，应王旦之孙、自己的弟子、忘年交王巩之请而写。

本文选自《莘县志》卷八“艺文”。



王氏宗谱跋后

宋·岳飞

皇宋受命，贤臣辈出，而相业烜赫、得君最厚者，无若魏国王文正公，而其子懿敏公素及孙太常公巩，皆以文章气节显名于时。若余所交殿帅王君子高，固文正公曾孙也。君以名家子，释铅颖、从戎马。当靖康末造，斥金虏，拒叛臣，崎岖万状，辇从南行。虽疆场宿将，无不闻名叹服。每因公事宴集相与，论及世变，君则嘘唏，泣数行下。盖其忠愤激烈，实有大过人者。顾军旅旁午，契阔者久之。兹奉朝命召还，休沐多暇，而君之仲子省郎吾护，捧君手书，谒余于临安私第，且出宗谱，索予为跋。余既喜故人之有子，更深喜故人之子之贤且才也。乃受而读之，其溯源自于晋，得派自太原。由晋及唐，迄昭代，文章甲第，炳炳奕奕，世不乏人。氏族之盛洵乎，蔑以加矣。顾余武人也，无渊云严乐之文，而欲附王氏谱牒之后以垂不朽，不其难哉？然窃尝横览当代高门右族，炫燿宗支汗漫卷帙，几于连帷压架，乃数传而虫蠹穿之矣，又数传而灰烬荡之矣。求其如王氏之裒然完帙，阅历异代而光远有耀者几何耶？是真两序间之赤刀、天球、河图、大训也。谨谢省郎为我寄语尊人曰：“是可为王氏世宝矣。”爰题四字于卷首而归之。

注：岳飞，其高祖岳涣从聊城迁至河南汤阴县，出任“令使”，遂留居汤阴。“三槐堂”王氏源自莘县。王氏后人修宗谱时，请岳飞作此跋。



《中州集》引

金·元好问

商右司平叔衡，尝手抄《国朝百家诗略》，云是魏邢州元道明所集，平叔为附益之者。然独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岁壬辰，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滞留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东人元好问裕之引。

注：元好问金亡后曾避难聊城六年，编《中州集》。

本文选自清嘉庆十三年刻《东昌府志》卷四十七“艺文”。



牧民忠告

元·张养浩

卷上

拜命第一

(凡六条)

1.省己

命下之日，则拊心自省：有何勋阀行能，膺兹异数？苟要其廩禄，假其威权，惟济己私，靡思报国，天监伊迩，将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僉人爵而旷其事，己则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2.克性之偏

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质强劣，有所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则官无难为，事无不集者矣。弛缓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庄，率略克之以详，烦苛克之以大体。苟不度所任，一循己之偏而处之，鲜有不败者矣。古人佩弦佩韦，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读书无益，莅官不才者，皆由狃于习而不知痛自克治故也。

3.戒贪

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司牧者，能几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爱也，宁不为世所诮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溪壑，适以自贼。一或罪及，上孤国恩，中贻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缧绁之苦。与其戚于已败，曷若严于未然？嗟尔有官，所宜深戒。



4. 民职不宜泛授

今选官者，大率重内而轻外，殊不知汉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所以家给人足，皆由重牧民之长故也。呜呼！牧民之长，其重若此，乃泛焉而选、懵焉而授，奚为不是虑也哉！

5. 心诚爱民，智无不及

赤子之生，无有知识，然毋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无他，诚然而已矣。诚生爱，爱生智。惟其诚，故爱无不周；惟其爱，故智无不及。吏之于民，与是奚异哉？诚有子民之心，则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

6. 法律为师

吏人盖以法律为师也。魏相所以望隆当世者，汉家典故无所不悉也。凡学仕者，经史之余，若国朝以来典章文物，亦须备考详观，一旦入官，庶不为俗吏所迂也。

上任第二

(凡六条)

1. 事不预知，难以应卒

比入其境，民瘼轻重，吏弊深浅，前官良否，强宗有无，控诉之人多与寡，皆须尽心询访也。至则远居数舍，召掌之者，语其详，疏其概，先得其情，下车之日，参考以断。若素无所备，卒然至部，听讼之际，百姓聚观，一语乖张，则必贻笑闇境。况民心易动，尤在厥初，初焉无以厌服其心，后虽有为，亦将奚信？不然，受其讼而翼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轻率应答，使士民失望也。

2. 受谒

诸执事参谒，不可默然无一言。第曰：“误蒙国恩，托兹重寄，芒背汗颜，期与诸君涤虑洗心，以宣大化也。汝或余违，国有常宪，非所敢私，诸君其慎之。”

3. 治官如治家

治官如治家，古人尝有是训矣。盖一家之事，无缓急巨细，皆所当知；有所不知，则有所不治也。况牧民之长，百责所丛，若庠序，若传置，若仓廪，若囹圄，若沟洫，若桥障，凡所司者甚众也。相时度力，弊者葺之，污者洁之，堙者疏之，缺者补之，旧所无有者经营之。若曰：



“彼之不修，何预我事？瞬夕代去，自苦奚为！”此念一萌，则庶务皆堕矣。前辈谓：“公家之务，一毫不尽其心，即为苟禄，获罪于天。”

4. 瘴说

昔人有欲之官而恶其地之瘴者。或释之曰：“瘴之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攻金攻木，崇饰车服，此工役之瘴；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无间远迩，民怨神怒，无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刘先生处瘴海而神观愈强，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虑彼而不虑此，不亦左乎？故余具载其言，以为授官惮远避难者之戒。

5. 禁家人侵渔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馈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由是而坐败辱者，盖骈首骊踵也。呜呼！使为妻妾而为之，则妻妾不能我救也；使为子孙而为之，则子孙不能我救也；使为朋友而为之，则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子孙、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职，而自为之为愈也哉！盖自为虽閨门恒淡泊，而安荣及子孙；为人虽欢然如可乐，而祸患生几席也。二者之间，非真知深悟者，未易与言。有官君子，其审择焉。

6. 告庙

故事，牧民官既上，必告境内所当祀之神，宜以不贿自为誓，庶坚其迁善之心焉。尔后虽欲转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

听讼第三

(凡十条)

1. 察情

人不能独处，必资众以遂其生。众以相资，此讼之所从起也。故圣人作《易》，以讼继师，其示警固深矣。夫善听讼者，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必先审其辞。其情直，其辞直；其情曲，其辞曲。政使强直其辞，而其情则必自相矛盾，从而诘之，诚伪见矣。《周礼》以五声听狱讼，求民



情，固不外乎此。然圣人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盖听讼者折衷于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也；无讼者救过于未然，非以德化民，何由及此？呜呼！凡牧民者，其勿恃能听讼为德也。

2. 强讼

起讼有原书，讼牒者是也。盖蚩蚩之氓暗于刑宪，书讼者诚能开之以枉直，而晓之以利害，鲜有不愧服，两释而退者。惟其心利于所获，含糊其是非，阳解而阴嗾，左纵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厌不已，所以厥今吏按情伪混殽，莫之能信者，盖职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讼，宜择一二老成练事者使书之，月比而季考，酌其功过而加赏罚焉。若夫殴置假质，凡不切之讼，听其从宜谕遣之；谕之而不伏，乃达于官；终无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则讼源可清，而民间浇薄之俗庶几乎复归于厚矣。

3. 勿听谗

健讼者理或不胜，则往往诬其敌尝谤官长也。听之者当平心易气，置谎言于事外，惟核其实而遣之，庶不堕奸民计中矣。

4. 亲族之讼宜缓

亲族相讼，宜徐而不宜亟，宜宽而不宜猛。徐则或悟其非，猛则益滋其恶。第下其里中开谕之，斯得体矣。

5. 别强弱

世俗之情，强者欺弱，富者吞贫，众者暴寡，在官者多凌无势之人。听讼之际，不可不察。

6. 待问者勿停留

昔尝使外，所过州县，待问者云集乎门，每病焉。乃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不浃旬，则讼庭阒然矣。

7. 会问

讼有相约而问者，不可乘一时之忿擅加搒掠也。若释道，若兵卒，诸不隶所部者是已。

8. 妖言

民有妖言惑众者，则当假以别罪而罪之。如有妄书，取而火之，则厥迹灭矣。勿使蔓为大狱，延祸无辜。

9. 民病如己病

民之有讼，如已有讼；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缧绁，如已在缧绁；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虽欲因仍，可得乎？



10. 移听

近年司宪受词讼，往往檄州郡官代听之。代听者不可承望风旨，邀宠一时，使人茹枉受刑，而靡恤阴理。

御下第四

(凡五条)

1. 御吏

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势最亲。惟其亲，故久而必至无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为奸。此当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则莫若自严；欲其不为奸，则莫若详视其案也。所谓自严者，非厉声色也，绝其馈遗而已矣。所谓详视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纲领而已矣。盖天下之事，无有巨细，皆资案牍以行焉，少不经心，则奸伪随出。大抵使不忍欺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圣人不能，故前辈谓：“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于斯三者，度己所能而处之，庶不为彼所侮矣。

2. 约束

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以来讼端，以启倖门也。暇则召集讲经读律，多方羁縻之，则自然不横矣。

3. 待徒隶

皂卒徒隶，非公故勿与语，非公遣勿使与民相往来。若辈小人，威以莅之，犹恐为患，一或解严，必百无忌惮矣。

4. 省事

为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则事省，事省则民安，民安则吏无所资。一或纷然，上下胥罹其扰也。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则又在夫措画堤防之术何如耳。古人谓：“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不特用兵为然，一役之修，一宴之设，一狱之兴，诚能思虑周详，繁略毕举，则民之受赐不浅矣。某尝为县，胥吏辈春则追农以报农桑，夏则檄尉以练卒伍，秋则会社以检义粮，冬则赋刍以饲尚马，其他若逃兵、亡户、逸盗及积年逋税之民，动集百余，不贿不释。某见其然，常挥牍不为署，暇则将一二谨厚吏，亲诣其地而按之，可拟者拟，可行者行。由是一切惟以信版集事，吏人失志，百姓获安。至今旁郡以为例。



5.威严

小而为一邑，大而为天下，赏罚明，则不烦声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为尤难。盖吏与官比，诡诈易生。民远于官，不能知理法，误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则日处法律中，非不知也，小过不惩，必为大患，无所忌惮矣。尝闻治民如治目，拨触之则益昏；治吏如治齿牙，剔漱之则益利。《传》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断不至于难治矣。

宣化第五

(凡十条)

1.先劳

古之为政者，身任其劳，而贻百姓以安。今之为政者，身享其安，而贻百姓以劳。己劳则民逸，己逸则民劳，此必然之理也。惮一己之劳，而使阖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尔乎？昔子路问政，而圣人告以先之劳之无倦。呜呼！此真万世为政之格言也欤！

2.申旧制

朝廷德泽，牧民者多屯而不能宣布。我朝自世祖皇帝迨今數十百年，列圣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国顺民者，讨论靡遗，所谓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但有司寢废而不为申明，遂为坠典。苟能揭而行之，则不待他求而治道备矣。

3.明纲常

欲先教化，去其教化悖化者，则善类兴矣。近年子叛其父、妻离其夫、妇姑勃蹊、昆弟侮阋、奴不受主命、冠履倒置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必其来告，当风乡长恒纠，其尤甚者，谕众而严决之，则自悚然改行矣。

4.勉学

学校乃风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为务，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则率僚寮以观讲习，或生徒有未济，廪饩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养有未至，激励有未周，皆敦笃以成之。久则弦诵之声作，而礼义之俗可兴矣。

5.劝农

农之勤惰，一岁之苦乐系焉，其所当为，有不待劝焉者。时因行治，



视其辍工废业者切责之，远近闻之，必知自励也。常见世之劝农者，先期以告，鸠酒食，候郊原，将迎奔走，络绎无宁，盖数日骚然也。至则胥吏、童卒杂然而生威，赂遗征取，下及鸡豚。名为劝之，其实扰之；名为优之，其实劳之。嗟夫！劝农之道无他也，勿夺其时而已矣。繁文末节，当为略之。

6.服远

或问：“远方獠民，巢居溪洞，猛不能讐，宽不能怀，喜则人，怒则兽，欲宣朝廷德泽，若之何而可？”余曰：“物之凶狠，无虎狼若也。然使之左右前后，惟吾之听者，得其制之之术也。夫克刚莫若柔，治繁莫如简。且彼之所以反侧不恒者，亦必有由矣。或贪其财，或蹙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属，以致蚊结蜂屯，肆其酷毒。苟安之而不扰，外之而无所事，虽欲忿然，无自而发。政使或尔，但严守己界，恬不与校，久而彼自驯伏矣。况彼兵一动，守土者非有上命，坐视而不敢前，比许追袭，则已雉兔逃而禽鸟散矣。由是而论，安静不竞者为上，恬无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开边衅，斯为下矣。”官于远方者，尚监于兹。

7.恤鳏寡

鳏寡孤独，王政所先，圣人所深悯。其聚居之所，暇则亲莅之，或遣人省视。若衣粮，若药饵，吏不时给者，纠治之。

8.戢强

或谓：“民有豪强，则不能致治。”是殆为贪邪之吏而发也。夫豪强之所以敢横者，由牧民者有以纵之也。何也？与之交私故也。苟绝其私，可不动声色而使其胆落。《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怒而民威于鉄钺。”信哉！

9.示劝

诸民有旌表及学行异众者，时加存慰，为劝必多。

10.毁淫祠

毁淫祠，非烛理明而信道笃者不能，非行己端而处心正者不敢。



卷下

慎狱第六

(凡十条)

1.存恕

人之良，孰愿为盗也，由长民者失于教养，冻馁之极，遂至于此，要非其得已也。尝潜体其然，使父饥母寒，妻子愠见，征负旁午，疹疫交攻，万死一生，朝不逮暮，于斯时也，见利而不回者，能几何人？其或因而攘窃，不原其情，辄置诸理，婴笞关木，彼固无辞，然百需丛身，孰明其不获已哉！古人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呜呼！人能以是论囚，虽欲惨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2.狱诘其初

狱问初情，人之常言也。盖狱之初发，犯者不暇藻饰，问者不暇锻炼，其情必真而易见，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则其劳将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狱，圣人惟与乎子路，其难可知矣。

3.详谳

在狱之囚，吏案虽成，犹当详谳也。若酷吏锻炼而成者，虽谳之，囚不敢异辞焉。须尽辟吏卒，和颜易气，开诚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狱卒款曲以其情问之。如得其冤，立为辨白，不可徒拘阙吏文也。噫！奸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4.视尸

故事，承检尸之牒，则划时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后时，时焉而不亲莅，亲焉而不精详，罪皆不轻也。其检之之式又当遍者，筮仕者不可以不知。

5.囚粮

天地之德曰好生，圣元体之，以有天下。诸在缧绁无家者，皆给之粮，惟县狱不给也。意者县非待报之官府，故令略诘其然，而上之州。比见为州者，往往为吏之所欺，吹求不受，以致瘐死于县狱。夫罪不至死，而以己私缪杀之，不仁甚矣。为州若府者，尚深戒之。

6.巡警

诘盗非难，而警盗为难；警盗非难，而使民不为盗尤难。盖天下之事，先其几为之则有余，后其几为之则艰苦而无益。夫盗之发也，恒出不



虞。知者防于未然，其防之之术，则在广耳目，严巡迟，戒饮博，几游聚，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境以恐惧之。夫盗犹鼠也，尉犹捕鼠之狸也，勤于出，鼠必伏而不动；狸怠出，则鼠必兴矣。彼为尉者，与其劳于已然，孰若警于未发之为愈？若夫使民不为盗，则又在于勤本以致富。勤斯富，富斯礼义生；礼义生，虽驱之使窃，亦必不肯为之矣。故管子谓“仓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谅哉！

7.按视

狱庭时当一至也，不惟有以安众囚之心，亦使司狱卒吏辈知所警畏，而无饮博喧哗、逸而反狱者，是亦先事防之之微意也。仓库同。

8.哀矜

亡友段伯英尝尹巨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为泣下。或以为过，余闻之，私自语曰：“人必有是心，然后可以语王政。且独不闻古人亦有禁人于狱，而不家寝者乎？要皆良心之所发，非过也。”

9.非纵囚

古人纵囚省亲，如期还狱者甚多，要不可以为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与期而纵之，是不几于弄天子之法，以掠美市恩于下者乎？然出于朝廷则可，出于一己之私则不可。

10.自责

教民不至，则犯禁者多；养民无术，则病饥者众。为守与牧，而使其至此，独归咎于民，难矣哉！

救荒第七

(凡九条)

1.捕蝗

故事，蝗生境内，必驰闻于上，少淹顷刻，所坐不轻。然长民者亦须相其小大多寡、为害轻重。若遽然以闻，莅其上者群集族赴，供张征索，一境骚然，其害反甚于蝗者。其或势微种稚，则当亟率众全力以图之，不必因细虞以来大难于民也。故凡居官，必先敢于负荷，而后可以有为。

2.多方救赈

天所畀人富与贵者，非欲其自裕，盖将使推所有以济人之不及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负天畀之富矣；直者举之，枉者错之，斯不负天畀之贵矣。然富贵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则在己，名为惠人，实自



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夭扎之变，视其轻重，必有术以处之。或私帑之分，或公廪之发，或托之工役，或假以山泽，或已负蠲征募籴劝粜，或听民收其遗稚，或命医疗其疹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盖古人视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难而父母坐视不救之理也。呜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之人为法，庶无彼我之间哉！

3. 预备

灾异之生，常出于人之所不意。诚素有其备，虽甚灾，不足为忧也。今州郡多无委积，虽有之，而在上者封锢甚严，不测有虞，茫无所措手，此厥今牧民者之通患也。然今所谓只应之钱者，山州僻县未尝有之，而使客往还，率无枵腹而过者，意必有以规画也。至于备荒之储独未有及焉者，岂以治平之时何遽有此，所以因仍岁月，幸满而去，不复为民远虑耶。尝闻近代为县者，教民种蔓菁，捣其根以为饼，大者三四斤，干而储之，后值凶年，蒸以食饥民，味甘且美，赖以全活者甚众。夫古人虑民之远也如此，其肯苟且幸代，而不为民预备哉！

4. 均赋

故事，民之税赋，三年则第其贫富而均平之。或好名，未及而先为，或避谤，逾期而不为，皆非也。如期行之，民受赐不浅矣。

5. 祈祷

凡有祈祷，不必劳众，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冤欤？已有赃欤？政事有未善欤？报国之心有未诚欤？无则如仪行事，有则必俟追改而后祷焉。夫动天地，感鬼神，非至诚不可。纤毫之慝未除，则彼此邈然矣。

6. 不可奴妾流民

尝见一显官，于凶年市所部民子女殆数十人，美且壮者皆奴妾之，余将賂时要以希恩宠也。仆闻而颦蹙曰：“使其困惫，吾治已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不大获罪于法耶？”故感而书之，以戒后来者。

7. 救焚

民或失火，则伐鼓集众，亲莅以救之。恻隐之心，人所共有，诚能鼓舞以作其气，虽仇人亦将焦头烂额而相趋患难矣。

8. 尚德

反风灭火，虎渡河，蝗不入境，全境之水回流，此在长民者之德何如尔，殆不可皆谓之偶然也。

9. 上灾异

灾异之事，则不可不闻；祥瑞，虽不上，可也。



事长第八

(凡六条)

1.各守涯分

尊卑之分定，则家无逆子，国无叛臣。夫国之所以亡，家之所以败，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诸历代，厥监甚明。今夫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设官也有长焉，有贰焉，有幕属焉，有胥吏焉，各安其分而事其事，天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乖同夤之义，无协恭之诚，衷既不和，则所见必有不同者。或长官不知待佐贰之礼也，或佐贰暗于事长官之道也，少见辞色，则彼此胥失矣。若夫事例应尔，而所见或不同，居下者当诚其意，婉其辞，卑其容体，以开其上；若由未允，则俟其退而语之家，人非木石，无不回之理。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为长者亦当如是晓之也。稍有所挟，虽面强从，退而必有不堪者，日引月深，终于泄露。人见其乖忤也，谗谮之言乘之而入，久则讼必兴，而政事隳矣。为一时之忿，使同僚之心离，阖境之民不得治，则其人之褊浅可知矣。古人有言：“必有忍，乃其有济。”又曰：“欲成大事，必须少忍。”又曰：“忍为众妙之门。”旨哉！

2.宁人负我

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于道其庶几乎？

3.处患难

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古今未有荣而无辱、得而无失、成而无败之理也。虽天地之运，阴阳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处之不以道，则纤毫之宠必摇，而一唾之辱必剗矣。故君子于外物重轻皆所不恤，顾其在我者何如尔。使其有可辱，虽不加谴，而君子恒以为不足；使其无可辱，虽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为有余。历观自昔大圣大贤，不幸横罹祸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处荣而不能处辱，惟能安顺境而逆境则不能一朝居，欲望其临政有余，为难矣！呜呼！善观人者，其于此焉察之。

4.分谤

是非毁誉，自古为政所不能无者。是则归人，非则归己；闻誉则归人，闻毁则归己。无长无贰，处之皆当如是也。前辈云：“恩欲已出，怨



将谁归?”呜呼！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5.以礼下人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远。昔某郡有新守，褊骜大不礼其下，常令掾属罗拜于庭。下有一贤掾，初以疾在告，疾愈当庭参。是日偶大雨，守命张伞布茅于庭下，使掾拜焉。掾恬然不动容，兴伏惟谨。识者知其他日必为宰相也，后果然。

6.不可以律己之律律人

同官有过，不至害政，宜为包容。大抵律己当严，待人当恕。必欲人人同己，天下必无是理也。

受代第九

(凡六条)

1.郊迎新代

闻代者来，则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己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旧政告之也。大抵天下之善，在彼犹在此，劝人为善，即己之为善也。讵可惟许己为善，而不愿他人为善哉？

2.克终

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终如始，故君子称焉。

3.不竞

尝见世之交代者多有所争，要皆旧官不广之所致。或据其居而不徙，或专其田而不分，或匿其公物不尽以相授，使新者怀不平而无所诉，甚非士君子善后之道也。夫利之与义，势不并处，义亲则利疏，利近则义远。况为民师帅而专务于利，其聚怨纳侮，视市井小人不若也。故君子之从政也，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

4.不可自鬻

代之未至也，风民立石以颂德，结绮门以租行，鸠钱帛以佐路费，建生祠以图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也。盖为善不求人知者为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呶呶焉自媒自鬻，惟崇虚誉者，风斯在下矣。

5.告以旧政

近代东原吴曼庆为某所宪长，既代，谆谆新上者曰：“某事有少许未完，某狱已具而未决，某按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许能可用。”一部之政，



毫分缕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尽。呜呼！今之仕者，方其在职，尚不肯用心，况已代去，而敢责其如是哉！

6.完归

其在政也，民被德泽，讼清盗息，豪强消沮，同僚悦服，则去之之日，虽弊车羸马，行橐萧然，其乐有不翅万金获而千驷受者。前辈由外官而至执政者，论济人之功，皆自以为不及为县远甚。呜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县而不屑为也。

闲居第十

(凡六条)

1.轻去就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任一县之责者则忧一县；任一州之责者则忧一州；任一路之责、天下之责者，则以一路与天下为忧也。盖任重则责重，责重则忧深。古之人所以三揖而进，一揖而退者，有以也。虽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固未尝不忧其责而以位为乐也。若以位为乐者，苟其位者也。呜呼！大圣大贤宜不难于其所任，犹且不自暇逸如此，吾才远不逮圣贤，顾可乐其位而重其去也哉！

2.致政

古人以休官致政为释重负而脱羁囚，切尝思之，诚有是理。方其仕也，严出入而慎起居，一顰一笑亦不敢以轻假人。盖一身而为众师表，少逾规矩，谤议四闻，譬之特行于高屋之上，自顶至踵，在下者无不见之也。一朝代至，完身而去，讵止如释重负脱羁囚而已哉！尝见仕而休居者往往不喜，或命子侄，或托朋友，市奸构讼，靡政不及，小有所违，则曰去官同见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纳惟谷，甚而挠沮排衦，为状百端。细民无知，亦从而靡。设使己政之初，人以是荐扰，当若何？推心体之，必自知其可恶矣。

3.进退皆有为

进则安居以行其志，退则安居以修其所未能，则是进亦有为，退亦有为也。近世士大夫惟狃于进退，则惛然无所猷为，甚而茹愧怀慚，蹙缩不敢一出户。夫轩冕，古人以为傥来之物也，其有也何所加，其无也何所损。不思良贵在我，惟假于物以为重轻焉，则其人品之卑下，不待论而可



知矣。

4.以义处命

世俗以穷达进退皆本夫命，谓命之穷者虽竭蹶求进而亦穷，命之达者虽远逝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翁、术士之常谈，非君子所尚也。君子则以义处命，而不倚命以害义，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吾不谓命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吾岂谓命哉？彼沦胥富贵利达之境而不能出者，则往往托命以自诬，宜乎接武祸机而卒不能悟，悲夫！

5.求进于己

士当求进于己，而不可求进于人也。所谓求进于己者，道业学术之精是已；所谓求进于人者，富贵利达之荣是已。盖富贵利达在天，而不可求；道业学术在我，而不可不求也。况古之人不以富贵利达为心也，其所以下从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道不行而富贵利达者，古人以为耻，而不以为荣。呜呼！非诚有致君泽民之心者，其孰能与于此。

6.风节

名节之于人，不金币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女不贞，则何暴不从，何炎不附，虽有他美，亦不足赎也。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禄或失，有时而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呜呼，士而居闲者，能以此言铭其心，庶不易所守而趋势要哉！

注：张养浩曾任聊城堂邑县令。在任时作《牧民忠告》一书，为从政经验之谈，在历史上备受推崇。2009年6月，新华网推出了“为领导干部推荐古代两篇小册子”，其中之一即为《牧民忠告》。



县令箴

元·古之哥

咨尔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宽。宽则人慢，猛则人残。宽则不济，猛则不安。小恶勿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至著。祸既有胎，德岂无自。镜不自照，只能鉴物。人不自知，从谏弗咶。欲不可纵，货不可黩。黩货生灾，纵欲祸速。勿轻小人，蜂虿有毒。勿轻小道，大车可覆。无谓刚可长，长刚者亡；无谓柔可覆，覆柔者耻。刚强有时，柔弱有宜。时宜克念，顾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毋为恶行，毋逆善名。保此中道，无不有成。过客箴士，冀申同情。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坚，如松之贞，如剑之利，如镜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注：古之哥，生平不详。县令箴，一般勒石置于县衙门正门内，常见内容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篇《县令箴》为聊城县衙所独有，颇具价值。

本文选自清嘉庆十三年刻《东昌府志》卷四十七“艺文”。



东昌府重修碑记

明·于慎行

国家转漕江南，通渠两京之间，自淮以北，长不下三千里，夹渠而治者，星罗珠贯，不下数十城。东郡枕其中间，独号为府，辟河渠以率。然则其要云，清源绾毂御漳，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也。而为之支郡倚其北河堤，使者以重兵开府济上，亦一都会也。据上游而控其南，左提右挚两东而兼扼之，此其为形胜，较燕齐魏博时奚翅十百？故其城不能十里，而壮丽严整，甲于他郡。城之中为楼，厥高十仞，命曰“光岳”，从百里望之，缥缈云气，以为地标。自国朝来，城凡三修，久之辄圮，吏人忧焉。万历丁丑，中丞汝泉赵公出抚东土，行部至郡，既延见吏民，问所疾苦。乃登楼循堞旁眺四野，僵慢垠莽，平皋沃土，一瞩千里，河流以一衣带，漱渎泱瀼，规旋而出，贡艘鳞次，牙樯蔽日，锦帆绛天，则叹曰：“壮哉！此非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欤！城而不完，保障云何？”乃谋诸治兵大夫艾公可久，对曰：“设险域民，重关待暴，兵之职也，著在宪典，敢不惟命！”乃谋诸分守大夫查公志立，对曰：“画圻慎封，守有责焉，敢不惟命！”乃谋诸分巡大夫詹公沂，对曰：“禁奸遏虐，巡有责焉，敢不惟命！”侍御秀峰钱公行部亦至所，与诸大夫谋亦如中丞。于是诹日鸠工，分画章程。会桂林莫侯与齐拜东郡守，至而身督课之。不数月，城成矣。凡修楼橹二十有五，护城神祠五环更庐四十有七，城高八丈，厚五丈，隍深一丈，广十九丈，堤高八尺，厚二丈许。长桥虹跨，高岸翠拱，奕奕霸霸，博敞宏壮，称金汤之险焉。及摧其费，用金千有五百，工千有二百，斯已俭矣。侯以告于内史行。行不佞受博士，诗当周宣王中兴，修明文武之业，既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御猃狁，又使宰衡保傅之臣，若仲山甫者出而城，齐其功烈，著之歌诗，至今有弦诵焉。当是之时，齐去镐京数千里，不称要害，而重已若此。今天子润色鸿业，方内又宁，永惟桑土



之谋，曰诏中外，将吏慎固城守，乃睠海岱之区，徒帷幄枢机，借中丞公镇抚东夏，中丞乘轺行部，宣政问俗，山城僻障，无不环而视之以令长吏。东郡为齐名胜，在襟喉肘腋之间，而城是成。是中丞能布宣天子之洪，休茂烈而与山甫比隆也。彼诗所称，出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入而式是，百辟为王，喉舌又何，古今符契，如此倘所谓天保者耶。不佞幸备，兰台史敢勒之，诗以比于蒸民之雅，其辞曰：於维大东，负海跨岱。百有八城，以襟以带。帛彼东郡，在封之右。南控江淮，北连京口。七雄之代，为齐西门。守不可拔，射书解纷。金堤之决，龙蛇起陆。皇皇汉武，於焉沉玉。肆唐中业，田氏凭陵。两河枯阻，万里征兵。迨宋淳化，卜迁此域。以河伯蓄，匪疚匪亟。皇建郡邑，是号名区。匪无鼎新，岁久则渝。中丞受命，自天子所。濺泽鸿恩，惠我东土。顾兹形胜，横扼漕渠。有城而敝，焉奠民居。乃询监司，乃召守吏。榷彼羨衍，兴此崇丽。小大欢欣，卜筮叶从。不日而竣，众心所成。岌峩高墉，寵榦华观。修堑长堤，有梁有岸。表以飞楼，上规下矩。周望原皋，俛临烟雨。河则如玦，而城如璧。巨舰舳舻，其帆如织。行者游观，居者象喜。赫赫中丞，令闻不已。伟兹柱史，同心訏謨。卓彼贤侯，矢力资图。昔天监周，生仲山甫。往城于齐，声施振古。惟中丞公，为帝喉舌。入赞枢机，出饰方国。明明我后，絜美周宣。烈烈樊侯，公何让焉。公归在朝，公功罔极。内史作颂，勒此磐石。

注：于慎行，明万历间大学士，以文赋著称。该文为于慎行明万历七年所作。“江北一都会”，“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即出自此文。

本文选自清宣统二年刻《聊城县志》卷十三“艺文”。《穀城山馆文集》卷十三亦载。



冉子仲弓墓碑记

清·孙星衍

冠县北二十里，有冉子仲弓墓，见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其传已久，乃后世忽指曹县之冉堌当之。冉堌实穰候魏冉之墓，见于《水经注》，何得以伪乱真！使者命参藩山左，下车之始，即以崇礼先贤，振厉风俗，为輶轩应问之事。饬校官访考冠县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即据冠县田平，约士民黄希武、马元标、张宣等，以出资修理，完毕申报前来。使者嘉其急，公免其徭役，用以劝善。考冉子仲弓为鲁人，不载于《史记》，而见于郑康成《论语注》；其《家语》所称，少孔子二十九岁，既是王肃伪书，亦不足据。王充《论衡·自纪篇》云，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则以仲弓为伯牛之子，汉人及见古书，或有所本，未敢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为德行，问仁问政，则告以邦家无怨、赦过举贤，仅仅为季士宰，欲使南面临民。《孔丛》载仲弓两问，惟刑教折狱为兢兢。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郑康成序《论语》，以为仲弓与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语文学之长，四科几一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东平，冉子有葬在郓城，仲弓以鲁人葬在晋冠氏，未详其故。唐开元赠薛侯，至宋祥符赠下邳公，咸淳又赠薛公。儒家尚文反葬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张聪逞其私议，削其礼秩，今象饰端冕犹存，不予聪之矫诬改制也。国朝为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县，得毋为明《一统志》歧说所误乎？后有知者，鉴于斯。铭曰：德行之选，列于圣门。寒门非贱，人爵非尊。用同且角，使可南面。弓旌不及，规模自见。手著《论语》，独综微言。游夏避席，求孺随肩。古有族葬，东平非近。冠氏有冢，云胡适晋。採樵既禁，崇祠在兹。祀典有举，神无不之。



注：冉子，名雍，字仲弓，孔门“十哲”之一。孔子称其“仁而不佞”。孙星衍，清朝经学大家。

本文选自清嘉庆十三年刻《东昌府志》卷四十七“艺文”。

附：

仲子庙匾



仲子，即仲由，字子路，孔门弟子，尤为出名。其历朝皆有加封，明以后称“先贤仲子”。以“负米奉亲”之举列入“二十四孝”，曾于范县（今莘县古城镇为其县治）开坛讲学，后人立庙纪念。此匾为郑板桥所题，今存莘县文物管理所。



窦小姑

清·须方岳

聊城县窦某者，乾隆间以武艺举于乡。有三子一女，皆骁勇矫捷，女即小姑也。窦尝为客商保镖，以红三角旗为记，南北往来，无少差误，以是人皆信之。后踵门求保者无虚日，父子应接不暇，广请夥友，开行于城东射书台下。是时北五省绿林豪杰最多，然无不知窦家红旗镖之不可犯，惟直隶某寨盗魁黄天狗者，臂力过人，啸聚颇众，不甚心服。窦偶经其地，亦加意提防，从未相值一较低昂。一日，省垣某达官干仆，领健骡百余头，驼银十数万金，将诣京师，限有日期，投窦行中乞保，行中人适皆派出，无一在家者。某仆绕床顿足，叠唤奈何。窦妻踌躇无计，欲出辞之。小姑从容起曰：“路上失镖固败吾名，镖至行中而不能行，误人家事，亦败吾名也。”母曰：“然则奈何？”小姑曰：“儿亦曾从父学习弓马，雄冠而出，自尚堪胜任。”母曰：“吾闻某寨之恶，汝父尚惮之，此去必由其地，汝能当之乎？”小姑曰：“请试之。”遂易男子装束，挟弹牵马，驱镖而出。行六七日，将过某寨，小姑见距寨十余里有店甚大，时且薄暮，率众投之。小姑坐店外，倚弓于墙，把壶啜茗。无何，一总角小儿以火寸爇火嘻戏左右，小姑不以为意，小儿潜焦其弦而遁。及晓复行，离店数里，丛树中群盗突至，牵其驼骡而走。小姑奋臂开弓，弹丸未出，崩然一声，弦分两段。谛审之，始悟昨日火寸之有由，即策马反身而走。违盗稍远，截发接弦试之，颇固，乃跃马前来，见驼骡已半近寨门，乃厉声曰：“汝等不识乃公，而来讨死耶？”霹雳一声，一盗已倒于地，手中丸未尽，百步间伏尸十数人。天狗知不能敌，忙摇手曰：“且勿且勿，小子无知，遂犯宝镖，幸不见罪。”即回头叱去左右，已而又曰：“知足下路出敝寨，备有菲酌，能不吝光顾否？”小姑意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允之。遂与天狗并辔而进。寨外驼骡以及夫役人等，命左右就地供给。及



至其处，水陆珍馐，咄嗟而办。三巡酒后，天狗以匕首戮肉一脔，起向小姑曰：“戋戋微敬，幸不我辞。”意将伺小姑启吻，直刺其喉。小姑致声不敢，以口接之，即嚼折刀头半寸许，适见燕语梁间，唾刀头刺之，燕立坠。天狗为之失色，因谓小姑曰：“虎父无犬子，信然，今日几交臂失之，敢请俯收门下，厕诸弟子之列。”且商之曰：“君家红旗，人多假冒，此后旗上望添二白带缀之，则燕赵诸寨，无人敢正眼觑矣。”于是，将所劫之物一并送还。及出，某仆惊喘不能动，强扶上马同行。年余后，绿林中始知为窦某之女，共相咋舌曰：“其女如此，其父子可知。”由是东昌窦家镖之名噪天下，因戏呼旗上白带为窦小姑裹足帛云。

写得小姑出色，而窦家镖之无敌可知，此如画龙者于风云晦冥中得露出一鳞一爪，而全体自见。——崔子遴

注：须方岳，字亦咨、蓉岩，堂名补桐轩，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清同治九年（1870年）作幕聊城，为聊城县衙“师爷”。

本文选自《聊摄丛谈》卷一。《聊摄丛谈》为须方岳居聊期间所编著，共116篇，内容仿《聊斋志异》，专记奇闻异事。这些事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经多年搜集而成，类似于稗官野史。此书仅见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文英堂刻本，清崔子遴、程仲新评。山东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有藏。



附录一：

聊城文献资料征集公告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公益性学术社团。自2010年4月成立以来，已有会员106人，征集资料百余部。为进一步挖掘聊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更好地为聊城各项事业发展服务，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研究决定，继续面向海内外征集聊城文献资料。

征集范围：

- (一) 与聊城历史文化有关的各种纸质文献资料，包括历史上聊城籍人士和外籍人士所作关于聊城的著作或绘图；
- (二) 石刻、木刻、名人题字以及名人使用收藏的文物拓片与影像资料；
- (三) 文物、古迹遗址等影像资料。

聊城文献征集活动长期进行，征集到的资料将在聊城文化部落（<http://whbl.lcxw.cn>）相关栏目进行公布。本会期待研究和关注聊城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提供资料或线索，共同为聊城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联系方式：

电话：13082788329

邮箱：lcctwhyih@qq.com 1052734146@qq.com

QQ：1052734146

网址：<http://whbl.lcxw.cn>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



附录二：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

顾问委员会

名誉会长：金维民 李 喆

名誉顾问：贾少勇 李望尘 马亮宽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高文举 周济成 杜泽逊 杨 达 宋士功 刘全来

理事会

会长：吴文立

副会长：姜国峰 薛兆立 陈清义 侯秀丽

秘书长：张东方

副秘书长：王庆友 罗 文 黄复庚 刘庆功 任家斌 赵 铮

常务理事：吴文立 姜国峰 薛兆立 陈清义 侯秀丽 张东方

张和鹏 朱海波 刘庆功 王庆友 罗 文 黄复庚

金凤杰 何丽丽 路子强 李印元

理事：吴文立 姜国峰 薛兆立 陈清义 侯秀丽 张东方

张和鹏 朱海波 刘庆功 王庆友 罗 文 黄复庚

金凤杰 何丽丽 路子强 李印元 丁兴业 赵 铮

栾 伟 王 栋 范瑞芳 李永军 程清斌 孔祥鑫

吕 品 张西同 辛灵美 任家斌 张文兴 刘富云

董长侠 魏 辉 程占祥 张月炳

研究机构

运河文化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清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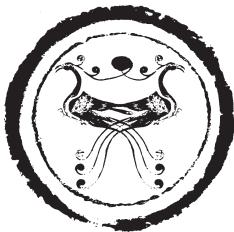
专家委员：吴 欣、赵中田



东昌古城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彦华
曹植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玉新
元好问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金光
馆陶古城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戴敬仁
蛤蟆嗡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许士瑞
文史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长城
民俗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凤杰
于慎行研究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孙述贵、康学森、郑天华
辞赋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丛本华
聊城七贤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学孟
书画研究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孟传科、布双起
太极拳研究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李 勇、陈同龙
潭腿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丁明业
查拳研究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吴小杰
国学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魏庆新
季羨林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秀芬
海源阁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玉民
临清古街巷研究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于 敏
武训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井 扬
中医与阿胶文化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丁延峰
文献研究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英顺
漫画艺术研究所	主任委员：邢培华
餐饮文化研究所	主任委员：谷万里
民间绝活研究所	主任委员：崔建利
中医文化研究所	专家委员：路子强
	所 长：徐 民
	所 长：高文广
	所 长：李玉成
	研 究 员：田吉坤 辛福春
	所 长：王奇先
	副 所 长：王志文 张继杰
	研 究 员：赵学众



会标



本标志采取瓦当形式，由两只飞翔的凤凰构成一个“文”字，契合传统文化研究性质，同时，其对称结构形成一个鼎型，寓意长久、正统之意。

官 网：

聊城文化部落 网址：<http://whbl.lcxw.cn>

联 系：

注册地址：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东昌路 105 号北二楼

办公地址：聊城市东昌西路 88 号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三楼

秘书处电话：13082788329

邮 箱：lectwhyjh@qq.com 1436075431@qq.com



后记

为了做好《聊城文献集成》这一大型基础性文化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展示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推动聊城传统文化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在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的编辑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金维民先生（聊城市政协主席）、李喆先生（聊城大学校长）分别听取了本书的编辑意见汇报。金维民先生还欣然同意将其撰写的《聊城历史文化优势解读》这一重要文章作为本书序言；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的名誉顾问、顾问等领导和专家给我们提出了中肯的指导性意见；

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高级顾问杜泽逊先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使本书大为增色。

在此，对各位领导和专家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省、市财政部门对我们征集资料、推动编纂《聊城文献集成》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为了搞好本书的编辑工作，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确定了部分学术骨干负责具体编辑工作。这些同志大都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业务素质较强、研究水平较高，在聊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均有有分量的成果，有较高知名度。特别是两位执行副主



编路子强（古典文献学硕士）、祝伟康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和优势，在业余时间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按照编委会的要求，我们对文章进行了精心选择，力求把那些有角度、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吸纳进来，并且对全书的体例、分类、编排等进行了反复研究斟酌，尽量使之科学合理，体现研究会的水平和实力，展示会员的研究成果，对聊城文化事业的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又有选择地请相关领域专家赵明信、王鲁、张富祥、徐泳等提供了专稿；《赵维新心学思想引论》是作者邹建锋、黄巍魏参加本会“儒家文化与聊城”研究活动的征文；《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是一珍贵资料，为方便研究参考，一并收录。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任务重，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难免出现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二〇一一年五月